

拂晓



沪西解放战争时期地下斗争回忆

中共上海市普陀区委党史研究室 编

拂晓

沪西解放战争时期地下斗争回忆

中共上海市普陀区委党史研究室 编

序

马 1.13

今年是上海解放 60 周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60 周年和伟大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 90 周年,在隆重纪念这些重大节日的日子里,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宣传部关于围绕庆祝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深入开展群众性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意见》的通知,这既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极好的机遇,也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为高扬爱国主义伟大旗帜和革命先辈的伟大精神,深切缅怀为新中国成立做出贡献的历史人物,展现重要的历史事件,激励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光荣革命传统,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为实现和谐新普陀而努力奋斗,中共普陀区委党史研究室选编了这本《拂晓》——沪西解放战争时期地下斗争回忆。

看到这本书,勾起了我对 60 年前那段令人难以忘怀的峥嵘岁月的回忆。作为唯一健在的、居住在本市的原地下党上海市委委员,我对沪西(普陀区前身)是怀有深厚感情的。沪西不仅是我大学母校——暨南大学的所在地,也是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斗争的地方。沪西小沙渡是上海工人运动诞生的摇篮之一,是工人

阶级在“五四”运动中首次登上政治舞台的战场,也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后最早向工人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发蒙之地。我们党和工人运动的很多领导人如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蔡和森、罗亦农、向警予、张浩、邓中夏、恽代英、项英、刘少奇等都在这里留下过战斗的足迹。沪西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分子为反抗外来侵略和剥削,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独裁统治,争取民主和生存权利,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进行了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解放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记得上海临近解放时,就有近百名同志被杀害,其中有不少是沪西的优秀同志,他们不管是在监狱里,还是在法庭上、刑场上都表现得非常勇敢,非常坚强,视死如归。今天,这些彪炳史册的壮丽篇章与本书所记载的英勇事迹一样,已成为我们后来者无可替代的宝贵财富,并正在变成激励我们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强大精神动力。

本书所收集的主要是反映沪西地区自抗战胜利到新中国建国前的有关革命史料。从历史的进程看,这一时期沪西的工人运动已经发展到一个成熟的阶段,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早已从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并且成为配合人民解放军作战第二条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汇集了许多亲身参加地下斗争和迎接解放战斗的老同志(有的已作古)的回忆文章,他们从不同的侧面回顾了当年参加革命的成长道路,再现了那些刻骨铭心的战斗场景,热情讴歌了如火如荼的斗争历程;“附录”部分撷取了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人民解放军在解放上海时发布的有关指

示、文告和电函等。

普陀区是革命文化底蕴非常丰厚的“资源大区”，它在早期工人运动史和党的创建和探索发展时期曾留下过不可磨灭的印记，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里所荟萃的史料仅仅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而已。然而，沪西的革命先辈们的英雄业绩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必将光耀千秋。如果说本书的推出能起到“存史、资政、育人”的作用，那么就是对编撰者工作的最好回报了。

最后，谨以此书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60 周年和上海解放 60 周年献礼！并借此机会表达一位老战士对所有参与迎接上海解放的老同志们的怀念之情！

（注：马飞海同志，福建福清人。1936 年进入真如暨南大学学习，参加上海大学学生救国联合会；1939 年在校由周一萍（原国防科工委副主任）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1940 年毕业于暨南大学数理系，任暨大支部委员。1942 年秋，党组织派其到新四军二师淮南驻地参加学习，后留在华中局城市工作部机关工作，1943 年春被派回上海。1945 年 7 月起任中共上海市委教育界运动委员会委员、副书记、书记、中共上海市委委员，领导了教育界改善教师生活斗争、私小教师“六·二八”反饥饿斗争、市立私立中小学教师总请假斗争。1949 年 2 月，负责领导沪南、徐龙区委和人民保安队的工作。上海解放后，历任市委党校副校长、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市委副秘书长、市教育局副局长、市业余教育局局长兼党组书记，市工农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市工农师范大学校长、市出版局局长兼党组书记，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目 录

序	马飞海
综述	/1
里应外合迎接沪西的解放	施惠珍/16
人民子弟兵血沃沪西	上海警备区党史办/21
夜幕下,地下党在行动	王关昶/26
迎接解放的日日夜夜	张翼均/32
真如地下党活动纪实	张文琴等 5 人/34
普陀警察局里的喋血战斗	贡斯文 钟 山/42
亲历真如解放的老人们共忆往昔	宋天生/47
真如发讯台向世界电告“上海解放”	顾淦翔/51
“一印厂”的艰苦奋斗	杨 善/55
视死如归的徐海峰	徐 林/63
钱琴——江姐式的烈士	麟 芝/66

深入虎穴的工运领袖汤桂芬	张菊宝等 5 人/70
沪西贫民区的地下斗争	陈鲁生等 4 人/83
千钧一发脱险记	杨志清 曹 前/88
药水弄的生死搏击	唐士林 丁玉海/94
腥风血雨中的抗争	华校生/98
接管普陀警察局	董 镇/100
27 军兵临造币厂桥	华校生 顾淦翔/103
建设沪西新政权	普陀区委党史研究室/106
蹉跎岁月永难忘	范小凤/113
我在工人运动中成长	杭惠兰/116
战斗在特殊岗位上	杨宽海/119
为死难烈士佩戴黑纱	徐明哲/122
团结起来到明天	吴贻燕/125
为了美好的明天	陈祥珍 包月芬/130
复工斗争中的上海绢纺厂	李志英/143
长丰厂工人斗争二三事	王菊秀/145
特殊战场上的无形战斗	邱月利/151
大陆铁厂的地下活动	周信业/154

解放前夕大隆厂的斗争	陈宝明/158
风雨中的女工夜校	王知津/162
难忘的师生情	黄纫秋/173
“你们是最有希望的”	陈祥珍/178
女工夜校与国际友人	杨杏轩/180
一堂难忘的启蒙课	包月芬/183
精神财富伴我前进	张梅芳/186
从觉醒到成长	杜惠娟/189
感谢夜校,感谢老师	王亚姑/191
一次生动的辩论会	唐永珍/193
从胆小女工变为革命战士	陆宗桓/195
人生道路上的转折点	薛文君/198
情同手足的引路人	丁巧玲 李爱珠/201
舞台就是战场	强 明/204
为工人姐妹引吭高歌	茹 伟/210
参加“三八”大游行	张菊宝/212
参加李公朴、闻一多追悼大会	李亚芳/214
在寅丰厂高唱《团结就是力量》	陈祥珍等4人/216

在募捐中得到锻炼	姚莲英 曹云卿/219
声援抗暴的交大学生	姚莲英 陈 奕/222
在课外活动中锻炼成长	沈 群/224
在工人运动中冲锋陷阵	杨 善/226
开辟地下交通线	林福英/234
接管上海印钞厂的前前后后	张 藏/236
大夏大学的革命斗争	郑广蒙等 4 人/240
青春热血 爱国篇章	程卫军/258

附 录

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	毛泽东/262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	/267
在丹阳集训会议谈解放上海问题(节录)	陈 毅/271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颁发“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的命令	/278
解放战争时期普陀区党史大事记	/280
解放战争时期沪西革命烈士(据不完全统计)	/305

后 记

综 述

今年,是新中国诞生和上海解放 60 周年。60 年前,中国共产党为了民族解放、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团结广大中国人民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迎来了上海的解放,取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

回眸往昔,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取得 1945 年的抗日战争胜利。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坚持独裁和内战的方针,又把中国拖进黑暗的深渊,中国人民进入了艰苦卓绝的解放战争时期。沪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历经艰难曲折,进行各种形式有利有节的公开和隐蔽的斗争,终于迎来了上海的解放。

沪西工人曾准备武装起义

1945 年 8 月 15 日,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联合反击下,日本天皇通过广播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虽已宣布无条件投降,但日军还未放下武器,而国民党迫不及待地来抢夺胜利果实,时局错综复杂,瞬息万变,历史正处于重要的转折关头。上海是全国的最大城市,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新四军是否进军上海,上海是否实行武装起义,涉及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斗争的全局问题。日本投降之前,上海地下党已在积极准备起义。从 8 月 15 日到 21 日,中央与华中局有过多次电报往来,进行反复讨论。上海地下党一面将情况向上报告,一面按原定方针,加紧准备,等待命令,发动起义。活跃在上海郊区的新四军淞沪支队在浦西、浦东积极开展活动,为支援上海地下军起义已在积极做准备。18 日,华中局向上海市委下达指示,乘敌伪统治基本垮台,国民党力量尚未到达的混乱之际,迅速做好起义准备。19 日,下达命令,组

织示威游行等方式发动起义，成立行动委员会，决定从浙东调2个主力团、杭嘉湖调1个团、苏中调1个团共赴上海策应起义。20日，中央已下达起义命令，华中局连续致电上海市委和淞沪支队，执行起义命令，立即以现有力量占领一、二个工人区，并迅速推广至全市，不必等到主力部队到达。根据中央和华中局指示，上海终于开始准备起义。上海市委选定沪西莫干山路信义铁工厂作为发动起义的据点。这是一家为日本军工生产提供原材料的工厂，地处沪西工人区，便于与在青浦活动的淞沪支队取得联系。工厂离戈登路（江宁路）警察分局较近，分局有地下党的力量，掌握藏有2000多支枪械库的钥匙。信义铁工厂内还存有一批大米，可供开大锅饭用。遵照华中局关于“不论是否举行起义，都应取隐蔽方针”的指示，沪西以地下军为骨干的工人以“清算日伪、要求复工和分发厂内存米”为口号，首先占领工厂，然后准备攻占戈登路警察分局，夺取枪支，扩大武装力量，占领沪西地区，与此同时，上海其它地区也采取相应行动，响应沪西起义，壮大起义声势。

8月23日清晨，沪西工人在地下军的引领下，携带武器，编成3个战斗突击队，布置在信义厂大门正面，大门东西两侧集中着地下党发动起来的2000多名棉纺、机器、面粉、被服以及人力车、搬运等各行业工人。地下军队员高呼“我们要饭吃”、“没收汉奸财产”等口号，带领群众冲进工厂，迅速控制了电话、要道和制高点，在二楼设了指挥部。3个战斗突击队进行夺取戈登路警察分局枪械库的准备工作。工人群众以厂为单位，集中坐在工厂的空地上。占领信义厂的消息很快传开，一批批工人闻讯而来，最多时达六七千人。直到下午4时左右，地下党工委书记张祺匆匆赶来向指挥部高骏等人传达上级改变行动计划的决定，命令撤走队伍，群众分批列队，高喊“要上工”、“要吃饭”等口号上街游行，然后散去，上海武装起义突然中止。原来根据全国形势的变化和行动方针的改变，中央两次急电上海停止执行起义命令，中央指出“日本投降条约即将签字，蒋介石已委任上海官吏，在此形势下，上海起义宜改为群众各种团体，发动清查汉奸斗争。”“目前起义对我们和人民是不利的，保存我们在工人中及其他人民群众中的组织基础，以便将来进行民主运动。”但是，因中央的21日命令是通过在青浦淞沪支队电台传

达的，故传递信息相对滞后，23日下午才到沪西指挥部。

当时上海的形势是在瞬息万变的，虽然日本投降，但仍有尚未放下武器的10多万日军和大批伪军，还有近2万多人的税警、保安队，此外国民党的各式别动队、游击队，国民党的空降正规军等到来，单凭淞沪支队、工人地下军和其他方面的力量，难以确保胜利，即使拿下部分地区，也难以守住阵地。中央审时度势的正确决定，避免了沪西革命力量遭敌人屠杀的一次浩劫。上海武装起义中止不久，9月2日，日本正式在东京湾的美国军舰上签字投降，至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沪西人民也进入新的战斗历程。

为了生存而爆发的复工斗争

日本投降后，众多的日商企业为逃避处理善后问题的责任，害怕工人们起来清算自己的罪行，而纷纷宣布停工并准备伺机携带资金、物资逃之夭夭。在地下党领导下，工人们迅速起来清算日本资本家的罪行，积极开展要求发放生活维持费的斗争。沪东地区最早起来斗争是日商上海纱厂。影响最大的是大康纱厂。国民党的接管大员到工厂接管，乘机大捞油水，中饱私囊，根本顾不上恢复生产。拉开沪西复工斗争的序幕的是信义铁工厂。早在8月24日，工人们来到苏州河北岸的平民村，成立沪西失业工人联合会，为争取工人早日复工而四处奔波。9月19日，国民党市总工会为粉饰国民党执政有方，要工人热情欢迎美国海军上将金开得率舰来沪访问，沪西失业工人联合会领导工人打着“我们要复工、要饭吃”横幅，浩浩荡荡到外滩，将“欢迎”变成示威，在场的国民党大小官员被搞得狼狈不堪。这些官员为息事宁人，被迫与中共沪西纱厂委员会书记范小凤派出的工人代表谈判。然而国民党当局派军警扣押代表，党组织经周密安排，在22日发动1.5万人的请愿队伍，从沪西赶到设在南市蓬莱路的上海市总工会，高举旗帜，高呼“被当局扣押之代表是我们失业工人的真正代表！”“我们是要工做、要饭吃的工人”等口号，迫使当局答应工人提出的释放被扣代表、要求发给补助救济费、早日复工的3项要求。为此，上海《文汇报》、《大公报》连续发表新闻和评论，《世界知识》、《联合日报》和苏联塔斯社的记者先后到平民村采访，表示支持，上海纺织业从10月起陆续复工，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

玉佛寺公祭昆明惨案牺牲烈士

1945年10月,国共双方签定了《双十协定》。不久,国民党违背《双十协定》,在美国支持下,调兵遣将,进攻解放区。1945年11月25日开始,昆明西南联大等院校集会,全市30余所大中学校万余人联合罢课,反对美蒋发动内战。12月1日,国民党当局指令军警特务镇压,将青年教师于再和3名学生杀害,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国民党统治区各大城市纷纷示威游行抗议,掀起了解放战争时期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内战、争民主的群众运动。

1946年1月13日,在中共上海市委领导下,上海大、中学校的学生、教师及工人、店职员1万余人到玉佛寺公祭于再等四烈士。大会主祭团由宋庆龄、柳亚子、马叙伦、沙千里、郑振铎、许广平、金仲华7人组成。宋庆龄送了“为民先驱”的挽联,柳亚子宣读祭文,各界代表致词,抗议国民党的法西斯暴行,要求严惩凶手,并致电政治协商会议,提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实行保障人民自由等8项要求。公祭仪式结束,群众要求游行,守候在附近的国民党警备司令部要进行干涉,会场突然响起《义勇军进行曲》,队伍冲出国民党的阻拦圈,浩浩荡荡走出玉佛寺,沿戈登路(江宁路)、静安寺路(南京路),到达三马路(汉口路)市政府。这场斗争成为抗战胜利后上海各界人民的第一次大规模的联合行动,揭开了上海争取和平、民主群众运动的序幕。

妇女节和“五一”节,人民力量的大检阅

1946年3月8日,在中共上海市委领导下,在沪西的兆丰公园(中山公园)举行上海妇女联合纪念“三八”节大会,包括沪西的大夏大学、圣约翰大学、大同大学和棉纺、丝织、卷烟等各行业约2万余人参加,大会主席团由许广平等7人组成,各界妇女代表纷纷发言,纪念大会成了控诉国民党当局的大会,成为向当局争民主争自由的大会。会议通过上海妇女联谊会致全国妇女的通电,会后举行了大游行,是上海妇女运动史上一次空前盛大的活动,上海各界妇女进一步被组织起来了。

同年的5月1日,是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国际劳动节。在共产党的领导

下,原计划在虹口公园举行全市性工人集会并游行,因突然大雨,临时改为分散活动。上午,沪西数千工人,冒雨举行游行,沿途高呼:“纪念‘五一’要保障职业!”“改善职工生活!”“要民主”等口号。下午,以沪西纺织业、丝织业为主的数千名工人在胶州公园举行“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大会。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朱学范任主席,沪西工人领袖汤桂芬等发表演说,大会通过“要求保障工人生活”、“停止内战”等9项提案。当天,英商电车、自来水、煤气公司及部分机器业工人也参加了沪西举行的集会和游行。

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纪念活动表达了上海工人要求和平民主的迫切愿望,显示了上海工人阶级紧密团结的威力。

争取和平民主,“六·二三”反内战运动

1946年6月6日,根据国共双方达成的约定,蒋介石和毛泽东各自向下属的部队下达了从6月7日起,在东北停止前进、攻击和追击的命令,也同时正式开始国共休战谈判,这个消息在上海引起强烈反应。但是,国民党却抓紧准备发动内战,并加强对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的控制和镇压。6月19日,沪西49个工厂的70多位工人代表集会成立了沪西工人反对内战民主促进会,发表《沪西工人反对内战民主促进会宣言》。上海的各界也都纷纷行动起来,反内战,要和平,已成为上海各界群众的一致的呼声。中共上海市委决定一方面通过由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和上海学生争取和平联合会出面组织和平请愿团的代表,另一方面组织广大群众去北火车站欢送请愿代表并游行示威,以壮声势,扩大影响。沪西工人队伍由汤桂芬负责。6月23日,5万多工人、学生、教师、职员以及工商、文化等各界群众打着旗帜、标语,从四面八方赶到上海火车站,欢送以马叙伦为团长的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横幅标语有一致“要求和平、反对内战”、“和平解决东北问题”、“欢送晋京请愿代表”等内容,整个广场一片沸腾。送走代表后,全场群众举行反内战大游行。而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乘坐的列车抵达南京下关时,代表们却遭到一批特务围攻殴打,马叙伦、雷洁琼等代表被打受伤,造成震动全国的下关惨案。消息传到上海,立刻激起全市各界人士的抗议浪潮,抗议国民党当局的暴行。揭开了上海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反对美蒋统治

的爱国民主运动的序幕,是上海人民从抗战胜利初期对美蒋存在幻想,到识破其反动面目的一个大转折。

要求解冻生活指数,为贫苦百姓摇旗呐喊

1947年2月,国民党当局为打内战,颁布《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宣布把生活费指数冻结在当年1月份水平上,并重申严禁罢工、怠工,违者格杀不论。国民党当局通过冻结生活指数搜刮职工血汗,而生活指数被冻结,物价仍飞涨,严重影响劳动人民的基本生活。全市各行业职工一致反对,纷纷提出要解除冻结生活指数。有首歌词唱道:“政府法令太巧妙,杀害百姓不用枪和刀。生活指数为什么要冻结!快快行动起来,为了我们的生存,争取指数的解冻。”3月3日起,沪西等各业的工人代表分别组成小型请愿团,到市参议会、社会局、中纺公司请愿谈判。中共上海工委决定以一个产业为主,汇合其他产业,形成规模的群众斗争。三区百货业工会通过在职工中开展民意测验,进一步激发了群众反抗的情绪。5月8日,上海丝织业首先举行大游行,全市包括沪西等区的丝织工人在内1万多人分别到胶州公园等地集中,最后汇集到外滩,经南京路到国民党市政府,又到社会局,一路高呼:“肚子吃不饱,什么事也干不了!”“大票满天飞,工人饿肚皮!”“生活指数不解冻,工人肚皮就要冻结!”“打倒官僚资本!”“打倒贪官污吏!”强大的群众运动,迫使国民党当局而被迫出台《上海市工资调整暂行办法》,宣布生活指数有条件解冻,底薪在30元以下的,按公布的指数十足发给,30元以上至100元以下的,每10元为一级,逐级递减10%。这场解冻生活指数的斗争,工人获得初步的胜利,使工人认识到只有团结起来,才能自救,只有团结起来才能生存下去。

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五·二〇”运动

1947年初反美抗暴运动是以青年学生为主力的斗争,是国统区出现反美反蒋第二战场的标志之一。年初,上海交大护校斗争,全校学生2700人集体赴京请愿,在真如车站被军警包围,国民党教育部部长朱家骅抵真如,乘铁甲车,偕同市长、议长、警备司令,隔河训话,蒋经国也调动青年军第202师,准备镇压。

最后,中共地下党组织通过学生代表的有理有节的谈判,迫使朱家骅答应学生提出的不能更改交大校名等5项条件和不开除学生要求。学生斗争胜利告终,极大鼓舞了全市学生界的斗志。是年5月20日,上海36名学生代表赴南京,汇合南京、苏州、杭州6000人,高呼“我们要饭吃”、“向炮口要饭吃”“反饥饿、反内战”口号,在南京珠江路口,遭到军警密集的血腥镇压,重伤19人、轻伤104人,被捕28人,酿成震惊中外的“五·二〇”惨案,全国许多城市掀起罢工、罢课、罢市的抗议浪潮,形成全国性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革命风暴。沪西的大夏大学、圣约翰大学、大同大学和晋元中学等学校都投入战斗。沪西女工夜校师生组成慰问团到交大慰问学生和联欢,毛纺厂60个女工写信说:“你们的血决不会白流,每一滴殷红的血将唤醒每一个沉睡着的人!”“我们相信有牺牲才有成功。为民主自由和抢救水深火热中的人民大众,你们是勇敢的走在前面,我们再不能沉默了,在这儿我们发誓,愿作后盾。”

毛泽东曾指出:“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第二条战线的开辟和发展,对全国革命斗争的大转折、大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中共中央向全国提出了:“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的口号。

震动全国的申九“二·二”反暴战斗

1848年2月,上海棉纺业工人为争取一年一度的年关奖,在上海掀起了反抗斗争风暴。年初临近农历年关,国民党中纺公司和棉纺业同业公会,与反动的工福会一起,决定年奖按照1946年标准打8折分两期发放,遭到全行业工人的一致反对。中共上海市委工委提出“年奖不打折扣,按当月生活费指数发放”的口号,发动全市棉纺业工人起来斗争,与学生界开展的救饥救寒运动相呼应。沪西的申新九厂是上海规模最大的民营纱厂,7000余职工中,党员约30人,有男工支部和女工支部,群众基础较好,中共上海市委决定申九为斗争的突破口。工委书记张祺与中共沪西民营纱厂工委书记周小鼎、沪西棉纺业工会党团负责人范小凤一起研究行动。30日申九罢工开始,厂房屋顶升起“工人团结起来”

的旗子,一些党员带着传单、标语贴到电车、三轮车上,申九工人罢工的消息很快传遍上海滩。上海先后出现舞女捣毁社会局的舞潮、同济大学争民主,反迫害的学潮和申九工人年关斗争的工潮,面对“三潮”并发的全市性反蒋斗争局面,国民党当局惊恐万状,以为共产党要搞总暴动了,下令武力镇压申九工人罢工。其实“三潮”并不是地下党的统一行动,而是个巧合。工委曾通过沪西民营工委收缩规模,要躲过敌人的打击。但沪西地下党组织尚未及时收到收缩罢工的指示,仍按计划罢工。2月2日凌晨5时,全副武装的警察包围了正在罢工中的申九,工人以一切可用的工具自卫。在下午4时,在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命令下,敌人在装甲车的冲击下,敌人的催泪弹、枪弹密集地射向工人,在殊死搏斗中,女工蒋贞新、王慕楣、朱云仙当场牺牲,百余人受伤,被捕200余人,其中26人被判刑,地下党员、罢工总代表被判无期徒刑,300余人遭资方开除。16日,申九工人被迫复工,罢工在敌人的血腥镇压下失败了。申九惨案发生后,全市各界人士纷纷开展募捐、慰问、悼念等后援活动,几天之内,全市捐款达3.2亿元,2月22日,全市许多工厂佩带2寸2分宽的黑纱(象征2月2日)走上街头散发传单,悼念烈士,全国各地寄来慰问信;解放区军民决定“五一”节义务劳动一天,支援申九工人的斗争,形成全国性声讨国民党当局血腥罪行的巨大声势。沪西申九工人的斗争和牺牲,表现了上海工人面对全副武装的敌人所表现的威武不屈的英雄气概和奋起反击的英勇壮举,极大地鼓舞了全市人民反抗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斗争,敲响了反动统治的丧钟。

肩负上海工人阶级使命,出席全国劳动“六大”

申九“二·二”斗争后,敌人对虎口脱险的罢工骨干追捕不止,党组织设法转移,有的到解放区,有的四明山去打游击,其中沪西工人运动领袖汤桂芬、沪西三区的机器业工会顾亮和毛纺业工会惠根宝、申新九厂工会徐明哲等17人被选派到哈尔滨出席全国第六次劳动代表大会。他们化装成跑单帮、学生、商人,千里迢迢,穿过敌占区,绕道异国的苏联、朝鲜,抵达哈尔滨,代表上海50万工人阶级参加大会。1948年8月1日大会开幕。早年曾在沪西战斗过的李立三代表党中央致开幕词,回顾了一大到五大期间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战斗历程,深情地说:“特别

是今年2月间,上海申新九厂工人的罢工,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坦克、机枪的屠杀下,死伤100多人,表现了上海工人革命斗争的光荣传统至今仍保持着。”汤桂芬代表上海工人阶级保证完成大会提出的任务:“上海解放时,工厂、仓库等将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有信心把上海变成最繁荣的城市。”对她的发言,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大家高呼“打到上海去,活捉蒋介石!”“毛主席万岁!”“工人阶级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沪西的汤桂芬、顾亮等当选执委。

中共上海市委根据中央指示,决定撤退一批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将他们撤至华中解放区、撤至大洪山、大别山、四明山、皖西等解放区,他们中有沪西已被敌人列入黑名单的、有为解放区建设和接管新解放城市的需要而输送的科技、工程、医护等专业技术人才;市委还将一些骨干转送到香港学习班培训,通过学习,统一思想,积极贯彻中央的指示,在人民解放军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完全有把握摧毁国民党的抵抗,解放上海并不需要采取城市武装起义的直接行动,决定为里应外合、迎接解放、接管上海做好思想准备。香港学习班为准备解放上海作了干部储备,其中有后来安排到沪西区委的施惠珍,为解放沪西作出贡献。

适应急剧变化的形势,重建中共沪西区委

1948年末,全国解放战争已取得决定性胜利,中共上海市委为把工作重心转为迎接上海解放的中心任务,为有利于统一领导地区内各系统党的工作,避免敌人分割击破,市委决定对党的领导形式作一次大的调整,把按系统垂直领导的方式改为按地区实行分区领导的体制。是年12月,在市委领导的主持下,中共沪西区委员会正式成立。原本区各系统的党组织先后统一归属区委领导,下设中共中纺系统分区委、中共民营棉纺第一分区委、中共民营棉纺第二分区委、中共沪西杂纺委员会、中共沪西机器业分区委、中共沪西卷烟面粉分区委、中共沪西劳工教育分区委、中共学生分区委和中共沪西地区分区委。同时还建立党的外围组织沪西工人协会,并成立党团,杨秉儒担任沪西工协党团书记。沪西的中纺棉纺业、民营棉纺业、丝织业均成立工协分会,还有沪西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等秘密外围组织。

1949年4月中旬,中共上海市委决定,将全市各企事业单位已普遍存在的护厂队、护校队、纠察队、消防队、自卫队等集中起来,在人民团体联合会的领导下,建立统一的人民保安队和人民宣传队。沪西人民保安区分队是以工人为主体,联合学生、城市贫民、职员等组成的武装自卫组织。他们主要任务是收集资料,收听新华社和国外电台的广播、中外报刊的报道,进行综合分析,编写宣传材料。沪西地下党组织从组织上、思想上为上海解放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在反迁移、反破坏的护厂斗争中与反动政府博弈

1949年1月,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国民党政府下令各地“应变”。中共上海市委根据中共中央上海局指示,决定开展“反破坏、反屠杀、反迁移,护厂、护校”的斗争,以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3月1日,在市委领导下的上海工人协会(简称工协)发出《工协纠察队总部通知》,要求各工厂企业建立工人纠察队。其任务是保护工厂、反对搬迁;保护工会、反对迫害;监视敌特,瓦解反动武装;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维持地方秩序。沪西各工厂接到工协通知后,很快成立各种形式的护厂队和纠察队。收集国民党政府警察人员分布和武器装备情报。大隆机器厂厂方趁工人回家过春节的时机,拆走精密机床。卡车开到厂门口,工人闻讯从四面八方汇集工厂,地下党支部立即组织护厂队,向卡车司机宣传:我们靠机器吃饭,你们靠卡车吃饭,拆走机器、没有卡车等于打掉饭碗。司机支持护厂工人,使拆迁计划没有得逞。中央印制厂(今上海印钞厂)厂方勾结国民党工会召开搬迁会议,工协坚决反对,提出“人在机器在”,坐在机器上,挫败厂方的搬迁计划。工纠队保护工厂财产,对锅炉房、电气间、机动部等要害部门,均有专人值班。中纺公司是国民党的最大官僚资本企业,是他们重点破坏的地方。工人获悉中纺印染一厂的机器要被强搬到台湾,党组织及时提出“反对搬迁,保护机器就是防止失业、保饭碗”的口号,对重点地方工人分兵把守,工纠队员严格检查送进锅炉房的每一车煤,拣出异物,防止意外,对可能被移作军用生产的物资严加看管。中纺一厂厂方调来10多辆大卡车装布匹,工人们一拥而上,经过谈判,达成协议:进多少原料出多少产品。经过护厂斗争,沪西地区工厂的机器、厂房,特别是重点设备和原材料得到完整保护。

决战前夜的里应外合,迎接解放的曙光

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后,国民党政府在土崩瓦解中垂死挣扎。4月底,国民党军一个团驻扎在大隆厂和附近几个工厂里,团部设在大隆厂办公楼。大隆厂中共支部发动工人对驻军兵士宣传战局形势,启发思乡之情;关心士兵生活,尽可能解除敌意。5月25日,苏州河以南的市区已解放,该团和上级联系中断,龟缩在阵地内,地下党支部又进行劝降,团长见大势已去,挂出白旗投降。驻中央造币厂(今上海造币厂)国民党军抢劫仓库银元,大隆厂人民保安队紧急出动,围截敌军,搜出银元。有的敌军丢下武器准备逃命,人民保安队就提供衣物以瓦解敌军。

5月17日,一批溃退的国民党军强行进入第一印染厂,妄图依仗坐落在苏州河边的工厂厂房负隅顽抗。护厂的人民保安队联合制定对策,警惕敌军破坏,积极做分化瓦解工作,帮助传递家信,会见亲友、提供便衣、赠送路费。敌军士兵陆续开小差。

5月21日,从月浦溃退下来的20多名敌军,由排长带领,闯入中纺二机(纺织机械专件厂)的江宁路大门,占领靠近澳门路的仓库。第二天,又有12名国民党尉官佩带短枪,带着雷管、炸药,找到中纺二机厂厂长要工厂平面图。中共地下党党员郑世昌以护厂团副团长名义出面接待。敌军把护厂团副团长当作自己人,讲明是交警总队派遣,必要时炸毁工厂。这两股敌军对工厂威胁很大,郑世昌向中共沪西机器业分区领导汇报请示,进行周密分析,制定护厂方案。护厂队员主动接近敌军,对厌战的老兵,思乡的民夫,被人民解放军俘虏过的军官,分别做瓦解工作。24日,上海临近解放,人民保安队分两路:一路找排长聊天,趁其不备将其制服,夺得枪支;另一路趁6名交警军官外出,把他们缠住在家。一个排的敌军,在排长被俘后全部投降,人民保安队立即使用缴获来的武器包围交警尉官住房,对峙到25日,人民解放军进厂后,把他们全部抓获。

据不完全统计,沪西地区共瓦解敌军1个团和3个营,共2000余人,其中团长1名,破获“东北民主联军”和“东南工作队”特务组织;缴获战车6辆,大批长、短枪支和各种炸药、雷管、电台等军用物资。

沪西中共地下党员在解放前夕,写信给各厂厂长,要他们保护工厂,支持工人护厂活动,亦取得效果。如中纺公司总经理也毅然向人民靠拢,做了有益于人民的工作。

他们是黎明前夕英勇倒下的革命先驱

上海解放,沪西解放,有很多沪西地下党员、爱国志士、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牺牲。

战斗在普陀路警察分局的钱凤岐、刘家栋是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安排在敌人魔窟里秘密战斗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凤岐是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他们以警员的身份,秘密搜集情报,及时向党组织作通报。上海解放前夕,钱凤岐以拉胡琴、唱京戏为名,把警员吸引到自己的宿舍里,传播国民党在前方惨败和解放军节节胜利的消息。中共上海警委从电台收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后,立即油印2000多份。钱凤岐、刘家栋接受分寄任务,迅速将布告附上警告信,寄到警官和特务分子家中,敦促他们认清形势,起义反正,立功赎罪,争取宽大处理,在警察局内部引起极大震动。国民党上海警察局局长毛森暴跳如雷,连续下了3个训令,要迅速破案,并在警察系统内疯狂搜捕。5月13日,敌人找到地下党发信的破绽,当晚将钱凤岐、刘家栋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埋伏在杨浦分局的中共党员钱文湘和进步青年蒋志毅。毛森连夜主持审问,他们在一个星期内被审讯几十次,遭受严刑拷打,仍坚贞不屈。20日,他们被杀害于闸北宋公园,是为警委四烈士。

1949年初,国民党当局要把中纺公司设备先进、生产能力较强的中纺印染一厂的机器设备秘密拆迁到台湾。地下党组织利用中纺公司发给各厂进行护厂的通知,争取到护厂合法化、公开化、群众化,抵制搬迁,保护了工厂,并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秘密利用厂里印染设备,印制了“上海人民保安队”袖章,给上海全市解放当天上海人民保安队保卫上海,维持社会秩序提供凭证和标识。为防止敌特和兵痞的破坏作出自己的贡献。第一印染厂党组织地下斗争挫败了敌人的阴谋,但敌人并不甘心失败。5月23日上午,国民党普陀警察局要一印厂的工会理事长杨善去谈话,她机智地甩掉敌人的纠缠。下午,警察局出动“飞行

堡垒”及近百名便衣武装特务包围一印厂，搜捕杨善，没有得逞，痛骂下属连一个共党也管不住，便又到工厂的一印加工场逮捕了19名工人，第二天就把地下党员工协会负责人孙方璟和工会积极分子张如松、李阶平杀害，他们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在黎明前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血沃沪西，普陀解放得新生

1949年，中共中央从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后开始部署渡江作战，组成渡江战役总前委，成员有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邓小平为书记。5月3日，陈毅等领导相继到丹阳，部署解放上海和确定建立机构和干部配备，成立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确定上海地下党的任务是配合与协助解放军，当上海解放后，地下党的任务即告结束，而应立即在思想上、组织上与解放军结成一体，负担新的任务。

5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于苏州发布淞沪作战命令。苏州河以南及浦东属第九兵团；苏州河（含）以北及闸北吴淞属第十兵团。12日，上海战役拉开序幕。上海第一战役阶段为钳击吴淞口，封锁黄浦江，扫清外围。第十兵团先后攻克浏河、太仓、昆山、嘉定、南翔、安亭。第九兵团先后攻克平湖、嘉善、松江、青浦、金山、川沙、高桥等地。第十兵团的月浦、刘行战斗激烈，遭敌军的重兵顽抗，经过10天的激战，解放军已从东、南、西三面包围上海的国民党军，于是上海战役进入第二阶段的总攻上海市区。23日，三野司令部下达《淞沪战役攻击命令》，各部队同时发起总攻。进入上海战役的各军，严格执行不使用火炮等重兵器射击的规定，采用多路快速前进、勇猛穿插、迂回包围的战术，以保全市民的生命财产，保全市区的建筑物。

沪西地区被苏州河分割为北部（浜北）和南部（浜南），为迎接沪西的解放，中共沪西区委还临时组建了浜北分区委，以备发生战斗时，统一领导北岸地区党组织开展斗争。中国人民解放军于23日夜发动总攻，第27军最先进入市区，25日解放了苏州河南岸的普陀区。入城后，他们不惊扰人民群众，指战员露宿在人行道上。

此刻苏州河北岸还未解放，敌人在中央造币厂一带仍有重兵把守，解放军

在南岸与北岸的国民党军对峙。23日国民党上海守备司令汤恩伯撤退时,临时委任国民党第51军军长刘昌义为淞沪警备副司令,兼51军军长。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7军81师师部驻守在普陀区西康路劳工医院内。81师师政委罗维道通过我党在敌军内部的关系,与驻守在苏州河北岸的刘昌义取得联系,动员他放下武器,率部投诚。刘昌义在我军的强大政治攻势下,弃暗投明,带了一些随从,开车从江宁路桥到西康路劳工医院内的师部驻地谈判,并于下午虹桥镇人民解放军27军指挥所洽谈投诚事宜,刘昌义当晚决定率国民党51军撤出阵地,26日到指定的江湾、大场集结,听命处理。

解放军攻占市区的战斗神速,26日,第27军多路并发,插入苏州河以北地区。但是,驻防上海的国民党青年军、交警总队不听命于刘昌义指挥,市区战斗仍在进行。我军第23军67师,于清晨,由曹家渡强渡苏州河,于中央造币厂附近俘虏交警千余人,尔后向江湾进发;是日清晨,第23军68师由周家桥渡河,继续向真如进发。第26军77师向真如攻击,在发动对真如、绿杨桥的攻坚战中,以我军59名指战员牺牲的代价,当天下午占领真如车站、真如国际电台。电台报务员用简便公电“XA”向全世界各地发出了“上海解放”的消息,同时收到不少电路发来的“XA”,向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5月27日15时,解放军27军在杨树浦受降最后一批国民党军230师残部,至此,上海全境解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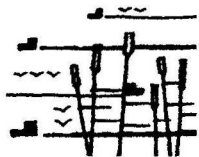
上海解放,沪西人民真正当家做主人

5月25日,普陀区解放,27日上海全市解放。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随即在沪西地区按原上海市行政区划分别设立普陀、江宁两个行政区接管委员会。6月3日,成立普陀区接管委员会,赵虞任主任委员,驻军团长范国璋、公安分局局长董镇任委员。原地下中共沪西区委已完成历史使命,处于待交状态。在接管工作期间,沪西区委除了配合协助各系统接管工作外,对于党员的转接组织关系、收缴党费、党员登记等均照常进行。8月6日,中共上海市委决定建立新的中共沪西区委,管辖普陀、江宁两个行政区党的工作。9月2日,市委正式任命吴亮平为区委书记,下设组织部、宣传部、工人运动委员会、青年运动委员会

和妇女运动委员会,1950年2月起,分批公开了地下党的基层组织,沪西开始进入历史发展的新阶段。

回眸解放战争时期的4年岁月,那是充满着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倒退、解放与奴役斗争的年代,中国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赶走日本侵略者后,中国又面临两种命运的决战: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老路,还是开创独立、民主、繁荣富强的光明的新天地。而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顽强奋斗,终于推翻了代表黑暗势力的蒋介石独裁政权,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沧桑巨变,震撼世界。

上海是中国的骄傲,沪西是上海的一块宝地。解放战争时期,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沪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发动大规模的爱国民主运动,在黑暗的反动统治时期,人民积蓄革命力量,形成配合解放军进攻的第二条战线。1949年元旦,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从1919年“五四”运动沪西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以来,沪西人民历经了30年的浴血奋战,终于站起来了,成为国家的主人,迎来了新生,一个伟大的新时代开始了。



里应外合迎接沪西的解放

施惠珍

重建和发展党的组织

上海解放前夕,我专程赶赴香港参加学习,目的是为上海解放做必要的准备。从香港回上海后,我先在学委系统,女中区委工作了一段时间,不久后又调到沪西区工作。这时,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先后胜利结束,中央原来估计打败国民党反动军队、取得全国性胜利,需要五年左右的时间,但现在,全国解放很快就要到来,上海解放的进程也大大加快了。我到沪西区的任务,主要是和区委同志一起,依靠全体党员发动群众做好迎接上海解放的准备工作。

我进入沪西区工作时正是申九“二·二”斗争结束后不久,群众政治觉悟已经大大提高。在斗争中,大批的积极分子得到锻炼,但我们的力量也受到了损失,一部分党员与积极分子被工厂开除,不少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有些撤退转移到香港或解放区。因此,区委领导机构和基层党支部都需要重新组织与加强。

经组织介绍,我到沪西区与周小鼎、钱希均两位同志接上了关系。后经组织决定,我参加了地下党沪西区民营棉纺委员会。周小鼎任书记,我和钱希均是委员。1948年12月前后,我们正式成立地下党沪西区委员会。其中,夏明芳为区委书记,周小鼎是副书记,我和王关昶均为委员。上级领导人主要是马纯古(张祺同志也短期领导过我们)。

我记得区委领导机关就在周小鼎、钱希均夫妇的居住地,地址在江宁路1353弄泰来坊内,一个朝南的客堂楼的二楼。后来,由于周小鼎屡屡被人跟踪,上级决定调周小鼎和钱希均同志到浦东去工作,同时在小沙渡路(现西康路)药水弄新买了一幢二层楼独用房子,重建了区委机关。我和丈夫王关昶继续在沪

西工作,王关昶对外声称是老板。为了更好的掩护,马纯古同志决定把我母亲接过来一起住。上级还派来一个年轻女党员担任区委保卫工作,对外名义是保姆。经过周密部署,我们一起建立了一个合法家庭掩护下的区委机关。

之后,我们的区委委员逐渐有所增加,安中坚、李德鸿同志相继加入进来,我们5个区委委员一直工作到上海解放。

不断扩大党组织的影响

那时,我们迫切需要增强党的力量,扩大党的队伍。经过斗争和实践的考验,我们也团结与教育了一大批积极分子。在上级党的领导下,我们开始积极地发展符合条件的同志入党。

那段时间可以说是党组织的大发展时期。到上海解放时,沪西区大约有1194名党员。仅从工厂6个分区委统计,在1948年12月底,所有工厂支部党员共有514名,到解放前夕已发展到976名,增加了近一倍。通过发展党员的形式,我们不但加强了党的核心力量,也发展了党的秘密外围组织:在工厂发展有觉悟、并具备条件的工人参加“工协”;在学校发展具备条件的学生参加“新青联”(也有少数学校经党的上级批准,成立性质相同名称不同的类似组织);在地区发展有觉悟的贫民参加“贫民团”;在职员中发展“职协”;在中纺系统的中高级职员中发展“小纺协”;在教师中发展“教协”等等。这些队伍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在上海解放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由于党员和党支部不断增加,为适应基层党领导的需要,区委逐步地成立了各类分区委,各个组织之间互通有无,齐心协力,为上海解放做了大量工作。

里应外合迎接解放

1949年1月,全国三大战役结束,解放军即将挺进上海。当时的南京政府知道大势已去,于是下令各地组织“应变”,他们准备拆迁机器、搬运物资、转移资金、破坏工厂,妄图垂死挣扎。我们得到消息后立即制定对策,决定揭露敌人的破坏阴谋。

为了阻止敌人的破坏行动,我们发动群众提出了“反对拆迁机器、反对搬运

物资、反对转移资金、反对破坏工厂”的口号，号召护厂、护校、护店、保护地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通过各项斗争，达到完整地保护好上海，配合解放军解放上海、接管上海的目的。对于我们来说，这既是一次“起义”，也是最好的“里应外合”。

针对广大群众渴望解放，迫切要求了解党的城市政策的情况，一些地下党员、工协会员和其它积极分子冒着生命危险，采取各种办法秘密印发宣传资料，有的还将秘密收听到的解放区电台广播的新闻印发出去。我们大量散发中共地下党市委统一编印的《新华通讯》、《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六次劳大决议》、《关于工商业政策》等宣传品，宣传形势和党的政策，传播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国民党反动统治行将垮台的消息，号召人们以实际行动迎接上海解放。当这些宣传材料出现在车间、更衣室、厕所及厂门口等地方时，工人们争相传阅，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和资本家也非常关注这些信息。那种难以抑制的喜悦和激动之情流露在许多人的脸上。

进行一系列宣传活动之后，我们进一步发动群众开展护厂斗争。因为与大家切身利益联系密切，护厂斗争深得人心，很快就成为群众自觉行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那时，我们的工作形式是非常灵活的，比如，在掌握一定工会领导权的单位，我们就利用工会合法身份发动斗争。在没有或没有全部掌握工会领导权的单位，我们就一个车间、一个部门地逐步开展，通过自下而上的形式发动工人参与。在进行护厂运动中，不少工厂还开展了反拆迁、反搬运的斗争。

我记得1948年11月底的一天，上午9时许，七八辆卡车开进中纺一厂（解放后改为国棉一厂），径直向苏州河边的后栈房驶去。这时南织乙班中共党员史小妹警觉起来，她赶到后栈房一看，原来卡车装满了仓库的布匹和木材，正打算将东西运出工厂。面对卡车就要出厂的紧急状况，史小妹马上回到车间发动大家说：“现在有许多卡车在后栈房装布，成品没有了，原棉没有了，我们靠什么吃饭呀！大家赶快到工厂大道去拦车！”

当装满货物的卡车驶到南织布房间门口时，闻讯赶来的工人拦住了去路。工人们一拥而上，把车上的布匹都卸下来，扛进了南织布房间。押车人无可奈何，只能灰溜溜地走了。

事后，史小妹和其他党员交换了意见，决定以“工厂的利益，就是每个人的利益”为动员口径，率先在南织成立护厂队，将后栈房和布房间监视起来。之后，中纺一厂职工联谊会秘书长华树嘉代表中纺一厂会同中纺第一毛纺织厂茅祖匀与中纺公司总经理顾毓琇交涉，要求“原料进、产品出”。根据谈判结果，职工联谊会做出决定：库存原棉保证一个半月以上的储量，否则成品不得出厂。

这一次护厂行动成功地维护了工人的利益，也保护了工厂的财产。随着工作的深入，不少工厂纷纷成立护厂队，与反动势力展开了坚决的斗争。通过护厂运动和适当的宣传，我们成功地说服了沪西区的一些准备回乡避难的资本家，让他们打消了关闭工厂的打算。大批中小型工厂的资本家和工人们也开始共同努力，设法渡过难关，保护好工厂。

随着解放军日益逼近上海，国民党的军、警、宪、特惊恐万状，慌乱不堪。一小部分反动分子垂死挣扎，不断破坏护厂斗争，阴谋失败后，他们就公开进行破坏，甚至血腥镇压。

1949年5月23日下午，一批特务带着近百个警察，到澳门路包围了第一印染厂第二工场，特务根据混进工协的杭云生告密的黑名单，逮捕了19个工人（大部分是工协会员）。他们将工人连夜押到警察局严刑拷打。24日早晨，特务秘密杀害了共产党员、工协负责人孙方璟和工协会员张如松、李阶平，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印染血案”。

“印染血案”使我们损失了几位重要的战友，但敌人的残暴没有吓倒沪西工人护厂的决心。在群众的掩护下，我们继续想尽办法开展各种护厂斗争。共产党员、工协会员和广大护厂成员冒着生命危险，在非常艰难的环境下坚持护厂。大家决心坚守岗位，奋斗到最后一刻。

全力为解放上海做最后准备

为配合解放军解放上海的需要，我们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通过调查，我们渐渐摸清了敌情，掌握了警备司令部所在地以及配有装甲车数量，全区警察局数量以及警察人数、机枪、步枪、手枪的数量；了解了敌产和需要重点保护

设施等诸多情况,我们将社会调查来的所有资料,交由上级转给解放军参战部队,为解放军进驻上海提供第一手的资料。

根据人民解放军即将解放上海的形势以及上级指示精神,沪西区秘密地建立了一支半武装性质的人民保安队,在原来护厂运动的基础上,人民保安队员公开仍以护厂队员的名义,进一步加强护厂、护校、护店、保护地区、保护重点设施的斗争,配合解放军解放上海。人民保安队与群众性护厂斗争结合,在解放前夕不断挫败了很多次敌人的破坏计划,保护了工厂和地区各项重点设施,最后终于在1949年5月25日凌晨,成功地配合解放军完整无损地解放了苏州河以南沪西地区。

上海解放前夕的这段工作是我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经历。回顾那段艰难的岁月,我至今仍然觉得珍贵,那些亲密无间的战友和淳朴可爱的工人给予了我最为珍贵的友谊。我觉得非常幸福,因为我盼到了上海解放以及新中国成立的这一天。



人民子弟兵血沃沪西

上海警备区党史办

在上海战役中,解放上海市沪西区的部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7军。这是一支不怕艰难、勇挑重担、英勇善战、屡建战功的部队,这支军队与沪西地下党组织和人民紧密配合解放沪西,演奏出一首时代的奏鸣曲,永远值得怀念。

快速前进,不给敌人喘息机会

1949年5月,第27军的广大指战员,在军长聂凤智、政委刘浩天率领下,马不停蹄,人不息脚,迅速向上海挺进。当时,江南正值梅雨季节,阴雨连绵,但为了赶时间,不给敌人以喘息机会,全军日夜在雨中行军;浑身上下都是湿漉漉的,有的跌倒在水田中,一身泥和水,有的鞋子早已破烂,赤着脚在赶路,谁也没有叫声苦。连队里的许多共产党员为了带领新战士一起参加上海战役,尽管自己够累的了,但还是帮助他们背背包,扛枪支,甚至扶着他们一起前进。风呼呼刮个不息,雨淅淅地下个不停,但战士们嘹亮的战斗歌声淹没了风声和雨声。

27军部队在上海西南方外围作战中,先后拿下了七宝镇和泗泾镇。5月24日下午,占领了虹桥机场,接着,便从西面和南面多路向上海市区攻击前进。当晚9时,从吴淞口方向传来了向国民党守军发起总攻的隆隆炮声,这是9、10两大兵团将最后切断汤恩伯集团通往海上退路的胜利炮声!这时,市区战斗的激烈枪声也清晰可闻。聂军长拿起电话,看着作战地图,在问70师师长肖镜海:“部队打得怎样了?”肖师长兴奋地报告:“军长,冲进了,敌人退却了,我们正顺着南京路,林森路(今淮海路)向市里追击。马路上的电灯还给我们照着亮呢!”接着,27军的80、81师都先后打来电话。报告了他们部队冲进市区,正在沪西区的中正路(今延安路)、林森路、安福路、康定路向黄浦江边挺进的情况。有的

部队已到跑马厅(今人民公园)一线。81师的部队,25日晨2时,已将麦特赫斯脱路(今泰兴路)以西的国民党军肃清,并控制了苏州河的几座桥梁。26日1时许,81师的241团已由恒丰路桥及麦特赫斯脱路北端搭的浮桥渡苏州河后,向两侧发展,掩护79师攻击苏州河北。

27军的首长们,以喜悦的心情,分头告诫各部队,不要与敌人逐楼逐房、一街一弄地争夺,一定要尽快甩开敌人,插到市中心去,不给敌人喘息机会。结果,国民党守军被人民解放军穿插得昏头转向,极度混乱,无法进行有组织的抵抗,甚至连国民党警备司令部传送战斗命令的吉普车,也稀里糊涂地开到了27军阵地来了。许多被甩在后边监视起来的敌人,尽管有高楼大厦,坚固的工事,有的还配有装甲车和坦克,但在四面包围之中,也只能缴械投降,作了俘虏。

正由于27军的指挥员们考虑到上海市人区人口众多,工厂林立,建筑物密集,为了避免战火对城市摧残和对市民的伤害,他们采用了“快速跃进,勇猛穿插,迂回包围”的战术,制服了敌人,很快地解放了苏州河以南广大市区。

上海人民积极支援子弟兵

中国人民解放军之所以能够很快取得上海战役的胜利,这是与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和上海人民的积极支援分不开的。1949年初,党的沪西区委认真贯彻了中共上海局和上海市委的指示精神,广泛发动群众,深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大力开展反对敌人抢运物资,进行护厂护校的斗争。同时,积极进行策反工作,分化瓦解敌人,为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和接管上海,做了大量工作。

当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近郊后,盘踞在上海市区的国民党军退守到苏州河两岸的工厂和险要地区,妄图负隅顽抗、破坏工厂。沪西区地下党的同志,立即开展策反工作,向敌人讲清利害,动员他们缴械投诚,走新生之路。据守在造币厂桥南同兴被服厂,新裕一厂和桥北造币厂内的国民党军一个团,就是在地下党员对该团团长劝说后,放下武器的。逃窜到恒丰路桥南福新面粉七厂内的交警总队的200多人,凭借八层高楼的厂房,居高临下地控制了恒丰路桥,其中一个营长,又十分顽固,叫嚷要与工厂共存亡。人民保安队沪西指挥部几次派人与该厂的护厂大队长联系,研究了对策,做好士兵的工作,让他们放弃抵抗。当

人民解放军包围了该厂后，由人民保安队带路，绕道破墙而入。当那个反动营长还妄图顽抗时，被他的士兵开枪打倒，全营缴械投诚。

5月25日下午，沪西区委的领导同志王关昶、施惠珍等来到了西康路劳工医院（师指挥部）见到了人民解放军第27军81师的师长孙端夫，政委罗维道，经过双方自我介绍后，孙师长、罗政委以感激的心情说，十分感谢上海地下党的同志们，十分感谢上海人民，你们使马路上的灯火通明，照亮着我们追歼敌人；你们为我们带路、当向导，使我们很快地分割包围了敌人；你们为我们抢救伤员，看押俘虏，使我们解除了后顾之忧……。王关昶、施惠珍同志也满怀激情地说，天亮了！总算把你们盼来了！把上海人民日夜盼望的人民解放军盼来了；当看到你们入城后，秩序井然，热爱人民，不入民宅，露宿街头，怎能不使上海人民心情激动，怎能不更加热爱人民的子弟兵！正说着，沪西区的工人、学生和市民们一群群、一队队地敲锣打鼓，呼着口号，唱着革命歌曲，扭着秧歌来到了设在西康路劳工医院的81师师部，欢庆解放，欢迎解放军进驻沪西区的工厂、学校。这时，人民保安队沪西区指挥部的领导同志，也把精心挑选出来的50名人民保安队员送到81师指挥部。他们告诉孙师长、罗政委，这50位同志都是老工人，人民保安队员，对上海的道路很熟悉，来给解放军带路的。孙师长、罗政委再三表示感谢，并说，你们真是雪中送炭！可以说，这次上海战役的胜利，是军爱民，民拥军，军民相互支援、密切配合的结果。

25日夜，人民解放军许多部队就由这50位上海向导带路，跨过了苏州河，追歼河北的残敌！

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第27军的部队，从徐家汇、梵皇渡冲进沪西区后，仅仅经过4个多小时的战斗，苏州河以南市区就全部解放了。可他们怎么也没有料到，一条30多公尺宽的苏州河却把他们凌厉的攻势挡住了。各个部队从拂晓一直攻到中午，也没能攻过河去。是敌人变得顽强了吗？不是！对岸的敌人，早就是我军手下败将。是攻坚力量不强吗？也不是！这支队伍曾攻克过城高沟深、设防坚固的济南城，砸开过壕宽垒坚的碾庄，首先突破长江天堑，全军涌现了许许多多战斗英

雄和英雄集体。要在通常战斗情况下,突破这条窄窄的苏州河,本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在解放上海的战斗中,他们既要歼灭敌人,又要保全城市,这确是一项特殊而光荣的战斗任务。

为了使上海这座世界闻名的大城市不遭战火摧残,要比较完整地 from 敌人手里夺回来,我军的指挥机关作出了特殊规定:部队进入市区后,严禁使用炮火轰击,只许以轻武器作战。但苏州河的地形对攻击部队十分不利。国民党守军凭借北岸的高楼大厦,居高临下组成了严密的火力网,封锁了整个河面与南岸临河的宽广马路。每个桥头上都设有坚固的碉堡,并有坦克、装甲车流动巡守。因此,在攻击几座桥头时,部队伤亡很大,一再受挫。在桥头倒下的烈士中,有“济南第一团”的连队干部,有最先突破长江天险的第一船战士,有准备解放上海后返家探望母亲的上海兵,有刚刚入伍不久的解放战士。这许多好同志为了解放上海,在苏州河畔牺牲了!

许多指战员被这一时的挫折激怒了!他们急于复仇,急于取胜,纷纷要求解除禁令,启用炮火,砸烂对岸的敌人。有个师已将榴弹炮营拉上来了,瞄准了对岸的高楼大厦!显然,只要一声令下,对岸的敌人顷刻之间就会葬身炮火之中。但是,那将有多少楼房和市民的生命财产化为灰烬!军部当即命令制止,重申严禁使用火炮。27军的首长们及时赶到前线,察看攻击过的几座桥头。只见对岸不断闪过敌人活动的影子;窗口间都隐约可见敌人的枪口,桥头的高压电线全被打断,马路上、墙壁间弹痕累累,加之,河深岸陡,这都说明,不用炮火摧毁敌人火力点,是难以直冲过桥的。

为了解决苏州河战斗不准使用火炮这一大难题,27军在西藏路桥南煤气公司附近的一个团指挥所里召开军的党委会。刘浩天政委主持了会议。一时,会上主张解除禁令的意见占大多数。但也有不同意使用火炮的。争论相当激烈。有的激动地说:请军领导解释一下,是爱我们无产阶级战士,还是爱官僚资产阶级的楼房?是同志们的生命和鲜血重要,还是官僚资产阶级的楼房重要?聂军长、刘政委听到这些激烈的言词,知道这些生死与共的战友,是出于对敌人的仇恨,是要早点冲过河去,解放全上海。但为了执行党的政策和上级的命令,他们坚定地说:我们爱战士的生命!但我们今天是以主人翁身份进入上海的。对面

这些被敌人占据着的高楼大厦,再过几小时,就是人民的财产,因此,我们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尽可能的保全它!军政治部的仲主任、军参谋长李元等领导同志都先后发言,引导大家不仅要看到当前的革命利益,更要想到革命的长远利益。最后,通过反复的讨论,细致的谈心交心,终于大道理说服了小道理,统一了领导骨干的思想。接着,通过调整部署,改变战术,采取正面佯攻,牵制敌人兵力。晚间,将主力拉出市区,在西郊绕道过河成功,然后沿着苏州河北,由西向东攻击前进,很快地歼灭了敌人,26日,苏州河以北的沪西地区全部解放,27日解放军解放了全上海。

上海回到人民的手中,解放军严格执行中央的命令,从军长到战士,都不入民宅,露宿街头,谢绝人民的馈赠。许多战士宁愿赤着脚,挨雨淋,对缴获的大批雨衣,胶鞋,分毫不缺地如数上交。人民解放军进城后的许许多多的感人事迹,在会市人民中传为美谈,上海人民从他们的言行中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使国民党多年编造的谎言,不攻自破!

回忆这一段光荣的历史,使我们更加怀念为上海解放之战而光荣负伤的二万多名指战员,他们有的终身致残,他们的功绩,永远值得我们尊敬!7784〔1〕位中国的优秀儿女,在上海战役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们的无私奉献和勇于献身的革命精神,将永远激励着上海军民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勇前进!

(根据上海警备区党史办资料改编)

〔1〕《上海战役》学林出版社198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撰

夜幕下，地下党在行动

王关昶

1948年下半年，辽沈、平津和淮海三大战役相继报捷，伟大的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全国胜利大局已定，而上海还处在解放前夜。作为蒋介石政府最重要的财力、物力基地，国民党反动派和它的外国主子，是不愿意拱手交出大上海的。在前方军事较量一败涂地的情况下，它们对上海的革命人民进行了残酷镇压，妄图以屠杀、逮捕、监禁各阶层人民来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这显然是色厉内荏的表现。鉴于斗争形势急剧变化，中共上海市委随机应变，决定将原来按产业、行业划分的组织体制调整为地区统一领导的体制，以配合解放军解放上海的战斗。于是，我就调离中共上海工委所属的机器业委员会，按市委马纯古指示，参加筹建沪西区委的工作。

1948年12月，沪西区委正式建立，由夏明芳、施惠珍、安中坚、李德鸿和我组成区委员会，由夏明芳担任书记。马纯古为沪西区委买下位于西康路草鞋浜的一幢简陋楼房作为机关驻地，指定我以小厂老板的身份作为户主。他还调来一位年轻的女党员（纺织工人）常驻机关，对外宣称是女佣人。她扮演的角色难度很高，必须像模像样当好女佣，干好一切家庭杂务，买菜烧饭，递茶倒水，洗洗刷刷。这已勉为其难，而最难办的是必须断绝一切社会关系，不准与自己的亲友交往，也不准与原属同一组织的党员接触。可想而知，这对一个群众基础较广的热心人来说，是难乎其难的。更何况，党组织又指示她，平时要注意周围环境的动态，却又不能和邻居发生过多的交往；在区委开会时，要照顾好同志们的生活，又要担任警戒。这样，按照党组织的安排，我这个“小老板”和那个“女佣人”，坚守着一块特殊的阵地，开始了迎接上海解放的战斗。

——

当年的沪西地区，包括现在的普陀、长宁、静安三个区的大部分，还包括闸北和徐汇区的一部分，地域相当广。苏州河流经其间又将它分为南北两地。这里有众多的棚户区，如余姚路的金家巷、药水弄、小辛庄等等。棚户区的居民大多是城市贫民，他们出卖苦力，拉塌车、当小贩、蹬三轮、拾垃圾、卖旧货，什么都干，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在苦苦挣扎中，他们练就勇敢、奋斗的精神，但也有较大的破坏性。如不予以正确引导，在社会大变动时，他们很可能骚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棚户区居民中，还混进了破落地主、还乡团分子，难保他们不浑水摸鱼、干趁火打劫的勾当。对于棚户区的地痞流氓恶势力，特别是充当国民党爪牙的地头蛇，更得严加防范。总之，棚户区大多是没有党员活动的空白地区，极需开辟和加强那里的工作。

沪西历来是工人区，工人运动较有基础，大隆机器厂是中共地下组织力量比较强的厂。据说国民党工福会的陆京士曾经说过：“大隆厂压平了，沪西就太平了。”其实，这话只说对了一半，他低估了纺织、卷烟、面粉、学校各业我党的力量。

在沪西区委成立前，我们党已通过实验民校、沪西公社等外围组织，加强了联系各阶层群众的工作。沪西区委成立之后，我们又加强了棚户区的工作，调整充实了骨干力量，建立了地区工作分区委，迅速开辟空白地段，形成了群众工作的网络。

当市里派张登同志来检查沪西工作时，估计到在上海的解放过程中，将会出现苏州河南北两岸中断联系的情况，要对付这一不利情况，需要苏州河北岸地区的党组织能够独立作战，以减少损失。曾经想成立浜北的分区委。

同时，又按照原来产业、行业系统分别建立了分区委，并根据形势发展，恢复建立工协贫民团的群众组织，建立人民保安队西区总指挥部。根据各单位的力量，或单独，或联合建立区队，大队，中队和小队的建组工作。这一切都在党员和群众昂扬的斗志，艰苦细致的工作中顺利完成，经过上海解放的实践证明，是成功的。

护厂斗争,是解放前与国民党进行的最后一次广泛的群众斗争。情况是复杂的,有些资本家经过我们宣传党对私营工商业的政策,表示支持护厂斗争;但不少人有恐惧心理,原因不问自知,说到底无非是怕“共产”,有的早就作了狡兔三窟的准备,有的抽逃资金去香港,有的拆卸机器准备去台湾,国民党的特务也从中兴风作浪。

针对这一情况,我们结合任务,向党员和积极分子加强教育,对广大群众进行广泛宣传,明确提出“保护工厂,保护上海,迎接解放军,打倒蒋介石”口号。工厂是我们的命根子,保护好机器,才能恢复生产,在发展生产中才能保障和改善我们的生活,不许什么愿,更不开空头支票,说得实在,群众相信,乐意跟党走,为创造新生活去奋斗。

各厂的条件不同,都根据自己的条件,采取不同的方式和形式,如口头宣传、散发油印小报、传阅《新华通讯》、借阅进步图书杂志和进行小型学习讨论等。处在面临解放的形势下,基本群众是欢欣鼓舞的,那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

国民党军队处于溃败状态,所属的军警宪特,党政人员亦显得惶惶不安。我们了解到这类动态,就对他们展开《约法八章》的宣传,奉劝他们主动赎罪,不要再做破坏的事情。要是他们顽固对抗,继续作恶,是要追到天涯海角的。当时是大势所趋,他们不能不暂时收敛。

华通厂的资本家要把机器拆运到台湾去。他在解放军横渡长江后,便向全厂职工宣布,给工人每人10个银元,练习生每人5个银元,作为“避难车钱”。实际上,是要遣散工人,拆迁机器。这一手,工人看穿了,也拒绝了,他的迁厂打算终于落空了。

大隆机器厂,在1948年10月,早就作了拆迁的准备工作,把储存在仓库里的,还有刚买进的机器运到台湾去。这批机器原来是给复工的工人使用的,拆运机器就要断了工人的生路,便遭到职工的反对。资方利用厂休日偷运,还是给工人发现拦住了。他们最后使出了杀手锏,以违反戒严令的罪名,逮捕了11

名职工，威胁他们同意拆迁机器就可释放。这些同志坚决表示，宁可坐牢，也不同意拆迁机器。经过合法的和非法的途径，争取保释了8位职工，还有3位在上海解放时，从关押的学院中趁着混乱之际逃离了。

沪西地区的职工群众和党员的眼睛并不是只盯住自己的饭碗，他们是想到上海的解放，全中国的解放，保证社会的安定，使人民财产不遭到破坏。他们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对敌斗争，对特务、工贼发出警告信，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当解放上海战役打响时，各厂都有职工住进工厂，有的老工人还携带家属一起住进厂里，以防止敌人的破坏和散兵游勇、地痞流氓的掠夺。这是多么可贵的品质，要说什么素质的话，根本一条就是他们深切感到党是领导和支持他们保卫自己的利益的，是与他们休戚相关、生死与共的。

为保证人民解放军顺利进入上海，必须提供许多详细的敌情，如哪几条马路、里弄交叉相通，哪些是死弄堂，无法通过，敌人的驻地在哪里，兵力设置如何，武器装备如何，防守状况如何等等。这都要依靠群众迅速查实。我们的党员和积极分子都很机警，有的以报案为名，闯入森严的警察局，有的打出“劳军”的旗号刺探敌人驻地的地形，乃至枪支式样、型号、数量。为了迎接解放，他们甘冒风险，完成这个艰巨任务。不是党内外和群众同心协力，那是不可能完成的。

国民党打出“应变”口号，其目的在于固守上海，梦想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挽回颓势，东山再起。只是“落花流水春去也”，我们利用这个口号，不论在官办的，还是民营的工厂企业中，都可以建立应变组织。如护厂委员会，合法地要求储备粮油，给职工发应变费。也组织消防队、护厂队、救护队，动员更多的群众参加护厂活动，合法地去做资本家工作，让他们安下心来，保护工厂，也准备恢复生产。因此，上海解放仅3天，各厂就开动机器了。

三

1949年5月25日清晨，中国人民解放军从西区突破国民党部队的防线，进入上海市区。中共沪西区委和人民保安队西区总指挥部，立即通知各个区队及其所属各部按照事前划分的地段进入岗位。各区队的分工也很明确，有的维持治安，有的为人民解放军领路，按图索骥，拔除国民党的后卫部队的防守据点，人民宣传

队纷纷上街宣传,秧歌腰鼓欢唱胜利,招贴标语鼓舞人心。沪西的曹家渡、胶州路、西康路、静安寺以至中山公园等地,人们的笑语欢歌,几乎压住了枪炮声。

然而,国民党的残兵并未束手待毙,还在负隅顽抗。如驻守大隆机器厂的一个团,就曾几次冲上造币厂桥,企图进行破坏,结果被桥南堍的人民解放军击退。敌军头目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竟利用人民解放军不向老百姓开枪的美德,强迫一位老人拎着满桶汽油去烧桥。老人匍匐缓行,又被他们击毙,油桶滚落苏州河中。在这紧张对峙之际,大隆机器厂的党员趁机劝降驻军警卫,收缴了枪支,旋即,他们又冒险闯入驻军团长住所,痛陈利害,指明出路,迫令其投降。经过一番开导,该团头目迷途知返,当即同意挂白旗投降。谁料,当那团长派勤务兵登上屋顶挂白旗的时候,进驻油脂厂的守敌又开枪阻挠,吓退了那个勤务兵。大隆机器厂的党员机警异常,立即改换地点,扯出白旗。这一来,动摇了附近守敌的军心。于是,解放军顺利通过大桥,迅即进驻大隆机器厂,举行了受降仪式。

敌军纷纷溃散,四出流窜抢劫,也是意料中的事,大隆机器厂的守敌,有些早在投降前已自行逃命。这伙兵痞打破造币厂的墙壁,进入银库,恣意盗劫银元和银元坯子。幸好,造币厂的党员和护厂队员有所防范,及时击退那伙兵痞,齐心协力守卫银库,保护了国家的财产。此类散兵游勇各处皆有,所以人民保安队根据区委部署,分别于大小道口设立收缴点,一则拦截兵匪流窜,一则收缴枪支弹药。短短几天时间,各收缴点收缴的枪支弹药都很可观,少则可满载四五辆三轮车,多则需用卡车运送,集中移交给人民解放军。与此同时,各单位还扭送一批特务、工福会分子,先集中于实验民校登记,经教育反正再予以释放。至于顽固不化的残敌和“民主联军”之类反动组织成员,一经人民保安队拦住查实,则被押到收容站处理。

维护社会治安,保护人民财产,还得制止地痞流氓和不法分子混水摸鱼。突出的事例如在铁路西站一端,一伙地痞流氓聚众抢劫木材,强行拆掉铁路两侧的“木城”,甚至还要破坏枕木。这将使国家财产受到严重损失,影响铁路运输的恢复。人民保安队得知此事,立即赶往现场阻止。他们遵照区委指示,当众揭露地痞流氓的丑恶面目,耐心劝说受蒙骗者迷途知返。经过反复宣传教

育，绝大多数人归还了公物，迅速离开了肇事现场。聚众哄抢的地痞流氓见势不妙，只得扔下各自抢得的东西，纷纷作鸟兽散，于是，一场哄抢木材毁坏铁道的风波，很快平息了。

沪西地区的水厂，大变压器和仓库都得到了妥善的保护，使水电供应正常，工厂、商店、学校和居民家庭也都能维持安定秩序。上海的华山路电台也得到保护，在全市解放后就进行工作，一切都似乎是平安无事的。其实，人民解放军战士在解放上海，进入市区，还是付出生命代价的。人民保安队战士亦有为人民的安宁献出生命的。如陈仲信烈士，他是省吾中学学生党员，他参加了人民保安队，并担任第二大队的大队长。这支大队，由爱群夜校联系的工厂职工所组成，由泰利机器厂工人党员鲍雪根任大队长。他们担任从中山公园至周家桥一带的社会治安任务，国民党盘踞在碉堡里的残敌，对准陈射击，子弹射中了他的腰部，顿时鲜血渗透了外衣，他为了党的事业，为上海的解放流尽了自己的鲜血，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人民保安队西区总部为他举行了追悼大会。

上海的解放，是烈士们的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我们是不能也不会忘记的。

40年过去了。其间，我们经历过胜利的喜悦，也曾为失误而忧虑，忍受过痛苦。历史告诉我们，生活的道路不可能是笔直的，要前进，总要付出代价的。我们要在挫折中聪明起来，保持和发扬优良的革命传统，不懈地奋斗，一个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强国，一定能够屹立在东方。



迎接解放的日日夜夜

张翼钧

1948年11月14日新华日报评论指出“现在看来,只须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派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由此,迎接解放的任务,摆到上海地下党面前,时间十分紧迫。

根据市委指示,“迎接解放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工厂、学校、医院和各种设施,保证上海完整无损地交到人民手里。护厂就是起义,护厂就是最好的里应外合。”为适应工作需要,地下党改变原有组织形式,着手建立各区委的分区委。12月中旬,我们沪西民棉分区委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壮大革命队伍 扩大党的影响。分区委成立后,按上级指示,发展党员,发展工协,壮大革命队伍,广泛发动群众,为迎接解放做好准备。

从1946年以来,在各种政治的、经济的斗争中,涌现了一批拥护党的积极分子,1949年初各厂吸收其中一批符合条件的人入党,民棉系统地下党员就从143人增加到233人,同时发展了一批工协会员。他们在护厂斗争,解放后建立工会、青年团,搞好接管、克服困难、维持生产等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对党员、积极分子的教育,对广大职工群众的宣传工作,在上级党领导下迅速展开。我们大量散发市委编印的《新华通讯》、《上海人民》、《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六次劳动大会决议》等宣传品。我们还用年奖的钞票买了短波收音机,安排专人在偏僻地区一个单身职工家中,收听解放区电台广播,并迅速编写和印发。人们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各种宣传资料。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三大战役的相继结束,消灭敌人150多万,长江中下游地区基本解放等消息传来,广大群众尤其是党员和积极分子备受鼓舞,当时《商报》连续转载党的工商政策,我们就利用它公开宣传。

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为了大量掠夺民间的黄金、美钞及其他各种外币,以“限价”为幌子,以“币制改革”为手段,发行金元券,以1:300万的比价兑换法币,触发了10月份席卷全国的大抢购,市场被抢购一空,黑市粮价上涨,从每石20元涨到500元。工人每月收入几十元,无法维持生计。为了工人的生存,党组织领导了广泛的经济斗争,我们民棉所属新裕二厂、永安三厂等通过罢工,纷纷取得了胜利。每个人加一个月工资,发40尺白布,并实行生活指数解冻,按物价上涨幅度结算工资。接着又开展年关斗争,新生纱厂罢工持续三天三夜,打击了敌特的气焰。经济事关每个工人的切身利益,谁代表工人利益,谁又在反对工人,在斗争中每个人都看得清清楚楚。我们党领导了这些斗争,得到了工人的拥护,也就是广泛地发动了群众。

同时,我们通过各种途径,摸清职员的思想状况。一般职员担心减工资、吃大锅饭,高级职员担心会把他们当资产阶级。针对这种情况,发动党员、积极分子分别对周围熟悉的职员家访谈心,宣传“原职、原薪、原制度”的政策,宣传革命形势。对重要的高级职员,写信给他们,帮助他们消除疑虑。多数职员,没有亏心事,通过宣传心里就比较踏实。个别为了讨好老板,往往压制工人的正当要求,也算不上政治问题。我们对他们表示理解,欢迎他们站到工人一边来。

我们对民棉的每一个资本家发信,宣传了党的新民主主义三大经济纲领: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官僚资本归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等政策,促使他们从怀疑转为稳定。党组织对官僚资本企业的中纺各厂厂长,也做了大量工作。

为了从精神上瓦解敌特势力,排除障碍,我们向所有敌特骨干发警告信,宣传党的政策,警告他们不得继续为非作歹,争取立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真如地下党活动纪实

张文琴 李贻钧 何 坚 魏 刚 芮达权

真如区位于上海的西北郊,是一个仅有 37 平方公里、近 5 万人口的小区,是上海市联接苏南的交通要冲。抗日胜利后,我们党在真如区境内有两个互不发生组织关系的党组织在活动。一个是上海市委的近郊工委领导的大场区党组织,它领导杨国生、严阿大同志,并以山海工学团和三十一民校为据点,分别向真如区的旺巷、大李家宅发展,开辟真如区。一个是上海局外县工作委员会的嘉(定)太(仓)昆(山)工委委员陆鑫康同志等以沪宁铁路旁的华东高级农业职业学校为据点,开辟工作。1948 年 7 月,近郊工委决定派张文琴同志领导真如区工作。同年年底,随着形势的发展,少数党员撤离去解放区,党组织有了调整和加强,到 1949 年 2 月,北郊区委决定成立真如分区委,真如区党组织实现了统一领导。华东农校的党员沈钟蔚、陈韵声由真如分区委领导。

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在真如区进行了艰苦的工作,宣传、组织群众,建立了工作据点,开展各种斗争,扩大党的影响,壮大党的队伍,为配合上海解放、接管城市,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开辟工作一开始,上级党组织就明确强调工作的重点是广大农民群众,指出一定要密切党和群众的联系,一切为群众着想,同甘共苦,才能在农村立足生根,开花结果。

以民校为掩护,宣传群众,开辟据点。真如区与市区联系密切,贫苦农民,特别是青壮年,不仅自己有学文化的迫切要求,而且希望子女读书识字,会算算写写。当时,国民党为装潢门面,搞社会平民教育。我们正是从农民学文化的要求出发,以民校教师的合法身份进入真如区农村的。

大李家宅邻近大场区有个大洋桥,大场分区委的俞秉廉同志在那里办了三十一民校分校。大李家宅的青年农民非常羡慕,希望民校扩展到本村。1948年7月,党员张文琴、何坚以民校教师身份进入大李家宅,开辟据点,办起三十一民校大李家宅分校。旺巷地区同大场区的郭家桥相连,大场区党组织的党员周鸿麒通过政治上比较开明、尚能热心地方教育事业的保长郭耕全,筹办山海乡村实验学校旺巷分校。地下党员薛耘、刘期颐先后到旺巷,开辟据点。

在大李家宅和旺巷开辟据点的地下党员,站稳脚跟后,分别向周围村庄扩展。华东农校的地下党员发觉这一地区邻近电台,又是交通要道,有它的特殊意义,于是在1947年秋,也把地下斗争的重点,从在校内转向农村。他们在学校所在地的马家宅村,联络青年农民办夜校,办中年妇女识字班,影响所及达14个村庄。

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根据上级党组织的要求,在农村据点开辟后,有重点地向工厂扩展。上级党组织指示“开辟旺巷,打入电台”。旺巷的地下党员在办好旺巷分校的基础上办起了夜校。利用夜校阵地,有意识地吸收家住农村的电台工人参加读书,联络感情,交朋友,开展工作,终于在电台工人中扎下了根,打开了真如发讯台的工作局面。大李家宅据点,则扩展到九龙染织厂。

运用各种方式方法,深入群众,团结群众。一九四七年以后,市区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广泛深入发展,反美、反蒋斗争一浪高一浪。真如地区在开辟新据点过程中,利用各种形式,机智巧妙地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普遍采取的是运用民校阵地,在课堂中利用国民党教育局编写的课本,注入革命的内容。如课本上有“工人、农民”,我们就讲工人、农民是一家。提出工人农民起早摸黑,从乌鸦叫到“鬼”叫,为啥到头来饭也吃不饱,书也读不起?课本上有“三民主义”,我们就讲赶走了日本鬼子,为啥又来了美国大兵欺压劳动人民,民权究竟在哪里?在夜校课堂上,我们还利用合法的报纸上刊载的新闻消息,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罪恶。如工人要活命,学生要爱国,有啥罪,为什么国民党政府派出军警残酷镇压?天天讲限制物价,为啥物价天天飞涨?揭露国民党限制是假,搜刮是真,不管人民死活。报上说国民党打了“胜仗”,为什么丢了一座又一座的城市呢?这种“胜仗”打下去,共产党要打过长江来,打到上海来。国民党的寿命不长了。讲故事,也是夜校常使用的一种方法。我们讲“白毛女”,讲工人运动、学生运动的故事,还把苏联的集体农庄编成故事讲给农

民群众听,寓教育于故事之中。这种种方法,识字课本上的一个命题、报纸上的一件新闻、现实生活中的一个故事,切合实际,结合农民利益,收到较好效果。时隔30多年的今天,有些当时的民校、夜校的青年农民回忆说:“夜校使我懂得了革命道理,引导我走上革命的道路”、“那时,我们原来只知道命苦,读夜校开了窍。积压在心中的怨愤像一堆干柴,而革命的道理像一支火炬,干柴遇火苗,烈火就在胸中熊熊燃烧”。

另外,运用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娱、武术形式,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厂头村的地下党员经党组织同意,组织了江南民间音乐常见的形式——丝竹社,为农民演奏,团结群众,这个丝竹社活动于厂头、绿杨桥、小南翔一带。大李家宅民校的地下党员组织武术班,晚上点起汽油灯,教农民青少年打拳,耍刀枪棍棒,热气腾腾。更多的是利用休息片刻,随时随地教农民青少年唱歌跳舞。这些活动扩大了党的影响,团结了更多的群众。

在进行宣传教育的同时,党组织还依靠积极分子,组织农民群众,保护农民的利益。1948年11月,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的市区边缘的贫民(大部分是苏北、山东等地来沪的,其中也混杂一些逃亡地主和还乡团),蜂拥来到真如区农田抢菜。大李家宅、旺巷地区农民的劳动果实受以严重威胁,面对成群结队的抢菜贫民,党组织把农民组织起来,加强联络,保护劳动果实,每当抢菜人群拥来,以敲锣吹哨为号,纷纷赶到田头,保护蔬菜和山芋。有时,还组织积极分子、党员对贫民群众说理教育,说明蔬菜是农民辛勤劳动赖以生成的产品,物价飞涨是国民党政府腐败造成的,菜农和贫民是兄弟,不能从穷人口里抢饭吃,劝阻贫民抢菜。在旺巷地区曾出现混迹于贫民中的痞子,蛮横无理,党员就挺身而出,予以批驳、揭露,使其孤立。经过几次联合护菜说理行动,抢菜风潮平息下来。农民群众经受了一次组织起来的实际教育,党群关系也更加密切了。

壮大积极分子队伍,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大李家宅和旺巷地区的青年农民和电台工人,在民校夜校中受了革命的启蒙教育。地下党员为人处世的高尚思想情操,也深深地感染着他们。他们中的一部分先进分子,不仅增强了对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仇恨,更产生了参加斗争投入革命洪流的强烈愿望。旺巷地区的一些青年农民和电台工人,常在夜校放课后找教员促膝谈心,有的诉说生活的苦难,有的诉说遭受保长欺压的愤怒,有的控诉地主

恶霸残杀亲人的血腥罪行。他们要翻身,要报仇。对这些青年农民和电台工人,党组织加强了培养教育,因势利导进一步向他们阐述革命道理,讲团结斗争才能推倒三座大山翻身得解放,讲翻身要靠共产党、革命要跟共产党,讲党的性质和宗旨、怎样才能参加共产党,也进一步向他们解说解放战争的形势,国民党反动派将覆灭,曙光在前,但其本性还要垂死挣扎,必须继续努力艰苦斗争。他们说:“好像喝了一贴清醒剂,头脑越来越清楚。同时,通过交给他们了解敌情、联系群众、保护农民利益等等任务,加强对他们的考察,让他们在实际工作中锻炼。1948年9月前后,大李家宅的孟夫根和旺巷的何伯生分别入了党,随后,又陆续发展了一批党员。到1949年4月,党在各个活动据点发展了26名党员,成立了大李家宅、旺巷、厂头、国际电台4个党小组,壮大了党的队伍,并为这些地区进一步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奋斗,建立了核心力量。

不畏艰险,坚持斗争。1948年,革命斗争的形势发展很快,在战场上吃了败仗的国民党反动派,疯狂镇压上海人民的革命运动。真如地区的党组织经受了—次严峻的考验。

这年的夏天,华东农校的陆鑫康同志截获了国民党的抓捕信息。经党组织决定,陆先行撤离。不久,俞继泽同志来,又被迫撤离。党组织决定留下3名学生中的党员和一名农民中的党员,其余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分批撤退,有的去苏北解放区和浙东游击区,有的到市区暂避。留下3名学生中的党员,组织关系转入近郊工委,2名转入真如分区委,1名转入江湾区党支部,部分学生中的积极分子也转入江湾区开辟江湾区农村工作。

这年的11月,新泾区地下党组织受到破坏,党员赵霞辉同志不幸被捕,为了避免损失,以防万一,上级党组织决定撤退大李家宅分校的全部党员和教师。但是,要张文琴、何坚、魏刚同志仍坚持在真如区,领导和联系党员。当晚,驻扎在大李家宅的国民党青年军,搜抄老师的宿舍,劫洗物资外,一无所获。1949年2月,党组织又调李贻钧同志到大李家宅,以办闸港义务小学为掩护,坚持斗争。

1949年1月13日,大场区山海乡村实验学校肖场分校因特务告密,党员8人、群众一人被捕。党组织及时调整了力量,将旺巷分校的薛耘同志调至南翔隐蔽,刘期颐同志及时转移,并调魏刚、芮达权同志去旺巷分校,坚持斗争。

因此,1948年下半年,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真如区党组织依然坚守阵地,坚持斗争,特别是当时新入党的农村党员,面对敌人,无所畏惧。敌人的镇压,教育了党员群众,他们经过严肃认真的考虑,要求参加到党的队伍里来。党组织更坚强,更有战斗力了。

为了把已经暴露的部分同志撤退到解放区去,近郊工委给真如区党组织一项特殊任务,在大李家宅据点没有破坏时,接待安置一些从别的区撤退的党员,并要派党员护送这些同志安全去解放区。经近郊工委同意由保坚同志担任这一重要任务。1948年下半年到1949年初,他曾经三次护送十多名党员和积极分子去华中党校(其中包括龙华区的同志),都安全到达目的地。

从1948年初起,经过一年多的艰苦斗争,我们在真如区开辟并恢复了大李家宅、小洋桥、旺巷、真如发讯台、华东农校、厂头等6个地下党活动据点;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党组织,培养了100多名农民和工人积极分子;党的影响扩及35个村庄、2个工厂,依靠党和积极分子团结了广大农民和工人群众,也教育了一批地方开明人士。我们的党在真如地区广大农村中扎下了根,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壮大了革命力量,为迎接上海解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二

1949年2月,为了迎接解放,北郊区委根据市委关于以分系统为主,改为按地区成立党组织,加强统一领导。魏刚为组织委员,李贻钧为宣传委员,何坚为策反武装委员,并将分散在6个据点的党员,统一归分区委领导。根据北郊区委的指示,分区委的工作重点是巩固和发展6个据点,壮大人民自卫力量,组织积极分子和党员全面调查敌情,保护工厂、农村,里应外合,配合解放军南下解放上海。

全面调查敌情,绘制真如地区地图。全区的党员、积极分子利用走亲访友、贩运蔬菜、建筑碉堡等机会,详细地调查了驻军的番号、人数、建制、布防、炮位及炮口指向,大小碉堡的位置、枪眼;区内重要单位及其所在地方,如工厂、电台、仓库、车站;国民党区党部、三青团等反动党团组织及其负责人情况;区公所、区警察分局的组织情况及其政治动向;大小公路、河道、桥梁、铁路等等。经过一、二个月的调查,一一绘制成图,编写成册,上报北郊区委。

策反攻心，分化敌人。蒋家王朝末日来临，区的上层人物，特别是家住本区的，不得不考虑各自的出路，真正死心塌地的顽固派，为数不多。地下党的同志对保长以上的人员及地方恶势力，分别发出几十封警告信、劝告信。这些信件，针对他们的不同情况，讲清形势，宣传政策，要他们改邪归正，停止罪恶活动，争取宽大。一般采用邮寄，也有直送的。如对真如警察分局副局长刘健，由地下党员借刘健为其子办满月酒，宾朋满座、人多杂乱之机，把警告信塞在婴孩摇篮里。区公所总干事管葆生在家里接到警告信后，十分恐慌，当晚就跑到副保长家中，还叫来了本村的管士刚，商议如何办。管葆生说：“我早先在一次吃喜酒时，说过蒋介石要在三个月内消灭共产党。这次信中警告我‘你若不老老实实，等不到三个月，你的头也要搬家了’。看来，我们村里一定有共产党了。”他们也都说今天下午收到了警告信，管葆生说：“大势所趋，还是老实些好。”

厂头地区的党员在上海解放前个把星期，不顾危险，直接找嘉定县绿杨乡乡长印某谈话，交待了我党的政策，指明了他将功补过的方向。在谈话的第三天，印某解散了乡保安队，按地下党组织所嘱把枪支弹药集中后埋在乡政府后面的田地里，有几支枪交给人民自卫队。上海解放后，这些枪支全部上交解放军。

对于旺巷地区的恶势力，如恶霸周小炳，蓝衣社分子、地痞张伯良等，刘期颐等同志以老师身份走访或借助召开“校董会”的机会，向他们指点前途，示意他们不要再同地方百姓作对，破除他们乘火打劫的幻想，劝告他们尽可能做一点对农民有利的事。这些人迫于形势，直至解放未曾掀风作浪。

在我军横渡长江前夕，国民党在各个战场上的常败军，都是为我军击溃后，重又凑合起来的，思乡心切，士气低落。当时，农村党员和积极分子巧妙地将宣传品张贴在国民党军队的营部岗哨亭，同时还利用一切机会对国民党军队士兵进行具体的策反工作，如利用国民党军队士兵借东西，就势攀谈家常，引起他们的思乡情绪；在敌军士兵要逃跑时，就物质上给予支持。驻在旺巷东南金王庙的国民党军队，为修筑碉堡工事，经常走过旺巷，也有些士兵跨入农民家中歇歇，要茶吃。于是地下党员就利用机会，察言观色，见到昆山籍两个士兵面带愁容，就准备好了烟茶，和他们闲谈家常，勾起他们思亲之心，终于鼓动他们开了小差。逃跑时，还送

了他们两套旧棉衣。大李家宅的党员也直接策反三个国民党士兵逃跑。

打入警察分局。1949年2月,国民党为了加强控制,真如区警察所改为真如区警察分局。特务头子毛森直接布置,调亲信高向荣为局长,并派了十几个警官,妄图顽抗。

分区委通过关系,发现刘林、周永明、范根才对敌人不满,要求进步。经过考察,先后发展他们入党。他们又利用结拜兄弟的形式,结拜了12兄弟,在警察中宣传党的政策,开展工作。

真如警察分局的党员同志,调查了警察分局和义警大队的组织情况、武器装备和警察局长的罪恶活动。他们还利用合法身份,调入了真如地区内的善后救济总署、工矿器材库、真如车站交警中队和装运军队及军用物资等情况;还调查过真如镇周围的54军8师和字部队(原常山部队)陈家渡一带战斗部队、对面街驻八四〇、八四二五部队等敌军的武器装备等情况以及敌人的防御工事,为分区委统一绘制敌人布防情况,提供了重要情报。

充分依靠群众,保护电台。电台的党小组在小组长魏宝泰同志带领下,在摸清敌人对电台“应变”计划的同时,抓紧做了电台的工程师、技术人员及主要职员的工作,启发他们认清形势,鼓励他们为人民做好事。组织青工特别是机房、外线工、仓库等要害部门的青工,搞好护台工作。以魏宝泰同志为主,团结了积极分子杨友根等,争取了技术员黄振禄、总务陈锡荣,组成了“留守小组”。这个小组由王和陈负责,实际由魏宝泰等党员同志掌握。他们提出了“人在电台在”的战斗口号,日夜坚守在机房周围。地下党还利用了工程师等人与市局上层的关系,调动敌警备司令部的30辆大卡车,由沈大根、何德祥等同志和一部分青工,及时把一部分重要物资转移到市区,并分散隐蔽起来。5月24日,在炮火连天的险恶情况下,留守小组的同志与国民党交警中队进行说理斗争,拖延时间,击败他们妄图放火的阴谋,电台完好地回到人民的怀抱,与国际上通讯没有中断。以后,他们又配合解放军保护电台安全,直到市局接管组的到来。

九龙织染厂刚入党的党员华荷珍同志,根据分区委的意见,争取团结了资本家,打消他迁厂去香港的想法,并发动积极分子,带领群众,把工厂保存下来。

筹建人民自卫队,迎接人民解放军。1949年4月,地下党员采取田头串连、夜间

串门的方法,选择可靠的青壮年农民进行个别动员。当时,解放军渡江在即,上海解放在望,革命战争胜利的形势极大地鼓舞了农民群众,为迎接解放,为保护地方治安,青壮年农民积极热情地参加了人民自卫队。一支以地下党员为核心的100多名积极分子组成了真如区人民自卫大队。同时,争取了义警三、四中队的部分队员参加自卫队。5月27日正式宣告成立。大队部设在杨家桥,下设三个中队。当时的主要任务是:(1)负责过境解放军的茶水、粮草、门板的供应任务。(2)保护公路、铁路和车站(我南下接管干部有部分是乘火车、汽车经南翔,过杨家桥进入市区的)。(3)维持社会治安,收容散兵游勇,收缴敌军溃逃时丢弃在碉堡内、田野的枪支弹药。旺巷的一个党员,在前往南庄村取一支被国民党逃兵丢在一口井里的枪时,发现三个国民党散兵隐蔽在附近的竹园里,准备偷了老百姓的衣服逃跑。他立即与一个农民去抓这三个散兵。开始这三个人还企图用银元收买他,被他义正辞严地训斥了一顿,并耐心地反复地宣传党的政策,这样,就顺利地把三个俘虏送到了大部队。一周内,自卫队共缴获弹药万余发。(4)热情关心农民群众的住房和生产等切身利益。解放前夕,厂头、旺巷一带,遭受国民党“三光”政策的祸害,厂头村的杨国声、杨国隆,旺巷村的何伯生、张年根等同志分别带领积极分子和农民进城暂避。27日回村后,旺巷村的一部分党员带领自卫队员维持社会治安,站岗放哨,一部分党员和自卫员带领群众,将敌人碉堡内的木材、门板等可用的建筑材料,合理地分配给农民,帮助农民搭建临时房子,暂时安身。这样,就安定了人心,克服了反动派军队垂死前拆屋毁田所造成的严重破坏,开始重建家园。(5)大队部还调厂头村的十几个自卫队队员,由杨国声同志带领到天厨味精厂等3家工厂站岗放哨,维持厂外治安,保护工厂。这支自卫队成立一周里,广大自卫队员风里来雨里去,拿着十几支枪,艰苦奋斗,通过上述活动,积极配合和支持解放军,对促进地方治安,安定人心,迅速恢复工农业生产起到了一定作用。6月3日以后,他们又在真如区接管会的统一领导下,积极投入到抗灾自救的斗争中去。

真如地区的地下党组织经受了锻炼。党员从抗战胜利前的4个发展到解放时的33个(7个同志是市区调来的),3年内发展当地的26个同志入党。1949年5月,真如区解放了,地下党完成了历史使命,这些同志也走上了革命和建设的新征程。

普陀警察局里的喋血战斗

贡斯文 钟 山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以雷霆万钧之势突破长江天堑，继又迅速攻克南京，包抄上海。国民党当局面对解放军的凌厉攻势，惊慌万状，立即部署大破坏、大屠杀，然后逃跑。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根据当时的形势，立即针锋相对地开展反破坏、反迁移、反屠杀的斗争，积极配合解放军解放上海。

隐蔽在上海警察局内部的中共党员，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争取和团结了一批倾向进步的警察，缜密地进行迎接解放、配合接管警察局的种种准备。在这条无形的战线上，先后有50多名警察被捕甚至被杀。其中钱凤岐、刘家栋就是这时被害的。他们在被敌人杀害之前，曾在普陀区警察局为革命、为人民进行过一系列隐蔽而艰苦的斗争。

冲破“三不准”禁令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管了上海，接收大员到处抢夺敌伪财产，大搞“五子登科”（劫收金子、票子、车子、房子、女子）致使工厂复工无期，工人大量失业。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又颁布法令，不准罢工、不准罢课、不准游行示威。在此情况下，中共地下党决定分头发动敌伪时期被淘汰的1000多名老警察上街游行示威，向国民党警察局提出复职要求。钱凤岐等党员都参加了这次斗争。

钱凤岐，1909年生于河北省河间县。由于生活所迫，于1931年考入上海公共租界警备处当巡捕。1944年参加中共外围组织“新警同仁会”，同年年底加入中共地下组织。他根据党的指示，本着对失业者的无限同情，秘密地为复职

造舆论、作宣传,特别是积极鼓动在职警员从各方面去支持即将兴起的复职斗争。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推动下,1945年9月底,一支由1000多人组成的请愿队伍扛着大横幅,从胶州公园(现静安区工人体育场)出发,一路高呼“我们要生活!”“我们要复职!”等口号,经过北京路、南京路、汉口路直奔市警察总局,要求见警察局长,声言不解决复职问题,决不解散队伍。在双方僵持的几个小时内,许多警察袖手旁观,不加干涉;有的还送来面包和茶水,表示同情和支持。国民党市政府和警察局万万没有料到接管上海还不到两个月竟出现示威游行的队伍,觉得事态闹大不好收场,只得满足请愿者的要求,让大部分老警察复职,向老弱人员发放救济金。“三不准”的禁令受到狠狠的打击。

1946年上半年,国民党政府为了强化警察机构,实行更加反动的警察区政策,大量录用从重庆和杭州警察官学校正科毕业的学员充当骨干;同时招募新警,进行政治军事训练和党化教育,然后派他们做“警员”,用以代替他们认为“靠不住”的老警察。把一批老警察集中到老闸、黄浦两个分局,准备陆续淘汰。要抵制警察局这一反动部署,就要组织老警察开展护职斗争。钱凤岐等同志按照中共警察系统委员会指示,秘密制作了许多写有“实行警管,敲碎饭碗”、“不受当局骗,就地改警员”、“坚持不改行,当局没法想”等口号标语,分别贴在当时各自任职的分局里,又去做警员的工作,分化瓦解他们。同时在群众中扬言:要在6月2日到外滩集会请愿,散布“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此处不能蹲,去找毛泽东”等口号。警察局反动头目看到这些标语,听到这些传说,十分惶恐。6月2日正好是北平学联号召全国学生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总罢课示威游行的日子,因此不得不作些让步,同意全部改为警员。警委又一次冲击了所谓“三不准”的禁令,也教育了下层全体员警,只有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才是出路。

查禁其名 掩护其实

国民党上海当局的反动禁令,一而再地受到冲击后,人民革命运动此起彼伏,逐渐形成了反对蒋介石残暴统治的第二条战线。国民党当局除颁布更严厉的所谓戡乱动员令外,还严令查禁和没收一切进步书刊和报纸。共产党员刘家栋所在的普陀警察分局局长沈德享,就常常派刘家栋和另一名警员一起去报摊

搜查。中共主编的或民主人士主编出版的《群众》、《新华日报》、《民主》、《文萃》、《国报》、《时代》等报刊，一被发现，立即没收。为了反对查禁，刘家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

刘家栋，1910年生于江苏泗阳县。19岁到上海，他当过地主的雇工，上海滩的苦力。当了巡捕后，经常阅读进步书刊，逐步提高了自己的认识。他崇敬鲁迅，鲁迅出殡时，他曾冒着失业的危险，以巡捕身份沿途保护送葬队伍。抗战时期，一位名叫杨干的新四军干部来上海采购文化用品，被敌人发觉。和刘家栋早就认识的中共地下党员张志坚，就把杨干转移到刘家栋家，刘以“警察”的身份作掩护。以后，杨多次来沪，刘家栋不仅继续掩护他，而且还帮助他把采购的物资运往根据地。1945年，刘家栋经当时的警委书记邵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刘家栋入党后，工作更加积极，每逢局长布置他去查禁进步书刊时，他就设法传递信息给以摆书摊为业的张志坚，再由张按预定网络把信息传播出去。因此他和另一名警察前去搜查时，总是扑空，“一无所获”。有些书摊上有时也会发现按例要没收的书报，而他总是眼开眼闭，敷衍了事，另一个当警察的特务，一不留意就被他蒙混过去了。他就是这样不顾个人安危来掩护进步报刊在群众中发行的。

开展立功活动 参加攻心战斗

互保立功委员会是警委的外围组织。1949年初，在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之后，警委立即布置在全体警察中开展互动报立功活动。中共地下党员和党外积极分子用各种秘密的方式联系广大群众，要求大家做到互相保证、互相监督、不做危害人民的事；要保护好档案物资，维持好社会治安为迎接解放，配合接管警察局立功。钱凤岐、刘家栋等都先后投入互保立功活动的组织工作。

钱凤岐自1947年9月起调到普陀分局，便担任了该局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他平素爱好唱戏，到普陀分局后，常以拉胡琴、唱京戏为名把警察们叫到自己的宿舍里来，每当兴尽人散之前，他就趁机宣传解放军三大战役的辉煌胜利，述说国民党在前方的惨败；暗示大家说，长江天堑不可靠，大上海也保不住，打破有些人对国民党所抱的幻想。有时也在警察中秘密传阅进步刊物，提高他们

的认识和觉悟。据后来统计资料表明,上海解放时,在国民党警察系统已拥有中共地下党约 500 名,党的外围积极分子约 2000 名。

当然,国民党当局一小撮顽固分子是不甘心灭亡的。上海警察总局局长、军统特务毛森迫不及待地、分批分片地召集他认为“不可靠”的警员进行训话,向大家分布《战时禁令》,规定如警察背叛国民党或弃职潜逃的“均予处死并杀戮其全家。”

警委面对越来越险恶的环境,为了保卫党的组织免遭敌人破坏,提高党员应付不测的能力,决定对全体党员进行一次革命气节教育。钱凤岐等十分谨慎地完成了这项关系重大的任务。他们利用各种机会,不分昼夜地找本支部所属党员一一进行个别谈话,细心地检查了他们的笔记本,把凡是记有别人姓名、情况的片断撕下烧毁,教育党员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斗争。万一被捕,决不自首变节,决不损害组织,决不出卖同志,要经得起各种刑罚的考验,一定要保持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

钱凤岐等还根据警委的意图,利用警察职业的有利条件,搜集、积累情报资料、历史罪恶、当地敌人驻军、特务机关、武器、物资等等情况。

1949 年 4 月 25,毛泽东、朱德联名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亦称“约法八章”)警委邯郸电台收听后,立即把它油印了 2000 多份;另外又附加上一封警告敌人的信。钱凤岐等接受了寄发信件的任务,即按他们平时搜索的住址情况准确、迅速地把《布告》和警告信寄到反动警官和特务分子的家里,敦促他们认清形势、起义反正,立功赎罪,争取宽大处理。这一行动,在警察局内部激起了很大反响,不少警察官收到信件后,平时的反动气焰不得不有所收敛。这一攻心战术,对争取多数旧警员,孤立极少数顽固分子,起到十分明显的作用。正因为如此,毛森曾专门发了训令,要限期破案。他还亲自到几个分局去训话,恶狠狠地说一定要把隐藏在内部的共产党员挖出来。

誓保党组织 血洒宋公园

敌人愈临近灭亡,就愈奸险凶恶。毛森使出他的看家本领,布置他的心腹悍将在内部开始严密的侦查。他软硬兼施,要共产党员出来“自首”,折腾了一个星期,却毫无眉目,中共地下党员和党外积极分子没有一个软骨头。又过了

几天,敌人发现了某些线索,逐渐把疑点集中到钱凤岐、刘家栋身上。5月13日下午,警察总局刑警处二科长甘觉忽然来到普陀分局。当天晚上10时许,分局长沈德亨和一股股长丁景鸿即以外出“查勤”为名,将正在拘留所值夜班的钱凤岐首先逮捕,继又拘捕了刘家栋。他们被捕的当晚,即被押往总局刑二科。毛森亲自审问,蓄意要从他们身上打开缺口。敌人喝问:“你们的同党是谁?”得到的回答是:“老百姓都是我们的同党!”在一个星期之内,敌人对他们审讯了几十次,动用了各种各样的刑具,最后塞住嘴巴,拖上警车,一直被送到宋公园。同被敌人抓去杀害的还有杨浦警察分局的蒋志毅和钱文湘。

就在四烈士就义的第8天,上海解放了,人民解放军在原中共地下党的配合下接管了机关、工厂、学校,也接管了原国民党警察局。刘家栋遗体在解放前夕已找到,从遗体上可发现刘家栋在被敌人监禁时,身受重刑,遍体鳞伤,十指发黑。钱凤岐等遗体直到解放后,才在成堆的死难者中辨认出来。钱凤岐满身伤痕,指甲缝里都插有大头针。这种种迹象告诉人们、无论是在法庭还是在刑场上,烈士的形象是无愧于党,无愧于他们所处的时代,也无愧于“革命烈士”这一光荣称号的!



亲历真如解放的老人们共忆往昔

宋天生

今年5月27日,是上海解放60周年纪念日。1949年5月12日,我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主力遵照中共中央军委、总前委的指示,向退守淞沪地区企图凭借永久工事继续抵抗的国民党汤恩伯部发起攻击。经过16天艰苦卓绝的激战,5月27日,苏州河以北最后一股蒋军被消灭,上海战役宣告胜利结束。

解放真如是淞沪战役宝山战区中的一次战斗,由人民解放军第10兵团26军77师(代号珠江部队)担任。23日午夜,发起总攻,25日中午,攻占沪宁铁路大桥,占领绿杨桥,抵达李子园,切断大场与真如发讯台联系,并迅速南进,包围太平桥、真如镇等地。经激战,20时攻击真如车站,守战600余被歼。子夜,真如警察局代局长兼义警大队代大队长刘健宣布投诚,231团进驻真如镇,真如战斗结束,真如镇从此解放。

从山东赶赴上海,35人受命接管真如

一支130多人的队伍,排成一路纵队,沿着田间泥路,不停不息地快速行进,迷蒙的月色笼罩着村庄、树丛、田野和茅封草长的田间小路。没有人说话,只听见一片唰唰的脚步声。偶尔,从前面传来一声命令:“快,跟上!”沿路村庄的狗吠和田里的蛙鸣,打破这江南春夜的寂静……

这支从山东耀南县赶来的部队,人员大都是当地的民兵和土改积极分子组成。新婚两天半的徐景濂也被挑选了进来。他清楚地记得,当时出发前只是说去某个大城市搞接管。耀南是个小地方,许多人从没见过大城市是什么样,听说还要坐火车。他们想象不出这火车到底是吃什么料的,能有这么大的力气,跑得这么快。后来,火车是乘上了,是拉煤的货车,上面没有顶棚,

但大家还是充满了好奇，车行驶到夜里，天突然下起了雨，战士们什么雨具都没有，只能用背包带扎住被子的四个角，再绑在车箱两边来挡风遮雨。到了目的地丹阳，雨水加灰尘，个个成了大花脸，谁也不认得谁了，炊事班赶紧炖了姜茶，防止战士着凉。

丹阳当时是总前委的驻地，是进行上海接管准备工作的大本营，这个原本只有3万人的古镇，一下又增加了数万人，到处挤满了穿黄军装的人。许多都是前来集训的接管干部。这时，徐景濂他们才知道，去接管的大城市就是上海，他们将在这里进行1个月的集训，培训内容主要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入城政策汇编》和第三野战军司令部颁发的《入城守则和纪律》。徐景濂说，当时他们中的许多人不识字或识很少的字，只是靠死记硬背。一个月的集训很快过去了，他们这支部队从丹阳出发步行经南翔到他们将去接管的目的地真如镇。部队行进速度很快，可以说是日夜兼程，徐景濂回忆说：“一些战士困得不行，一边走路一边睡觉，撞上了前面的人，也只是稍一停顿又机械地向前走去。接管真如镇有35人，我被分配到第五组，就是现在的朱家湾，当时连总部都没有进，便直接去了各自分配的区域，开始了既兴奋又陌生的接管工作。”

义警抓消防队壮胆：“想开溜先打爆轮胎”

“当时我看见街上已出现三五成群从前线退下来的败兵，样子很狼狈，不是落了帽子，就是失了裹腿，有的衣服敞开，有的连番号也撕落了，武器也没有多大用处了，提着、拿着、掬着、背负着，什么样的都有，现在的枪还不如一根拐杖。”

“在南大街封家厨房间里，留下满满三大铁锅的饭，散发出阵阵农家灶火煮饭特有香味，但驻扎在这里的国民党士兵已惊恐万状，连刚煮好的饭都顾不上吃一口就仓惶出逃了，关押在这里的两名解放军‘探子’，也因无人看管，早已跑得不知去向。”73岁的张兆林老人，说起这些自己亲眼所见的往事忍不住为自己小时候的胆大机灵而得意。

最可笑的是，那些本乡本土的义警，奉命维持秩序，看着争先恐后溃逃

的国民党兵，心里害怕就借驻在旁边的消防队壮胆，并决定一旦发现消防队要开溜，便开枪打爆消防车轮胎。曾当过义警的真如羊肉馆沈建中老人回忆这段经历时，自己也忍不住笑出声来。

其实，早在真如解放一个月前，我解放军侦察兵，已经悄悄到了真如。还有人发现真如镇第一任镇长曲文华当时手拉一把京胡走街串巷，为解放后的顺利接管在作准备。据当年居住在北大街，今年已84岁高龄的张阿大老人说：“那时家里人听说要打仗了，便逃到上海市区避难，而我因为照顾老人留了下来。一天，有十几个年轻人来我家要借宿，我便让他们住在客堂间，这些人白天出去，晚上睡觉才回来，也没有床，他们只是坐在那里打个盹，天一亮就又出去了，也不向我要吃的，一点也不麻烦我们。有一天我悄悄地问他们是不是从北面来的共军，他们笑而不答，叫我不要对别人说起这件事，还让我过几天到别处去避几天。等我回来时，真如已经解放了，曲镇长还专门来看望过我。”

解放军连拿把草也付钱，老百姓把外藏的财物取回家

上海解放时，三野政治部摄影记者陆仁生拍摄的解放军露宿上海街头的照片，曾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这张照片真实地反映了我军入城后严格遵守纪律又不入民宅的情景。据多位老人回忆说，5月26日凌晨，真如镇的居民早上醒来打开门都吓了一跳，街的两边，睡满了穿着土黄粗布军服的解放军战士。晚上曾下过雨，有的战士身上的衣服还是湿的，经过一夜的激战，战士们显得很疲倦，一张张充满稚气的脸上满是尘土，有的还有斑斑血迹。有一位居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当时在战士中曾流传着这样一首打油诗：“想上海，进上海，进了上海得到两条麻袋布。又是铺，又是盖，晚上睡觉怪凉快。”

在镇上开有一家蔬菜行的姚良璞老人对解放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感触最深。当时姚良璞的父亲蔬菜行打理得不错，家里资产殷实。由于对解放军不了解，一听要打仗，便把家里一些值钱的东西藏了出去。解放军进镇后，有战士到他蔬菜行要买稻草打地铺，对蔬菜行来说稻草本不值钱，拿些无所谓，但这位解放军一定要付钱。可当时解放军身边并没有上海市面上

流通的货币，就打了一张收据，请他父亲日后到军管会去取。后来他父亲一直把这张收据留作纪念，可惜的是，经过几次搬家，这张颇有意义的收据找不到了。他父亲也因为解放军拿草都付钱这件事，决定把藏在外面的财产取回家中。街上商店也纷纷开门营业。

真如解放后，工作最紧张，生活最艰苦，还有一定危险性的就数接管组的成员了。当时接管第三组的成员就住在真如寺边上的一间房里，接管人员一律打地铺，由于潮湿，稻草里长满小虫，咬得人奇痒难忍。队员们大都来自山东，又吃不惯上海的米饭，在工作中因语言不同，阻力不小，有时甚至还有生命危险。当时的接管成员董衡恭老人告诉我们：一天晚上，由于天热，他一人出来想凉快一下，突然一颗子弹，从他的身边擦过。那枪是从桃浦河对面射来的，董老赶紧卧倒，随手拿起步枪回了一枪。可能天太黑，也可能匪徒心慌，枪打偏了。但这件事还是引起接管组的警觉，以后晚上外出就更加小心了。

“快去看，国民党投降啰！”一些胆大的居民纷纷跑出家门去看热闹。在今天的水塘街这里，一座被炮弹打掉半截的炮楼还在冒着青烟。十几名国民党士兵正排着队，按照解放军的命令，依次把枪放到真如寺后一块空地上。一名解放军战士拿起一把冲锋枪，连声赞道：“乖乖，这枪真好。”另一位战士说：“武器好有屁用，关键还是人。”

真如解放已60年了，能对当时解放那年的一些人与事还有所记忆的人，如今大都也已是七、八十高龄了，“解放来之不易，历史仍须珍惜”。为此，我们在各居委干部的帮助下，各方寻找曾经历过那段历史的老人。经过老人们的口述，整理了这些文字，虽挂一漏万，但仍让人缅怀、发人深省、催人泪下。

真如发讯台向世界电告“上海解放”

顾淦翔

国际电台真如发讯台是进行国际通信联络的大型发报台，设备新颖、齐全，占地面积很大。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国民党电信总局把从东北、京津等地运来的大批电信器材，集中在真如、南翔发讯台，准备转运台湾。1948年夏，中共上海郊区地下党组织决定要千方百计地保护好这批具有重大政治、经济和军事价值的通讯设施，使它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在具体步骤上，党组织决定先在电台周围的农村中建立活动据点，伺机打入电台，组织力量，采取措施，迎接解放。

建立电台党小组

当时，陶行知先生创办的山海工学团在大场一带很有影响。于是，大场地区的地下党组织首先选择了电台周围的陆家宅、金家宅、金家楼、旺巷、宗巷、金巷、罗巷、张家桥、孟家桥等村并以旺巷为中心，通过关系，联络地方人士，办起了山海乡村实验小学旺巷分校。再由校董会出面，聘请地下党员薛耘担任教师。1948年7月，薛耘以教师身份为掩护，来到旺巷地区开展工作。

8月底，薛耘在办好旺巷分校、取得周围村庄农民信任的基础上，利用教师轮流到学生家吃饭的机会和晚上串门走访的形式，联系与发动了30多个青年农民和家在农村的真如发讯台高空架线工人，并由真如台何宝生、沈大根、孟宝祺等人办起了夜校。他们经常聚集在一起，谈论国事，分析形势。薛耘就通过启发教育来培养积极分子，选择党员的发展对象。不久，党组织为了加强领导，又派来刘期颐。他俩白天教书，晚上则培养、教育出身好、有政

治热情的青年农民和青年工人。经过二、三个月的教育、考察，到1949年初，他们先后发展了6名青年农民和7名电台工人入党，并成立了一个农民党小组和一个电台工人党小组，实现了上海郊区地下党入电台计划。7名电台工人党员是魏宝泰、吴德祥、沈大根、祝汝兴、钱惠林、孟宝祺和何宝生，由魏宝泰担任党小组长。上海地下党真如分区委成立后，上述两个党小组就直接在真如区的领导下开展工作。

群策群力，准备新的战斗

1949年1月，国民党军队为了守住上海，就在沪郊纵深四十里的范围内，建筑碉堡、拉丁、派捐、毁田、砍树等等，电台的安全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为了维护群众利益，保护电台的安全，电台党小组认真积聚力量，组织群众，准备迎接解放。

在上级党组织的统一布置下，电台党小组先后绘制了无线电发射铁塔、天线、机房、仓库、发电机组的方位图；摸清了电台行政管理人员的政治表现；调查了电信物资和设备的性能、数量及存放地点。在仓库里工作的吴德祥，对库内物资一一登记造册后，交给了上级党组织。

春节后的一天，刘期颐兴致勃勃地向党小组传达了地下市委对解放战争胜利形势的分析和迎接上海解放的任务，并提出了护台和维护农民群众利益、减少财产损失的具体要求。大家听了都很兴奋，个个摩拳擦掌，准备战斗。

依靠群众，发挥留守小组作用

在解放大军进攻沪郊之前，电信当局已制定了应变计划。真如发讯台的应变计划是以组织留守小组来保持国际电信的畅通，对与发报无关的物资及基他设备，则准备全部撤运到市区，待机转运台湾。魏宝泰很快从电台工处长沈树仁、工程师钱尚平等处摸清了当局对真如台的应变计划。地下党团结一切可团结力量，充分依靠广大职工，开展护台斗争。

党小组在群众中开展了不同形式的护台教育，根据不同的对象及其不同的政治态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政治教育，如对青工特别是机房、外线、仓

库等要害部门的青工，就着重向他们宣传军事形势，揭露国民党政府对外投靠美帝、对内反共反人民的行径和腐朽没落的政治本质，阐明护台与个人前途的切身关系。而一些中老年技术人员、职员因家庭负担重，所以顾虑较多。于是，党小组就着重向他们阐明电台、技术、职业、生活、出路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中有几个中老年技术员曾在抗日时期到四川内地，亲身经历过离乡背井的痛苦，也亲眼目睹了一些国民党达官贵人的腐朽生活，他们的亲身经历也就成为党小组开展护台教育的生动素材。

争取和团结工技人员是一项十分重要任务。由于党小组的7名党员都是工人，大都识字不多，只有吴德祥的文化程度稍高些。于是，他们就决定采用发信的方式来开展工作。由吴德祥执笔写了十几封信，以党的地下联络员名义，分别寄给了台内的工技人员和职员，向他们讲明解放军直捣淞沪的形势与前途，劝告他们为人民办好事，解放后必将论功行赏。对个别表现较差的人，则警告他不要再干坏事，再干必将追究。

发信后的第二天，电台内议论纷纷，许多职工面露喜色，为台内有党力量、能听到党的声音而感到高兴；有的职工虽然在表面上不露声色，但内心却十分兴奋。这为党小组进一步争取、团结技术人员打下了基础。

经过地下党小组的宣传和发动，在职工中间形成了一股与电台前途共命运的潮流。在群众基本发动起来之后，电台正式成立了留守小组。留守小组由技术员黄振禄、总务陈锡荣、地下党员魏宝泰、孟宝祺、积极分子杨友根、周伯兴、张福庆七人组成。这样，地下党小组掌握了留守小组的领导权。

黎明前的战斗

4月底，解放大军已逼近郊区。真如、大场、南翔一带相继成为战斗前沿。国民党军队为了负隅顽抗，对电台周围的农村实行了“三光”政策。在这险恶的环境里，地下党小组为了使贵重设备免遭破坏，准备把重达一百多吨的设备抢运到市区胶州路、泥城桥、河滨大楼等处。这时，国际电台派出了汪永年等人，带领20辆向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借来的军车来到真如台抢运设备物资。地下党小组立即组织职工装车，并由地下党员沈大根负责押运。

在隆隆炮声和呼啸的子弹声中，沈大根和大家冒着生命危险抢运物资。当时，沈大根的三间瓦房正在起火、燃烧，但他顾不得去灭火、抢救，而是满怀着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和坚定信念，坚持把设备全部押运到了市区。地下党员吴德祥、祝汝兴、钱惠林也不顾疲劳与个人安危，团结广大职工，把部分留台通讯器材和物资分类储存、清点造册，并把清册与仓库钥匙全部收起来。

在战火纷飞的险境中，以魏宝泰为主的留守小组提出了“人在电台在”的口号，日夜坚守在机房周围。面对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国民党军队终于溃退了。5月24日上午，留驻在电台内的七、八个交通警察中队的士兵，拿来了汽油和燃烧物品，准备破坏发讯台。留守小组的成员马上围了上去，缠住带头的家伙，并由黄振禄出面，以“要请示上级”为由进行交涉。魏宝泰等人则向他们递烟、送茶，以拖延时间，设法阻止他们的破坏，就这样泡磨了好长时间。突然，电台上空响起了解放军的枪声，交通警察中队的士兵急忙把汽油倾倒在电台门口的木桥上，点燃后就匆忙逃跑。留守小组的人马上勇敢地冲了上去，迅速扑灭了火焰，保护了人民的财产。

为了保证解放军的安全通过，迅速追歼顽敌，地下党员还切断了发讯台周围高压电网的电源。

5月25日下午3时，解放军攻占真如发讯台，电台报务员用简便公电“XA”向全世界各地发出了“上海解放”的消息。

5月27日，上海人民沉浸在庆祝解放军的欢乐之中。在中共真如分区委的领导下，真如发讯台的党员，积极分子和周围农村的党员，共同组成了人民自卫队，日夜守护着电台。真如发讯台完整无损地回到了人民手中。

注：此文系解放前中共真如区委和真如发讯台党小组成员回忆撰写，征集小组作了部分修改。

“一印厂”的艰苦奋斗

杨 善

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饮马长江，即将渡江南下，上海解放指日可待。我们女工夜校的同学怀着激动的心情，遵照党中央和上海党组织的指示，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全力投入保护工厂、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破坏和迎接上海解放的紧张战斗。我所在的中纺公司第一印染厂的女工夜校学生同样如此。

我在女工夜校读书时，1945年由夜校老师黄纫秋发展入党。当时我是中共沪西工人协会党团领导小组成员，公开身份是中纺公司第一印染厂工会理事长。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我以厂工会理事长的合法身份，开展了黎明前的一系列激烈紧张的斗争。一印厂的地下党员，多半是女工夜校学生，都成为斗争的核心、骨干力量。

发动群众 保护工厂

中纺印染一厂是中纺公司中设备先进、生产能力较强的厂。1949年初，国民党当局自知朝不保夕，秘密策划拆除机器设备搬迁到台湾。厂里的国民党分子到处制造舆论，称台湾是个海岛，有美国人的保护，把机器搬迁到那儿可以照样办工厂等等。我们了解到敌人的阴谋后，一印厂的地下党支部书记郑阿彩（夜校学生），委员曹去卿（夜校学生）、王玲娟（夜校学生）、鲍国良开会商议，决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提出“反对搬迁，保护机器和工厂就是防止失业，保护饭碗”等口号，发动工人保护机器设备不让搬迁。同时，我们深入细致地做工程技术人员的工作，稳定人心，指出到台湾是寄人篱下、背井离乡，促使他们和工人一起反对搬迁。我们还秘密组织以党员和工协会会员为骨干的护工队，对重点

车间和重点设备确定专人负责保护,防止敌人破坏,加强对敌人的监视。大炉间的地下党员和工人群众为了防止敌人因拆不走锅炉而进行破坏,按三班分工负责保护锅炉设备,确保正常运转。他们自动在大炉间门口钉上写着“锅炉重地,闲人莫入”的木牌。对进大炉间的每一车煤,都要进行认真检查,把各种异物拣出来,以免发生意外事情。

为了争取护厂合法化、公开化、群众化,使广大工人和技术人员都投入到护厂运动中来,我们利用中纺公司发给各厂进行护厂的通知,督促行政公开组织护厂团。4月26日,由厂长和工会召开全厂责任工、支部长和工会全体理监事联席会议,成立了护厂团。由厂长任总团长,我以工会理事长身份任团长,下属6个组,负责人大部分是党员,而且是女工夜校学生、工协会骨干。厂内那些坏家伙一看我们人比较少,就放阴风说:“打仗炮火连天,家里有老有小,保家还来不及,哪有心思来护厂。”有个坏蛋又说:“炮弹、炸弹又没有眼睛,万一落在厂里,谁也护不了厂”等等。工人们听到后就当场驳斥:“我们工人靠做工吃饭,工厂被破坏,就等于饭碗被砸碎,那你一家老小去吃西北风。”染色车间老工人李海亮说:“我不相信一颗炮弹会把整个工厂都炸光,但我相信炮弹落在工厂里会引起大火,如果没有人去灭火,可能被烧光,所以我们工人一定要把工厂保护好。”工人代表响亮的声音,使这些家伙哑口无言。

他们破坏护厂的第一招失败了,又来第二招。一个被称为军师的家伙阴阳怪气地说:“既然要护厂,那就叫厂里的护工队来搞就是了,用不着另起炉灶搞什么护厂团!”这人说完,几个爪牙稀稀拉拉拍手附和说:“对,对。”但是,许多工人、职员听到这话辨出了味道。群众知道厂内的护工队,一支是工会控制的,还有一支是中统特务王福才控制的。因此,许多代表纷纷表示反对。我则坚定地说:根据总公司通知和大家意见,我们一定要成立护厂团。厂长也表示同意。这样,护厂团的领导权和工厂的机器、仓库、大门都切实掌握在我们地下党员、“工协”和基本群众手中,厂长只挂了个总团长的空名。反动派破坏护厂的阴谋又告失败。但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护厂团成立后的第四天,人事课的韩良勋、金震民利用草拟护厂团组织细则的机会,背着护厂团领导机构,擅自改动护厂团的领导体制,推派特务分子任纠察队总队长,企图篡夺护厂团的领导权。我们知道后,立即找厂长和

韩良勋进行交涉,同时发动群众抵制,要护厂队员按原来的组织体制执行任务。经过斗争,韩良勋、金震民再不敢插手护厂团的事情了。

数天后,工福会特务、工会指导员吴键,来厂找我,并气势汹汹地说:“护厂团是谁叫你们搞的?客商来提货为什么不发货?……。”正当我向吴键说明情况时,工会的公务员、护厂队员李凤鸣把吴键来厂不许成立护厂团的消息传到了装潢车间。该车间女工们听到这个消息,以夜校同学、地下党员黄明珍、赵菊英、曹云卿、王雪文、王玲娟、姚志明等10多位同志为首,马上关了车,戴上护厂团袖标涌向工会办公室,围住吴键评理。吴键两手撑在腰上怒气冲冲地说:“你们来干什么?谁叫你们护厂的?”女工们毫不畏惧地回答说:“中纺公司叫我们护厂的,是我们自己要护厂的。你为什么不让我们工人护厂?”吴键大叫大嚷说:“你们这些小姑娘能护厂吗?不要上当,护厂是共产党搞的!”这时,地下党员陈秀珍嘲讽地说:“吴先生讲话有点滑稽,我们工人保护工厂有什么不好呢?你说护厂是共产党搞的,那么国民党不要护厂而要破坏吗?”吴键张口结舌,脸上的横肉,一阵白一阵青。为了有理有利有节地开展斗争,我一面动员女工们回车间生产,一面把吴键连拖带推进了厂长办公室,由工会、行政同吴键进行谈判,达成了协议:(1)护厂活动照常进行,但不戴护厂袖标;(2)客商来厂零星提货照发,大批提货必须用坯布调换。这个老奸巨猾的国民党分子,得到了这点“面子”,也只好走了。

敌人破坏护厂仍不死心,竟装神弄鬼企图吓退护厂队员。胡说什么:“老煤场里有‘鬼’,危险品仓库那里有‘狐大仙’。”而且装“鬼”吓人。5月中旬一个晚上,装潢车间的地下党员、女工夜校同学沈彩云巡逻到危险品仓库,看到有个黑影一闪而过,她马上向护厂团值勤室报告,一面同另一个女队员手持木棍朝着危险品仓库走去,看个究竟。正当走过仓库时,突然在印花车间墙后弄内跳出一个头披黑色棉大衣的家伙,装着“黑无常”蹦跳过来。由于她们思想有准备,见到那“黑无常”跳过来时,便举起木棍朝“鬼”打去。那“黑无常”叫了声“喔唷!”把棉大衣拿下来,对两个女队员说:“我是和你们开开玩笑的。”仔细一看,原来是印花车间“拿摩温”祝华顺。两个姑娘气愤地责问他:“你为什么要装‘鬼’吓人?走,到值班室去!”那个平时欺压工人的坏蛋见势不妙,拔腿就溜。

后来坏蛋们又刮起了谣言,说护厂队里小伙子、小姑娘混在一起,夜里不做好

事情……。我们见这些坏家伙实在可恶,就以上海工人协会名义对他们寄发了警告信。警告他们要认清形势,弃恶从善,停止一切捣乱和破坏活动,否则将受到人民的惩罚。以后这些家伙收敛多了。

我们遵照党组织的指示,发动组织全厂工人和技职人员,勇敢机智地利用合法的和秘密的方法,保护工厂,使一印染厂在解放时,完好无损地回到人民手中。

巧妙周旋 瓦解敌军

5月17日半夜,厂门前突然响起汽车喇叭声,乒乒乓乓敲门声,乱糟糟的叫骂声,紧接着就有几个国民党士兵爬上铁门跳进厂里,逼着护厂纠察队员把门打开,让外面的人进到厂里来。原来,这批国民党军队是从前线败退下来进入市区的。蒋帮残军退守沿苏州河两岸的工厂和险要地区,妄图负隅顽抗。当时,造币厂桥(今江宁路桥)周围约有1个团的敌军,桥堍南北的同兴被服厂和造币厂各有1个营,到一印来是敌军团部的1个直属连,由1个营长直接带领。敌军强行进入厂后,把门口的纠察队员全部赶跑。那营长还宣布,不许工人纠察队值勤,所有岗哨由他们派士兵接替。在厂门口和危险仓库的三角地段另行增加了了望台,架起机枪,准备垂死挣扎。我们看到这些情况,估计要立即撵走他们已不可能,就按照上级党组织事先估计敌军可能进厂而定的策略,尽可能安排敌军远离要害部门、要害车间,防止其破坏。便故意把他们安排到离仓库、车间较远的合作社和康乐室住下,敌营长看到地方还算宽大,房子结构也较好,也就住进去。

第二天,我们向上级领导汇报了驻军情况。根据上级指示,首先,争取了护厂纠察队坚持值勤和巡逻。地下党员董选文特地穿上护工队制服,同地下党员潘学锦等数人以护厂队代表的名义,到合作社找敌军营长谈判。门口的士兵不让他们进去,他们有意在门口高声争辩,敌营长听到吵声,问明原因,同意两人进去谈判。董选文等人对敌营长申诉了工人护厂的道理,那人说:“别大惊小怪的,有我们在这里,还怕什么。”代表说:“厂里还在生产,进进出出的人很多,你们不认识,怕发生误会,有工人纠察值勤,不是方便了吗?”代表们还提出纠察队的固定岗哨,敌营长始终不答应。最后,讲定纠察队白天带上袖标,夜里提着马

灯,可以继续巡逻。但敌营长又心虚地规定了不得超过4人,巡逻时不可身带任何武器。

其次,组织武装纠察队,手持木棒等当武器,一旦发现敌军有破坏工厂、机器设备的意图,武装纠察队便立即把敌军住所合作社、康乐室两处出口封住,抢先迫使他们缴械投降。敌军驻厂不到两天,我们就把他们武器装备情况、岗哨位置、换岗时间掌握得一清二楚。

同时还发动党员、积极分子抓紧做士兵的分化瓦解工作。利用各种机会广泛接触了士兵,宣传党的俘虏政策,为他们指明出路。工人们主动帮士兵擦拭枪支,到瞭望台上同岗哨士兵聊天,缓和了他们的警戒气氛。装潢间的女工们在士兵开饭时,故意前去观察,见到他们生活艰苦,就借题发挥地说:“当官的无荤不下饭,你们吃糙米干饭,连小菜都没有,还为他们卖命干什么?”开始时,士兵们对工人还有些拘谨,经过几天的相处,渐渐熟悉了,就悄悄地向工人们说出心里话。有的说:“不是我不想跑,是没法跑呀!”有的还流着眼泪,把藏在内衣口袋的合家照片拿出来给工人看。有一个士兵家住在本市长沙路,曾经写了一封短信,要求工人帮他送出。有的士兵家属在工人帮助下,到厂门口来看望士兵。工人们的这些活动,有效地促使他们形成脱离反动军队的迫切愿望。

护厂队还在行政上预备了银元和便衣,对想回家的士兵给予方便。5月24日深夜,这个连队往北岸撤退时,就有一些士兵偷偷地脱下黄军装,换上便衣回家去了。剩下的敌军,士气消沉,已失去了战斗力。

敌军从强行进厂到撤离,由于我们遵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巧妙地与敌军周旋,发动党员、群众做士兵工作,既保护了工厂未遭破坏,又从心理上瓦解了敌军,使其已失去战斗力,还促使一些士兵逃跑。

斗志斗勇 赶制“袖章”

为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大上海,保护好大上海,上海地下党组织以党员、工人协会会员、地区贫民团团员为核心,建立了上海人民保安队。5月初的一天,中共沪西工人协会党团上级联系人、西区人民保安队指挥杨秉儒向我布置3天内完成印制600只“人民保安队”袖章的任务。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任务,立即回

厂与工会理事中的地下党员潘学锦、俞银泉和夜校同学、地下党员王明珍等人商量,并向党支部作了汇报。一印厂是敌人重兵把守的要害工厂,敌特对全厂严密地管制,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赶制袖章谈何容易。我们“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决定由俞银泉负责制版,由王明珍负责印制。老俞接受任务后,考虑带回家中做时间不允许,便想到车间的小阁楼仓库里是较安全隐蔽的地方。但对自己不是白铁工,便悄悄地找来护厂队员李宏宝、孙阿清两位老师傅到仓库。两位师傅知道是为迎接上海解放的任务,心情非常激动,立即干起来。楼下阿清师傅望风,小阁楼上老俞协助宏宝师傅做锌版。宏宝师傅技术熟练,敏捷地剪下一块6寸宽12寸长的锌皮,老俞把事先准备好的字样描上去。开始凿字时,突然传来阿清师傅咳嗽声。这是发生异常情况的约定暗号,老俞和宏宝师傅立即把锌皮藏起来。只听到下面一阵咋呼声:“他妈的,老子鞋掌坏了,拿几个小钉子。”原来是驻在厂里的国民党军队的几个士兵来找麻烦。阿清师傅忙走上去搭讪:“老总,里面放的是木头,要钉子我给你拿!”很快把几个兵痞打发走了。老俞和宏宝师傅听下面没有动静了,又开始凿字。仅半小时,他们就把“上海人民保安队”的镂空锌版凿好。老俞用布把它包好,藏在身上,和宏宝、阿清两位师傅分头走出仓库,把这块珍贵的锌版郑重地交给我。我随即把锌版交给王明珍,要她两天内完成印制任务。王明珍接受任务回家后,经过一番思考,当夜去找小组里另一个党员、夜校同学赵菊英,商量研究具体做法。

第二天清早,她们提前上班进车间,趁工贼还未上班之机,立即把车间里堆放的零头白布拿来,一人剪布、一人用缝纫机缝制。不多一会,缝了300多只。快到上班时,就把缝好的袖章藏起来。后来又以护厂团、救护队需用袖章的名义,公开缝了200多只。

印刷600只袖章更是个艰巨任务。白天装潢车间特务、流氓多,容易暴露,她们商定,把印“人民保安队”袖章的意义,向参加“工协”的女工,夜校同学吴阿妹交底,由她来担任警戒、望风。她们还用老办法,隔天3人提早上班,趁大家还没有来,3人将车间里的布匹堆高作围墙,中间留下一个空隙,由阿妹坐在布堆外面假装补工作服,她们两人就在布堆中间动手印刷袖章,一人坐在地板上,用手揪好坏布袖章和锌皮;一个跪在地板上,一手端住盛有红色印料的肥皂

盒子，一手用牙刷认真仔细一个一个地印刷。就在这战斗最紧张的时刻，未到上班时，突然车间里冒出了一个特务、流氓王老五。阿妹被吓出一身冷汗，但她临危不乱，镇定对付。王老五见她在补衣服，便问：“喔唷，阿妹依今朝为啥特别早啊？”阿妹回答他：“依眼睛勿看见，我在做啥？”她镇定自若地继续缝衣服，一面注视着他的动态。当王老五走近布堆，阿妹便站起来，大声说：“依做啥？”王老五望着她更衣箱内的肥皂，贼头贼脑，嬉皮笑脸地说：“这多么肥皂！”阿妹就顺手拿起一块说：“你要拿一块去好啦！”这一来特务王老五只得尴尬地转身走了。这时躲在白布堆中印刷的两个地下党员，已印完了袖章，她们由于手脚麻木，站起来，直直腰，伸伸腿，一不小心，“卜通”一声，踢翻了肥皂盒。刚走到车间外面的王老五闻声一惊，回过头来问是什么响声？吴阿妹机灵地说：“是外面打包间啥东西响。”她边说边拿了衣服朝外面走去，把特务王老五引出去。借这个时刻，两个女党员把印好的袖章藏到安全地方，随后，又及时把印刷好的 600 只袖章交给我，由我送交给杨秉儒。

5 月 25 日，上海苏州河以南地区解放了，杨秉儒通知我去海关领取“人民保安队”袖章。当我和人民保安队员们戴着我们印刷的鲜红的上海人民保安队袖章，配合人民解放军巡逻在工厂及周围的马路上时，心头充满着无比激动的、胜利的喜悦之情。

胜利之花 献慰英烈

5 月 23 日上午，国民党普陀警察局要我去警察局一次。过去，由于我是厂工会理事长，为工厂和工人的事，常去国民党普陀警察局办交涉，他们也常打电话与我联系。这次我得到消息后，想到上级领导指示：这个时候不要随便去国民党统治的机关，进去了就可能出不来。于是吃过中饭我没进工会办公室，就从厂里不大引人注意的小门走出厂，向上级党组织汇报这件事。

这于下午，普陀警察局出动“飞行堡垒”及近百名便衣武装警察包围了一印厂。一批特务进厂和厂里的特务接上头。不一会两个特务走进工会办公室，凶相毕露地问值勤的常务监事潘学锦：“理事长杨善在哪里？”“不知道，上午她还在的嘛！”潘学锦回答。这天中饭后，厂里的特务王福才早就坐在工会办公室坐

探,他也没看到我下午进办公室。于是两个特务和王福才离开工会办公室。潘学锦见此情景,正想法派人出厂通知我和在外面的同志不要进厂,恰巧工会公务员李凤鸣进办公室。他喜出望外忙叫她立即去通知在厂外的同志,告诉厂里的情况。小李利用公务员身份借出厂买香烟的机会出了厂,及时通知了在厂外的同志。厂党支部知道消息后,安排平时比较出头露面的同志隐蔽起来,对护厂等工作作了妥善安排。我得到敌人进厂逮捕我的消息后,就没回厂,未遭敌人逮捕。工人们见特务进厂捕人,纷纷走出车间。敌人没有抓到我,对厂内的一批特务、爪牙骂道:“你们这批都是笨蛋,连一名共产党分子也管不住!”随后在厂里兜了几圈,就离开了厂。敌人没有抓到我,就转到设在中纺三厂里的一印染加工场去,逮捕了19名工人,其中地下党员工协会负责人孙方璟和工协积极分子张如松、李阶平遭杀害。他们为了保护厂、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在黎明前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烈士的鲜血染红了胜利的红旗,烈士的鲜血浇灌了盛开的胜利之花!5月27日,上海解放了!大上海完好无损的回到了人民的手中,让我们把胜利之花献慰英勇牺牲的烈士们,我们永远怀念他们。



视死如归的徐海峰

徐 林

徐海峰江苏省宿迁县人,1923年2月24日生,1940年参加革命,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过乡长、乡指导员、区青救会宣传部长、区青救会主任、区武工队教导员、中共区委委员、区农会主任等职。1946年9月经中共华东联络站党组织派遣到上海搞敌工工作,1949年5月13日,即上海解放前夕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5月20日英勇牺牲于上海闸北宋公园。

徐海峰在1941年担任乡农会主任和区青救会主任期间,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秘密活动,开辟地区工作,建立民主政权,并积极发展青救会员,成立青救会等组织。6月下旬,太山区青救会成立,他担任宣传部长,正式脱离生产,从事革命事业活动。在筹备成立的过程中,徐海峰同志不分日夜,不避酷暑,坚决完成发展工作。1942年夏收减租减息运动中,他领导和发动两个乡的农民,向地主恶霸开展坚决斗争,取得彻底胜利,从而推动了全区的减租减息运动顺利的开展。当年11月份,日本帝国主义向我淮海区发动进攻,大肆清乡扫荡,并在各城镇建立据点,海峰同志积极组织民兵坚持在本地区领导群众开展反扫荡,缩小敌人“两化”地区,先后配合部队拔除东龙庵等据点,保卫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1943年秋天的参军运动中,他发动群众,不仅提前完成了一个乡的参军任务,而且把应征者家属和本人的思想动员工作也做得比较深透,所以出现了“三亲送子”参军等模范事例,对全区的参军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发动参军的运动中,海峰同志表现了高度负责的精神,深入到对象户动员,每天只有三、四小时睡眠,因而使重敦乡工作由于成绩突出而受到了区的表扬。

在土地复查算旧账运动中,群众思想有顾虑,不敢向地区的恶霸地主开展斗争,当徐海峰同志深入的做好群众工作,解除顾虑,条件成熟时,即召开3个

乡的群众斗争大会,将有两条人命的恶霸地主刘卓璋斗倒,从而提高了群众斗争的意志和信心,使以后全区算旧账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1949年秋天,江华、扬帆等同志领导的中共华东联络站为解放上海对敌斗争工作的需要,要在地方选派一些优秀的干部到上海开展敌工工作,当时徐海峰同志在邵店区任教导员,接到通知后,他二话没说,上缴了家中的20亩田,就上路了。不料,途经淮阴地区,遇到反动派的还乡团盘查,敌人用卑鄙的手段对徐海峰同志严刑拷打,遍体鳞伤的海峰同志坚贞不屈,始终未吐出半句真言,更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气急败坏的敌人见无计可施,在一天夜里把海峰同志带到野外,以活埋威逼他讲出真情,并逼问说,你是要死,还是要活,这是给你最后考虑。海峰同志想到上级派自己到上海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于是机智的说,埋与不埋随你们的便吧。但我上海有亲戚,放我出去,可以弄点大洋给你们。最后,无奈的敌人在诈去190元大洋后,终于把海峰同志放了。

到上海后,徐海峰同志和1925年就参加革命的地下党负责人、国棉十七厂的经理姜汉卿同志和地下党员樊锡瑾同志接了头。为了便于工作,海峰同志化名为徐永全,先后在上海被服一厂、三厂、袜厂等单位以工人职业为掩护,他们的任务是写标语、散传单;收集敌人情报并在敌军中开展策反工作和赶印袖标、秘密成立工人纠察队,一方面维持城市秩序,一方面保护工厂仓库不受损失,他们经常开会至深夜。1949年初,他和一个姓袁的地下党员回苏北解放区向上级党负责人江华同志汇报工作,3月又回到上海,因为我军正在准备过江,所以国民党封锁很严,他们只有爬火车回到上海,当时上海也日夜搜查得非常紧,但海峰同志不畏艰难和危险,他多次叫爱人方秀珍到国民党军官家中当女佣人,并借机寻找和窃取带有红色印章的公文,此外,他又在敌人内部积极进行策反和瓦解工作,并通过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委员方元明,搞清了国民党江苏省的组织情况,获取和保存了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的重要档案20余箱。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经常动员其爱人方秀珍为其保存印章、传单等物品,开会时叫其放哨,做了大量工作。樊锡瑾同志曾经对他说,你爱人方大姐做了许多工作,可以考虑发展他加入党组织。但海峰同志听了以后说,现在对敌斗争工作这样紧张,(她)入党的事等马上解放了以后再说吧。从乡下汇报工作回来后,紧张的革命工作使他无法在被服一厂厂里继

续呆下去,于是,他就在汉阳路买了一间房子,以摆香烟水果摊为掩护,便于进行革命活动。临战前的上海,国民党天天用飞机撒传单,造谣破坏蛊惑群众,而海峰和他的同志们则趁此机会,把印好的戳穿国民党谣言的传单散发到人群中。

1949年5月11日,国民党进行全市大搜查,为了不泄露党的机密,地下党十分重视文件和一些印章的收藏。有一天,有两位同志把一包图章等物品收藏在楼梯下未放好,结果掉到楼下28号一个居民家里了。情况十分危急,一旦落在坏人手里,后果不堪设想。大家宣誓,坚决不泄露党的机密,不出卖同志和组织,要死得其所。怎么才能把丢失的东西拿回来呢,这时,海峰同志就假借已被我争取过来的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委员方元明的名义,写信给楼下28号人家,勒令其必须在5月12号X点之前把一包东西送到楼上来,否则杀头。第二天,这家人家果然把东西送上来了,结果未遭受损失。那几天,徐海峰同志还到杨树浦找国民党连长叶叔友来谈话,动员他带领全连官兵起义。

上海解放前夕,警察局长毛森张榜公布,宣称:谁要捉到一个共产党,就奖励大洋3000块,因此把上海弄得更加乌烟瘴气、人心惶惶。13日这天,徐海峰、方干卿、方云卿和樊锡瑾等一些地下党同志以搓麻将为名在杨树浦开会(被动员起义的国民党连长叶叔友也在场),正在开会时,敌人将开会地点包围,所有开会的人都被逮捕。

在狱中,万恶的敌人对他们施尽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火烫等刑罚,未能使他们屈服,5月20日,丧心病狂的反动派仓皇逃离上海前夕,终于将他们全部杀害在闸北宋公园。解放后,当在烈士殉难地成堆的遗体中找到徐海峰等烈士遗体时,只见海峰同志遍体鳞伤,浑身有七、八个已经发黑发绿的洞,手指也烂了。据认识徐海峰同志的群众讲,他曾亲眼目睹在押赴刑场的路上,被捆绑着的徐海峰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胜利是属于我们的”等口号。

徐海峰同志自入伍以来,在革命斗争和各项工作中,均表现出高度的革命坚决性,一贯以忘我的精神专心为党为人民工作,经常为完成党所交给的任务,不避艰险,不辞辛苦,虽然面对流血牺牲,在所不辞。他不仅自己这样做,而且还动员家属一道参加和支持革命工作,因而,生前曾多次获得党和上级的表扬和奖励。

(作者为徐海峰烈士之子)

钱琴——江姐式的烈士

麟 芝

钱琴,又名钱勤,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沪西女青年会女工夜校老师,从事党的上海地下革命活动。抗战胜利不久,她在沪西被敌人怀疑,经党组织秘密派遣到台湾从事地下革命工作,1950年在台湾被叛徒出卖,英勇牺牲,人们说她是江姐式的烈士。

钱琴,1918年生,四川成都人。自小丧父,靠父亲抚恤金和亲友资助度日。后来进入免交学费的常州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在抗日救亡的爱国主义思想熏染下,思想进步很快,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成为革命行列的先进分子。常州沦陷后,她到上海难民收容所工作,与中共地下党党员共战斗、同命运,不久,便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占租界,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所办的6所学校纷纷关闭,仅剩三和里学校。钱琴深爱这所巍然挺立的学校,看到各方爱国进步力量都汇聚在这里,里面读书的是中国代表新生产力的工人阶级妇女,她们英勇机智、艰苦奋斗,是黑暗旧中国里的战斗先进堡垒。这年钱琴刚满23岁,不计报酬低廉,不怕环境艰苦,毅然到校担任教师。女工夜校,在西康路安远路之交的弄堂房子,两个开间门面,下面是教室,上面是教师和图书活动之地。来校读书的都是沪西附近工厂的女工。钱琴坚持认真教书育人,课余时与女工同学广泛联系交谈,不久便成为学校师生爱戴的老师。由于她家境贫困,所以身体条件很差,体形显得特别苍老,女工同学经常叫她为“外婆”。她除了上好课外,还特别关注贫困的同学。女工同学病了,她设法给同学治病,女工同学失业了,她想尽办法让她们维持生活,甚至拿出自己微薄的工资,接济苦难中的同学。她关注女工走夜路,在严冬腊月的深夜,陪伴家在苏州河一带女工同

学回家。她还经常到女工同学所在的工厂,看到女工同学艰苦的劳动,同时也看到大生产的工人阶级集体力量的伟大。许多女工同学在她的先进文化思想教育影响下,也很快成长,成了反抗黑暗统治的进步力量,有的同学在她的教育下,成了坚定的地下党员。三和里成了培养女工干部的秘密学校,革命的摇篮。1945年10月20日,上海出版的《女工》杂志上刊登了钱琴有感而发写就的《女工夜校》文章,文中写道:“望上海各界姐妹们,站在同一的妇女解放的立场上,来帮助推动女工教育的进行”。

1946年1月,国民党当局在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和平民主的压力下,召开有各党派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一些有利和平民主的决议。上海妇女界根据政协筹备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增加党派及社会贤达代表名额”的决议,发动一次选举“国大”女代表的活动。她与许广平、雷洁琼等35人一起被选为“国大”代表,她的得票数仅在许广平之后,钱琴已在上海妇女界已享有崇高的威望。然而钱琴在社会上和在三和里女工夜校的较大影响,却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她的活动和行踪已被国民党特务所掌握,迫害的魔爪正向她伸来,中共上海地下市委领导为保护钱琴同志,决定将钱琴转移到台湾,投入新的战斗。在告别上海、告别她的亲密战友时,她牢记党组织领导的嘱咐,坚守党的秘密,不能向任何人透露自己的行踪。告别的那天,她向自己最为挚友的时光青年会干事(校长)王知津告别时,只能以祖母病重为由,提交辞呈离校,从此,她就悄无声息地离开上海、悄悄地乘船,横渡台湾海峡到了台湾。但是,师生们不见了钱琴老师,大家仍在怀念钱琴老师,可是谁也不知她的去向。1949年5月,上海在战火中解放了,人们在欢庆上海解放时,学校师生仍在惦念着敬爱的钱琴教师,可是谁也打听不到她的下落。直到后来很久很久,人们才断断续续地知道一些钱琴老师的信息。原来她是由党组织秘密派遣她到台湾从事邮务系统地下党的革命活动,不幸被叛徒出卖而英勇牺牲。

1989年,我到区委党史征集委员会工作不久,接受编写《中国共产党上海市普陀区组织史资料》一书,其中涉及抗战前后中共沪西中国纱厂委员会书记计淑人和女工夜校教师钱琴被党组织秘密派遣到台湾从事地下革命活动和在台湾牺牲一事,为理清缘由,为组织史编写和整理烈士传记,组织上决定由我采访

当年直接领导沪西纱厂委员会的上级领导张祺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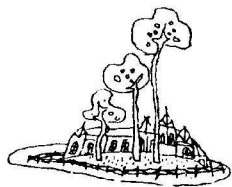
这是1992年的一个仲夏,时年88岁的张祺同志大病初愈,正在无锡梅园疗养。我从上海乘车直抵无锡,在夜色朦胧中,才见到张老。我与张老已是老相识了,采访没有什么寒暄,直奔主题。此刻的张老顿时双眉紧锁,开始回忆起革命的当年,是他代表上海地下党组织派遣革命志士到台湾搞地下工作的。这是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内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国民党蒋介石垄断抗战胜利果实,加紧部署内战,实行内战独裁,中国出现两种命运和两种前途的斗争,和平民主处于危机之中,上海人民爆发了“六·二三”反内战大示威,和平请愿遭到血腥镇压。根据中共中央在国统区秘密组织坚持党的“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白区工作方针,将已暴露的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撤退至苏北和山东解放区。钱琴等同志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并根据台湾刚回到祖国,革命条件基础较差的情况,决定派遣钱琴等同志到台湾播撒革命火种,从事地下革命活动,他们的组织关系仍直属中共上海地下党市委领导。钱琴同志被捕后,在狱中顽强斗争和视死如归的精神,我们党组织是后来才知道的。所以,你们可以写她的革命事迹,教育后人。现在台湾还没有回归祖国,希望你们党史工作者在台湾回归祖国后,再去进一步收集钱琴烈士的资料,把烈士传写好。第二年,即1993年,张祺同志病故了,他的愿望尚未实现。

到了改革开放后的90年代末,一批原女工夜校的师生要编写《巾帼摇篮》一书,大家自然回忆起难忘的钱琴老师,纷纷撰文缅怀钱老师。原女工夜校校长王知津、原女工夜校学生和我共同负责编写该书,开始对钱琴烈士资料的征集,人们对钱琴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钱琴,在1946年,由中共上海市委派她到台湾开辟另一条隐蔽战线的地下革命工作,临行时,由中共上海市委工委书记张祺同志找她谈话交待任务。到台湾后,化名钱静芝。在台湾省邮务工会补习学校当教师,克服了语言和生活上的困难,团结台湾同胞,运用各种形式宣传革命思想,宣传中国共产党。在她的秘密宣传教育下,很多同学觉悟提高,有的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壮大组织,在台湾历次工人运动中,起着骨干作用。1949年后,蒋家王朝在大陆的反动统治崩溃,龟缩到台湾,为维持其反动统治,对台湾境内的革命力量大加镇压。

1950年,有叛徒把钱琴等多人出卖了。据一位同狱的难友后来回忆钱琴说,她们被捕后,敌人残忍地施以酷刑,她坚贞不屈、严守机密,视死如归,表现英勇果敢,在被判死刑,关押执行之前,仍利用一切机会,坚持革命真理的宣传,教难友唱革命歌曲。这年的10月11日,她被拉出监狱要执行枪决,仍神志自若,与同狱难友一一握手告别,从容走向刑场,在台北市马场町刑场英勇就义。当时国民党当局还大肆宣传,现已查到当年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判决书及当时台湾报纸的报导。

但是,钱琴的英勇事迹长期被历史的尘埃所淹没,直到1981年,经胡耀邦总书记批示,中央组织部干审局审查,民政部以(81)民优字第105号文,才正式追认钱琴同志为烈士,现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纪念馆的烈士群像已摆放了钱琴的遗像。上海的书刊、杂志、电视均有报导,台湾同胞撰写的《魂系台北》已出版。钱琴烈士永远活在人们心中,人们称颂她是沪西的江姐。



深入虎穴的工运领袖汤桂芬

张菊宝 陈素英 马林轩 朱月华 邱金娣

每当我们的老校友回忆起在女青年会女工夜校一起学习、共同战斗的经历和纺织工人运动革命斗争史时,都要亲昵地喊着汤姐姐。她离开我们太早了。45岁就被病魔夺去了生命。现在我们缅怀她短暂的一生时,能浮现与她朝夕相处、并肩战斗的情景,特别她那临危不惧指挥若定的神态,以及无数看似平凡而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事例都历历在目。

女工夜校培育的女战士

汤桂芬出生于1918年上海沪西一个贫苦工人家庭,父亲汤志忠在日商内外棉四厂做打包工时,受中国共产党影响,曾参加过上海工人武装纠察队。他会日语,日本人威迫他,要他当翻译,他宁愿失业在家,也不愿为日本人做事,最后被工厂开除,遂以编织草绳维持家计。不久,在贫病交加中去世。母亲林希珍是纱厂工人,生有两男两女,生下长女桂芬后,即失业在家,生活非常艰苦。他们一家还把桂芬的大弟桂根送往抗日前线,一去无返,为国捐躯。

汤桂芬9岁起就挑起家庭的重担,先后在内外棉五厂、十四厂、统益纱厂、永安三厂、大康纱厂、同兴军服等厂做工。苦难的生活、繁重的劳动,饥寒交迫的困苦,年纪轻轻的她也已受到旧社会广泛流传的“宿命论”思想影响,认为自己穷,是命不好,要靠“吃素修行”才能“来世交好运”。1939年,她在永安三厂做工时报名,进女青年会三和里女工夜校读书。她的级任教师,是张老师,以后级任教师是钱琴和黄纫秋老师,都是中共党员。她们了解汤桂芬的身世,在思想上、学习上、生活上对她更多的关怀和帮助,使她认识到受剥削、压迫根源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所造成的。此后,她冲破“宿命论”的思想牢笼,遂把推翻三座大山作为己任,锻

炼成为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女战士。同年12月,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永安三厂爆发了为争取年奖的三天三夜罢工斗争。汤桂芬第一次参加了这样的斗争,表现特别积极,参加宣传鼓动,与工友们一起冲进经理室同资方评理。由于她表现突出,资方以“聚众闹事”为借口将她开除出厂。不久,她再度进沪西统益纱厂做工。上级党组织向统益厂的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毛经赐详细介绍了汤桂芬在永安三厂英勇斗争的情况。经毛经赐考察培养,于1940年正式吸收汤桂芬加入中国国共产党。自此,她更加自觉地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要求,努力为中国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冲锋陷阵,以后成为上海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

1941年4月,毛经赐调任中共沪西华商纱厂委员会工作,汤桂芬接任统益纱厂地下党支部书记。

1941年底,日军侵占了上海租界,统益纱厂关闭。按照党的指示,汤桂芬到沪东大康纱厂(今国棉十二厂)协助余敬成(中共地下党员)开展工作。当时汤家住沪西劳勃生路(今长寿路)大旭里,上班路途甚远,为了能有更多时间接近群众,她搬到简陋的工房里,与工人姐妹挤在一起,对贫苦工人姐妹十分关心。她省吃俭用,每次回家不乘车,从沪东到沪西,来回步行,省下来的钱接济揭不开锅的工友。她与妹妹汤桂珍在一个厂做工,与妹妹合吃一份午饭,另一份送给生活更困难的工友吃。其实汤桂芬的家境同大家一样贫困,连上级领导人到她家联络工作时一顿午饭都招待不起,只能上街去买几只大饼充饥。

汤桂芬在大康纱厂密切联系群众,处处关心工友。心灵手巧,帮助工人姐妹缝补,裁剪衣服,织毛衣。厂休日帮女工洗衣烧饭、倒马桶什么都干。她还发动群众开展互助活动,使大家深受感动。由于她勤劳、真诚、广交朋友、热忱待人,赢得了工友们的信赖。她不但从生活上关心团结工友,还千方百计地把新四军抗战事迹和党的政策在工人中传播。使工人群众增加抗日必胜的信心。这些扎实的群众思想政治工作为抗日义卖、募捐、救济难民创造了条件,为发展大康纱厂党的力量作出了贡献。

汤桂芬由于日夜操劳,长期积劳成疾,肺病复发,吐血不止,并感染上伤寒症,已无法继续在沪东开展工作,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及时将她调回沪西老家治疗疾病。

军服厂里的传奇斗争

1943年初,日军将原同兴纱厂改为同兴军服厂,开工之初,汤桂芬按照党的指示,考入戈登路(今江宁路)的同兴军服厂做工。汤桂芬技术水平高,在该厂车间内担任了第二班班长。进厂后积极动员女工到女工夜校读书,积极发展党员,并担任该厂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

汤桂芬利用自己的班长身份,积极设法为许多失业的女工夜校同学介绍工作,把朱月华、陈素英、张金凤、张菊宝、杨善、胡月仙、李根宝等20多名女工夜校同学介绍进同兴厂做工,她们团结在汤桂芬周围,成了该厂的骨干力量。当时全厂有40多名女工在三和里夜校读书,经过女工夜校培养,许多女工同学被发展为中共地下党员。该厂有党员20多名,全厂30多个生产班,其中三分之二的生产班长是党员,三分之一的生产班长是积极分子,成为沪西日本工厂中的坚强红色堡垒。

该厂是由日军直接严格控制的军服厂,工人每天要做工12个小时,大门口站着荷枪实弹的日军,宪兵带着狼狗在车间监视、巡逻,职工进出厂门要抄身,工厂不管工人就餐,大家只得自带午饭上班。厂方为了省煤,吃饭时只准工人盛一碗开水泡饭。有一次,一位女工在喝第二碗开水,日本宪兵竟放出狼狗将她咬伤。有次一位老太太给在厂做工的孩子送饭,日本人在她的空饭盒内发现一小团洗碗的乱线头,竟不分青红皂白,将她揪住,用鞭子抽打,逼她交代做工孩子的名字。老太太害怕孩子会遭迫害,宁死不说。日本人竟残忍地放出狼狗咬她,还用硝镪水泼她,老太太最后被活活折磨而死。日本人对中国工人残酷剥削与压迫,更是罄竹难书。厂方经常拖延工人的工资发放,以存入银行牟私利。汤桂芬及时将厂内发生的一切,向上级党组织汇报,并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由地下党支部领导发动了一次特殊形式的抗日斗争。

汤桂芬与支部成员精心研究、策划一场反日的“无头斗争”。为了防范敌人的血腥镇压,党支部决定不推派代表,由各班党员分头发动群众,寻找机会发动群众一哄而上跟敌人斗争,使敌人抓不到领头人。斗争开始前,汤桂芬安排可以自由到各车间走动的扫地工和机修工,分别担任联络和宣传工作。他们很快

把全厂 32 个班联络起来。一天中午,全厂 3000 多工人,一起行动,饭后回到自己的岗位都不开车,全厂死一般寂静。日本资本家大石带着宪兵队到车间问罪。大石赶到一班,揪住一位女工就往办公室拖。汤桂芬见状,立即暗示工人要为小姐妹解围,很快成百个工人一哄而上,将大石和宪兵团团围住。工人越聚越多,顿时车间里数百人响着一个声音:“要去一道去!”狡猾的大石见状马上改变了主意,放开了那位女工,转而命令各班班长去厂部开会。会上,几十个班长异口同声地说:“不发工资,工人饿着肚子开不动车;一碗开水不够,天天吃冷饭,老闹肚子疼,不能开车。”最后厂方被迫答应工人的要求,当即贴出次日发工资、保证开水供应的布告。“无头斗争”胜利了!工人们受到极大鼓舞,增强了团结斗争的信心。汤桂芬还发动群众多次开展怠工斗争,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气焰,拖延军服生产任务。怠工方式就是日本人来就做,不来就不干活。有一次陈素英上班怠工,未踏缝纫机被日本人发现,立刻被拖出去,被脚踢,还被狗咬。汤桂芬见状,立即出来对日本人说:“小姑娘人小手动得慢,不能这样对待她。”在汤桂芬有理有节的交涉下,日本人无奈只得放手。

1945 年初,日军战场连连失败,但厂里的日本人仍在吹嘘他们的“战果”。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汤桂芬和党支部成员决定开展一次政治宣传攻势。要求既能收到宣传效果,又不被敌人侦破。当时工人都把日本侵略者称之为“矮东洋”、“萝卜头”。汤桂芬暗暗带了一只有叶子的红萝卜进厂。放工时,汤桂芬等三人溜到女厕所,把红萝卜挂在板壁上,还在萝卜旁用粉笔写了两行大字:“天快亮了,大家快起来,磨刀切萝卜头!”第二天清早,这实物加标语的宣传很快传开了。人们到处在交头接耳的低语:“切萝卜头!知道了吗?”“日本鬼子快完了!”“中国人不会永远做牛马!”日本人气得直跺脚,急命女监工把板壁上的“红萝卜”拿下来。可是,切萝卜头的消息已经传遍全厂,传播到厂外。许多工厂的工人也用类似的方式盼望“天亮”。

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沉重打击下,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胜利,上海工人兴高采烈,欢庆胜利,然而日本资本家却置工人生活于不顾,在大门口张贴了停工布告。汤桂芬根据群众的意愿和党组织的指示,立即发动群众向厂方索要“停工

遣散费”。日本宪兵蛮不讲理,但又不敢明目张胆地迫害工人,而唆使狼狗咬伤马林轩和去要遣散费的女工。女工们群情激奋,一个劲儿往里冲。后来,群众推选汤桂芬等5人当代表,与厂方谈判,经过数次较量,日本资本家只得发了米和黄布军大衣。与此同时,为了保护工厂、防止日本人破坏机器、偷运物资,汤桂芬又组织了几个护厂小队,日夜在工厂四周巡逻。一天夜里,护厂小队果然发现日本资本家正在搬运布匹和缝纫机。汤桂芬得到报告立即组织数百名工人赶到厂门口拦截,许多工人还奋不顾身地躺在厂门口的马路上,阻止卡车出厂,惊得日本资本家目瞪口呆,不知所措。这时,会开卡车的工人立即跳上车去,把卡车开回厂。面对日本刺刀的恐吓,汤桂芬率领工人进行斗争又一次获得胜利。

出色的宣传活动

汤桂芬不仅是工运领袖,而且也是工人的贴心人。回顾在同兴厂时,党员王银娣生病,她发动姐妹们捐钱送到银娣家,及时帮助她治病。汤桂芬很注意对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厂里通过结拜十姐妹、十兄弟的名义来团结群众。在同兴厂罢工时大家都看汤桂芬所在二班的态度。厂里不少积极分子想参加部队到前线去打日本兵,汤姐姐就语重心长地说,在日本人的军服厂拖延军服生产,也是打击日本侵略者。大家便安下心,坚持在厂里投入特殊形式的抗日斗争。马林轩同学就是在汤姐姐教育和介绍下参加中国共产党的。

汤桂芬的思想、工作方法、处处关心别人的作风,与夜校钱琴老师很像。大家见到汤桂芬就像见到钱琴老师一样。我们都亲切地称钱老师为“外婆”,叫汤桂芬为“汤姐姐”。汤姐姐在夜校读书时,也是文艺活动的积极分子,并通过文艺的形式来教育群众。陈素英在夜校读书,经常与汤桂芬同台演戏剧,演出时还动员同兴厂的群众去观看,抗日胜利前,陈素英与汤桂芬等几个同学曾去中西女中演抗日救国的文艺节目。汤桂芬与陈素英演唱《松花江上》一歌,汤扮演父亲,陈演女儿;父女二人从东北逃亡出来浪迹街头,生活贫苦,演出时感情逼真,中西女中学生反映强烈。另一次汤桂芬和同学一起去中西女中演讲,详细

讲述工人受剥削、受压迫的痛苦生活,使学生深受到教育。

抗日战争胜利后,失业工人生活依旧很苦,女工夜校借实验民校演戏,表演反映工人要吃饭、要做工的《失业的痛苦》戏剧。由马林轩编导,汤桂芬演父亲,朱月华演女儿,马林轩演后楼阿姨。父女同唱:“穷呀穷,穷得答答滴,肚子里唱空城计,人快要断气,后楼阿姨好心送东西,买只大饼来充饥。”情景交融的演出,深深感染了500多观众。事后,三和里夜校许多同学风趣的叫汤桂芬为“爹爹”。还有一次以反对物价飞涨,奸商囤积居奇为题材的演出,汤桂芬扮演开米店的老板,把唯利是图,囤积居奇,牟取不义之财的奸商刻画得入木三分。夜校同学王菊秀、汤桂珍扮演挨饿的老百姓,指着奸商的鼻子骂:“你、你、你、你这个坏东西,市面上油、盐、柴米不够用呀,你一大批、一大批,囤积在家里……”。

汤桂芬也是女工夜校各项活动的积极分子。女青年会每年募捐,汤桂芬与大家一起到工厂募捐。在星期天,汤担任组长和几位同学还到南京路、霞飞路(今淮海路)商店募捐。

抗战初期,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后,日军侵占租界,许多老百姓无家可归,蜂拥逃到难民所。汤桂芬与三和里夜校同学一起到难民所慰问,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同学们还和汤桂芬一起为救护抗战伤兵在夜校学习包扎救护知识。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汤桂芬和夜校同学发动同兴厂职工学习包扎,救护伤兵的知识,为新四军接管上海作准备。

呕心沥血为工人阶级谋利益

日本侵略者刚投降,同兴厂就关闭了,国民党置工人的生活不顾,使大量工人陷入了失业的困境。中共沪西区地下党领导同志第一次在汤桂芬家里召开会议。会议决定,组织群众开展复工斗争,帮助工人改善生活,联络沪西各厂,把职工团结在我们周围。地点选择在中山北路朱家湾附近的平民村,成立了以汤桂芬为首的“沪西失业工人联合会”。推选出汤桂芬、顾亮、钱瑞华、王克顺等同志为复工谈判代表。当时吸引了棉纺、机器等40多家工厂,有5万多人参加,联合会组织工人多次向国民党市党部、社会局和上海市总工会(筹)等机构请愿交涉,要求“发救济金、要求复工”。

日本投降前，党中央曾计划从日伪手中夺取上海等一些城市，指示建立城市地下军里应外合。汤桂芬按照党的指示，参与组织沪西工人武装起义，配合新四军解放上海，通过各厂党组织布置积极分子张贴“欢迎刘长胜当上海市长”“欢迎新四军接管上海！”的标语。8月23日根据地下党上海“工委”的布置，汤桂芬发动“沪西失业工人联合会”的广大工人占领信义铁厂（在莫干山路）并成立了临时指挥所，机器业工人也来到信义厂。当时女青年会女工夜校许多同学和同兴军服厂的党员，是这次行动的骨干。那天她们待命没饭吃，饿了一整天。夜校的钱琴、王知津、黄纫秋、姚玉英等老师和曹云卿同学买了许多羌饼、大饼到信义机器厂去慰问，支持她们的斗争。直到下午4时，传来中共中央关于停止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指示，临时指挥所根据“工委”布置，立即组织工人有秩序地撤离工厂，并转移武器。群众分批列队走上街头，高呼“要工做，要吃饭”的口号。当时普陀区巡捕房派来了许多警察，抓走了21名代表（其中不少代表是夜校同学），关押在普陀区巡捕房。汤桂芬派张菊宝、陈素英找国民党市总工会的周学湘交涉，提出工人“要工做，要吃饭”是犯了什么罪？强烈要求释放被捕代表。张菊宝要总工会周学湘代表工人，保护工人利益，并拖住周学湘去普陀巡捕房交涉，周为了讨好工人，只得去巡捕房解决代表释放问题。

经过反复斗争，代表终于全部释放。全市性的“要工做，要吃饭”的复工斗争序幕终于在沪西信义机器厂拉开。

9月19日，美国第七舰队4艘军舰访沪，国民党当局为取悦美国，要联合会组织200名工人在外滩集合欢迎舰队司令金开德。沪西失业工人联合会便将计就计，借此，组织2000余工人的欢迎队伍到外滩，当金开德到达欢迎现场时，欢迎队伍突然打出“我们要复工，要吃饭”的横幅，并高喊口号“要复工、要吃饭”的口号，怒吼声响彻黄浦江畔的上空。沪东的余敬成、徐周良也带领工人进来，揭露国民党当局不解决工人失业困苦的丑行，使国民党当局大小官员狼狈不堪。次日，国民党以谈判复工为名，阴谋拘捕、毒打15名谈判代表。7位女代表中的杨善、沈雪珍、陈素英、张金娣、杨美玲等，均是女工夜校同学。在狱中，敌人威胁恐吓与毒打，她们饿了3天，不准吃

饭。要大家交代平民村“失业工人联合会”是谁领导的。女工夜校同学，坚决顶住国民党特务的威胁恐吓与折磨。她们坚决不吐露汤桂芬一个字。同时，还设法与隔墙牢房中男代表联系，要求他们与女代表口径、行动一致。在汤桂芬的安排下派了张菊宝、朱汇寅两位同志再次去找周学湘和章祝三交涉。经过多次斗争，反动当局找不到代表的“罪证”，一周后只得释放15位代表，由张菊宝带领代表出狱。

汤桂芬积极领导复工斗争的同时，还指导统益纱厂的复工谈判，经过各方面激烈的复工斗争，国民党当局被迫正视工厂关门、工人失业的社会问题，遂于1945年10月起逐步恢复工厂生产。统益纱厂也在当年11月复工。汤桂芬此时三进统益纱厂，她积极动员女工到女青年会女工夜校读书，并发展积极分子入党，壮大统益纱厂党的力量，邱金娣等许多女工就是汤桂芬动员去女工夜校读书，然后入党的。当年12月重建统益党支部，汤桂芬任党支部书记。

复工斗争胜利后，汤桂芬考虑到年关将至，物价飞涨，带领工人向资方争取照发年奖的斗争。1946年1月汤桂芬首先在党员较多的布机间发起罢工，各车间也随之关车，很快形成了全厂大罢工，统益纱厂工人斗争和全市工人争取年奖斗争互相影响，互相推动，在中共上海市工委的统一领导下，形成了一场巨大的运动。汤桂芬等代表再次与资方谈判，谈判破裂，再罢工24小时。当时中纺各厂和民营棉纺厂先后解决了年奖问题，统益纱厂工人也解决年奖问题，得以40、50、60元三等分发，另有阴丹士林布1.5丈。工人拿到年奖高高兴兴地过了战后第一个胜利年。

复工斗争胜利后，各棉纺厂逐步恢复生产。同兴厂的党员有的原是各棉纺厂的骨干，各厂复工后，她们就进入到信和、统益、申九、新裕二、鸿章、新生、恒丰、华阳、宝丰、庆丰等各棉纺厂去工作。同兴厂红色的种子洒遍了各棉纺厂。所到各厂，又动员了许多姐妹们到女工夜校读书。

抗战胜利后，汤桂芬肩负的任务更为繁重，在形势更为复杂的环境中，汤很少再到女工夜校去，同兴军服厂的党员虽然分散到沪西许多棉纺厂工作，但汤桂芬担任沪西（三区）工会领导，同学们仍在她的领导下进行新战斗。

“十八条”斗争的日日夜夜

抗战8年中,上海工人生活十分艰苦,抗战胜利后,物价飞涨,纺织工人待遇极差,许多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获得解放。1946年2月中共上海市工委决定在年奖斗争的基础上开展争取改善工人生活和工作条件的斗争,时任联合支部书记的汤桂芬及时把党指示对九个厂的支部作了传达。汤桂芬是全市斗争的领导成员,和工人代表去社会局与中纺公司和同业公会代表谈判,遭到拒绝。2月22日全市47家纺织厂13万多工人进行总罢工。汤桂芬发动沪西各纺织厂参加罢工,这是抗战胜利后上海纺织工人最大的一次联合斗争,给中纺公司和棉纺同业公会很大压力。斗争的结果,迫使资本家于2月28日签订了18条协议。其中包括增加工人工资底薪,工资与生活费指数挂钩,女工产假56天(工资照发),每天工作10小时,承认工会合法地位及改善职工福利等,保障工人利益的条款。这是上海纺织工人有史以来获得的最大一次生活改善,是纺织工运史上的一件大事。但是资本家并不甘心,总是千方百计地破坏协议的实施。为了使资本家履行协议,仍然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如新裕二厂因资方不履行“十八条”,工人进行斗争,军警来镇压,并抓了2个工人。此时,汤桂芬发动沪西、沪东纺织工人立即联合声援,全市纺织厂于3月14日上海总怠工2个小时,迫使资本家放人,并履行“十八条”协议。鸿章纱厂在张菊宝领导下,也进行了怠工。女工夜校同学,中共地下党员如周巧英、王美英、许玉琳、张梅英均是这次斗争的骨干。怠工中有社会局特工队来镇压。特工队来抓人说什么“要求释放被捕工人是政治口号”,“你们车间有坏人破坏生产”,要张菊宝交出人。张理直气壮地对特务说:“工人怠工是新裕厂资方不履行‘十八条’,还要抓工人,我厂工人怠工是支援新裕二厂工人的斗争,是理所当然的,我厂没有一个工人破坏生产。你们一定要抓人就把我抓去交差好了。”这次怠工是有充分准备的。敌人面对秩序井然的各车间,找不到任何镇压的借口,只好灰溜溜地走了。此后,各行业工人纷纷仿效纺织工人“十八条”,经过艰苦斗争,签订了一系列有利工人的劳动条款,汤桂芬在纺织业乃至整个上海工人群众中崭露头角。“汤姐姐”的名声开始在各行各业逐渐传开。甚至敌人听到汤桂芬名字,也感到震惊。

脱颖而出的工人运动领袖

经济斗争获得重大胜利后,汤桂芬又根据党的指示和群众的要求,着手建立维护工人利益的新工会。汤桂芬与统益厂党支部抓住时机,按照18条协议中有关规定,在选举过程中,汤桂芬亲自到各车间、小组去做工作,动员群众选举敢为群众谋取利益的积极分子担任小组长、工会理(监)事,全厂共选出142名工会小组长。1946年3月25日,召开了统益纱厂工会成立大会,汤桂芬以141票当选为工会理事长,另外4名中共地下党支部委员分别当选为理事、监事。新工会产生后,人们称之为“民主工会”。汤桂芬以工会身份与资方交涉斗争,促使厂里先后办起理发室、浴室、蒸饭间等。因统益纱厂当时已建厂20多年,工人一直带冷饭进厂,即使在数九寒天,也只能用开水泡一次。办了蒸饭间,工人吃到热饭,他们从内心感谢“汤姐姐”。为了帮助工人学文化,工会还请实验民校的三位老师(中共党员)来夜校任教。

新工会威信很高,有些生孩子的女工在享受到56天产假后感激汤桂芬,让家属拎着一篮篮红蛋送往工会。

此后,汤桂芬又当选为沪西三区纺纱厂工会理事长。

1946年1月10日,国共两党签订了停战协定。同日由共产党、民主党派、国民党的代表共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会议通过了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等五项协议。政协闭幕后,为了争取可能的和平民主,中共中央发出指示: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目前是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议会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因此,中共上海市工委决定推出汤桂芬等3人为工界代表参加竞选,上海妇女界也广泛动员起来。许广平、胡子婴根据周恩来同志意见,在当年4月成立了“上海国大女代表选举筹备委员会”于4月14日组织各界数万妇女投票选出35名国大代表。汤桂芬榜上有名。有这之前的3月份,国民党为了标榜实施所谓“民主政治”,决定在各地建立参议会,并扩大参议员的候选人范围,以作点缀。汤桂芬、朱俊欣、徐周良等有影响的工运领袖被列入上海工界参议员候补名单。实际上国民党官办的上海总工会头目周学湘、章祝三接连在报刊、电台作竞选演说,争取多拉选票。4月28日,工界参议员选举在西藏

路的宁波同乡会举行。尽管国民党特务在选举中弄虚作假,但汤桂芬仍以多数票当选为工界正式参议员(朱俊欣、徐周良当选为候补参议员)。国民党操纵的上海工福会的头子陆京士承认他们这次参议员选举失败了。当时,夜校同学闻讯个个都欢欣鼓舞。汤桂芬当选后,及时向党组织汇报。遵照中共上海市工委领导的指示,要她利用自己合法身份及其社会地位,为工人谋取利益,积极投身各项社会活动。汤桂芬利用她的合法身份,保护了不少同志,当她获悉敌人已把一些工厂的工会干部中的地下党员列入黑名单,汤桂芬就立即设法通知已暴露的党员同志转移。1946年约11月份,她获知女工同学张菊宝已被敌人列入逮捕名单,汤桂芬立即亲自通知张菊宝撤离鸿章纱厂,暂时隐蔽到杭州,后由中共地下党组织安排张菊宝去苏北解放区。

6月23日,中共上海地下党发动组织各界5万多群众到北站欢送“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赴南京请愿,汤桂芬参加了全市的欢送大会和大游行领导组织工作,还担任了沪西区游行总指挥,女工夜校许多同学都积极参加了这次欢送会。在北火车站的欢送会上,汤桂芬高高地站在人群中演讲:“反对内战,要求和平……”;这天,统益纱厂的游行队伍是大游行中较为壮观的一支,在高的横幅上写着“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标语。整齐的一行行女工队伍,两旁是男工组成的纠察队,后面是一辆大卡车压阵。《文汇报》在报道大游行时,还曾专题报道统益纱厂的游行大军。

1948年1月30日,申新九厂工人大罢工,2月2日遭国民党反动派血腥镇压。国民党当局为了逃避罪责,竟宣布不许带黑纱,以“谁带黑纱谁就是共产党”。来恐吓群众。为了对死难工友的哀悼,对申九工人斗争的声援,汤桂芬在厂里秘密布置党员、积极分子准备好黑纱,利用开工会理事会的的机会,让积极分子冲进会议室。工人对工会理事们说:“申九工人惨遭屠杀,你们工会为什么不响,你们是代表啥人?为什么不带黑纱?”汤桂芬当时在主持理事会,立即表态说:“我们应该支持申九工人的斗争,应该带黑纱。”此话刚落,工人立即给工会每个理事都带上黑纱。国民党安插在工会内的特务也不敢反对,被迫戴上黑纱。汤桂芬还说:“我们工会理事的态度应该让工人知道。”于是汤桂芬带领工会理事到各车间兜了一圈,很快全厂工人都带上黑纱,以实际行动悼念申九死难烈士。

北上出席第六次“劳大”

由于解放战争形势的急剧发展,敌人狗急跳墙,到处抓人。申九“二·二”斗争后,敌人对申九和各厂的工人代表,进行了大搜捕。汤桂芬也被敌人监视了。3月25日,汤桂芬以统益纱厂工会理事长身份主持召开了最后一次工会小组长会议,向大家报告了近日有些工厂工会负责人被捕,揭露国民党当局迫害工人的罪行。此后,汤桂芬按照地下党工委的布置,从统益纱厂撤离,秘密离开上海去解放区。最初由于敌人控制很严,暂时还不能离开上海,就由邱金娣负责保护她的安全。先是由邱带她到浦东乡下暂避,后在徐仙玲家隐蔽。汤桂芬离沪前,扮成乡村大姑娘,身穿农家妇女衣服,头扎花布巾,由邱金娣秘密护送汤桂芬离开沪西区。汤在十六铺由交通员护送乘船离开上海到青龙港,再送到苏北解放区。汤桂芬离开上海时对邱金娣说:“你们留下来的同志工作更艰苦,千万要沉住气,不要盲动。国民党统治是不会长久了,我们很快就要回来的。”

1948年8月,汤桂芬在哈尔滨参加第六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当敌人从电台广播中知道这个消息,十分恼火,要捉她的家人问罪。但在汤桂芬离沪前,地下党早有了预防不测的准备,“工委”已及时安排统益纱厂有关党员将汤桂芬的弟弟、妹妹、母亲隐蔽起来,以后也去了苏北解放区。汤桂芬在第六次劳动代表大会上多次发言,介绍了“上海女工英勇斗争”的事迹,很多代表听后感动得流下了热泪,当会上通过东北代表《关于全国解放区职工增加义务劳动一天,以其工资作为援助国民党统治区工人及人民斗争基金》建议时,汤桂芬激动地站起来表示:“大会的《决议》和解放区职工的革命情谊,一定会极大地激励和鼓舞国统区的职工。我相信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一定能把斗争坚持下去,直到最后的胜利!”第六次“劳大”盛况由解放区电台向全国广播,汤桂芬在会上发言随电波传到上海,我们的同志当时听到“汤姐姐”熟悉的声音,激动得热泪盈眶,并受到极大的鼓舞,特别是上海不少被捕同志的家属,拿到解放区职工捐的银元时,都感动得热泪滚滚。

上海解放前夕,汤桂芬随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在江苏丹阳集中,女工夜校许多校友,如张菊宝、朱月华、汤桂珍、钱瑞华、徐明哲等在丹阳与“汤姐姐”会

师,大家激动的心情,无法用语言表达。为准备接管上海,汤桂芬被分配在轻工业大队任大队长。5月27日上海解放,汤桂芬回沪后投入了紧张的工作,解放后的第四天,上海总工会成立筹委会,汤桂芬担任党组成员、女工部长。当年12月,有着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纱厂工会成立。汤桂芬在会上得票最高,当选为纱厂工会主席。1950年7月,全国纺织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汤桂芬当选为中国纺织工会副主席。同年10月,有20万职工的上海纺织工会成立,汤桂芬当选为主席。纺织工会中各个部有(除财务)10多位女部长,都是女工夜校的校友。想不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上海纺织工会干部,竟成了女工夜校的“校友会”。汤姐姐在工人中的声誉很高,成为团结广大职工的一面旗帜,她带领广大工会干部、职工积极投入工厂改革,废除抄身制,镇压反革命,民主改革,“三反”、“五反”等运动,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作出贡献。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她刻苦学习,努力工作,贡献了她的全部精力。

1964年2月18日,汤桂芬不幸被病魔夺去了宝贵的生命,当我们听到这一噩耗,都悲痛欲绝,广大的工人得悉“汤姐姐”去世的不幸消息,都悲痛万分。大家喊着:“我们的‘汤姐姐’为什么年仅45岁就离开了我们。”在2月21日开追悼会,全市有1200多名职工代表参加了隆重的追悼会。

上海总工会主席张祺在悼词中指出:

“汤桂芬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工人怎样在党的领导下,成长为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良好榜样;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工会工作者,怎样在党的领导下,全心全意为自己阶级的事业而战斗的良好榜样。”

女工夜校是汤桂芬的母校,我们夜校的校友以“汤姐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也要让我们的后代好好学习她,永远怀念她。

沪西贫民区的地下斗争

陈鲁生 单意基 许之敏 陈 祁

一

解放前沪西地区的城市贫民工作,是中共地下组织通过实验民校党支部开辟的。举办民众学校和工厂夜校,在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中开展革命工作,是党的优良传统。抗战胜利以后,进步人士、社会教育家、当时市教育局社会教育处处长俞庆棠在上海创办实验民众学校和一大批民众学校。地下党组织积极支持俞庆棠的办学活动,并派遣了一批共产党员参加这项工作。建校之初,党就指示,民校工作必须面向工厂,深入地区。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环境日益恶化,国民党对我党地下革命活动的破坏和镇压日益加剧,1946年下半年起,国民党当局就采取种种措施,限制刁难实验民校的议案。面对这种形势,党提出各种民众学校党组织都要加速开辟地区工作,把我党在民众学校的阵地向附近的工厂和贫民区延伸发展,在那里建立起一个个革命据点,以便在形势进一步逆转时,革命力量能够在工厂、地区广大群众中生根和继续发展。实验民校在地下党组织的支持和推动下,在支部书记冯援同志的主持下,进行选点和宣传工作。

余姚路棚户区,是地痞流氓异常猖獗的地方,他们勾结官府,狼狈为奸,横行不法敲诈勒索,仗势欺人,群众敢怒而不敢言。柏文龙就是曹家渡余姚路这一带的一个流氓头子。开展地区工作,不可避免地要同当地的流氓打交道。刚进棚户区时,由于我们打着“官办”的招牌,柏文龙还弄不清我们是什么路数,所以还比较客气,甚至主动借房子给我们用。但后来他发现我们在群众中的威信日高,不利于他称王称霸,便开始处处作对,派小流氓到夜校和福利站捣乱,寻衅滋事,还想把福利站的地皮占为己有,把福利站挤走。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很明显,这个马蜂窝敢捅么?反过来,如果不理他能行么?群众对我们怎么看?今后我们还能在这里站得住脚么?一场与流氓头子的斗争终于爆发了,在党的领导下,紧紧依靠受害最深的贫苦群众,在一家一户调查访问的基础上,组织了一批受害最深的群众向国民党的市政府、警察局等处告状,控告柏文龙欺压群众的累累罪行。与此同时,又通过各种关系开展上层工作与群众工作相配合,我们通过各种关系找到了苏北帮流氓大头头顾竹轩,要他干预此事。他听了情况后说:“柏文龙这小子太胡闹,要管教管教他。”儿童福利促进会的名誉董事长国民党的市长吴国桢既接到了群众的上告状纸,也受到有的社会名流送给他的函件,便飭令警察局进行调查。后来连当地国民党的区长也被争取过来支持我们。对于一些中小流氓和保甲长,特别那些原来就与柏文龙有矛盾的人,经过细致的工作,大多程度不同的站到了反柏斗争的一边,有的也至少是中立了。打击的矛头只针对柏文龙一个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党警察局不得不把柏文龙关进了游民习艺所。这一下群情振奋,整个地区都震动了,为进一步鼓舞群众斗志,巩固反柏统一战线,党组织利用群众熟悉的方式(尽管是落后的),在义悟堂(土地庙)内集合70多人焚香盟誓,与柏文龙斗争到底,经过曲折的斗争,国民党法院判处柏文龙两年徒刑,这个流氓头子终于被斗倒了。

余姚路的局面打开以后,沪西地区工作的条件更为有利了,沪西一带的流氓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震动,原来已经开辟的金家巷、梅芳里等地的工作进展更快,劲头更足了。我们又乘势在药水弄、英华里、大自鸣钟、海防路等地先后办起福利站或小民校,逐步形成了一个据点。反霸斗争的胜利推动贫民区工作加快发展起来。

这时已经到了1948年底,中国大地上一场震撼世界的革命风暴正以势如破竹之势迅猛发展。棚户区的工作也随着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

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以后,上海解放指日可待。上海地下党的中心任务是一切为了迎接解放,一切为了配合解放军解放上海和接管上海。为此,党的组织在全市范围内进行了大调整。沪西地区建立了中共沪西区委。

1949年2月底在沪西区委下又建立了以城市贫民为主要工作对象的地区分区委，由陈鲁生、单意基、许之敏、陈祁四同志组成，陈鲁生任书记，王关昶、施惠珍同志先后代表沪西区委来领导。沪西地区贫民工作的有关党组织统归地区分区委领导。

分区委建立后，全力投入迎接解放斗争。当时，形势已经明朗，国民党肯定完蛋，共产党解放军不日即将进来，敌人内部分崩离析、惶惶不安，私下里都在盘算后路。根据上级指示，分区委组织所属各单位党组织因势利导，在棚户区大力加强对群众的宣传教育，提高群众觉悟，使之对共产党解放军能有正确认识，并运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分化瓦解敌人。与此同时，大力加强发展党的工作，建立党的外围组织，把革命高潮形势下大量涌现的积极分子及时吸收到党的队伍和党的外围组织中来。根据上级部署，各单位还做了许多具体的迎接解放的准备工作，如：绘制了军、政、警、宪、特机构和重要设施的地图；搜集了本地区内国民党各机关首脑和骨干分子的名单，有些地方并有选择地对他们发了一些宣传品，向他们宣传共产党解放军的政策，要他们立功赎罪，站到人民一边；有的单位还利用条件准备一些打巷战可以使用的武器；发动群众组织护厂队、护校队、消防队等等。在进行这些工作时，分区委不断地提醒大家，黎明的前一刻是敌人最疯狂最残暴的时刻，要加倍提高警惕，注意秘密工作的规定，不给敌人以可乘之机。

在急剧发展的革命形势下，各单位的工作都有了迅速的发展，有的并在沪西区以外的地方开辟了新的关系，建立了新的据点。如金家巷在闸北，时应里在南市，余姚路在中山公园附近的西新街等。

党的队伍不断扩大，分区委每次开会都要审定一批人的入党申请，短短的一个多月发展了新党员六、七十名。鉴于发展得很快，根据上级指示，从4月下旬开始，原则上暂停发展检查清理一下，以便发展一批，巩固一批。

为了适应迅猛发展的革命形势，3月初，分区委研究决定并经上级同意，在城市贫民中建立一个秘密的革命组织“贫民团”，发展的团员由各单位党组织指派党员分别联系，不建立纵向的组织系统。发展贫民团员的审批手续规定的还是比较严格的，申请入团的人，经所在单位党组织同意后，由联系该单位的分区

委委员审核,带到分区委会上作汇报,由分区委集体审定(后来发展任务重的单位,改由分区委委员或支部审定。)短短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共发展了700多名贫民团员。各单位的积极分子大部分都吸收进来,有的参加“贫民团”后不久又被发展入党。

在临近解放的前夕,根据领导布置,各单位都组编了人民保安队和人民宣传队,以地下党员、贫民团员和工协会为主体,吸收部分积极分子组成,进行内部编组。各级指挥组织,有些是事前接好关系,取得联系,广大队员则是在解放军开进上海才公开拉起队伍,正式投入战斗的。

但是,黎明前总要经历黑暗。临近解放沪西地区经历了复杂的斗争。

1949年4月20日解放军渡过长江,迅速向前挺进,不几日上海市区已可听到越来越近的隆隆炮声。4月26日一早接到通知,当晚解放军将进上海,在傍晚时分把各自的人民保安队集结待命,伺机与解放军相配合。我们也怀着兴奋异常的心情分头通知下去。

单意基和沪西公社支部一起作了研究,并把通知的内容及时通告了所有党员。研究决定中有这样一项,由杨志清同志出面于下午4时召开保甲长会,要他们组织应变会,迎接解放。谁知到中午时炮声不是越来越紧,反而越来越稀疏了,有时还出现了些平静。几个同志都坐不住了,如果解放军今晚不进来问题就大了。我们凭什么可以召开保甲长会?傍晚队伍还要集中,不是送给敌人一锅端吗?几个人都坐立不安,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正在焦急万分之际,一个国民党警察跑了进来,一进门便大叫“你们这里4点钟开会吗?”“4点钟开会吗?”同志们一听知道不对了,正在分批撤离时,一部红色的“飞行堡垒”呼啸着开来,十几个武装特务跳下来扑向沪西公社,只差2分钟!在“飞行堡垒”到来之前的2分钟杨志清跳上了驶向曹家渡的16路无轨电车!特务们扑了个空,当晚12时和次日凌晨2点多又接连去了2次,杨志清仍然连个影子都没有,其他几个教师也不见踪影。教师住的小阁楼被抄了,发现了几本左倾书,顺手牵羊“拿”去了十几块“大头”和一段发给公教人员的呢衣料。“这里肯定有共产党,沪西公社肯定是共产党的一个据点”,但人呢?早已不知飞到那里去了!所幸党员和积极分子都已撤离,特务们扑了空。人虽没有捉去,但这个据点不能

用了。斗争如何坚持下去？——化整为零。所有党员、工协会会员、贫民团员一个一个都联系起来了，形成一张无形的联络网，继续开展工作。

1949年5月25日，经过郊区外围激战，解放军从西面突进市区，沪西地区首先解放了。

解放了！地下党员、贫民团员、工协会会员、积极分子，怀着极度兴奋的心情集中到各自的单位里，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挂起“欢迎人民解放军”、“庆祝上海解放”的红布横幅，戴上全市统一印刷的“人民保安队”“人民宣传队”的袖章拉起队伍上街了。他们有的配合解放军站岗放哨，巡逻搜索，保卫重要的水电设施、桥梁、工厂和仓库，防止敌人破坏；有的为解放军带路，剿灭溃败的国民党残余部队；有的直接收缴被打散了的散兵游勇的枪械和国民党党政特工人员以及地痞流氓手中的枪支武器。“人民宣传队”则走街串巷开展宣传工作，扭秧歌，唱解放区的歌曲，张贴通告，宣传党的政策和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那历史性的日子里，大家日夜奋战，有的连续几个昼夜没有合眼，喉咙都哑了，但仍然斗志昂扬，精神振奋。吃饭开大锅饭，组织上拨发了一批接收过来的大米，有的同志拿出了自己的几块“大头”（银元）卖点油盐青菜，就开起大锅饭来了，吃起来特别甘美。整个沪西地区到处回荡着解放区的歌声，到处沉浸在团结战斗欢庆解放的欢乐海洋之中。

千钧一发脱险记

杨志清 曹 前

1949年4月21日，我百万人民解放军以雷霆万钧之势，胜利渡过了长江，23日解放了南京，不久迅速解放了上海邻近地区，隆隆炮声上海市内已隐约可闻。

5月24日上午，中共沪西地区分区委传达上级指示：解放军将于当晚进城。要求各地下党支部务必于当日傍晚把全体党员、工人协会会员、贫民团员集中起来，配合大军进城。中共沪西公社（原沪西小学）地下党支部开会作了研究，并迅速传达到全体党员。还决定由支部书记，夜校负责人杨志清同志出面邀集大自鸣钟附近的一些保甲长和商店代表于傍晚来校商讨成立应变组织事宜，当即发出了书面通知。

88

疯狂搜捕 机智脱身

当天中午炮声有些稀疏了，下午炮声更稀稀拉拉了，有时还出现了间隙的平静。在得不到进一步消息的情况下，大家心急如焚，如果今晚解放军不进来，队伍集中起来，不等于送给敌人一锅端么？而一时又无法找到上级。单意基同志和几个支委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焦急万分。当几个同志正在操场边上商量怎么办时，约五点钟的样子，忽然从学校大门进来了一个身穿黑色制服的警察，他一进校门就问：“你们这里开会哦？”“杨志清在哪里？”事有凑巧，第一个就问到了老杨本人。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老杨立即跨步出门，跳上向西行驶的16路无轨电车，驶向曹家渡去了，机智地脱离了险境。

警察进校后，探头到各个教室窗口察看，我在中间的大教室里问他：“有

什么事？”他说：“你们在哪里开会？”我告诉他：“这里没有开会。”他不予理睬，照样四处张望。

这时，夜校师生正陆续来校，我把情况告诉了单意基同志，他决定通知同志们立即转移，随即也跨出校门。当我通知了尚在教室里的王成根同志前脚刚跨出校门，只见十多个全副武装的军警特务由大自鸣钟方向直向学校门冲了过来。他们一拥而上，为首的一个特务摆动手枪，驱赶围过来观看的群众，气势汹汹地说：“走开！走开！”我就趁机离开校门口，向曹家渡方向走去。当时，王成根同志还在教室里和几个夜校同学谈话，见到敌人已经进来，索性凭着他那一身美式配备大摇大摆地走了出来，敌人也弄不清他什么路数。其他师生有的从学校后面的矮墙上翻到隔壁弄堂走掉；有的索性就到教室里装着等待上课。敌人来捉杨志清，对不起，杨志清连个影子也没留下。

单意基同志出了校门以后，放心不下校内的一批同志，不知将有多少人被捕去，就站在学校对面的人行道上注视着敌人进校以后的情况，可能神色总有些紧张、异常，不料敌人也有布置，派便衣特务混在人群中注意动静。老单的神色被他们注意到了，一个特务上前抓住老单的衣领，拔出了手枪对着老单胸口，喝问：“你干什么的？”“有身份证么？”当老单去取口袋里的身份证时，特务喝道：“慢慢着！”另一个混在人群中的便衣特务走了出来。把老单身上摸了一遍，没有武器，才让他拿出身份证来。这时天已经暗了下来，路灯本来就昏暗，这地方离路灯又远，特务拿出手电筒照照身份证上的照片，再照照老单的面孔。看身份证确实是他本人的，然后进行了盘问。幸而老单根据地下党组织平日的布置：一旦被捕，对付敌人的审讯，平时就要有所准备，所以对特务的盘问未露任何破绽。

特务问了他的姓名、职业住址。他按照身份证如实地对答了。

特务又问：“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刚从外面回来，看见许多弟兄（以前旧社会一般百姓称国民党军警为弟兄）在门口，所以在这里看看。”

“你从哪里来？”

“我舅舅家小孩满月，我去吃满月酒，刚吃完回来。”

“你们这里有个杨志清么？”看来他们的主要目标是老杨。

“有的。”

“他是干什么的？”

“教务主任。”

“你们这里下午要开会么？”看来又是哪个保甲长会出的毛病。

“我下午出去了，刚回来，还未进去，不知道有没有开会。”

这时周围上来看热闹的行人和小孩已经很多，特务正在轰赶围观的群众时，老单也就趁机退到人群中，在混乱中走掉了。

再也不能呆在现场了，组织上还不晓得呢。老单向分区委书记陈鲁生同志寓所奔去，但后面有没有尾巴呢？老单穿了好几条弄堂，兜了好几个圈子，反复检查，后面确无尾巴，才跑进陈鲁生的小房间向他报告了刚刚的经过，但到底多少人被捕还不知道。

沪西公社出了这么大的问题，陈鲁生这地方能保证安全么？陈鲁生当夜也得另找地方栖身。当时时间已经不早，10点钟就要戒严哪，两人也来不及具体分析情况，研究一下下一步怎么办，就先匆匆分手各自找安身隐蔽的地方去了。

老单离开了陈鲁生家又检查了几次，没有发现尾巴，跳上三轮车，既不讲到什么地方去，也不讲价钱，用手向前面一指，快，快，直奔南阳桥一位同志的家里，三轮车以飞快的速度向南阳桥奔去。到了南阳桥，刚踏进他家的弄堂，戒严的汽笛已经呜呜长鸣了！

两次搜捕 敌人扑空

离开沪西公社以后，我同王成根同志竟在长寿路胶州路口相会了，两人商议了当时的紧急情况，决定先到西康路1001弄老王家里把事先转移去的一些文件，“工协会员名册”等先隐蔽好，老王又让在沪西公社日校读书的弟弟到学校教师住宿的小阁楼上取下外套上佩戴的“中国儿童福利基金会”徽章，以防敌人追踪，然后，他们一起乘三轮车先到长乐路我从前读中学时的一位老师家里，借宿不成（事后了解，他的爱人在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不便

留宿)。最后，他们就到了中国儿童福利基金会。为了安全起见，当晚睡在临近杜美公园（现襄阳公园）的一间办公室里，旁边就是一个“夜花园”，万一再出现什么情况时也便于转移。

事后知道，那天傍晚，敌人在第一次搜捕时扑了个空后，当晚12点多钟和下半夜两点多钟又到夜校进行了两次搜捕，结果也都一无所获，杨志清连个影子也没有回来。他们爬上教师宿舍，翻箱倒柜，连一张照片也没有找到，只是顺手牵羊拿走了老单的十几块大头和国民党政府发给公教人员的一段中山装衣料（这是解放以后重返沪西公社时才发现的）。

化整为零 各自为战

大家被打散了，谁也不知道在哪里，当务之急是怎么能互相联系上。老王说，过去老单碰头常约在“觉园”，现在我们找不到老单，老单也找不到我们，如果未被敌人捉去一定也在想找；我们到“觉园”去碰碰看，说不定他也会想到这地方。他们到了“觉园”，不久，果然老单也来了。他也不知道我们是否已被捕，也是出于同样的想碰碰看，居然，我们大家竟都碰上了，大家都非常高兴。原来三个人都没事，老杨已经飞掉了，看见他跳上16路公交车。于是心放下了一半，但当时在学校的其他同志呢？究竟有多少人被捕去，三个人都不知道。怎么办？我们分头去访问了几位学生党员。原来一个人都没被捉去。

三个人一起分析了当时的情况，觉得如果可能的话，争取夜校复课对工作有利。但经过考虑，又觉得太冒险了。于是决定化整为零，转移到校外活动。

学校出事后的第三天，我在重新寻找同其他党员的联系时，在安远路上竟和杨志清同志意外的相遇，他留下了电话号码，请单意基同志和他约定碰头的地点。之后，他们电话中约定了时间在“金门大戏院”门口见了面。考虑到老杨已经暴露而上海即将解放，同意他到七宝镇亲戚家去，能够隐蔽到上海解放就是胜利。

工作方面，王成根、顾洪福、韩玉林和我分别到工厂、棚户区同其他党

员接上关系，同“工协会员”的联系也在几天内迅速恢复，很快建立起单线联系网络，化整为零，继续坚持迎接解放的斗争。

白色恐怖 巧妙周旋

上海市区处于我人民解放军重重包围之中，反动政权风雨飘摇，即将垮台。夜校共产党员、工协会员在党的领导下，发动群众积极参加护厂，反对国民党搬迁机器设备，反对生活指数冻结的斗争此起彼伏，敌人以实行白色恐怖作垂死挣扎，多次以户口大检查为名搜捕共产党员和所谓“共产党嫌疑分子”。就在沪西公社夜校出事后不久，几个党员约定在哈同花园（现工业展览馆友谊电影院）里碰头，刚谈完工作步出园门，又遇到特务突击封锁搜捕，晓得他这次更是漫无目标企图侥幸捞个外快，所以大家也更加镇静而机智地脱了险。

为了逃避敌人搜捕，我们经常变换住宿地点。老王有时住在父母的家里，有几天和老单及我一起睡在他的单位里。白天大家分头出去活动，各干各的。晚上人家都下班走了，老王再回来把门开开来，虚掩着，我和老单先后进去。反正天气已经不冷了，又都是二十几岁的小伙子，所以也用不着被褥铺盖，在地板上和衣而眠就可以过夜。睡了几夜之后，怕被邻人注意，就又换了地方，我住到威海卫路救济总会仓库，老王和老单竟一起在当时国民党驻英大使郑天锡的公馆里睡了好几夜，那是一处漂亮的洋房，正在空关着，由一名茶房看守。老王认识这茶房，向他打了个招呼，说乡下有个亲戚出来，家里地方小住不下，晚上二人到这里来睡几天。那茶房慨然允诺。那里晓得竟是两个共产党员“逃犯”。于是二人晚上就堂而皇之的睡到大使公馆里，睡觉前与老茶房闲聊闲聊，拉拉关系，也向他进行些宣传教育。住在这种大公馆里真是再安全也没有了。但天数多了也不行，怕引起人家注意。老王就又住到父母家里，老单则设法睡到亲戚处。他还向一位过去的同志借了一件旧呢料长袍，一条旧呢料裤子，从陈鲁生处拿了一顶大礼帽，顾洪福又给了他一副平光眼镜。穿戴起来，微胖的身体，俨然是个大老板。所以尽管天天仍在沪西一带跑来跑去，却从来没被人认出来。

大军进城 欢庆解放

5月25日凌晨，我人民解放军由徐家汇方向进入市区，苏州河以南地区率先解放。夜校师生当天一早回到了沪西公社。解放了！解放了！大家一起欢呼雀跃，放声歌唱。第一件事就是在大自鸣钟的塔楼上贴出“热烈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幅标语。夜校党支部随即组织起以党员、工协会员为骨干的沪西公社夜校“人民保安队”。王成根同志担任队长，高音喇叭的喉咙喊起来倒也颇有几分威武。大家日夜值班巡逻，协助解放军保护仓库、银行、变电所的安全，收缴国民党败兵和地痞流氓手中的武器，有力地维护了大自鸣钟地区的社会治安。

回忆解放前夕这段历史，虽然夜校遭到敌人的破坏，但没有人被捕。全体共产党员、工协会员没有人动摇退缩。大家坚守岗位，改变斗争方式，继续在工厂、地区活动，发展组织，护厂应变。解放军进入市区后，配合解放军防止了敌人溃逃中的破坏，维护了附近地区的社会秩序和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为迎接上海解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药水弄的生死搏击

唐士林 丁玉海

1948 年秋,国民党政府在战场上节节败退,上海人民已经看到即将解放的曙光。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根据形势的发展,决定加紧在贫民区开辟工作,发动群众开展活动,条件具备时发展党员,建立组织,中共药水弄地下组织就是在这个时候建立的。

解放前,药水弄是上海有名的贫民窟(又称石灰窑)。与南北英华里联成一片,是上海最大的贫民棚户区之一。1948 年,药水弄已有居民 14000 多人,绝大部分是工厂工人、小贩、拉人力车、踏三轮车、拖老虎塌车以及讨饭拾荒的无业游民。他们住的是芦席棚、滚地龙,喝的是苏州河里的臭水,走的是泥泞羊肠道。平时垃圾成堆,夏日蚊蝇成群,蛆虫乱爬,疾病不断。当时民居流传说:药水弄是“吃水不清,点灯不明,走路不平,出门不太平”和“宁坐三年牢,不住石灰窑。”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药水弄贫民还要受国民党政府和地痞流氓的沉重压迫和剥削。这些地头蛇惯用“打秋风”、“做阴寿”、发户口米等方式对贫民敲诈勒索,药水弄成了人间地狱。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药水弄人民对当时的黑暗社会充满了怨恨和不满。

1948 年底,大自鸣钟的沪西公社业余夜校中共地下党支部,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决定派党员唐士林同志到药水弄开辟工作,由杨志清同志与其单线联系。到药水弄工作的还有在沪西公社夜校读书的丁玉海、葛志敏等同学。我们以基督教青年会沪西公社的名义与药水弄的保长拉上了关系。青年会是一个有三十多年历史的宗教团体,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我们说明来意后,得到保长的同意,并借了一间草房,很快就在药水弄办起了一所儿童福利站,并挂上沪西公社分校牌子,开办儿童识字班和成人识字班。唐士林同志任儿童福利

站的负责人。我们又以儿童福利站的名义,到几个保长处查阅户口资料,了解失学儿童人数,然后逐个上门访问,调查他们的家庭情况,动员失学儿童和青年进识字班。为缺衣断奶的穷苦百姓发放寒衣和奶粉等赈济物资。就这样逐步与药水弄的贫民群众融洽了感情,站稳了脚跟。

识字班是我们在药水弄开展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要阵地。到这里来学习的人都有一本家庭血泪史。他们抨击社会不公道,为什么有人住洋房、吃鱼肉、穿绸缎,而他们却只能住“滚地龙”,吃菜皮汤。寓教育于识字中,以三座大山压迫中国为比喻,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国民党反动派政权的腐败,宣传苏联人民和解放区人民翻身当家作主的幸福生活,激发同学们的觉悟,只有团结起来才能翻身得解放。在药水弄内,经过我们的辛勤耕耘培育,结出了丰硕的革命果实。有一批青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们团结在党的周围,积极参加贫民团组织,有的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9年初,药水弄的党员已有近10人,上级党组织派许之敏同志来具体领导和加强建党工作。不久,便建立了中共药水弄地下党支部。杨恢烈同志任支部书记,唐士林同志任组织委员,丁玉海同志为宣传委员。

1949年2月,蒋家王朝已日落西山奄奄一息,上海即将解放。许之敏同志传达了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为迎接上海解放,迅速建立“贫民团”组织。我们接到上级指示,立即行动起来,以共产党员为骨干,发展一批积极分子参加贫民团,成人识字班的学生也大都参加了“贫民团”,以药水弄为中心的贫民团员有一百人以上,他们遍布在药水弄、南北英华里、小沙渡路、潘家湾、潭子湾、大洋桥、曹家渡等地。“贫民团”有组织网络。大队长是树士义,联络员唐士林。药水弄由丁玉海、尹士明、陆尧卿、张自强负责,潘家湾、潭子湾、大洋桥由高政卿负责;曹家渡的一个布厂和力行中学由许立夫负责;南北英华里由冯树卿、万金贵、李朝全、王家文等人负责,正红里由冯国强负责,锦绣里由王世鸿负责;小沙渡菜场儿童福利站由皮友堂负责;大旭里由方广裕负责。为了对付敌人溃逃前的破坏,要求每个贫民团自备诸如木棍、铁棍、刀、斧、绳子等武器,我们还侦察国民党普陀区警察局的地形,准备袭击警察局。“贫民团员”已严阵以待,准备战斗。后来党组织很快

下达指示，上海地下党任务主要是动员群众，保护城市，打击敌人，迎接上海解放，我们采取了更加隐蔽的方式进行斗争。

为了有利于开展工作，我们又组织了一个药水弄的义务消防队。药水弄自1922年以来，已发生过三次大火灾，1942年烧了800余家，药水弄成了一片焦土。临近的余姚路棚户区1949年春又发生大火。我们通过一些贫民团员发起组织义务消防队，得到群众的拥护，保长也表示支持。我们党组织的一些意图便是通过义务消防队得到贯彻。一些地痞流氓在义务消防队前面也不得不有所收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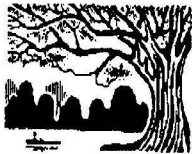
我们的儿童福利站影响越来越大，引起了敌人警觉，开始注意我们的行踪。他们一是派人监听我们上课的内容。在成人班上课的是党员许之敏、杨恢烈、尹士明、丁玉海等同志，发现形迹可疑的人则用读课本掩饰。二是派人盯梢。他们有时装成同路人送许之敏、唐士林回家，以窥测我们同志的活动和住址。党组织商量用甩尾巴、兜圈子与他们周旋，逐个脱身。三是派国民党军事联络员公开调查。先是找老师摸情况，然后直接找唐士林训话。由于群众的掩护，两次见面都未能认出唐士林。但是一再躲避会遭敌人疑心。于是党组织研究一套主动出击方案，直接上门拜访，并作好被捕的思想准备，被捕后一不能暴露身份，二不能涉及其他同志。组织上也作好营救的准备。唐士林同志在党组织的精心安排下，勇敢地上门拜访这个军事联络员，但这个联络员见大势已去，却已抢前几天夹着尾巴溜到吴淞避难去了。

1949年4月，我军百万雄师下江南，国民党反动派已兵败如山倒。为防止敌人在溃逃时的破坏和坏人趁火打劫，发动群众在各条弄口装木门。同时，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前线指挥部名义，分别向几个保长和流氓头子发出警告信，要他们安分守己，不得坑害百姓，否则当心丢脑袋。这些家伙见信惊恐万状。他们已怀疑我们是新四军派来的，一个流氓头子讲，唐士林不是新四军可以杀我头。然而国民党政府已风雨飘摇，树倒猢猻散，他们已龟缩一隅，不敢公开露面了。

隆隆的炮声划破长空，解放军兵进上海在即，我们的同志忙着侦察苏州河两岸的敌情，随时准备为解放军进城引路。我们还写标语、备医药箱，一切为上

海的解放而准备着。5月25日,解放军进入市区. 药水弄地下党支部立即投入战斗,派出一部分贫民团员,戴上人民保安队袖章,为解放军带路站岗放哨。我们又组织一批贫民团员到闸北收集国民党残兵败将丢弃的枪支弹药和通讯器材,先后收缴长短枪300支左右,保长和地痞流氓自备手枪亦被我们收缴。夜以继日地奋战了几天几夜,终于完成了组织上交给我们的任务。

药水弄党组织从建立到上海解放总共只活动了5个月。在党的领导下,这是一支战斗的组织。共产党员是忠诚于人民解放事业的,世代贫困的药水弄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这个光荣的革命传统我们要永远坚持。



腥风血雨中的抗争

华校生

解放前夕,中共上海市地下党在沪西地区开辟了城市贫民工作,为迎接上海解放和顺利接管作出了应有贡献。英华里、梅芳里、大自鸣钟等地也是沪西地区城市贫民革命斗争几个阵地。

早在上世纪末,小沙渡地区沦为公共租界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经济侵略,在吴淞江(即苏州河)南岸先后开办了13家棉纺厂。日本资本家为便于有效地控制和利用华工,在工厂周围建造了一批简陋工房,便于大肆地掠夺、压榨中国的原棉资源和劳工血汗。英华里(当时称樱华里)、梅芳里便是这时形成。居住在这里的居民绝大部分是附近工厂的工人和其他的一些城市贫民。他们世代过着饥寒交迫的悲惨生活。

英华里、梅芳里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里弄。早在30年代,日本侵略军发动对上海直接军事进攻的“一·二八”事变时,激起上海人民反日怒潮,英华里、梅芳里成为上海抗日的大本营之一。沪西地区坚持罢工的工人云集这里集会活动,坚持反日斗争,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锅饭运动,得到了宋庆龄、何香凝等著名人士的支持。远隔千里的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也支援了沪西人民的斗争,捐赠了13000元。英华里、梅芳里一带曾被称为“红色沪西”、“小苏维埃”。

抗战胜利后,人民盼望和平、新生。但是蒋介石却发动内战。在党的领导下,上海开展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形成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二条战线。形势的发展,上海地下党决定开辟地区城市贫民工作。在余姚路棚户区开辟工作成功后,又进一步向大自鸣钟地段发展,先在沪西公社(现长寿路二小)、药水弄建立了党组织。在这同时,党组织进一步把儿童福利站发展到大自鸣钟西康菜场、英华里和梅芳里等地,并派出党员皮友堂、冯树卿,王治等到上

述三个地方开展工作。由于热诚地为当地群众服务,很快地站稳了脚跟。并及时地发现和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及时地把其中一部分同志吸收到“工协”和贫民团内,他们成了地区一支可靠力量。

英华里、梅芳里与药水弄党组织相互配合,积极地为迎接上海解放进行准备。他们有的密切观察敌人部队调动,有的在测绘地形,有的准备防止敌人破坏的武器等。梅芳里的共产党员王治还曾利用与国民党江阴要塞司令的亲戚关系搞过策反工作。同志们熬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终于盼来上海的解放!

1949年5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冲过国民党军队层层防线,终于从西郊突入市区。梅芳里、英华里和大自鸣钟是解放军解放上海的必经之路,党组织及时地把英华里等里弄的共产党员、“工协”、贫民团成员编成了人民保安队,为解放军引路,协助军管会看守工厂、学校和仓库,严防敌人的破坏。同时加强巡逻,收缴敌人遗弃的枪支弹药。保安队过着战斗的集体生活,沪西公社则成了同志们食宿的大本营。经过同志们夜以继日的战斗,终于粉碎了敌人想破坏大上海的阴谋,上海完整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革命胜利的果实也同样凝聚着英华里、梅芳里和大自鸣钟地区的共产党员、积极分子和广大居民的心血!

上海解放了,百废待兴,需要综合治理。形势的发展,上级党组织决定把药水弄、梅芳里英华里等里弄的党员重新组合成自大鸣钟党支部,书记冯树卿,组织委员唐士林、宣传委员王治。9月份,以吴亮平为首的新的沪西区委建立,同志们开始在新区委的领导下,又投入到建设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去了。

接管普陀警察局

口述：董 镇 整理：张佩华

接管前的充分准备

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城市，是旧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党中央对解放上海和接管上海十分重视。当时国民党反动派集结 20 余万军队在上海周围，妄图负隅顽抗，并准备在被迫逃跑时，对上海城市进行毁灭性的破坏。针对这种情况，为了尽可能保全上海和顺利地接管上海，陈毅司令员和中共中央华东局领导同志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周密地部署军事进攻的同时，从老解放区抽调大批干部和大量物资，从思想上、组织上、物资上，为接管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从而使上海城市在解放后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迅速完成了接管任务，走上了改造和建设的道路。

在准备工作中，最重要的是思想准备。1949 年 4 月，被选调的干部集中到江苏丹阳，进行一个月左右的学习，主要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入城纪律守则和各项政策。当时领导上要求大家认真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解决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在思想上明确从农村环境、武装斗争环境转到进入大城市，意味着我们的革命逐步由新民主主义阶段向社会主义阶段转移，我们必须适应新的形势，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武装头脑，完成党交付的接管上海的任务。经过学习，广大干部的思想水平有了大大的提高。同时，还学习了中央的各项城市政策，使大家能适应变化，在工作中加以贯彻等等，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在上海解放后如何把城市接收好、管理好，使城市生活迅速正常化。

陈毅司令员为我们作了一次报告，谈了形势、政策、纪律和城市接管工作。要求进城后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团结一致，接管上海，保卫上海，建设上海，把“冒险家的乐园”建设成为社会主义、为人民造福的新上海。

接管中的“双管齐下”

1949年5月27日上午,我作为接管专员,带领19人的小分队,在隆隆炮声中,来到上海市普陀区接管了区警察分局。当时区里来讲分两条线接管,一条是以赵虞、刘大樾等为首的接管伪区公所,一条是我们接管伪普陀警察分局。当年的普陀区地盘很小,面积只有2.65平方公里。虽然地方不大,但因为是上海纺织、印染业集中的工业区之一,工人群众较多,又是我们地下党长期活动的地区,所以国民党为了加强对该区的控制,曾将普陀区列为警管区。当时区警察分局位于江宁路,也就是现在的区人民医院。警察分局有警员231人,共设五个股:一股“警防”,负责马路交通、市容卫生等;二股“司法”,负责办案;三股“户籍”,负责户口管理、门牌整理;四股“总务”,负责出纳、福利、枪支等;五股“秘书”,负责人事管理、会计等。

我带领接管人员来到分局后,由于人地生疏、情况不明、人力较少,给我们的接管工作增加了难度。但是我们绝不气馁,知难而上,我们一靠人民解放军作后盾,听取了驻在普陀区中国人民解放军警备团同志的情况介绍;二靠地下党同志的支持,向地下党了解警察分局内部组织人员、武器等的情况,了解社会治安、工厂、商店、地理等外部的情况。在部队和地下党的配合下,我们边接收,边管理,双管齐下,明确地讲就是夺权,砸碎旧机器,成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机器。在掌握情况的基础上,我们召开了警员大会,宣布根据市军管会的命令进行接管和接管人员的名单;宣传了党的政策,并宣布纪律,凡放下武器,不再与人民为敌,不再反共反人民,不搞破坏,愿协助我们接管警察局出力的,我们都欢迎,给予出路,继续留用,如有违反者,将予严肃处理。由于党的政策正确,当时200多名警察,除少数人逃跑外,基本都来报到,听候录用。然后,一面开展各项清点工作,一面举办学习班,对他们进行教育,并迅速抓紧恢复社会治安工作,让一般交通警察、消防警察等人员立即照常开展工作,进行值勤和巡逻等,维持好社会秩序,使人民群众的利益得到保证。还从工厂吸收一些工人等优秀分子进来,充实加强队伍力量。1949年6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委任我为普陀分局第一任局长。

接管后的较量与斗争

我们接管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充满了尖锐的斗争。临近上海解放接管时,蒋家王朝已处于行将覆灭的境地,国民党更加疯狂镇压革命群众,大肆逮捕和秘密枪杀我地下党员。当时,普陀警察分局地下党支部书记钱凤岐和党员刘家栋同志于1949年5月13日遭到秘密逮捕,在临解放前7天即5月20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他们在敌人的酷刑面前英勇不屈,慷慨就义。后经市局批准钱凤岐和刘家栋同志为烈士,家属也得到妥善的安置。新生的人民政权又面临反革命残余势力的疯狂反扑,各方面的情况相当复杂。接管中主要反映在分局内部的接管与反接管的斗争,如1950年初,就发生了8名警察暴动,妄图将我和来接管的干部全部打死,占领普陀警察分局,进行垂死挣扎,幸好被及时发现,没有得逞,这些人在大镇反时全部处死。还有同各种反动组织和社会上地痞流氓等坏分子的斗争。为了加强社会治安,成立了以军队为主的治安保卫委员会。采取对散兵游匪进行登记,收缴私人枪支,打击流氓和盗窃犯,取缔银元投机等一系列整顿治安的措施,以减少犯罪,将犯罪分子送到苏北劳改农场,这些人别的怕,最怕的是送到苏北。在斗争中采取镇压与宽大相结合,严惩与改造相结合的政策,个别恶劣的进行镇压,当时镇压就在武宁路中山北路处,这个地方那时是一片荒地。还打击了地下反动组织,清除了隐藏的匪特,荡涤了旧社会的污泥浊水。以后又经过了肃反、镇反、民主改革等一系列的斗争,逐步建立了新的社会秩序,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接管工作的顺利进行是通过大家的艰苦奋斗才换来的。那时我从山沟里到这个大城市接管,虽然住的是楼房、有电灯、电话,条件很好,但实际是一场很艰苦的战斗。我从入城那天起,每天都是工作到深夜十一、二点钟,没有星期天,过年过节,人家休息,我们公安部门加班加点,从未在家吃年夜饭,也从未和孩子们到公园里去玩一玩,始终战斗在岗位上,埋头苦干,努力工作。这样,才保证了接管的顺利进行,保证了接管时期的社会治安、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保卫了三年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使市场十分稳定,民心安定,出现了一个良好的社会局面。

27 军兵临造币厂桥

华校生 顾淦翔

2007年8月17日赤日炎炎的下午,按照约定我们来到老红军罗维道将军在上海长宁路的居所,93岁高龄的罗将军不顾高温与年迈,热情地接受了我们的专访。

罗维道将军,1915年9月生于江西泰和县一户贫苦农家。1929年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4月加入共青团,1932年3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员。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先后参加了五次反围剿和湘赣边区三年游击战争、苏南战斗和黄桥决战、涟水和莱芜战役、淮海战役以及渡江战役和解放大上海的战斗。曾在1930年反围剿战斗和1947年莱芜战役中两次负伤。历任江西军区万泰独立团连指导员、湘赣红五团营教导员;新四军团政委、苏南第四军分区政委兼中共郎广地委书记;华中野战军第16旅政委、旅长;华东野战军第6纵队16师师长、第27军81师政委;建国后任空军华东预科总队长兼政委、防空军一军政委、福州军区空军副政委、福建省军区副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我们此行的目的是要了解解放军攻入上海,争取国民党刘昌义部起义和解放普陀区的情况。罗将军尽管年事已高,行动不便,听力有些背,但回忆当年的情形仍记忆犹新。

“1949年5月24日,我们27军从松江进入市区,占领了虹桥镇、龙华镇和龙华机场。25日天刚蒙蒙亮,部队在进攻苏州河造币厂桥时受到盘踞在对面的国民党军顽抗。根据上级的命令,为了保护上海这座城市,战斗中不得使用重武器,部队伤亡很大;在激战中路边的电线被打断,我们的战士触电倒下,北方战士不懂电的知识,一个拉一个,结果伤亡好几个,后来找来电工师傅剪断电线

才算完事。”

虽然相隔半个多世纪,但罗将军的记忆仍然清晰。

“我们81师临时师部设在第二劳工医院(今西康路)。天亮后,中共地下党员、上海策反委员会的田云樵等同志(事后知道他们的身份)来到师部与我和师长孙端夫联系,我说中央指示我们,要‘解放上海、保卫上海、建设上海,不能用重炮和炸药’,既要打军事仗,又要打政治仗,最好进行政治攻势解决对面的敌人。田云樵马上想到联系人王中民,讲王曾任国民党少将部员,与对岸51军高官较熟,现兵临城下,争取他投诚是可能的。随即安排参谋送其过河。”

“上午,我们又接待了王关昶、施惠珍等地下党同志,王是沪西人民保安队的负责人(事后知道,当时也没有介绍信)。我请他们为部队找30名向导,以帮助部队向江湾地区挺进。”事后我们知道,当时81师师部所在地一劳工医院也是沪西人民保安队的联络点。

罗老用浓重的江西话继续说道:“经过一番周折,中午前敌淞沪警备副司令兼51军军长刘昌义偕王中民、参谋等几个人乘坐吉普车通过造币厂桥来到我师部。刘对我讲,汤恩伯跑了,让他当副总指挥代军长,还对桥北的部署情况作了介绍。我讲你一小时内不投降,我们就彻底消灭你!他跟我谈了一个来小时,讨价还价,到底是改编、投诚还是起义?他要保留原来的编制、武器,我说绝不可能,只有放下武器,同意算你起义。他见我态度坚决,也就不再坚持。谈妥后双方在文书写的协议书上用毛笔签了字,对协议中‘保留原来的编制、番号’一句,我毫不客气地划掉了。”

“因为签了字,气氛比较轻松。看吃饭的时间已到,我请刘昌义吃顿饭,四菜一汤:青菜、豆腐、萝卜和一点小虾加清汤。他可能嫌差不想吃,问我平时也吃这些菜吗?我说还没这么好。”

“饭后刘昌义提出要见陈毅司令,我说找不到陈司令(其实陈老总已在中山公园),你可以同聂凤智军长谈,刘略有不满,但还是听从了我的安排。于是我带着刘昌义、王中民等坐车前往虹桥路的27军军部。为确保安全,我派一辆架着机枪的卡车在前面开路。在军部,我们受到聂凤智军长的接待,刘昌义表示了起义的决心,聂军长笑着说:‘我听罗政委在电话里谈起,已向陈毅司令员作

了汇报。’并说,对刘的安全,解放军绝对予以保证。至于待遇问题,对刘军长等贡献较大的国民党人将给予特别优待。刘听了连说‘谢谢’。”

我们在后来的一些回忆文章以及刘昌义的回忆录中知道,为了贯彻协议,双方又商定三项具体内容:

一、刘昌义命令 51 军在 25 日夜 12 时前将造币厂桥防地(包括大场)交给解放军,51 军集中到江湾体育场,并配合解放军打击顽抗的国民党部队(刘提出时间来不及,后同意推迟 4 小时);

二、命令国民党 21 军、123 军向大场集中,把苏州河以北所有防地、仓库、物资移交解放军;凡有违抗的,都由人民解放军解决之;

三、命令国民党所属部队在撤离中,要确保交通、通讯、水电等设施完整,不得破坏。

聂军长和刘昌义在协议上签字后,大家分头行动。刘昌义等返回北岸,让军法处长魏震亚留在 81 师师部,负责双方联络。对这些情况罗老都基本予以肯定。

“26 日清晨,我们 81 师顺利地从造币厂桥等桥上通过,接管了刘昌义 51 军的所有防地,解放了整个沪西地区并向江湾地区进发,扫清残敌。5 月 27 日上海全部解放。”罗老浓重的江西口音到此告一段落。

对解放军 81 师进城时在大西路(今延安西路)曾举行过一个简单的进城仪式的传闻,罗维道将军笑着断然否认:“没有!打得那么厉害,怎么可能搞什么仪式?”

考虑到罗老的身体,我们只能告辞了,罗老在女儿的搀扶下坚持送我们到电梯口。面对这位战功卓著、亲自参与解放上海和普陀区的老将军,我们除了表示崇高的敬意外,真诚地祝福他安享晚年,健康长寿!

建设沪西新政权

普陀区委党史研究室

1949年5月27日，上海全境解放。8月6日，市委决定市区建立9个区委，吴亮平同志奉中央之命，到上海沪西。9月2日，正式被宣布任命为中共上海市沪西区委书记。1950年6月，中共上海市委决定，以行政区为区域重新调整区委，吴亮平同志出任中共普陀区委书记，直至1951年3月离任。吴亮平同志在沪西和普陀一年零七个月的任职期间，培养出一大批党的好干部，并带领全区干部群众，团结一心，克服困难，为全区恢复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巩固新生政权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他所呈现内涵极其丰富的执政能力、领导风范和人格魅力，为我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至今仍有历史的借鉴作用。

106

打一场恢复经济的人民战争

吴亮平同志初来乍到沪西，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克服困难，安定人心，尽快恢复和发展生产，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沪西是上海经济命脉的大工业区。上海解放不到一个月，美国即指使国民党蒋介石公然宣布对上海口岸实行武装封锁，妄图把新生的上海政权扼杀在摇篮里。当时上海重要工业生产原料大部分依赖国外，沪西是工业区，棉纺织业所需原棉60%靠进口，毛纺织业全部靠进口毛条维持生产，面粉原料全靠洋麦，造纸业完全依赖进口纸浆，卷烟业半数以上的烟纸、烟丝是进口的，甚至全市人口赖以生存的粮食，50%~60%靠洋米、洋面来维持。美蒋的封锁、轰炸和暗藏的敌人破坏，给工业生产带来严重困难，人民生活陷入极度的困境。全区860家大小工厂（其中30人以上工厂为200多家）原料短缺、销路呆滞、

资金匮乏、供电不足，特别是占全区工人总数80%的私营厂，工人生活已陷入难以为继的程度。申新第九棉纺织厂是当时全国最大的民营纺织厂，有纱锭13万，5400名工人，半年时间亏损额竟达折合棉纱2000件。崇信纱厂资本家出走香港，生产全线停顿，2000多工人生活无着。一些不法商人，乘机哄抬物价，扰乱市场，敌特分子借机造谣惑众，制造混乱。吴亮平同志坚决执行中央、华东局市委的指示，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各界人士，以百折不挠的战斗精神和清醒的头脑、灵活多样的策略，打一场恢复生产的人民战争。

沪西地区党员85%在工业系统，为此，吴亮平与区委其他领导成员决定在支部委员一级办学习班，统一全区干部思想，又在夜党校连续举办3期有2700名工厂党员和积极分子参加的培训班，为发动全区人民生产自救准备了干部队伍；同时，派出工作组到基层建立工会和青年团组织，为大规模的经济恢复准备了战斗指挥部和战斗员；多次举办职员学习班，团结、教育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让他们与一线的工人站在同一条战壕，为经济的复苏献计献策；团结教育资本家，鼓励他们为维持生产多作贡献。在全区人民的共同努力下，生产开始恢复、社会秩序得到整顿、民心趋向安定。1950年10月，抓住棉花秋收后农村市场出现的机遇，积极推动已停工的纱厂恢复生产。到1951年3月，吴亮平同志离任，全区工业生产的恢复打开了新局面，为全区以后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理论联系实际 加强队伍建设

保持党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加强党的队伍建设是吴亮平同志戎马一生的宝贵经验。

吴亮平同志到沪西后，重点抓的是建立一支与人民血肉相连的干部队伍。吴亮平同志上任伊始，注意对全区干部的组成和思想状况作深入调查。区的干部大多数来自沪西地下党，他们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冒着生命危险干革命，富有自我牺牲精神和严密的组织纪律性，不足之处是许多同志没有经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缺乏执政的领导工作经验；区里还有一批来

自随军南下的干部，他们经历了战争的考验，视野宽广，但对本区人文历史和社会风俗习惯了解甚少，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都有各自的思想作风、工作态度和生活习惯，如何把大家在工作上、思想上凝聚在一起，这是吴亮平同志深思的大事。他要求区委领导成员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团结和带领群众克服困难、共同战斗。针对干部思想实际，他强调，干部要防止因胜利而骄傲，以功臣自居而脱离群众。为了教育干部，能把大家思想拧成一股绳，吴亮平同志不辞劳苦地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大会报告，小会辅导，个别谈心，在全区培养了一支作风好、战斗力强的干部队伍。其次，吴亮平同志身先士卒，深入实际，在火热的群众运动中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吴亮平同志身负区委书记的重任，时刻牢记党的中心任务，特别注意理论联系实际，经常到区的大街小巷、工厂学校实地调查研究，注重在基层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以点带面，指导工作。在部署全面工作时，反对照本宣科的空泛教条主义，要求区委领导成员和广大干部坚持实事求是精神，加强调查研究、深入基层。他率先垂范、夜以继日地与大家个别交换意见、促膝谈心；针对干部和群众思想实际，精心准备，多次亲自给同志们作形势和任务、党风建设的报告或党课，他的理论联系实际做法深受大家的欢迎。

高超的领导艺术

吴亮平同志是我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又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他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以深邃的哲学思维，观察每个历史时期的国内外形势，善于从纷繁杂乱的现象中，把握事物的本质特征，筛选最有价值的信息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剖析，找出解决问题的突破口。他的这种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出色的领导艺术的结合，在沪西，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胸怀全局，高超的领导能力。1950年6月，美国突然发动侵朝战争，10月，我国政府毅然做出重大战略决策，“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爱国运动。朝鲜战争爆发后，特务、匪徒谣言四起，一度在市民中造成思想混乱。“会不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很多人存在的焦虑，害怕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会“惹火烧身”。面对大敌当头和人们的

疑虑，吴亮平同志以教育入手，精心部署全区抗美援朝宣传的教育工作，亲临统益纱厂大礼堂为广大干部群众作形势报告，组织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青年学子作控诉美国侵华种种罪行的演讲，达到预期的宣传效果。广大党员群众纷纷捐献钱物购买“飞机”、“大炮”，在全区掀起了抗美援朝、报名参军和发起爱国增产节约运动的高潮。大家对区委书记吴亮平同志的这种高超的领导艺术非常佩服。

二、注重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吴亮平同志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做干部的思想工作。有位干部在谈心中袒露自己有“骄傲自大，目中无人，自由散漫，不拘小节”的缺点。吴亮平同志对这个问题作了鞭辟入里的剖析，他说：“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个人的本领再大，也不及人民群众的力量大。你一定要目中有人，切不可狂妄自大、自由散漫。至于不拘小节，不一定是坏事，拘泥于小节的人往往会谨小慎微，办不了革命大事，成不了好战士。但是不拘小节要以不损害别人的、集体的利益为度，否则就是大节。”字字珠玑，言简意赅。他既给人以教益，又从不自居人师；他思想极为敏捷，但毫不锋芒毕露。他的谈话朴实无华，总是给人以启迪，使人不愿离席。即使对方一时想不通，也不强求于人，而是耐心细致地做团结教育工作。他凭其坚定的信念、明澈的思想、宽阔的胸怀、巧妙的说理和自己的模范行动，使人在不知不觉中为之折服。

三、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沪西许多工厂的旧职员是企业的管理层，其中技术干部大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代表厂长对工厂实行管理，也是工人的直接管理者。上海解放后，国家对他们实行“原职、原薪、原制度”。但是，由于在旧社会里，旧职员代表资方压迫工人，长期以来劳资矛盾尖锐，工人群众从思想上、感情上不愿接受旧职员对工厂的管理，对立情绪相当大，这在沪西已成为普遍的问题。吴亮平同志以求实精神做工人的思想工作，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主人翁精神，教育工人要做工厂的主人；同时，又紧紧抓住对旧职员的思想教育，要他们真心实意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再教育。但他们思想顾虑重重。吴亮平同志加大对旧职员的思想教育的力度，多次为他们举办学习班，请专家给他们上课，吴亮平同志也亲自给他们作报告，

在统益纱厂礼堂召集全区范围内各工厂的职员大会，对他们进行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宣传和党的方针政策教育，强调工厂职员必须重视自己的学习，自觉改造，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来管理生产、管理工厂。吴亮平同志针对职员的思想实际，严肃地批评职员中存在的“一分行情一分货”，把自己当作商品出卖的雇佣思想。在这同时，他高度重视落实党和国家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在会上他代表区委宣布：“你们过去是资本家的工具，今天已成为劳动阶级的一部分，要坚决地同工人群众站在一起。”吴亮平同志的报告切中职员思想要害，振聋发聩，反响很大。许多原来思想顾虑重重的旧职员说：“这些话说到我们心里去了，我们一定要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教育，做工厂的主人。”吴亮平同志的报告争取和团结了职员，既教育了广大旧职员，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又改善了工人与职员的关系，推动了后来的工厂民主改革，加强了企业管理。

四、博采众长、虚怀若谷的开明风度。吴亮平同志有高超的领导艺术，但为人谦虚谨慎，注重自身修养和形象。在区委，他从不包打天下，充分发挥一班人和全区党员干部的积极进取精神。在领导班子里，他是领导，但不做家长，书记和委员是平等关系，实行民主集中制。对副手和部下，按照分工，充分放手，但又不放任；执行任务，态度坚决，但又反对照搬照套；建国初，沪西需要大批干部担任各级领导岗位，他坚持到战斗的基层第一线去蹲点，发现苗子、培养干部。他特别重视在工人中选拔干部，坚持重才更重德。在吴亮平同志的积极努力下，经过培养和磨练，沪西区人才辈出，为全市、全国输送了大批干部，他们在祖国各地的不同岗位上，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党性修养和人格魅力

长期以来，吴亮平同志自觉注重马克思主义党性修养，在革命的实践活动中体现了坚忍不拔的忍耐力、顽强的革命意志和襟怀坦荡的人格魅力。

吴亮平同志曾是我党的高级干部，早在20年代的莫斯科中山大学，他因坚决抵制王明拉帮结伙的宗派活动，多次遭到握有党内大权的王明的打击和

迫害，但吴亮平同志始终坚忍不拔地与王明作斗争，同时又顾全大局，积极为党工作，不计较个人得失，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翻译了被毛泽东称赞为“功不在禹下”的《反杜林论》；继续撰写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的文章，在中央党校、抗大、陕北公学讲马列主义理论课，发挥了共产党人的无私无畏、克己奉公、把自己一切献给党的模范作用。1940年，任弼时代表党中央与吴亮平同志作平反谈话，推翻王明强加的一切诬蔑之词，选其为中共“七大”代表，恢复吴亮平同志一些领导职务。延安整风后，毛泽东考虑要加强干部学习理论，但是很多马列著作还没有翻译过来，曾与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凯丰商议成立一个马列著作编译部，请吴亮平同志出任部的负责人。但是亮平同志一再表示，要多做一些实际工作。他先到晋西北，后来又回到东北根据地任抚顺市委书记、东安地委书记，打土匪、搞土改，不久又在江西建设新的解放区了。

全国解放后，吴亮平同志愉快地服从中央的安排，到上海最需要干部的第一线沪西区委工作。在沪西，他继续保持党的优良传统，以其特强的党性修养，严格要求自己，全力以赴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

沪西的老同志怀念吴亮平同志，颂扬他的伟大寓于平凡之中，赞美他在沪西以自己特有的人格魅力呈现了他那高度自觉的马克思主义党性修养的风范。

人们从来没有听到他讲自己“过五关斩六将”的丰功伟绩。他始终以一个普通党员干部的身份与同事打成一片，倾听别人意见，即使对犯有错误的同志，也宽厚相待，以理服人。

不少人认为他是区委“一言九鼎”的大干部，而与他相处较久后，才知他是个温文尔雅的“大官”，是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的好官，他与普通党员干部和群众情同手足，人们喜欢与他为伍，同工作共战斗，称颂他具有从善如流和朴实无华的品格。

人们赞美他是知识渊博，诲人不倦的长者。吴亮平同志博古通今，知识渊博，但仍勤学苦练，在百忙之中重新校译出版《反杜林论》，满足科研单位和读者需要。他十分关怀工人渴求文化的要求，特设区委职工教育组，指导工厂组织工人文化学习班，组织班组读报会。他善于运用切中时弊的语言，

号召人们在火热的现实生活中进行自我改造，“修身养性”。

吴亮平同志离开普陀，又先后在党和国家许多工作岗位上披荆斩棘，为祖国出色工作，但他又几遭磨难，死而复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已是垂暮老人，在担任全国政协常委时，还情系沪西，四次到普陀区给老战友宣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改革开放新政；他奔走祖国各地，给历次运动中蒙受冤屈的同志抚慰伤痛，落实党的政策。大家盛赞这是一位可亲可爱的道德高尚、永葆青春的革命家。

1986年10月3日，吴亮平同志病故于北京。中共中央评价他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社会科学家。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



蹉跎岁月永难忘

范小凤

1920年,我出生在江苏常熟一个贫农家庭,父母以种田养蚕为生。1932年日货侵占中国市场,中国货被日货排挤,养蚕大量亏本,我家生活发生严重困难,加上债主逼债,因无法偿债而破产。父亲被迫到无锡拉黄包车,但养不活家里人,当时,我只有12岁。家里托亲戚把我带到上海进厂学生意,受尽厂主欺压,经常不给饭吃,为了活命,为了能学到技术,只能忍气吞声过日子。

艰苦的环境磨练了自己。1936年,经人介绍,我进入文德女工识字学校读书,还参加各种文艺演出,受到了启蒙教育,思想觉悟不断提高。朱立波老师很看重我,给我起了一个学名叫冯勇,他鼓励我要坚强勇敢,这对我以后参加革命工作影响很大。

1938年,我在同兴纱厂做工时,由孟佩英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初期,党为了进一步培养我,派我到解放区培训。不到1年,又有新的任务等待我,党要我仍回上海开辟工作,并嘱咐我,要去日本人开设的规模较大的工厂,不能由人介绍,凭自己技术考进去。我遵照党组织的指示,选择了内外棉十三、十四厂,因为我布机挡车技术较好,当场就被录取了并得到最高工资。我在厂里站住脚跟后,为了积极开展党的工作,有意接近本班拿摩温张小妹,为她做事,取得了张小妹信任,提拔我做帮拆工,这样活动面广了,我可以四处活动,同工人广泛接触。对周围工人,年龄大的我就叫“阿姨”,年龄小的叫“阿妹”。放工后,我经常到工人朋友家串门子,帮她们扫地、洗衣、拎水、做家务。平时,自己省吃俭用,积下来的钱,去帮助有困难的工人。我寄住在工人陈梅仙家中。有次,梅仙宫外孕,生命有危险,我就赶紧送她进医院,并代付医药费,梅仙的丈夫很感动,以前对我存有戒心被“理解”两个字冲掉了。根据上级党组织指

示,要在内外棉十三、十四厂成立中共党支部,要我担任党支部书记,同时,上级党组织又派杭惠兰、孙雪珍来本厂,同我接上了关系,以后又陆续派进了多名党员。十三、十四厂的党支部就这样成立起来了。我们积极团结工人,开展抗日宣传,发展党员,做好建党工作,直到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接下来就发动工人开展要求复工的斗争,为了改善工人工资待遇,生活待遇,大大小小的罢工浪潮轰轰烈烈,总是取得胜利,达到预期效果。中纺一厂的工人运动在沪西区是比较有名的。

1947年,沪西区成立了工团组织,上级党组织派我去担任沪西区工团书记,分管面广了,我不再担任中纺一厂党支部书记了,但我公开身份仍是一厂工会理事长。这样,我既负责沪西区工团领导工作,又要过问一厂工人运动,两头奔波。

1948年1月,位于沪西区的申新九厂为反对厂方打八折分两期发放年终奖的决定,在上级领导下,筹划全厂罢工。在1月30日12点30分全厂正式罢工,并推出了工人代表140余人。代表们经过商议,拟出7条要求向厂方提出。突然而起的罢工,使厂方手足无措,经过劳资双方谈判,形成僵局。与此同时,上海又发生舞女赴社会局请愿的事情,29日又发生同济大学学潮,国民党当局以为这三潮是共产党在活动,于是决定对申九工人诉诸武力,实施武装镇压。装甲车开进了申九,工人遭到残酷镇压。在这生死搏斗中,共牺牲了3个年轻女工,重伤40多人,被捕200多人。国民党的血腥暴行,激起了全市工人和各界人民的强烈愤慨,引起强烈反响。为了向全市人民揭露和控诉国民党倒行逆施,上级党组织决定开追悼会。当时申九地下党已隐蔽起来,主持开追悼会,唯有我出场,这样,引起了国民党对我的注意。另外,我在中纺一厂抗战胜利后的一系列工人斗争中,一直以工会理事长身份,冲在前面,一厂特务早已把我列入“共疑”对象。这次声援申九斗争又公开露面,因此在1948年3月,普陀区警察局逮捕了我。中纺一厂的党员和工人群众心急如焚,大家表示一定要把我营救出来。党组织利用邵裕本(中共党员)工会理事长名义,要他四出活动营救,邵日夜奔走,不辞辛劳,多方交涉,据理力争。国民党当时尚未吃准我的真实身份,同时,打进敌人心脏的杨宽

海也为我辩护，因此，我被无罪释放，并给予复工。许多工人兄弟高兴得放鞭炮迎接我出狱。出狱以后，上级党组织就准备让我撤退。但是考虑到马上撤退，会引起敌人怀疑，而且又正值8月份第二届工会改选临近，于是张祺对我说：“目前你不但不能走，而且要参加竞选，一定要选上，然后再撤退。”于是我全力投入工会竞选。8月举行改选，党组织密切联系群众，掌握了全厂选票3/4，改选结果，完全实现了预定名单，我得票第一位，再次当选常务理事。9月我接到上级的撤退指示，悄然离开了上海。



我在工人运动中成长

杭惠兰

我是1943年进厂的,在这个厂里经历了三个时代,三个时代更换了三个不同名称。日本帝国主义的时代叫内外棉株式会社一、二厂。国民党时叫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上海第一纺织厂。解放后,又称上海国营第一棉纺织厂。

我未进厂以前,原是上海申新九厂整理车间的验布工。当时内外棉株式会社一二厂为了扩大军用生产需要,正准备招收一批养成工(就是学徒工)。党为了加强在内外棉厂的力量,厂内地下党员范小凤同志通过拿摩温关系,介绍我到厂里当养成工。进厂以前,组织上交待我的任务,就是要好好学习,好好做工,取得敌人信任,保住饭碗,在这个厂里扎下根。按照党的指示,通过约半年的学习,我从养成工转为正式工,总算把饭碗保住了,在厂里站住了脚跟。

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日本的暗探、警察到处搜索共产党的踪迹。为了保存和发展党的力量,我们对日本人不采取公开的罢工斗争,而是开展隐蔽的怠工、慢工斗争,在斗争中物色积极分子,发展党的力量。例如,我们根据日本领班进车间的时间规律进行怠工,当日本领班进车间的时候,都把车子开得很好,日本领班一出车间,车子都关下来,然后三五成群在一起聊天。开始一般谈谈家常、生活等,慢慢谈到日本帝国主义罪恶,又谈到新四军、八路军……当时群众对共产党还印象不深,但对新四军、八路军印象却很深。这个厂的苏北人比较多,新四军、八路军在苏北一带军纪严明,爱护群众,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很多工人都知道。党员积极分子利用这个机会引导大家,谈论国家大事,谈阶级斗争,激发大家阶级仇恨,引导大家热爱新四军、八路军、共产党。当时我所在的北织车间第五组,经常聚集了许多人,车间里的拿摩温对第五组的评价是:像个“茶馆店”。

少数拿摩温是日本领班的心腹,日本领班不在,由她来管理工人,故而做好拿摩温工作,对延长慢工的时间是有利的。我们向拿摩温中一些进步的有正义感的人做工作,对他们进行阶级教育,告诉他们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的敌人,为他们效劳,是不会有好处的。争取大部分拿摩温站在我们工人一边,个别的也就孤立了。时间一长,拿摩温的管理也松懈了。

工人是轮换吃饭的。第一班吃饭时,还开着车,到第二班吃饭,日本领班也去吃饭了,工人们就趁机把车子全部关下来。用当时工人的话说,就像摇班(罢工)一样,虽然每天工作12小时,实际上不到8小时。利用怠工、慢工时间,党员对群众做了大量宣传和组织工作,从而把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发展了党的力量。1945年我发展了5名共产党员,以后又陆续发展了好几个党员。

党组织除了向群众进行口头宣传以外,还用张贴标语口号的方法,向群众宣传,常常在厕所间,在洗手池旁,在过道里,人不知鬼不晓的出现了共产党的标语。当我们看到很多工人姐妹在边看边议论的时候,就感到特别高兴,这是我们工作起了效果。

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到国民党当局统治时期,党领导的工人运动斗争形式由隐蔽的斗争发展到公开合法的斗争,主要有两个特点:1、我们利用合法的工会组织的形式,领导公开合法斗争;2、由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在斗争中,党的力量迅速发展。从我个人来说,也是在党领导的工人运动中,逐步成长起来的。

为了适应厂里斗争特点,地下党的组织分成两条线,一条线是工团组织打进合法组织,公开领导斗争,也就是打进工会夺取领导权。当时范小凤、邵裕本两同志通过公开民主选举,担任了正副理事长。另一条线是厂党支部,做细致扎实的群众工作,扩大党的组织,发动群众起来斗争。两条线是互相联系的,领导工团的是范小凤同志,负责党支部的是我。后来到1948年底,我厂已有77名党员,在上级党组织指导下,成立了党总支,我担任了总支书记。在国民党当局统治时期,我厂罢工斗争是很频繁的,大大小小的罢工斗争有几十起,斗争前都是由党组织亲自布置和领导的。在上级党组织的正确领导下,斗争艺术不断成熟,掌握了主动权,党和群众的关系像鱼水关系,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奋

斗。中纺一厂的斗争在沪西区是举足轻重的,占着重要地位,所以有“红色堡垒”之称。

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面临覆灭境地,对共产党、进步人士进行疯狂的镇压。每天晚上,警车呜呜呜地叫,大批共产党员、进步人士遭到逮捕,军警在中纺二厂也逮捕了一批同志。当时组织上为了保护同志的安全,保存党的力量,通知我厂几名比较“红”的同志,暂时离开工厂,所以走了一批党员。另有一部分党员和积极分子,仍然冒着生命危险,天天进厂,开展护厂斗争,不让敌人破坏,一直坚持到解放。

回忆过去岁月,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场面,犹在眼前,和厂里的工人兄弟姐妹们,在共同的目标下,战斗在一起,生活在一起,亲密无间的情形,仍历历在目。我要永远珍藏这种友情,永不忘怀。



战斗在特殊岗位上

杨宽海

我早年在上海英商开设的公共汽车公司求职。1937年经金子明、刘宁一两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我一直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地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军政要员纷纷从重庆拥至上海,以“接收”的名义,争权夺利,瓜分胜利果实。当时,国民党上海市总工会的范才驊提出,凡百人以上厂单独成立工会,隶属总工会领导,由总工会派出“指导员”到各厂指导组织工会,范企图以此控制工人运动。针对这一新的斗争特点,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领导人张祺同志要我去找“同山兄弟”、“上海工人忠义救国军”第二支队长章祝三,利用和章的特殊关系,设法打入敌人内部,观察敌人的动向。

我与章祝三原来都在上海英商公共汽车公司当售票员,一起拜过朱学范(当时任全国劳动协会主席)为先生。我接受上级指示后,立即登门拜访章祝三,对他说道:“祝三兄,听说你现在有官衔了,我特来请你帮个忙,找个事干干。”章祝三答应了。

1945年11月,经章祝三介绍,我被委派进入中纺一厂(现上棉一厂)人事课任一等办事员,专办劳工管理,处理罢工、怠工等事宜。不久,我又被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任命为“指导员”使我有了更合法的身份作掩护。地下党领导特别叮嘱我不要弄得太寒酸,说话也不要太“红”(指进步、革命的语言),要注意乔装打扮。于是,我戴上金丝边眼镜,穿上毕挺的西服,手里牵着一只狼狗,上下班骑摩托车,故意做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使自己从外形上同国民党“指导员”靠近,迷惑住了敌人。

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特工头子陆京士在各厂筹划建立国民党直属区分部,章祝三要我参加国民党。我马上将情况向党组织汇报。党组织要我将计就

计,利用参加国民党之机,设法抓实权,以便于开展工作。几天后,我便对章祝三说:“你要我入国民党可以,但你们现在都是‘大亨’了,让我当个普通的党员,那不行。”章祝三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没有几天就任命我为国民党78区分部书记。这样,我在敌人内部站住了脚,为配合地下党开展工作奠定了基础。

随着上海工人运动的蓬勃开展,国民党深知工会在工人中的地位,他们拼命想争夺工会实权,培植自己的亲信。当时,国民党社会局规定各厂工会理、监事的候选人,一律要通过社会局审查方可认定。我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对中纺一厂工会理、监事的审查权。按照党的指示,我与厂内地下党默契配合,凡是范小凤送上的名单,我都一一照圈,这样,中纺一厂工会的理、监事,实际上是由地下党安排的。首届工会的理事长、常务理事都由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担任,有力地挫败了国民党的阴谋。

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中纺一厂工人斗争频繁,引起了敌人的怀疑和追查。1946年11月,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吴开先写信给中纺公司总经理束云章,并附上35人(也有中纺一厂的人)的黑名单,要各厂厂长严加注意这些人的活动。我接到上级党组织的指示,要我设法抵制国民党的这一追查行动。一天,章祝三来中纺一厂问我:“你厂里到底有没有共产党?”我说:“什么样的人才是共产党?他们额头上又没有字,我怎么知道有没有共产党?”章祝三也无可奈何。

陆京士亲自挑选女特务蔡某来中纺一厂当“书记工”。党组织了解到蔡某原是个叛徒,危险性极大,于是指示我一定要设法阻止该人进厂。我马上去找吴厂长。吴曾留学日本,人称“吴大炮”,平时看不起陆京士、章祝三之类。我利用这一矛盾,对吴厂长说:“上头要派个女‘书记工’来,听说很厉害,很难与之共事,所以先来报告你,请厂长定夺。”吴厂长听了大为不满,当蔡某来厂报到时,就不客气的叫她先回去等着,有空额再通知她,把她打发走了。1947年春,党组织告诉我,解放区派来一位周国桢(周小鼎)的同志来上海,需要立即搞一张居民证,并叫在中纺一厂安排个工作,以作掩护。我利用与国民党三区区党部主任李华的关系,为周搞了一张上海的居民证。接着,我又通过邵裕本将周国桢安排在工会任文书,使周取得了职业掩护。以后,周担任了中共沪西区民营纱厂委员会书记,领导沪西区民营纱厂的地下党工作。

1947年5月间,章祝三与我闲谈中透露出国民党想在厂里组建镇压工人运动的“护工队”,我立即向党组织作了汇报。党组织经过研究认为,硬顶着不让组建,可能会暴露身份,不如利用这个机会,把我们的同志派进“护工队”,开辟一条新的对敌斗争的战线。同时对我交待了三条原则:第一,队长要由我们的人来当;第二,要掌握住枪支;第三,不能让国民党派教官来厂。不久,章祝三正式找我商量筹建中纺一厂“护工队区队”的事情。谈及“队长由谁来担任时”,我说:“看来一下子很难找到合适的人选,还是先让我来干吧。”章祝三便同意了。区队成立后,上面发下了两支枪,一支由我自佩,另一支发给副队长洪锦江。我又与厂地下党范小凤、邵裕本配合,将10位地下党安插进“护工队”。在54名队员中,地下党员就占了1/5左右,“护工队”实际上控制在地下党的手里。

“护工队”组建不久,章祝三要把申新九厂“护工队”的一个国民党军事教官派到厂里来。我说:“我们厂里有人当过兵,可以担任教官,自己厂里的人各方面活动都方便些。”章祝三认为我言之有理,就没有表示异议。这样,我很快地贯彻了党组织的三条指示。有一次鸿章纱厂发生罢工,厂里“护工队”被抽调去“执行任务”,我宣称自己厂里有情况,调回了“护工队”。当国民党再来调中纺厂“护工队”时,我总是借口“护工队”成员抽不出,或者说需经公司认可、厂长同意等加以拒绝。

1948年秋,国民党当局想通过组织全市性突击查户口,追查地下党的线索。中纺一厂的“护工队”也接到了搜查厂对面梅芳里一带居民户口的任务。当时,梅芳里一带住着不少党员,上级党组织要我亲自带队,保护我们同志。我对“护工队”的人说:“梅芳里有许多本厂工友居住,弟兄们不要搞得太难堪,不要随心所欲。”我要求他们万一抓了人送到我这里处理,不要送警察局。搜查过程中,“护工队”里的地下党员也有暗中配合,故意草草了事。每当敌人追查工人斗争的领导人时,我总是用轻描淡写的方式,把工人斗争说成是“劳资关系”或“我正好做夜班”等,进行消息封锁。由于我的特殊身份,也免不了引起一些不明真相的自己人的非议,但只要是为党工作,保护好同志,我心中也非常的快慰。

我在这特殊的岗位上战斗了4个春秋,直至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了,我同全上海一样,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从此,结束了我这特殊的战斗生活。

为死难烈士佩戴黑纱

徐明哲

1948年春节期间，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白色恐怖下的上海，到处是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凄凉景象。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数以万计的工人，包括我们女工夜校的学生，都戴着统一的2寸2分宽的黑纱，更增添了万分悲情。

工人们佩戴2寸2分宽的黑纱，是为了悼念申九“二·二”惨案中牺牲的3位工友，愤怒抗议国民党当局的血腥暴行。

申九工人为度年关，要求厂方发放拖欠5个月的配给米和配给煤。可资本家却回答说：“今年是荒年，农村收成不好，等明年丰收了，再发米给你们”；“南京的煤还未开出来，东北的煤无法运出来，等挖出煤，修好公路再发给大家。”资本家蛮横无理的态度，引起工人们极大的愤慨，举行了罢工。国民党当局竟于2月2日出动1000多名全副武装的军警，开着飞行堡垒、装甲车，对我们手无寸铁的工人进行血腥镇压，造成3人死亡，40多人重伤，100多人轻伤，236人被捕的惨案。

我是女工夜校学生、申九罢工工人代表，与工人群众一起赤手空拳，在枪林弹雨中与军警搏斗，身上洒满了工友的鲜血。我幸免于难，反动军警到厂里大肆搜捕罢工工人代表和积极分子。工人群众冒着危险，千方百计掩护我。直到第三天清晨，天下着雨，一群女工友有的撑着伞，有的用破衣服顶在头上，将我夹在中间，趁天还黑，避过特务、军警的监视，掩护我出了厂，脱离了险境。

悲歌一曲恸天地。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暴行，激起了全市工人、各界人民的强烈愤慨和对申九工人的广泛同情，纷纷开展募捐，慰问被捕工人和遇难家属，悼念死难工人等活动。中共上海市工人运动委员会以上海工人协会

名义，发表了《申九惨案宣言》，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罪行，号召上海工人用各种方式来支援申九工人的斗争。在当时许多工会遭到敌人整理改组的艰难情况下，按照“工委”的指示，以中共地下党员徐周良为首的上海市机器重工业联合会联络了11个行业、65个基层工会组成了申九惨案后援会，并巧妙地取得了合法地位。2月18日，65个单位200多名工会代表在大连路平凉路四区机器业工会内秘密举行会议。同济大学的同学帮助布置会场，四面墙上和走廊里挂满了揭露国民党军警镇压申九工人的漫画。会上，我报告了申九工人英勇斗争的情况，控诉了国民党军警的暴行；毛纺工人代表报告了在饿工斗争中工人被捕经过和资本家开除工人的情况；同济大学的同学报告了同济大学学运的情况，激起了与会代表对国民党当局的无比愤怒。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成立上海各业工会申九惨案后援会的倡议和《告上海各界宣言书》。会议决定在全市工人中发动募捐，佩戴2寸2分宽的黑纱，表示对2月2日申九死难工友的悼念，对国民党当局暴行的抗议。随后，各种形式的声援活动在全市范围内广泛展开。

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有许多人是我们女工夜校的同学。会后，她们回到厂里，首先佩带上2寸2分宽的黑纱，同时积极进行宣传，揭露国民党军警镇压申九工人的暴行，要求工人支援申九工人。经过宣传，广大工人群众消除了春节期间戴黑纱不吉利的迷信思想，纷纷戴起了2寸2分宽的黑纱。有的混进工人中的特务分子别有用心地问工人群众为什么戴黑纱？工人们悲愤地回答说：“申九工人被国民党军警杀害了，天下工人是一家，她们是我们的姐妹，我们为我们的姐妹戴黑纱，悼念她们。”“工人要同情工人，工人要支援工人，像你们这样没有良心，不会有好报应。”说得那些特务、工贼低着头一声不响地走了。

当时，我根据组织安排，参加了声援会组成的哭诉团，到工厂、学校等单位报告申九工人英勇斗争的事迹，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暴行。法商电车公司工会已被国民党当局下令解散，戴黑纱的活动难以展开。法电地下党的同志，设法让我们哭诉团的人，起早摸黑到法电工人上下班的交通车上去宣传。我们在车上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并拿出黑纱，希望大家佩戴。

车上工人听了控诉，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十分气愤，立即佩戴上黑纱。他们分散到各车间和站头上班后，又向群众展开宣传。这样一传十，十传百，从而突破了敌人的封锁，使大家知道了申九惨案的真相。工人们都自动要求佩戴黑纱。党组织布置一些党员家属事先做了大批黑纱，通过党员和积极分子分给工人。法商电车公司有 60% 以上的工人佩戴了黑纱。

在支持申九工人的斗争中，我们女工夜校的同学不仅自己带头佩戴黑纱，还积极参加宣传、募捐活动。

经过广泛的宣传，2 月 22 日，在申九死难工友三周年纪念日时，全市有 6 万多人戴上 2 寸 2 分宽的黑纱，悼念申九死难烈士，声讨国民党当局的血腥暴行，形成了群众性抗议的巨大声势，在政治上给国民党当局以有力的打击。



团结起来到明天

吴贻燕

1948年1月30日至2月2日,全国最大的民营棉纺织厂——上海申新九厂7千余名工人,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了坚持四天三夜震动全市的罢工斗争,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倒行逆施,发动全面内战。国民党统治区物价飞涨。1947年底比1946年上涨了26.6倍。而工人生活费指数所计算的工资收入,只及物价指数的49.4%。这时,官僚资本企业中纺公司和棉纺业同业公会竟然规定1947年底的年奖按照1946年标准打八折,分两期发放,而且不按当月生活费指数计算。申新九厂工人除了年奖受到损失外,还被国民党政府征去4个月的所得税;连续5个月没有领到配给米和煤球;同时,资本家制造各种借口,不断开除工人。厂方不履行1946年纺织业十八条劳资协议,越到年底,开除工人越凶,目的是为了省下一笔年奖。女工怀孕后,面临开除的威胁更大。十八条协议中第9条规定,女工分娩前后,应停止工作共8个星期,停止工作期间,工资照给。但是,申新九厂有些女工的产假期得不到保证;或者产假期已满,身体不好,不能继续休息,不上班就作旷工;旷工三天,就要被开除。贫困不堪的工人面临飞涨的物价,面对开除的威胁,实在难以生存下去,纷纷表示要为生存而起来战斗。

中共申新九厂地下党组织,讨论了工人面临生活上困苦处境,分析工人要以斗争求生存的情绪,决定顺应工人群众的要求,在1948年春节以前领导工人开展罢工斗争,维护工人的切身利益。党组织派党员毛和林先去布机间了解群众对罢工斗争的看法。1月28日,毛和林有意识在布机间车弄旁当着很多工人的面询问车间主任“米和煤球到底几时发下来”?女工们很关心这个问题,纷

纷围上来探听消息,于是许多布机都停下来,形成了一次试探性的罢工关车。消息传出后,工人们要求罢工的呼声愈来愈高涨。党组织决定在30日举行全厂性的罢工。30日上午,申新九厂气氛异常紧张,中共地下党员的活动,受到资本家亲信和黄色工会人员的盯梢监视。中午12点半,中共地下党员杨光明首先指挥铜匠间先关车,其它各车间工人在共产党员带领下纷纷关车。五分钟以后,全厂机器全部停止了转动,罢工开始了。资本家派出亲信监视阻止工人罢工的企图失败了。住在厂集体宿舍内的夜班工人,闻讯纷纷集合起来。资本家亲信企图阻挠夜班工人进车间,关闭了宿舍区的铁门。共产党员戚怀琼勇敢地站出来,指挥夜班工人冲出宿舍,冲开铁门,涌向车间,全厂长日夜、甲班、乙班的7千多工人大会师,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投入罢工斗争。

为了准备同资本家谈判,全厂共选出工人代表140多人,中共地下党员都当选为代表。在工人代表会议上,讨论通过同资本家谈判的七项条件:一、如期发放配给物品;二、年奖按当月生活费指数补发;三、年底前被开除的工人一律无条件复工;四、取消压迫工人的不合理厂规,所有厂规要有劳资双方协商才能有效;五、女工产假期满而身体不好的仍可继续休息;六、补发“五一”劳动节工资;七、反对征收工人所得税。

当天深夜,以中共地下党员杨光明为总代表同资方代表进行谈判。为了保护谈判代表,100多名工人代表都进入谈判场所。当工人代表提出第一条关于如期发放配给米和煤球的要求时,资方代表蛮不讲理地说:“今年无锡、常州收成不好,等明年丰收再发米,……”,“现在只有一个煤矿在南京,正在开采,等挖出煤来,修好公路,就可以发给大家了。”工人代表对资方代表毫无诚意的谈判态度,十分气愤。这时在谈判场内,发现了两个冒充新闻记者的陌生人,在工人代表的追问下,原来是国民党普陀警察分局派来的密探,当场被工人揭穿。

罢工进入第二天,国民党社会局和市党部派了两人到厂调查罢工情况。他们同混进工人代表中的黄色工会人员密商平息罢工的计策,企图破坏工人内部的团结。第三天,这两人同工人代表100多人谈判,根本毫无诚意,向工人施加压力。临走时,对工人代表威胁说,小榔头敲不下来,要用大榔头来敲。致使谈判一直陷于僵局。

申新九厂连续3天的罢工斗争,使国民党当局惶恐万状。与此同时,上海市连续爆发的同济大学学潮,市长吴国桢挨打。舞女怒砸社会局。“学潮”、“舞潮”、“工潮”一起来,国民党当局决定对申九工人采取镇压。2月1日晚上,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宣铁吾召集一帮人,在静安寺百乐门舞厅开会,秘密策划对申九工人罢工实行镇压的具体步骤。

全厂工人在坚持三天三夜斗争的日子里,在共产党员带领下,表现出很好的组织纪律性。罢工开始后,迅速建立了工人纠察队,守护交通要道和机器设备,看管保护好棉花原料、棉纱线、布匹等成品和半成品,防止敌人破坏以嫁祸于工人。共产党员组织工人印刷传单,书写标语,贴到厂内每一个车间、科室、宿舍。青年女工王慕楣等人带着标语传单,走出厂门,把标语贴到街头、贴到电车上、汽车上、三轮车上。工人中组织了歌咏队,高唱《团结起来就是力量》、《我们要配给品》、《你这个坏东西》等歌曲。工人们在一块麻袋布上写了“工人团结起来”六个大字,作为旗帜插上屋顶最高处,还把《告上海工友书》等印刷品从屋顶上散发到马路上去。

2月2日清晨,一批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军警突然包围了工厂。资本家指使门警,打开大门,军警很快占据了厂的第一道、第二道铁门。工人闻讯后,纷纷跑出车间,涌向第三道通往车间的门口,纠察人用铁链锁住第三道铁门,守好其它各道门,手挽手筑起一堵堵人墙,顶住铁门。共产党员带领工人在饭厅屋顶上筑起防御工事,把砖块、竹片、木棒、桌凳、碗、铁棍、油桶等搬到屋顶,还接上消防龙头,准备对付敌人的进攻。军警看到后大叫:“你们要造反啦!”工人们回答:“你们不开枪,我们也不打”。戚怀琼带领大家呼喊口号:“我们要配给物品”!“警察、工人是一家,自己人不打自己人”!工人们还对着军警,高唱:

你,你,你,你这个坏东西。

别人家配给物品都已发,

只有你,只有你,囤积在家里,

只管你发财肥自己,

工人的痛苦你是不管的。

不发煤球、不发食油、不发食米的都是你,

你的良心和煤球一样的！

中午，国民党警察局长俞叔平带来了一帮大小头目陆续来厂，还调动了装甲车、消防车、马队、囚车和1000多名武装警察，策划决定先把罢工领导人和工人骗出去逮捕，然后驱散工人。他们一些大小头目轮流站在吉普车上用喇叭向工人喊话，叫代表出面去谈。工人们知道他们的阴谋，齐声高呼：“我们要（与）资方谈判！”“答应我们的合理要求！”“警察退出去！”这时，国民党特务，对着罢工队伍，不断地在偷拍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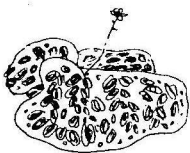
下午，俞叔平用喇叭气势汹汹地对工人喊：“你们好好听我话，要是不回去开车，就会弄得大家都不好看，没有几天要过年了，你们要好好考虑。”工人们在共产党员带领下，继续高呼：“退出军警，解除武装！”“我们要（与）资方谈判，答应我们的条件！”

4时左右，军警开始对工人下毒手了。他们先用大钳子剪断了门上的铁链，把铁门朝外拉，呼啸的装甲车突然出现在工人群众面前。女工管妙福等许多女工走到铁门外，站在装甲车前，大声喊：“用在战场上的装甲车用在工人身上，我们不怕，你们开过来吧！”装甲车不得不停下来，军警抓起了几个女工，铁门还是被工人们关上了，继续用身体顶住铁门。不幸的是，女工王慕楣被挤压倒地，当场牺牲。守在饭厅屋顶上的工人，看到军警这一暴行，怒火冲天，他们把砖块、铁棒、碗片、桌凳，冰雹似地砸向军警。敌人第一次进攻被击退了。

5时多，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赶到现场，下达了向工人施放催泪弹、开枪杀人的命令，调动了重型装甲车，再次向工人进攻。工人们从厂区内开出一辆吉普车和一辆卡车，共产党员许泉福开卡车，顶住了铁门。这时，国民党军警吹起了冲锋号，施放催泪弹，工人们在烟雾中头昏眼花，看不清反击目标，逐渐后退。军警从宿舍屋顶上、地面上疯狂向工人开枪射击，装甲车将铁门连同水泥柱子一齐撞到，卡车上弹洞累累，玻璃被打得粉碎。女工蒋贞新、朱云仙不幸中弹牺牲。共产党员何宇珍在饭厅屋顶上左腿中弹仍坚持战斗，勇敢地从三楼脚手架跳下，前额撞出个大窟窿，后仍被军警抓走。女工俞月琴的手指被枪弹打断。敌人冲进车间后，手提冲锋枪，抓到工人后，用枪柄乱打，特别是男工都被拳打脚踢。直到晚上9时枪声才停止。

工人们为了求生存,开展了正义的斗争,寻求同资本家通过谈判来达到最低的生活要求,可是,却遭到国民党反动军警的血腥镇压。3位女工王慕楣、蒋贞新、朱云仙英勇牺牲,100余人受伤,其中40余人受重伤。有236名工人被捕,后来,国民党伪法院又强行判处其中26人徒刑,中共地下党员、工人总代表杨光明被判无期徒刑。有365名工人被厂方开除。

申九“二·二”斗争,是解放战争时期在国民党反动统治区内规模较大的一次工人罢工斗争,虽然暂时遭受了挫折,但这次斗争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残酷镇压工人的狰狞面目,有力地配合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军。全厂工人进一步团结起来,冲破黎明前的黑暗。1949年5月25日,工人们日夜盼望的日子,终于到来了,上海沪西地区首先得到解放。大家兴高采烈,迎接解放军进驻工厂,迎接狱中的杨光明光荣归来,被开除的工人全部复工。对在斗争中牺牲的王慕楣、蒋贞新、朱云仙3位烈士,展开了追悼纪念活动。申九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努力生产,迎着新中国的阳光奋勇前进!



为了美好的明天

陈祥珍 包月芬

旧社会我们都是受苦难的童工，是女工夜校帮助我们学习文化，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并参加许多社会实践锻炼，把一个个深受剥削压迫的女工，变成为推翻三座大山、为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作己任的时代新女性。

为工人利益，众校友冲锋陷阵

1947 年底，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为了配合全国军事形势的发展，中共上海地下市工委指示：“只要斗得起来就斗，要斗得国民党到处不得安宁，使它陷入全民包围之中”，“在敌后开辟打击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第二战场。”1948 年 1 月年关将至，物价飞涨，工人生活再度陷入困境，广大工人要求改善生活，过一个像人过的年，争取年奖的呼声日益高涨，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的情绪十分激昂，要求采取罢工斗争的形式迫使资本家发年奖。那时，各厂资本家以当局的“战乱总动员令”为后台，置工人的呼声不顾，工人与资本家形成一个对峙局面，有一触即发之势。蒋介石为了维持其反动统治，加紧对人民爱国民主运动的血腥镇压，颁布所谓《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严禁一切罢工、罢课游行示威，凡是罢工、怠工都格杀勿论。中共地下党杂纺区委书记沈正光同志权衡严峻的形势和不挫伤工人的斗争决心，维护工人的切身利益，决定采取有利有理有节的“饿工”形式开展斗争，争取发放 2 个月年奖，让工人“过一个像样的年”口号，最低限度发 45 天年奖。在党的指导下，决定三区毛纺工会出面领导，先派工会代表与毛纺同业公会（资方组织）谈判。但资方不答应发 2 个月年奖，甚至 45 天年奖

要求也不同意。三区工会向各厂代表传达谈判经过，大家听后义愤填膺，决定沪西毛纺业，振丰、寅丰、元丰、华纶、大光明等8个厂于1949年1月21日统一行动，进行饿工（因饥饿而不得不停工）斗争。

饿工斗争是一场严肃的经济斗争，又是尖锐的政治斗争。振丰毛纺厂党的力量较强，在工人中有较坚实的基础，夜校校友和女工夜校同学成了斗争的先锋。杂纺区委委员安中坚同志和三区毛纺工会骨干均在该厂。该厂进步职员较多，工人与职员平时关系好，工人称之为自家人。饿工斗争开始，职员与工人一起参加斗争。振丰厂群众发动得很充分，组织严密，成立了纠察队，工厂各个门口都设立了岗哨。

寅丰厂饿工斗争分内外两路进行。坚守在厂内的一些党员和积极分子组织发动群众，集中饭间里写标语，印传单，出版《寅丰呼声》，宣传“工人阶级团结有力量”、“斗争才会胜利”；夜校同学教群众唱进步歌曲鼓舞士气，自编“年奖只有41天，我们不能过年”等歌曲；纠察队日夜轮流站岗放哨，控制写字间和工厂大门、二门、车间门，工人全部集中在车间，团结战斗。另外组织一些积极分子到马路上贴标语、发传单，扩大影响，争取广泛社会舆论支持；到三区毛纺工会和各兄弟厂联络，了解各厂斗争形势，互通情报。寅丰厂饿工斗争的第一天就争取到技职人员的支持，加入工人斗争的行列。第二天又把资本家软禁在厂里，要他答应工人提出的条件，准备采取个别突破。

元丰厂的饿工斗争，首先在基础较强的部门先行动，然后带动全面。由于党员和积极分子在群众中有较好的影响，当一个车间发动起来后，各部门群众冲破工头、特务的控制，纷纷响应，工友们说：“你们饿工为大家，你们不吃饭，我们能吃得下吗？要同你们一起斗争。”一天之内席卷全厂，进展迅速，工人都参加了饿工斗争。并到职员食堂宣传，感动了他们，绝大多数人立即把手中的饭碗放下，以表示支持。

饿工斗争第二天，各厂资方都假惺惺地送来牛奶、面包、奶油蛋糕、生煎馒头，当即被工人们拒绝。大家说：“我们要的是工人生活有保障，要过一个像样的年”，“目的没达到，吃了你们的牛奶、面包等于吃毒药！”不少工人们鄙夷地说：“这些好吃的东西为什么平时不送给工人呢？”“现在你们想破坏

饿工斗争，我们决不上当。”

毛纺业的饿工斗争，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同情。机器业工会代表顾亮，沪西棉纺工会代表汤桂芬（夜校校友），中纺毛纺一厂、二厂、协新、振兴毛纺等厂的许多工人代表，以及女青年会女工夜校的师生、实验民校、交通大学、复旦大学、省吾中学等单位，纷纷到各毛纺厂进行慰问，送来了面包、奶粉、饼干等食品，各界代表的慰问极大地鼓舞了工人斗志，各厂党员和积极分子虽然饿得精疲力竭，但依然斗志昂扬，将收到的慰问品全部送到群众手里，并对工友们说：“不吃资本家送来的东西，是抗议。对各界代表的慰问，我们应接受，饿工斗争是一种手段，不是目的。”我们工人代表宁挨饿，不让群众受损失的精神使工人十分感动。他们深情地对我们说：“宁愿杀头也心甘情愿跟着你们走。”

毛纺业饿工斗争，最初未引起国民党当局的重视。他们估计饿工斗争支持不了几天，使些小花招，便能分化工人，息事宁人。但他们始料不及，工人越闹越厉害，事态越来越严重。各厂先后都有10多名工人饿昏被送医院抢救，引起社会的震动。当时《大公报》、《新闻报》连续两天登载振丰、寅丰、元丰、华纶厂工人因饿工昏倒，不少工人送往医院的新闻。资方的同业公会对此惊恐万状，呈文上海市政府、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市警察局：“振丰、寅丰两厂贯行在前，元丰、华纶、大光明、鸿发、维一等厂响应于后，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请钧座迅速予以制止，并恳求查明煽动分子以严惩，藉申纲纪遏乱之源。”反动当局这才感到事态的严重，开始对沪西毛织厂饿工斗争实施镇压。第三天晚上，派了大批军、警和特务包围振丰毛纺厂，准备进行大逮捕，妄图一举打垮饿工的骨干力量。这天，高度警惕的振丰毛纺厂党支部见白天资方毫无动静，估计敌人要来镇压，党员王义华派了工人积极分子化装成乞丐，逗留在曹家渡长寿路一带侦察敌情，不久见从曹家渡方向开来一辆红车子，车前架有机枪，沿路用手电筒照寻门牌号。两位同志立即从大沪铁工厂弄堂翻到本厂大炉间后门敲窗报警，厂内立即作好迎战准备。果然，从晚上10点半开始，先来了百多军警，工人纠察队事先就紧关厂门说：“无代表签字，谁来也不开门。”反动军警气势汹汹扬言要拿风割机

来割开铁门，双方发生冲突。对峙中反动军警由100多人增加到300多人，从曹家渡到安远路戒严禁止通行，一直拖到凌晨3时，反动军警翻越墙篱笆进厂，强行开门，拿着黑名单捉代表。群众一面高呼：“要去一道去！”一面和军警搏斗。赢得时间，掩护同志转移。中共杂纺区委委员安中坚同志翻墙由隔壁灯泡厂的后门撤出。由于厂内特务分子方定发、肖培坤向反动军警告密，蓝彩虹（校友）、王义华、汪琨3位代表被逮捕。

在元丰毛纺厂，反动军警不是直接冲进厂里明目张胆捉人，而是采取欺骗手段，在半夜三更，派人轻轻地去拉代表的衣服，说有电话通知继续谈判。代表们看到周围群众经过3天斗争又饿又乏，正在休息，出于对群众的体贴，没有惊醒他们，就轻手轻脚单独地去听电话。不料，刚拿起听筒就被事先埋伏的特务挟持，面对敌人的枪口，当即高声抗议，但因距离群众的宿营地较远，未能唤醒熟睡中的群众，就这样王惠英、姬彩云（均为校友）、赵福泉被一个个地绑到警车上，进了监狱。

振丰、元丰毛纺厂代表被捕的消息传到寅丰毛纺厂时，寅丰的地下党员立即叫醒了群众，作好严阵以待来犯之敌的思想准备。当天夜间果然有特务闯进来，借口要进厂慰问说：“要找厂方的负责人。”进步技术人员华增甲以厂方负责人名义积极配合金志康、陈祥珍与闯进门房间的特务周旋，看住特务，不许他进厂，也不许他出厂，切断特务内外的联系。包春梅、姚婉娜、李亚芳（均是校友）则此时在车间发动群众，以防不测。当时，白天来厂与资方谈判的三区毛纺工会代表惠根宝还滞留在厂里，群众给他化装掩护，为他雇了一辆出租汽车，脱离虎口。

当天清晨，元丰毛纺厂群众发觉代表已在半夜里被抓走，不知他们的生死，地下党支部研究决定：“首先要救出代表，他们抓我们的代表，我们就抓资方的代理人。”代表是在接电话时被绑架的，因此，我们“师出有名”，组织群众冲进写字间接管了电话，又冲进门房间接管了大门钥匙。被捕代表姬彩云的妹妹姬凤云怒气冲天，和群众一起一面喊着：“我要阿姐！”“还我代表！”冲进办公室将资方代理人王新甫和其他3名平时为虎作伥的职员扣留为人质（其中一人是参与指使喊代表听电话）。押到车间会审，群众愤怒地审

问：“代表是啥人来喊的!?”“抓到哪里去了”……他们一一作了交代，当场做好审问笔录，并一个个画押、盖手印，然后对他们说：“你们听好！我们的3个代表平安回来，就放你们出去，否则，你们也别想活着出去！”此时，群情激奋，有的骂，有的哭，有的唱革命歌曲，有的喊口号。特务丁桂根见状吓得夹着尾巴偷偷爬墙溜走了。不久，有3个特务带着手枪说是代表工会来慰问的，他们对工人威吓说：“你们饿工是受别人利用，不要上当！……”这时，姬风云就大声疾呼道：“我要阿姐，我要阿姐！”群众纷纷质问特务说：“我们饿工是被迫的，你们为什么要抓人？”特务沈关成说：“有赤化分子。”大家指责他：“胡说八道！难道工人不要养家糊口了吗？”特务理屈词穷，也不得不夹着尾巴跑了。后来戈登路警察局的警察也来工厂，一个胖子挂着一支盒子枪，前后两个警察拿着木棍要工人派代表出来谈判。姬风云一听，发觉苗头不对，就双手一挥说：“我是代表”，大家也和她一起喊：“我是代表！”“我是代表！”一声比一声响，那个领头的警察东张西望也不知是什么人带头喊起来的，只得无可奈何地走了。下午，老板赶来，在厂门口将汽车喇叭一个劲地按着响，也没人替他开门，只好自己下车进厂，失去了平时的气派和威风。群众包围了老板，一致责令老板去和反动当局交涉放回代表，并命令不许碰代表一根汗毛，老板只得答应去设法营救，还连忙声明：“我棉毛衫和点心都买了送进去了……”

寅丰毛纺厂当时没有同志被逮捕，但听到振丰、元丰毛纺厂的代表被捕消息后，立即积极外出，摸情况，联络各兄弟厂准备采取统一行动。同时又组织了群众冲到伪警局去要求释放毛纺业的代表。

后来，反动当局又派人到各厂工会开会，威胁要工人复工，扬言：“我们这里，名单上还有很多人，不复工还要抓人。”当时，有的工人奋勇上前拦住他们的汽车，要他们放回代表，他们竟凶狠地把拉车工人抓进汽车，经群众奋力往外拖，才脱险。

饿工斗争的第五天，在工人的强烈抗议下，被捕代表被放回，群众见到代表，热泪盈眶，热烈拥抱。群众放鞭炮欢迎。但反动派却因而提出交换条件，要各厂工人吃饭复工。此时三区毛纺业工会领导正在被通缉，一时聚集

力量有困难，三区缺乏统一领导。各厂群众不得不一面进食，一面痛骂国民党反动派。“斗争能这样罢休吗？”“不！”振丰、元丰、寅丰毛纺厂工人又继续停了2天不开工。寅丰厂资方利用“双工”收买了几个拿摩温，叫他们偷偷摸摸上班，积极分子沈玉梅发现上工的那几个拿摩温，立即向代表陈祥珍（校友）反映，当即发动群众聚集到车间门口，痛骂上班的拿摩温。在群众的正义怒吼声中，一个个羞愧得面孔通红，从车间侧门溜了出去。警察局得知，派了两个特务来厂质问工人，特务刚开口就遇到火山爆发似的抗议声。群起而攻之，指着他们的鼻子骂：“你们有人性吗？我们已经饿了5天，做不动，你们能强迫我们做吗？”“你们家里有没有兄弟姐妹？”“我们不上班，你们把我们抓到警察局去好了！”两个特务无言以对，灰溜溜地走了。

不畏强暴，精诚团结齐斗争

毛纺业饿工斗争后，杂纺区书记沈正光同志召开各厂部分党员会议，总结饿工斗争，认为经济上虽未达到目的，但在政治上打击了敌人，教育了群众，准备春节后采取新的方法进行斗争。当天沈正光同志把刻有“天快亮了，工人要翻身”、“打倒蒋介石才有饭吃”的宣传图章发给几个厂的党员。陈祥珍带回2枚图章，与党员姚婉娜乘发工资时，将党员的钞票集中起来，到工房宿舍床帐里往钞票上盖章，然后回到车间与积极分子交换工资钞票，100元一叠的新钞票，盖的章一时不易发现，交换后，将换来的钞票再盖章。工人到商店买东西，店员见新钞票的字，都以为是造币厂共产党干的，个个欢欣鼓舞。工人渴望天亮，在厂里纷纷议论说：“共产党神通广大”。元丰厂包月芬等党员在新钞票上用钢笔书写“打倒蒋介石”与积极分子互相交换新钞票乘机向群众宣传。

1月29日，申新九厂工人大罢工。寅丰厂是申九的隔邻，为支持申九工人斗争，各车间工人自动关机支持，夜校同学爬上厂房屋顶上，与申九工人宣传队互送传单和革命歌曲，相互鼓励。

2月2日，敌人调动了大批军、警宪，大队人马开进申九，进行血腥镇压。当晚周围马路戒严禁止通行，寅丰厂门口也布满了装甲车、骑兵团，飞

行堡垒开着警报器，当晚申九厂内探照灯光冲天，烟雾弥漫，只听得催泪弹声，装甲车的骚动声，工人们喊叫声、冲杀声、枪声、呐喊声交织一片。申九厂一片白色恐怖，工人被血腥屠杀。寅丰厂工人对隔邻的阶级兄弟姐妹遭受迫害，阶级的仇恨怒不可遏，都流下愤怒的眼泪，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滔天罪行。事后寅丰厂党员陈祥珍、李亚芳等夜校同学和金志康等，带领积极分子和工人群众几十人，去慰问申九工人。申九大门口仍布满了反动军警，戒备森严，不准慰问。大家上前和他们评理，痛骂这些坏蛋，警察恼羞成怒，要抓金志康进去，大家毫不示弱，展开了一场拉锯战。反动军警抓住金的衣领往里拉，党员和积极分子抓住金的手臂，抱着金的头向外拖。军警动手毒打，我们和他们扭打到马路上，戚明月等积极分子也遭毒打。在情况危急之际，大家就向军警和马路行人大声疾呼：“我们要见厂里的亲属难道犯法吗？”“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申九门口围观的人越聚越多，马路人群和寅丰厂工人同声喊叫“不准打人，不准抓人。”军警见人多不好对付，只得放手，我们的同志就乘机离开，免遭被捕，并又及时提醒积极分子避开特务的盯梢，不立即回厂，在外面兜了好长时间至深夜回去。这次慰问虽未成功，却使工人们进一步看清国民党反动派的狰狞面目，进一步认识到工人要紧密团结反暴行。

春节前，社会局设下阴谋诡计，命令各厂放假半个月，工人都回乡去过春节。就在工人回乡休假期间，社会局乘机封闭了三区毛纺工会，春节后，分别在各厂贴出布告，开除工人代表和饿工斗争积极分子，振丰、寅丰、元丰、章华共计78名（其中女工大多是女工夜校学生）。节后工人陆续回厂上班时，反动军警派兵到振丰、元丰、寅丰三个毛纺厂，大门口站的是宪兵，二门口立的是武装警察，车间安插的是特务。厂内敌人刺刀上膛，对凡是上了黑名单的人，发现一个就用刺刀逼走一个。资方的同业公会为虎作伥还印了一份名单至全市毛纺业各厂，不准雇佣开除的工人。反动派以为这样可以斩草除根了，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愈演愈烈的反抗斗争，正在敲响反动派的丧钟。

在党的领导下，沪西毛纺业失业工人成立了互助会，蓝彩虹任互助会主任，与在职工人联合作战。各厂工人强烈要求被开除工人复工，同时省吃俭

用，送年糕、大米、钞票、支援失业的阶级兄弟姐妹。70多位失业工人组织了请愿团，大闹同业公会，向社会局、市政府、市参议院请愿。工人们一天换一个地方示威游行、请愿，得到全市人民社会舆论的声援。国民党的总工会负责人周学湘不得不出面接见。

同学们在女工夜校学到的宣传方法，也用到实际斗争中去。失业工人还组织了宣传队，三五成群在马路上、各厂门口、电车里，进行义卖募捐和宣讲活动，向全市市民宣传，控诉失业工人在饥饿死亡线上挣扎的悲惨遭遇，揭露国民党反动派镇压工人的罪行。社会人士都很同情。工人们在电车上义卖，售票员不要我们买车票，还帮助宣传和推销义卖品。义卖的毛巾、手帕、绒花上都印有沪西毛纺失业工人义卖宣传口号，被一买而空，有的还直接捐了钱，争取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元丰厂林福英、王惠英、包月芬、孙立、杨秀珍等许多夜校同学利用在午饭时到元丰厂门口向工人宣传。有的工人冲出厂门与失业同志见面。双方激动得手拉手痛哭，诉说厂里面布满了特务、警察，三人一岗，五人一哨，你们快回来。武装警察发现了立即阻挠，将他们拖回厂，工人们则以不吃饭作抗议，冲进写字间，责问资本家，被开除的工人们犯了什么罪？为什么不让他们回厂做工？

申九“二·二”惨案后，申九党组织遭到很大破坏，毛纺业党组织领导沈正光同志提出：要突出申九“二·二”斗争。毛纺业的斗争，要与申九后援工作相结合。当时三区毛纺工会被查封，毛纺业被开除的不少同志无家可归，在二区党员毕金康同志帮助下住宿在二区机器业工会，到四区机器业工会开会。沪西毛纺失业工人到处串联，区与区，行业与行业，互相联系，出现在全市各处，东宿半夜，西宿一宵，一只破床横着睡，挤上六七个人。挤不下就打地铺。在二区机器业工会吃大锅饭，盖破棉絮，有时以大饼充饥，有时以菜汤糊口，过的是“军事共产主义”生活，好似“战斗在第二战场上的游击队员”。大家情绪高涨，积极乐观，在棚户区茅草屋里，或在小阁楼上秘密写标语、印传单直至深夜，并通过各种渠道传送。当时有蓝彩虹、蓝晓红、刘杏珍、林福英、包月芬、王惠英、杨秀珍、姬风云、罗玉凤、华小琴、陈祥珍、陈晓红、姚婉娜、李亚芳、包春梅等女工夜校校友积极参加申九

“二·二”斗争后援会活动。申九厂党员徐明哲在大连路平凉路四区机器业工会内报告了申九工人英勇斗争的事迹。揭露反动派血腥镇压屠杀申九工人的罪行。蓝彩虹代表毛纺业向大会报告了沪西毛纺业的饿工斗争及国民党反动派镇压工人的罪行。大会动员各界为纪念“二·二”斗争中牺牲的烈士，佩带2寸2分黑纱，强烈抗议反动派的残酷镇压。因反动派控制上海各报刊不能把真相登载，党组织要求各行业开展宣传，告知全市人民申九“二·二”斗争真相。毛纺业蓝彩虹以申九工人名义与徐明哲同志一起向全市各工厂、学校报告“申九二·二斗争”事迹。

毛纺业同志参加全市十多个行业反饥饿、反暴行的统一行动。白天在三友实业社写标语，晚上10时后，三四人一组，把标语贴到全市各处。毛纺同志与二区机器业男同志，男女搭配行动。申九的徐明哲也一起参加了这次战斗。包月芬、华小琴一组从成都路贴标语到市警察总局至外滩；陈祥珍、陈晓红从大世界金陵路贴到黄浦警察局到外滩；姬凤云、罗玉凤、李亚芳一组从南京路到外滩；蓝彩虹打扮成漂亮小姐与法商电车公司穿长袍男同志一起到大世界楼上剧场窗洞往下撒传单。传单在大世界空间飘扬，下面人群轰动起来，马路上挤满了拾传单的人，十字路口交通堵塞，蓝彩虹机警地立即下楼亦挤到马路边拾传单并大声朗读给行人听，人群中纷纷议论：“国民党太坏。”林福英与一男同志在辣斐大戏院楼上第一排看电影，电影快结束前，林福英从二楼将传单往下撒，楼下观众骚动。当敌人将戏院门口封闭，进行大搜查时，林福英已撤离戏院坐上三轮车离去。王惠英与大学生在大新公司顶上向下撒传单，在南京路上又演绎了一幕千人争抢传单的动人场面。

这天晚上，毛纺业同志完成任务后，回到打浦桥二区机器业工会。统一行动后，敌人发现全市许多传单和标语，惊慌失措，暴跳如雷，立即戒严，进行大逮捕，还派出特务警察到二区捕人。当时二区在工会理事长毕金康指挥下，用竹梯让同志们翻墙到隔壁弄堂，等敌人离去，立即又翻过来，这样翻来覆去折腾了半夜，摆脱了敌人的追捕。

第二天全市各行业交流经验，斗争的形式多样，内容生动，方法灵活，大学生由工人配合，机器业工人穿上护工队制服，机智地以特殊任务名义支

开警察，在不少马路墙上刷了巨幅油漆漫画，效果显著，大快人心，闹得反动派鸡犬不宁，焦头烂额，十分孤立。

身陷牢笼，威武不屈志不移

1948年，中共上海地下党经历了更加严酷的斗争，国民党特务撒开搜捕大网，有的党组织遭到破坏。

女工夜校同学中的毛纺业地下党员龚文新、蓝彩虹、张文兰、王惠英、姬彩云、陆宗桓、黄小妹均遭被捕。蓝彩虹于4月10日遭第二次被捕，先关在市警察总局，4天后被押到中统局设在蓬莱警察局的监狱里。在狱中的难友大都是因申九“二·二”斗争后，反饥饿、反暴行被捕，他们在狱中相见，感慨万分，四区机器业的难友见到蓝彩虹，隔着铁窗唱起了“春天里来百花香，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牢里来了一位好姑娘……”以表达对蓝彩虹同志的声援，监狱是阴沉冷酷，但难友们的歌声温暖了她的心。四区机器业党员朱琦同志是位坚强无畏的战士，他在狱中被敌人折磨得很厉害，得了严重的肺结核，没有条件治疗。在放风时，朱琦站在蓝彩虹背后，悄悄地对她说：“小蓝，你可以看到胜利，争取出去，你年轻，为了美好的明天，你还可以做很多工作。”小蓝深情地回答道：“我们一起争取出去。”但朱却说：“我看来已不行，我出不去。”果然，朱琦同志被敌人折磨而死，蓝彩虹每想到朱琦同志，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敌人多次审问，蓝彩虹只承认自己公开的身份——失业工人互助会主任，把一切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在上海即将解放前夕，为防敌人垂死挣扎下毒手，小蓝与难友们一起巧妙地对狱中看守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为掌握情况，在难友们配合下，缠住了看守，小蓝利用烧开水之机，在看守的办公桌上获取了狱中政治犯名单，为中共地下党组织营救同志提供了情报。

龚文新因中共上海工人运动委员会委员王中一违反党的组织纪律的案件牵连，暴露了身份，于3月29日被捕，当时她已怀孕5个月，关在市警察总局，家人都不知，每次都在深夜审问，敌人问：“你怎样参加共产党？你的领导人是谁？下级是谁？为什么这么晚结婚？”龚答：“我参加工会，不懂共产

党，晚结婚因家穷。”敌人见龚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也不肯写悔过书，敌人对龚毒打，她想到女工夜校老师的教导，以先烈为榜样，宁愿牺牲自己，决不动摇，守口如瓶，视死如归。她的第一个孩子就是在狱中降临的，孩子奄奄一息，皮包骨头，没有营养，无力呻吟，撒尿无尿布，生了褥疮，更无治疗的权利，龚文新同志后押到提篮桥监狱，经党的营救，最后特刑庭判决2年徒刑，1年缓刑。

元丰厂新党员张文兰，在厂里为反对资本家搬迁，要求发米票给工人，是冲在前面的先锋战士，在入党宣誓的第二天，张就因所谓煽动工潮罪被捕，张文兰在狱中受尽严刑拷打，坚贞不屈，准备把牢底坐穿，直到上海解放前夕营救出狱。

寅丰厂陆宗桓，1947年进女工夜校读书，非常用功，进步很快，后被同学们推选为友光团主席，经常将夜校学到、听到的新闻，告诉厂里小姐妹，动员她们去女工夜校读书，也被国民党特务注意了。1948年11月被作为共产党嫌疑分子逮捕，她在狱中一点也不怕，她理直气壮地说：“我不是共产党，也不知道共产党，我认为对的就是要听，要讲。”在狱中关了2个月，看到许多工人、学生无辜被抓，受尽折磨，使她更加认清了国民党的腐败，共产党才是人民的救星，出狱后她真正找到党的组织，并光荣地在1949年3月被发展为中共党员。

王惠英、姬彩云1948年撤退到大别山，要经过汉口联络站转去。因汉口联络站出了叛徒，当王、姬去联络站接关系时，被叛徒出卖。王、姬二人在汉口被捕（这是她们第二次被捕）敌人知悉王惠英、姬彩云是中共党员，多次威胁审问，两人均未承认自己是中共党员，敌人对她们严刑拷打，上老虎凳。当时王惠英、姬彩云牢记女工夜校周琦老师领她们入党宣誓时的誓言，永不叛党。王、姬坚持以被人骗到汉口找工作为理由，顶住敌人的逼迫和压力，始终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汉口解放前夕，敌人逃跑去广州前，党通过姬彩云的父亲和王惠英的姐姐借了500块银元，买通了监狱长。使王、姬未被押往广州。直到汉口解放后出狱。

元丰厂黄小妹1948年在浙东游击队，一次未及时撤退，不幸被敌人抓

住，因黄穿的是便装，她只承认自己是老百姓，但敌人仍怀疑她是游击队，多次拷打审问也无结果。敌人仍未放过她，当知道她是上海人，便押到上海，直到上海解放后出狱。

毛纺业的党员遭敌人逮捕的共有10多名同志，其中7名女同志均是女工夜校校友，在牢中经受了考验，是党的忠贞战士。

女工夜校，巾帼英雄之摇篮

沪西毛纺业中共地下党组织发展与壮大，离不开女工夜校这个革命熔炉。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有华纶、华华、章华毛纺厂的女工，如曹晓星、赵莹珍、林福英、吕志琴、蓝彩虹等共20余名女工在女青年会三和里女工夜校读书，经过夜校培养，先后都参加了共产党。抗战时沪西毛纺业有10多位同学去参加新四军和浙东三五支队抗日。蓝彩虹在夜校学习很认真，进步很快，还捐赠《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进步书籍给同志们阅读，受到钱琴老师表扬，抗战胜利后她到振丰毛纺厂工作，1946年初参加共产党，在各项斗争中，为工人利益冲锋陷阵。

1945年元丰毛纺厂有20余名女工分别在一、二女工夜校读书。第二女工夜校周琦老师是中共地下党员，1946年先后发展了包月芬、王惠英、姬彩云、杨秀珍等同学入党，第一女工夜校蒋华老师发展了孙立等几位同学入党，抗日战士林福英原是夜校校友，也到元丰厂做工，使该厂成为地下党坚强的红色堡垒。寅丰毛纺厂，1946年起先后有20余名女工在三和里女工夜校读书，经过培养入党的有姚婉娜、李亚芳、陈祥珍、陈晓红、黄土莲、居琴娥、陆宗桓等。

1948年1月沪西毛纺业为工人年奖进行饿工斗争，许多党员和积极分子、夜校同学被开除出厂，后又参加申九“二·二”斗争后援会许多活动，4月敌人开始了大逮捕，党领导沈正光要求党员立即隐蔽。指示林福英将一部分已暴露的党员安排去大别山、浙东游击区和苏北解放区，被开除失业的党员一一接上关系。同时建立了毛纺业地下党总支，潘裕德为书记，高琼瑶、林福英、陈祥珍、沈玲娟为委员分别联系毛纺行业各厂党支部。

失业党员首先安排失业群众就业，解决生活困难，许多党员（夜校校友）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改名换姓进入到其他工厂做工，各厂资本家为最大限度剥削工人，不愿雇用长期工，雇临时工维持工厂的生产，于是党员经常在一个厂做2个月，又转到另一家工厂，同学们一年要到六七个工厂做工。共产党人像革命的火种，每到一工厂就与工人交朋友，结拜姐妹，并到工人家访问，工人把党员作为知己朋友，党员就介绍她们进女青年会的女工夜校读书，接受教育，有计划地将成熟的积极分子发展入党。林福英一年内发展了12名积极分子入党。其中有3名是振丰毛纺厂的。元丰、寅丰毛纺饿工斗争后，大部分党员被开除出厂，寅丰厂一度成为空白，元丰厂姬凤云改名为汪静英由在职老工人介绍进入寅丰厂工作，同时又动员更多工人到女工夜校读书，经过夜校培养锻炼，然后发展入党。1948年一年内元丰、寅丰各发展了十五六名新党员，同时还各发展了三四十名党的外围组织“工人协会”会员。元丰、寅丰、协新、大光明、华纶、鸿祥等毛纺厂建立了中共地下党支部，许多中小型厂开始有了地下党员，沪西毛纺业党员比饿工斗争前增长了三倍半，在斗争中进一步发展壮大党的组织。1949年初，林福英调至沪东区开展中纺公司毛纺厂工作，任沪东区分部委员，沪西毛纺业又建立了新的党总支，由潘裕德、陈祥珍、包月芬、陈晓红组成，积极领导沪西毛纺业各厂的党支部工作，为迎接上海解放、护厂斗争做出了贡献。

复工斗争中的上海绢纺厂

李志英

上海绢纺厂，原名为日商公大三厂，1925年开办在极司非尔路（今万航渡路）138号，当时全厂有职工2000人左右。八年抗战的艰难岁月里，工人被挤压在旧社会的最底层，吃的是碎糙米、烂蚕豆、青菜皮，住的是滚地龙、茅草棚、小阁楼，每天工作12小时，还要受日本人、汉奸、工头的殴打和凌辱。女工大多是文盲，迫切想学习文化，因此在辛勤劳动之余，还到曹家渡康福里怀德小学去读夜书。当时有位戚惠英（又名戚怀琼）老师是中区地下党员，原是女工夜校的学生，她除了上文化课外，经常给学生讲社会知识和世界知识。1945年2月，我和金建平由戚老师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她也是我们的党组织领导人。

抗战胜利后，全厂工人个个兴高采烈，从心坎里喊出“天亮了”，“胜利了”。戚老师来通知我们去参加沪西平民村“失业工人联合会”，目的是为了要复工、要生活维持费。不久戚老师离开怀德小学，调申九夜校工作。她介绍了黄纫秋老师来领导我们。黄老师介绍我们到女青年会女工夜校去读书。她们都是女工夜校的同学，从此绢纺厂工人斗争与女工夜校联系在一起。当时我们又发动了厂里30多名女工到第二女工夜校读书，成为绢纺厂对敌斗争的骨干力量。

全厂工人本来是多么渴望着新生活的到来。可是，国民党的接管大员只顾抢占财产，不顾工人死活，把厂关了。甚至与日本资本家相勾结，把厂里积存的大批粮食等物资偷运出去。我们以厂里的女工夜校学生为骨干，组织全厂工人向日本资本家及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求生存、要求复工、要求发生生活维持费的斗争。

有一次,国民党反动派勾结汉奸、日本人将厂中存煤运出厂,企图中饱私囊。车子出门时,被厂附近工人发现。我们知道后立即赶到厂里,戚惠英老师也起来了。在她指导下,我们立即和其他夜校同学一起,把工人叫拢来,组织工人把煤车挡住。在工人们强大压力之下,那卡车只得退回厂去,煤也被卸了下来。当时夜校同学、党员徐素珍被大家推选为工人代表向日本资本家交涉,日本人在人赃俱获之下,不得不承认错误,答应发给每个工人5升红碎米,1斤油,2包面粉,2匹稀白布,暂时维持一下工人的生活,第二天下午发放。谁知第二天下午,工人来厂,却遭到从厂里冲出来的国民党警察六队狙击,他们用刺刀刺伤金建平等多名工人。当时陈美玉(夜校同学,现名陈如文)、李荣生等看到受伤者鲜血直流,急忙送往医院包扎。不料包扎好出来后,外面狗腿子就将受伤工人抓到三区警察分局关押,进行吊打。徐素珍等同志就把分散在厂区周围的工人集合在白利南路(今长宁路)工房对面荒场上开会,会场上群情激奋,戚惠英老师也参加了,对我们几个党员说,今天召开这样大会是不容易的,一定要把工人组织起来,斗争的日子可长啦,如果工人们都散掉了,斗争就没有了力量。我根据戚老师的指示,站出来问大家:“以后要不要复工?”大家回答:“要复工的”。我又说:“要复工,就请大家把地址留下来,否则到哪里去找你们呢?”这样大家马上将地址留下来,且分块编组,各组推选了组长,大都是夜校同学负责上下联系。大家又选派工人代徐素珍等同志与日本资本家继续交涉。经过多次谈判,日本资本家才同意受伤的工人每人发给医药费10元。被警察局关押的夜校同学、党员金建平等人由日本厂方负责保释回厂。日本资本家答应给工人的米、油、面粉、白布等也都发放了。

这次为生存争取生活维持费斗争的胜利,大大鼓舞了我们绢纺厂工人的斗志。厂里的党员继续以动员女工进夜校读书的方法将工人们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积极参加沪西棉纺织厂失业工人的复工斗争,为维护工人最低生活和民主权利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争夺工会领导权的斗争。并从经济斗争逐步转向政治斗争,开展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及迎接解放上海的一系列革命活动。

长丰厂工人斗争二三事

王菊秀

抗战胜利后,中共上海地下组织领导上海广大职工改善生活待遇和劳动条件的18条协议斗争取得胜利,上海许多工人第一次在生活上得到一定改善。但是,我所在的长丰织布厂的资本家却顽固不化,坚决不执行18条协议。于是我厂以女工夜校读书的女工党员为核心,在争取改善工人福利的斗争中,再现了中国工人阶级团结一致、顽强不屈的战斗精神。

秘密组成中共地下党支部

我是长丰织布厂的一名普通女工。自进了三和里女工夜校读书后,不仅学到了文化,而且使我懂得许多做人的道理,提高了我的阶级觉悟,在黄纫秋老师的耐心帮助教育下,不久便由黄老师作介绍人,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了长丰厂的第一个中共地下党员。与我一样进女工夜校读书的女工同学也进步很快,不久王蓉秀、顾慧英、蒋金娣、任月娥、钱源等不少女工同学也入了党,我担任了厂的党支部书记。我们这批秘密党员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成了团结全厂工人的核心力量,党支部成了战斗堡垒。

我们这些女工党员都是有一定政治觉悟,因在工厂里与广大工人一样,是受压迫、受剥削的普通劳动者,所以特别乐意帮助人、关心人,愿意做群众的真正贴心人。工厂有不少青年女工是远离家乡的农村姑娘,她们在上海做工,大都是举目无亲,特别思念父母。我们的同志就主动关怀她们。我们一些同学用在夜校学会的一点文化,代为她们写家信。有的姑娘生病,我们便为她买药送水。布机挡车工赵凤宝是个病弱的女工,一次在闷热的车间劳动过度而昏厥过去,我们的同志赶紧护送她到医院抢救,不幸她已病入膏肓,

不治身亡。小赵在上海没有任何亲人，资本家又不管死活，我们的同志冒着酷暑，为她办好了丧事。我们同志的一言一行，工人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因此，厂里的女工有什么家庭烦恼、生活困难，总愿找我们谈心、求助，不少女工与我们结拜为姐妹。我们也不失时机地动员更多的女工到夜校读书，我们的同志无形之中成了团结全厂工人的核心，地下党支部成了领导工人斗争的战斗堡垒。

罢工斗争初战告捷

1946年初，国民党当局被迫签订了一个全市性的“18条协议”，里面讲到工人应有的最低工资标准、10小时工作制、女工有产假期等等条款。可是长丰厂的资本家就是不执行，仍然要工人每天做12小时工作、把工资压得低了再低。工人们的生活、劳动条件极差。我在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下，决定发动一场有理有节的罢工，为改善工人的福利而斗争。我们发动罢工的方法是先由我们的党员分头到车间秘密联络积极分子酝酿，推选工人代表。于是，男工代表周阿宝、张阿三和女工代表任月娥代表全厂工人向资本家提出五点要求：（1）全厂普遍增加工资；（2）实行10小时工作制；（3）厂休、例假日照发工资；（4）因公受伤、女工分娩应有保障；（5）承认工人代表，不得无故开除工人。资本家听后，竟趾高气扬，不予理睬。我们决定以全厂总罢工回击。女工任月娥是帮拆工，有流动性的工作特点。她与陈巧娣相约，分别到各挡车工交代罢工暗号，以一台布机不转，全厂开始罢工。这天，任月娥在装纤子，趁领班不注意，用脚猛踢开关柄，布机突然停止转动，刹那间，140台布机也跟着关机，领班已弄不清是谁带头发动罢工。罢工立即影响生产任务，资本家眼看因罢工而白花花的钞票飞走了，便无可奈何地要与工人代表谈判，并提出边生产边谈判。这个阴谋很快被工人识破，继续坚持罢工。最后老奸巨猾的资本家不得不签订《和解笔录》，答应代表提出的条件。工人拿到增加的工资，工人代表威信提高了，在罢工中成立了工会。但是，党支部知道，这个资本家决不会甘心的，要教育工人，准备迎接更为艰巨的斗争。

执行 10 小时工作制的斗争

通过这次罢工斗争,工人们争到了 10 小时工作制。但资本家在签订《和解笔录》时,提出因原有生产计划早已安排,如不做 12 小时,就无法按期向用户交货,提出工人仍做 12 小时,增加的 2 小时另加工资,为期 2 个月。工人代表同意了。后来党支部得悉,这批蚊帐纱布是国民党为打内战的军用品。我们决定以拖延交货的方法,作为支持反内战的实际行动。

资本家规定的 2 个月的 12 小时工作制即将期满,而资本家接到军用品生产任务,不仅没有结束,反而延长。资本家强迫工人仍每天做 12 小时,党支部决定抵制。7 月 8 日,挡车工赵凤宝晕倒死亡,震惊了全厂。我们抓住资本家不管工人死活的问题,与资本家谈判评理。但是,资本家死硬不参加谈判,激起全厂工人的愤怒。大家说:“老板只顾赚钞票,不管工人死活,实在太狠心了!”有的说:“老板就是蜡烛,不点不亮,他们不答应 10 小时工作制,我们就罢工!”工人的怨吼,罢工时机成熟,于是我们又精心策划了又一次的罢工。这次,仍是先由任月娥所在的乙班以做第一个夜班不进车间为信号,开始了全厂性的罢工。

经过两天三夜的全厂总罢工,资本家又吃不消了,只得答应执行 10 小时工作制,并承诺在炎夏气温最高的下午 4 点半至 7 点,工人不进车间生产。罢工又取得了胜利。

“复工”展开的拉锯战

资本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在其勉强答应 10 小时工作制后,便暗中策划镇压工人的阴谋。不久,资本家贴出布告,宣布实行每班 11 小时工作制,凡坚持 10 小时工作制者予以除名。布告发布后短短 4 天时间,先后被开除 27 名工人。

黄纫秋老师代表上级党组织密切关注长丰厂事态的发展,随时与我联系,并及时作出指示。同时,黄老师在夜校同学中广泛讨论长丰厂工人的罢工斗争,激发大家进一步憎恨国民党反动统治。女工同学看到长丰工人的苦难,关

注与自己命运相同的长丰厂女工的斗争。女工同学自发地捐款,购买干粮,送到被开除工人手中。

我和任月娥一起,带领被开除的女工,天天在赤日炎炎的热浪中奔走社会局,向国民党当局施加“复工”的压力。同时,也向社会广为宣传,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援。资本家也在千方百计破坏工人的“复工”斗争。他们勾结青红帮组织的侠谊社头子、国民党地方武装头目来厂商量对策。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工运组派人到厂监视工人行动。在工人代表的斗争和社会舆论压力下,社会局不得不安排劳资双方谈判,但由于资本家的阻挠,谈判流产。社会局只得于8月23日发出批文,宣布长丰厂被开除工人准予复工。但资本家仍然拒绝工人复工。

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短兵相接的“复工”拉锯战即将爆发。

8月25日,我们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由我拿着社会局的批文,带着27名工人进厂。资本家早已有防备,在大门里面又筑起一道“二门”,整天被铁锁关闭。当我们被“二门”阻隔不得入内时,厂内的同志立刻分头到车间、宿舍奔走相告,车间工人立刻关车罢工,睡在宿舍里的工人,纷纷起床,投入罢工斗争。有些拿摩温硬拉死拖,要工人开工,都宣告失败。附近丰太、立丰等不少工厂工人闻讯纷纷买了许多大饼油条送给罢工工人,以表声援。27名被开除的工人,在大家的支援下,在地上铺上席子,卧坐斗争。斗争坚持半天一夜,由于资本家已关闭“二门”,女工的大小便无法解决,上级党组织决定暂予“主动撤出”,再商对策。

斗争进入相持阶段,资本家又使出分化瓦解工人队伍的阴谋。经理陈永芳的弟弟陈其芳,是双领班,约我到静安寺的康乐酒家叙谈。陈说:“你是我介绍进厂的,现厂里闹这么凶,我在阿哥面前不好交代,你是不是拿点铜钱离开长丰厂到无锡另找生活做做”。我理直气壮地回答:“这件事关系到全厂工人的事体,我不能这样做。”资本家的无耻收买破产。

斗争已坚持半个多月,被开除的工人因没有工资,生活特别困难,她们的家庭压力日益增加,大家挤在三区工会楼上席地而睡,拥挤闷热,难以忍受。她们虽然每天有兄弟厂工人支援,解决吃饭问题,但急躁不安情绪严重影响大家的

“复工”斗争。党组织研究,为打破僵持局面,决定组织一次有准备、有组织、有计划的冲厂斗争。

冲厂斗争分准备和实施两个阶段。

首先,稳定已被开除工人的思想,解决她们日常生活困难的燃眉之急。女工同学蒋金娣毅然拿出自己艰苦积蓄购买的金戒指,兑换成现钞,交公维持大家的生活。这个侠义疏财之举,鼓舞了大家坚持斗争的信心。

其次,三区染织工会召集所属会员厂的工人代表会议,控诉揭发长丰厂资本家顽固拒绝工人复工、不顾工人死活的恶劣行径。要求各兄弟厂支援和派代表参加冲厂斗争。代表们群情激昂,坚持支持。三区染织工会还将95家会员厂代表署名签章的指控长丰厂资本家的信函,书呈社会局,给社会局和长丰厂资本家以舆论压力。

再次,做好冲厂前的分工准备。(1)通过厂中党员和积极分子,摸清二道门早上买菜开启时间;(2)约定由夜校同学曹小妹(秦素贞)站在门房间,听到大卡车声音,打开大门;(3)由曹小妹把守大门和二道门,王蓉秀负责控制电话,任月娥、蒋金娣、李亚芳等冲上二楼,将资本家接进卡车去社会局谈判。厂外的立丰厂代表孙居汉、丰太代表王钰声、恒丰代表马茂忠、三区工会代表李拜禹等配合冲厂。厂内党员发动全厂工人共同冲厂,以壮声势。预定向丰太、立丰、万利等兄弟厂借用卡车4辆。

9月2日是冲厂的实施日期。这天清晨,4辆上车准时到达三区染织工会,各厂代表与被开除女工共六七十人登车,到美亚四厂大门附近马路旁停靠。我守在卡车上,任月娥、蒋金娣等女工和兄弟厂部部分代表跳下卡车直冲厂门。曹小妹如期守候在门房间,听见卡车声,装着出厂,打开大铁门的边门,接应大家冲入厂内。这突如其来的愤怒群众,使门卫呆若木鸡,来不及关锁第二道门,大家一拥而入,直冲二楼,奔入账房间。当时布房间领班胡泉林正在打电话向经理报告生产,被王蓉秀一把将电话筒夺下,控制了电话,切断了资方与外界的联系。三四十名男女工人涌在账房间里,人声鼎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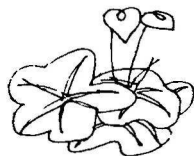
资本家这时尚未到厂,但其侄儿刘某在厂,无法逃避,被蒋金娣、李亚芳一把拖住,要同去社会局评理。刘某死皮赖脸不走,更激起工人們的愤怒,有人上

前拉领带、有拉袖子、有拉衬衫,被推推拉拉拥出账房间,拖扯到大门,登上卡车。厂内,工人聚集到二道门周围,欢呼刘某被揪,目送浩浩荡荡的四辆卡车向社会局驶去。三区工会理事长任正杰与长丰厂工人代表以及部分工人带着刘某。进入社会局办公室,其余的人则在外守卫示威。

在社会局里,我们工人代表与资方代表展开短兵相接的唇枪舌战。我和工人代表任月娥以社会局关于 18 人复工批文为武器,痛斥资本家藐视政治法令。刘某虽一再申辩,但最后在理屈词穷的情况下,以要请示爷叔厂长为由,约定 9 月 3 日继续谈判。

当晚,我和任月娥向黄纫秋老师汇报谈判经过。经讨论,认为在国民党的腐朽反动统治下,不可能实现工人的解放,我们已经在政治上、社会舆论上取得了主动,在经济斗争上可适当作些让步。

9 月 3 日,资本家出席了社会局召开的第二次谈判,经过反复争论,最后达成协议:任月娥等 27 名被开除工人一律复工;厂方补贴在停工期内工人伙食费每人每日 2000 元;自动辞退的 7 名工人厂方给予每名退职金 1 个月;工方也保证复工工人努力工作而告一段落。



特殊战场上的无形战斗

邱月利

大隆机器厂是普陀区的一家大型工厂，有职工 5000 余人。1902 年由杨树浦的一片弄堂小厂起家，1914 年迁到平凉路，修配外轮和为日商内外棉各厂修配纺织机械零件。1920 年又迁到大连湾路，开始生产小型柴油原动机和抽水机、碾米机。1926 年迁至沪西光复西路 5 号，专营整套棉纺机器的制造。

1937 年“八·一三”后，大隆厂为日本侵略者占领，由内外棉株式会社接管，先后厂名为内外棉铁厂、大陆铁厂，成为生产纺织机械和船用柴油机的基地，为内外棉各厂提供纺织机械设备，并向日军军队提供船用柴油引擎。

1941 年 12 月 8 日，日本侵略者空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为适应日本扩大侵略需要将大陆铁工厂改为军火工厂，制造迫击炮、火焰喷射器、高射炮座子，军用 115 匹的船用柴油引擎和炮弹、手榴弹等。整个工厂由日本 3877 部队接管，实行军事管制。

日本侵略者在大陆厂实行法西斯统治。禁止工人参加任何组织活动。华工进厂做工，必须由工头或技术师傅引荐和铺保，在工作场所禁止谈论国家大事，禁止三人以上交谈。为监视、控制华工，工厂的厂部和车间都由日本管理人员控制。一批工头直接到班组严密监视工人生产。工人稍有疏忽，就遭禁闭或被开除。大陆铁厂已是一座法西斯统治中国工人的集中营。

大陆铁厂加紧制造武器弹药，杀害抗日军民，激起了中国人民对日伪统治的仇恨。中共沪西地下党关注着厂内工人自发的反抗斗争，决心深入虎穴派遣地下党员进入大陆铁厂，展开一场特殊的秘密战斗。

1943 年中共沪西杂厂委员会陆续派遣地下党员周辛吾、黄金柱、居启元进入工厂，于 1944 年建立了第一个党的战斗堡垒——中共党支部。第二年

初，党又派入周信业、陈正泉、赵士泉、吴杏根、何康等同志进入大陆铁厂，开辟了以周信业、陈正泉为主的第二个党支部。党组织根据党的白区工作“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一面劳动，一面开展团结群众，教育群众工作。党支部建立后，通过党员与工人结拜师徒关系，互学技术，经济上互相帮助和拉家常、串门子等方式，团结了群众。党员秘密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和“不打抗日队伍”的思想，激发工人的爱国热情和对敌人的仇恨，团结工人进行隐蔽和灵活的斗争，使工厂的生产处于疲软、拖沓状态。其主要方法有以下几种：

1. “以少报多”，改写每天进库上报的数量，如将1字改成7字或9字等。
2. “以坏充好”，把有砂眼的零件作为成品装配，在铸造生产中将泥芯落歪出废品，滥竽充数。
3. “偷梁换柱”，白天入库的零件，夜班工人又拿出充作第二天产品入库。
4. 想方设法磨洋工，敌人严密控制，工人自有积极怠工之策，车间与车间，工人与工人之间建立怠工信号网络，使监视人疲于奔命，产品日益下降。

资本家要最大限度地榨取工人血汗还得维持工人和养家糊口的最低生活水平。工厂也规定，每个星期由厂方发给每个工人三升黄糙米，可是日本资本家却故意拖欠工人口粮。有一天下午，一个工人在墙上写着“要吃饭”，这犹如一堆干柴，一下子被点燃起来，工人饭后留在开饭间，一个也不进车间工作，举行罢工抗议。气急败坏的日本两班人事科长佐佐木冲到饭间威胁说：“你们里面有共产党！”工人们齐声说：“我们不晓得共产党，我们要发米，要吃饭”。佐佐木一看工人们坚持不上班，一筹莫展，事情发生在厂里没有按规定发米所起，只得发给拖欠的黄糙米，平息了工人的罢工斗争。

面对日本人残酷的压迫和控制，工厂地下党组织决定利用厂内各种关系和矛盾，以利开展各种合法斗争。车间一个名叫山本的日本监工，对工人似狼如虎，经常打骂工人。车间的一个工头与日本监工是一丘之貉，经常对工人敲诈勒索。但他有吃喝嫖赌嗜好，地下党组织决定利用这个工头的特点，通过他去影响山本放松对工人的监视。于是，党员们凑了钱，经常宴请工头上馆子，在吃喝中联络“感情”。酒足饭饱后，工头夸下海口。果然不久，兽

性十足的山本对工人的监视有所放松，党组织利用这一隙间的空子，发动工人多出次品，打破敌人严密的控制。

在敌占时期，大陆铁厂从1941年起曾办起过三期养成工学习班。进厂手续是由厂内老师傅介绍，盖店保公章。进厂后开始上午读书。下午进车间劳动。两年后。正式分配进车间劳动。并规定，每个养成工必须学日语。许多人以记不牢、背不出为由，来抵制日本人的奴化教育。养成工的生活待遇很凄惨，吃的是红糙米和六谷粉，每月收入只值二升米的价钱。残酷的剥削与压迫，迫使许多工人中途离厂另谋生计。如第二期养成工开办时有33人，不到二年仅留12人。

养成工对日本领班的反抗斗争同老工人一样，也采取多种多样的斗争方式。

1. 做夜班到下半夜就千方百计睡觉，或者开空车。
2. 将做好的零件一部分藏到工具箱里或者丢到毛坯和废品堆里。
3. 将生产用机油、肥皂油、火油往阴沟里倾倒。

养成工同样有很强的团结斗争精神。有一天，养成工谈明义在签到簿上写了：“远藤是猪猡！”领班看到这是骂日本人为“猪猡”，领班气急败坏地将养成工集中起来，逼问这是谁写的？可是谁也不吐真情，远藤吼叫起来，命令养成工全体集中跑步到大场，再跑回工厂。当时正处严寒，厂边王家宅小河已结成薄冰。又叫大家赤脚站在河里，两脚冻得发柴，上岸回到厂后，又对每个养成工轮番抽打耳光，再逼是谁写的？但是大伙抱成一团，没有一个人招供。

1945年8月初，终于得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大陆厂地下党组织积极行动起来，在深夜到上海马路张贴欢迎新四军解放上海的标语。但蒋介石窃夺人民抗战胜利的成果，独揽了工厂的接管大权，大陆厂地下党组织仍在黑暗中与国民党反动政府展开新一轮的斗争，直到1949年5月大隆厂才真正回到人民的手中。

大陆铁厂的地下活动

周信业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帝把上海作为侵华及支援太平洋战争的物质供应地，将大陆铁厂改成军工厂，生产战争武器，如迫击炮筒、手榴弹壳、火焰枪及步枪零件等。因此，当时的大陆铁厂在沪西地区以及上海机器制造业方面具有一定的重要性。

1945年初，我从中共华中局城市工作部（当时的淮南根据地，位于安徽省天长县以西大王庄）整风学习班返回上海，担任中共上海市工委属下的杂厂委员会委员（书记为顾松盛）。我们在中共上海市工委的领导下，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在各种团体中积极组织地下军，筹划武装起义，准备在时机成熟时举行武装起义，配合从外部进攻上海市区的新四军，里应外合地消灭日本侵略军。

1945年2月，我接受党组织的决定，以应聘方式，经操作考试进入大陆铁厂做车工，秘密开展党的工作。当时，日帝实行经济封锁，严格限制供电和原材料供应，致使中国民族资本工厂被迫纷纷关厂，工人失业，生活无着。在此米珠薪桂之时，日帝以大陆厂每月供给10多斤粮食及分配一些肥皂之类的日用品为诱饵，吸引工人进厂。我进厂后，了解到绝大部分工人是为生活所迫才出卖劳动力的，他们对日帝、汪伪相勾结残酷搜刮欺压的行径普遍存在怨恨情绪。因此，我根据隐蔽自己、团结群众、利用敌人的方针，首先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当时有一个车工名叫胡东海，进厂已四五年了，对厂内情况较为熟悉，与我又是同乡，于是我决定先与他建立关系，从侧面对他启发，通过他公开利用社会习俗，以结拜兄弟的形式，把车间内的工人群众团结起来，然后逐渐向其他车间发展。

以后，我又陆续把厂外地下党员，以介绍工作为由安排进了厂里，如陈正泉、赵士泉、吴杏根、何阿康、陆文彬等。并在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下，成立了大隆厂第二个党的核心小组，开始了党对大隆厂工人斗争的直接领导。核心小组成立后，便首先做好党的宣传教育工作，在党内使党员一致认识到“生产武器不打共产党军队”，在群众中则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不打抗日队伍”。总的目标是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做到既解决工人生活，又达到破坏武器生产。当时在生产过程中进行破坏方式有以下几种：1、将产品以少报多：改写每日进库上报数字，如1字可改写7字、9字、10字等。2、以坏充好：把有砂眼的零件作正品装配。3、日班入库产品，由晚班拿出，作第二天日班上交数。4、车间有日本监工，来查工时，工人间互相暗示。另外，我们对关键岗位的小职员做好团结工作，如点数员、记录员、质量检验员等。

金工车间的日本领班名叫山本，对车间监视严密，不但看产品，抽查数字，连工人之间说话都受限制，大家决心设法把他引开去。

中国领班崔杏生是被工人有意拖进来的结拜兄弟，此人一贯吃喝工人血汗钱。我们私下凑钱利用工头崔杏生拉山本外出吃喝嫖赌，致使山本对车间监视放松，给我们破坏工作带来可趁之机。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日本很快投降。上级领导来上海分别传达中央指示“要发动群众，里应外合，配合新四军解放上海”。上海工人就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保护工厂，防止敌人破坏和盗劫，迎接胜利。

8月18日早晨，工人进厂上班，日军将厂门紧闭，不让工人进厂，大批工人聚集在厂外要求进厂。当时日军还未放下武器，日军架起机枪，向大家做瞄准动作，吓唬工人，工人中立即引起骚动、后退，我即向工人说：“日本已投降了，他们不敢开枪。”带头冲入厂内。果然日军正在车间内拆卸毁坏武器零件，准备消灭罪证。

8月17日，我们组织厂里工人参加了沪西区的纺织、机器等业在平民村召开的上万人庆祝抗战胜利大会，并贴出了“欢迎新四军”“欢迎刘长胜市长”的标语，那种群情激奋，欣喜无比的心情真是无法形容。但后来形势很

快发生变化，蒋介石垄断了受降大权，勾结日伪军阻止我新四军解放上海，党中央决定撤消对上海的进攻，尽可能广占乡村和中小城市。因此根据上海市委决定，我们仍坚持长期地下隐蔽斗争的方针。此时工厂停产，工人面临失业，我们必须发动群众，保护工人生活权利，组织起来向厂方要求发放生活维持费、解散费等。大陆铁厂的工人群众广泛团结一致，投入了对日帝的清算斗争，并取得了一定胜利。工人中涌现出更多的积极分子，如胡东海、乐松友、张益发、潘志仁、王殿喜、谈富根等。

国民党接收大陆铁厂以后，复工无期，工人失业，并宣布坚持敌后斗争的工人、职员为“伪工人”、“伪职员”，要进行甄别，否则不得复工。

在反甄别等待复工之际，我与顾亮在江宁路、长寿路口设立报摊以维持生活，实则是作为联系群众、进行反甄别、要求复工斗争的联络据点。国民党眼看甄别不灵，又要花招，提出所谓“分批复工”，以此试图分化、破坏工人团结，制造矛盾。

经过党内研究，决定要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企图，认为可以分批复工，但要向全体工人说明，先复工进厂工人的任务是为了进厂对敌斗争，以达到争取全部复工的目的。事实上群众也在各种斗争中信服了工人骨干确是在为大家谋利益的。因此在党的宣传影响下，大家保持团结，反对分裂，同意分批复工，最后取得了一定胜利。

国民党反动派对工人的阴谋激起了工人群众的愤怒，经过一系列政治、经济斗争，大家越来越认识到团结就是力量，斗争才有出路。此时，上级党组织指示要在工人中成立工会组织，为此在党的指示与工人意愿相一致的情况下，我们公开提出工人要有自己的组织，成立工会以保障工人权利。国民党迫于形势也只好同意成立工会，但国民党企图控制和包办工会，攫取工会领导权，派遣社会局专员以“整理”、“组织”工会为名，不择手段地把工人谈富根等引诱拉入国民党一边，抬出工人张宏发在厂内以说书的形式吸引工人。并在工人中公开宣布，工人中有共产党，“红鼻头”（是我在大陆厂的绰号）是有来历的，他就是共产党，以此来分裂工人队伍。利用谈富根当面指名我是共产党，进而挑拨工人骨干胡东海与工人的关系；并恐吓胡东海不许

他与我接触，孤立我，达到分化进步力量的目的，但阴谋未能得逞。国民党又操纵谈富根带领工人参加反苏游行，我们从中加以分化其阴谋，因此在成立工会问题上，工人要选我，国民党要力排“红鼻头”。经过上级党组织认真讨论，决定我不能进入工会，但要采取“三三制”选举方式（三三制，即我方、群众、反动派）把顾亮选进工会，如“三三制”达不到目的，也一定要把顾亮以群众身份选进工会，而且要担任理事长。为此我们要求党员要保证顾亮当选成功，同时，我们在群众中做了大量动员工作，强调顾亮在工人复工中积极为工人说话、为工人谋利益的作用，要求工人一定要选举顾亮当选理事长。结果顾亮被选为大陆铁厂工会理事长（这是由我代表上级党组织批准的），这是我们党在大陆铁厂夺取工会领导权的又一胜利。

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大规模内战，又大肆屠杀和压迫爱国学生、职工、民主人士。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人民运动逐渐深入开展。1946年6月23日上海学生、工人、职员各界人士约数万人集聚在北火车站，欢送上海人民代表赴南京请愿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并进入市区示威游行，我厂工会也响应参加。由于我自抗战胜利以来在一系列政治、经济斗争中暴露较多，党组织决定让我撤离上海。1946年6月我离开了大陆铁厂。

解放前夕大隆厂的斗争

陈宝明

1948年11月29日,我一进厂门,便觉得气氛有点异样,显得沉闷、紧张,工人群众三五成群,小声议论。我赶紧打听,方知是黄金柱、陈正良、赵士泉、陆文彬、潘志仁、胡东海、姚锦泉、钱永根、陶根祥、葛德山、沈爱泉等11位同志,已于昨日深夜(28日)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了。我随即与乐松友同志商量,采取了三条措施:

1. 立即了解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的同志的具体情况,设法与这些同志及其家属取得联系;了解国民党反动派在这些同志住处的搜查情况,是否涉及其他同志,以及时应变,对付国民党反动派,进而设法营救被捕同志。2. 立即向上级党组织汇报,请示如何开展工作。3. 对未遭敌人逮捕的党员同志,分别取得联系,做好工作,稳定人心,并提醒我们的同志沉着冷静,设法清理和销毁红色书报及有关资料,做好应变的准备,不给敌人以可趁之机。

几天后,乐松友同志向我传达了上级党组织的指示,要发动工人群众营救被捕的同志,并通知我厂休日不要外出,在家等候上级党组织的同志前来联系。

那天下午,乐松友同志陪同一位陌生人来到我家。经介绍,我得知此人便是上级党组织的代表王关昶同志,是来领导我们工作的。乐松友同志随即向王关昶同志扼要汇报了黄金柱、陈正泉等11位同志被捕后的情况及工人群众对此事的反映;又汇报了国民党反动派并没有在被捕同志的住处搜查可利用的所谓“证据”,我们更没有“把柄”落在敌人的手中。随后,我补充报告了工人群众很关心被捕的同志,他们对张宏发等国民党工人福利会分子散布的所谓“抓的是共产党”的说法,反应冷淡,表示蔑视,认为是乱扣“红帽子”。

王关昶同志听取了我和乐松友同志的汇报后,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出国民党反动派所代表的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和封建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张宏发

等大大小小的国民党反动派分子所谋求和维护的正是这个利益。他们卑劣、腐化、丑恶、无耻、丧尽人心，遭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对，这是必然的。我们代表着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为解放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而奋斗，也必然会受到广大人民群众信任、爱戴、拥护和支持。王关昶同志要求我们把工人群众和被捕同志的家属发动起来，迫使大隆厂工会出面向国民党反动派当局交涉以释放被捕同志。要让工人群众知道工会是工人自己的组织，是为我们工人谋福利的，是保障我们工人利益的。黄金柱、陈正泉等 11 位同志是大隆厂工会的会员，其中还有几位是工会的理事、监事和工会的小组长，是我们大家选举的，是为大家办事的，工会有这个责任，向国民党反动派当局交涉，释放他们，保障我们工人的利益。

当王关昶同志了解到大隆厂工会理事长刘永明尚愿为工人群众办一些事，谋一些利益，以谋取自身的较好名声，换取工人群众的好感和支持时，指出刘永明虽然也是工人福利会的成员，但与张宏发等工人福利会中的顽固分子之间有一定的区别，我们应该利用这个区别，以争取教育团结刘永明，通过工人群众和被捕同志的家属，一起做好刘永明的工作，促使他能以较为积极的态度，以大隆厂工会的名义，向国民党当局交涉，要求释放被捕同志。

王关昶同志在作了发动群众营救被捕同志的指示后，又明确了我党在大隆厂的工作，暂由乐松友同志和我负责。会后，我们依照王关昶同志的指示，分别对党员进行了传达和部署，全面开展了营救被捕同志的活动。我们一面发动被捕同志的家属直接找刘永明，一面又让管仲明等我们一些年龄较大的同志和胡培泉等一些接近我们的老工人对刘永明做好工作，督促刘永明以大隆厂工会理事长的身份，代表大隆厂工友同国民党反动派当局交涉，要求释放被捕的同志。当我们得知黄金柱、陈正泉等 11 人分别被关押在黄浦和蓬莱警察分局后，我们的同志和工人群众不断地前去探望。起初，无法进入警察分局，只得在警察局外面，站在马路对面，朝关押被捕同志的窗口挥手，向他们表示敬意。

1949 年 2 月下旬，在人民解放军渡江之前，国民党政府已摇摇欲坠，为争取喘息的时间，在玩弄假和平阴谋的情况下，对上海的工人、学生运动，表面上不得不暂时收起赤裸裸的血腥镇压手段。在对被捕的工人、学生并没有掌握充分的证据下，同时在地下党的营救下，在社会舆论和被捕者家属的压力下，国民党

反动派当局被迫应允交保释放被捕者。

我们在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请示上级党组织批准以大隆厂工会的名义保释。据此,我们的同志和工人群众一起督促刘永明出具保释书。1949年3月22日黄金柱、陈正泉、赵士泉、陆文彬、潘志仁、姚锦泉、葛德山和沈爱泉等8位同志被保释出狱。约3周后,钱永根同志也被保释出狱了。

在11位同志被捕后,上级党组织和王关昶同志以及大隆支部的同志们,对他们都非常关心。他们在狱中时,我们每次都在组织会议上谈起他们并商讨营救工作。当第一批8位同志出狱后,上级党组织还从解放区工人捐献的救济款中拿出一部分银元(具体数字已记不清了)交给大隆厂支部。由支部根据他们各人家庭的不同收入及负担,分别转交给了他们,以示慰问。同时,王关昶同志还代表上级党组织召集他们,在我家开了一次会,对他们表示慰问,并请他们每人写了一份被捕的经过和在狱中情况的报告,交给组织上。特别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后,党组织考虑到国民党反动派垂死挣扎,很有可能疯狂反扑,残杀革命同志,再度加剧白色恐怖,而黄金柱、陈正泉、赵士泉3同志的面目较红,有再次受到迫害的可能。于是,王关昶同志在与我们支部研究后,决定他们3人暂时隐蔽起来,这都充分说明了我们党对自己的同志,历来是非常关心和爱护的。

在11位同志被捕后的第二周,王关昶同志把姚锦生同志的组织关系转交给了我们,并决定由乐松友同志负责去接关系(姚锦生同志是在实验民众学校入党的,组织关系在该校地下党支部)。又过了一周,在一次会议上,王关昶同志向乐松友、姚锦生和我宣布了中共大隆厂支部的重建,决定由我任支部书记,乐松友同志任组织委员,姚锦生同志任宣传委员。

11位同志被捕后,原先由黄金柱、陈正泉、赵士泉等同志负责单线联系的一部分党员,与组织失去了联系。支部重建后,我们便逐个地与他们恢复了联系。这些同志与其他同志一样,表现都很出色,沉着冷静,举止正常,毫不惊慌失措,绝不因有同志被捕而思想有所动摇、失常,不给敌人丝毫可疑之处。在营救被捕同志的过程中,他们团结广大群众,与党组织步调一致,配合默契,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说明我们大隆厂支部及其党员,是成熟和干练的。

支部重建后,党在大隆厂的工作重点主要是发动群众,保护工厂以及发展党

员和工协会会员。同时,我们又把《新华通讯》等宣传品油印后寄给厂内的工人福利会分子;并以顾亮同志的名义对工人福利会在大隆机器厂内的骨干分子,如张宏发等人,分别邮寄了警告信以及宣传品等,以示区别,予以分化。我们又遵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发展并组织了秘密护厂纠察队(上海解放前几天,改名为人民保安队),保护本厂及附近地区工厂、道路设施等;调查敌人在附近地区的武装部署、军事设施及地形等;瓦解敌人军心,鼓动敌军离队;等等,以迎接解放。

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放松营救尚未出狱的同志的工作,仍不断地督促刘永明继续与国民党反动派当局交涉。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仓惶逃离,监狱无人看守,胡东海、陶根祥两同志才获得了自由。

在黄金柱、陈正泉等同志被捕后,我们党在大隆厂的组织活动从未中断过。我们坚持了每周一次的组织会议(支委会重建后,为支委会会议),保持了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每次会议,王关昶同志均亲自出席,听取汇报,共同研究,作出部署,指导我们开展工作。特别是在国民党反动派拒绝了和谈“协议”,和谈终止,中国人民解放军奉令发起渡江战役,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后,为了适应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和出于革命斗争的需要,上级党组织决定,建立了闸北临时分区委,顾松盛同志任临时分区委书记。乐松友同志和我都参加了临时区委的工作。临时分区委仍由王关昶同志(安中坚同志一度也曾参与)负责领导。这时,乐松友同志和我增加了对这一地区内某些工厂的党员或积极分子的联系,我们基本上出于半脱产状态。而临时分区委的办公、开会和联络点,则设在我家。至上海解放,临时分区委的使命完成,即行结束。

革命自有后来人。尽管国民党政府对于人民的革命行动采取了所谓的“格杀勿论”、“宁愿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的反人民法令,国民党特务机关和警备司令部的“飞行堡垒”昼夜二十四小时在上海街头到处捕人、杀人,可是共产党人是捕不完杀不尽的,真是“一个人倒下去,千万人站起来”。由于国民党政府倒行逆施,使更多的人从沉睡中觉醒过来。大隆厂的11名同志被捕后,先后又有7名同志参加了党组织。到1949年上海解放时,大隆厂共有党员27名,成为党的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了广大工人群众,在迎接解放上海的斗争中发挥了共产党人应有的作用。

风雨中的女工夜校

王知津

1944年7月,我从沪江大学社会系毕业后,经雷洁琼教授介绍,进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劳工部工作。从抗战后期到上海解放,这是不平凡的5年,也是我受教育最深、最难忘的5年。

—

上海女青年会劳工部主要工作就是在各工业区办女工夜校,最盛时候有六七所,由于战争等等原因,到我去的时候,只剩小沙渡路三和里一所。当我第一次跨进教室,就被热情可爱的女工同学吸引住了。她们大多是十六七岁至二十来岁的年轻女工,彼此见面打起招呼来像久别重逢那样亲热。课前三三两两、叽叽喳喳讲个不停,上课铃一响,顿时安静下来,她们又是那么认真地听课。放了学,钱琴老师对我说:“你别看这些小姑娘,她们都是每天站在机器旁挡车12个小时,有时连小夜班得16个小时,做得筋疲力尽。晚上照常到夜校来读书,真不容易啊!”钱琴带我参观了女工夜校校舍。这是两幢一楼一底毗连一起的石库门房子,楼下两间和楼上一间是女工夜校初、中、高3个班的课室,其中楼下有一间课室白天兼做沪西女工生活服务社失业女工缝纫组、楼上另一间就是钱琴、黄纫秋、葛祖德和姚玉英等4位教师的卧室,后面半楼梯两间约6平方米的亭子间:一间做图书室,一间做教师办公室。楼下2间灶间:一间做医务室,一间做厨房,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钱琴还告诉我:“上海过去办的劳工夜校不少,但寿命都不长。像我们这所夜校从1930年办到今天,没有中断过,主要还是靠基督教女青年会这块牌子,可能全上海也就只此一家了。女工们刻苦求学的精神真叫人感动,她们在日本鬼子的恐怖戒严、交通封锁、灯火管制下没

有退缩,常常在黑暗中摸着来夜校。我们只要有学生来,点了油灯、蜡烛也要给她们上课。”从钱琴谈吐中感觉到她非常热爱夜校和女工同学。

1945年夏天,人们的思想特别活跃。苏联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消息谁也封锁不住了。苏商《时代日报》成为女工夜校同学关心时局最好的读物。她们还常常利用午休,跟着老师到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苏侨俱乐部和杜美电影院(今东湖电影院)去观看《保卫斯大林格勒》、《女壮士》、《丹娘》、《虹》等反法西斯影片,回来展开热烈的讨论,眼看日本侵略者统治也不会长了。8月15日,日本侵略者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了,沦陷区人民好容易盼到了天亮,这是多么振奋人心的消息!可是事实完全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蒋介石从峨眉山上下来,抢夺胜利果实。生怕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进驻上海,他一面叫新四军“驻防待命”,一面叫汉奸周佛海、汪伪和平军继续留在上海“维持治安”。抗战胜利给上海工人带来的却是关厂、停工、失业。工人们沸腾起来了,他们自发组织起来护厂,不准日本人往厂外运东西,要求厂方解决生活问题。不少同学表现得很勇敢。如内外棉第二加工场女工杨善在日本投降后的第二天,看见厂门口还是日本兵荷枪站岗,不让工人们进去。杨善气愤极了,她立刻走上前去,抓住日本兵手中上着刺刀的枪,带领一群工人冲进厂里找日本大班谈判交涉。

有一天将近中午,我到三和里夜校去,只看见许多工人包括夜校同学在内都急匆匆地往澳门路莫干山路方向跑去。夜校只留姚玉英老师一个人,姚说:“今天沪西工人集中在莫干山路信义铁工厂开会,我是出来买羌饼给她们吃。”我跟了姚玉英赶到现场,许多工人在资本家开的信义铁工厂门前一块水泥场地上坐着,强烈要求老板发放贮粮分给失业工人。这是日本投降后沪西工人第一次大集会。国民党当局派来的调解人竟然站在老板的一边。几名工人代表不时将和当局谈判的情况向工人群众通气,说话泼辣有力。她们是汤桂芬、张金娣、张菊宝、马林轩,都是夜校的学生。我暗暗地高兴,女工夜校的学生真行!

二

抗战胜利后,三和里女工夜校人来人往,热闹非凡。许多过去曾在女工夜校读过书的同学,纷纷到三和里来,有的打听以前教师或同学的下落,有的要求继续

来读书,有的介绍厂里的小姐妹来读书,有的表示愿为女青年会开办新的夜校出力。报名的那天,三和里夜校挤得水泄不通。看到这些可爱的女工同学,我和几位老师既高兴又发愁,三和里夜校这几间课堂,怎能容得下那么多人?为了挖掘潜力,我们找人搭天井、盖晒台;同时跑遍了江宁路、西康路、长寿路和曹家渡五角场一带工人较集中的地方找校舍。在女青年会全国协会资助下,上海女青年会分别各以三条半金子(黄金3.5两)的代价买下曹家渡仁和里(今长宁支路12弄3号)和沪东榆林路东晋城里(今榆林路783弄16号、18号)作为第二和第五女工夜校的校舍,也是女青年会劳工部在沪西曹家渡和沪东活动的中心。至1946年,女青年会女工夜校已从1所发展至6所,学生增加到1000余人。

上海女青年会的董事会和各部委员会等组织也在抗战胜利后逐步恢复、充实起来。指导劳工部工作的劳工委员会委员大多是劳工教育专家或热心劳工福利事业的人士。先后担任过劳工委员的有汤凤美、胡绣枫、沈骥英、金江衡、刘虹若、胡耐秋、钟复先、杨向时、戚逸影等。还聘请过夜校同学代表王菊秀和杨杏轩为委员。雷洁琼和俞庆棠是女青年会董事,她们也都关心和支持劳工部工作。

女青年会全国协会为了加强对全国各地女青年会劳工部工作的指导,1946年秋与上海女青年会劳工部合作,在曹家渡仁和里举办劳工福利实验站,聘请邵滴容为执行干事,林乃夫为干事。实验项目有培训戏剧和歌咏人才,组织毕业校友读书会,编写女工教材,出版油印刊物《友光通讯》和友光团的活动资料,并有图书室、娱乐室和卫生室等文化福利设施。

三

随着夜校的发展,教师队伍也扩大了。除了原来三和里夜校的3位老师外,还有抗战初期就在女工夜校当教师又被我们请回来的,如张华、王葱;有的是从小教及其他方面转过来的教师如周琦、杨瑞英、张黎、汪萃英、徐淑贞、高云等;更多的是从中学出来的毕业生如奚宗伟、聂梅励、黄少平、张莲华等;也有少数是大学刚毕业一时找不到职业暂时来教书的如蒋华、陆兆珊、冯鼎芬等。4年中前后担任过教师的不下四五十人。教师的共同点是年轻、热情、正义感强、素质好。她们不论来自何方,到了女工夜校,和工人接触,就为工人阶级公而忘私

的优秀品质和顽强战斗的革命精神所感染，自然而然地爱上了劳工教育事业，在工作中培养了密切联系女工同学，艰苦踏实为工人服务的好作风。

老同学特别怀念在日本占领“孤岛”最艰苦的日子里，坚持在三和里女工夜校教书的钱琴老师。1941年，钱琴初来夜校工作时，不过23岁，由于长期生活艰苦，营养不良，牙齿坏掉了好几只。同学们亲昵地给她起过外号叫“外婆”。在日伪统治时期，夜校除了上文化课外，一切活动都属“非法”。钱琴和其他两位老师抓住教书识字的机会，向工人宣传进步思想，同时利用厂休深入到工人宿舍和家庭，了解她们的思想和生活，进行个别细致的工作。譬如工人生了病往往因为没钱医治产生消极情绪，担心病重了要被解雇。老师就陪同她们到收费较低的新闻路红十字会医院去医治，安慰和鼓励她们要坚强地活下去。纺织工人中生肺病的较多，对于病重而又特别贫困的同学，则设法通过女青年会的关系弄一点鱼肝油给她们吃。女工失业了，老师就在同学中打听其他工厂有没有招工的机会，帮助她们找到工作。同学们有什么心事都喜欢找老师谈，常常谈到深夜。夜校开学时，有些新同学一两天不来校。钱琴总要到厂门口去等候或托人去打听缺课的原因。在工资菲薄、物价飞涨的情况下，夜校教师经常发生到了月底伙食开不出，但是碰到女工同学特殊困难时，钱琴只要身边有点钱，总是拿出来用了再说。有一回钱琴出去家访，深夜不见回来，原来是途中突然遇到日军交通封锁，她和几个女工同学在苏州河边马路上过了一夜。

1946年的一个秋天，钱琴急急忙忙跑来找我提出要求辞职，理由是外祖母病重，得回家乡常州去。同钱琴相处那么多时候，她从来没有为私事请过一天假，这回因外祖母病而坚决辞职，我怎么也留不住她，真有点奇怪。第二天，钱琴就悄悄地离开三和里女工夜校，她没有与朝夕相处的女工同学告别，以后也没有再来过。全国解放后，我们到处打听钱琴的消息，后来才知道她在女工夜校时已是中共地下党员，当时因被特务注意离开上海，最后仍遭反动派逮捕杀害，英勇牺牲。

四

女工夜校同学如饥似渴地要求学习，她们克服了种种困难，坚持每天晚上到女工夜校读书。夜班工人下班后第一件事就是赶到夜校找老师补课。而工人识

了字,掌握了文化工具,真是如虎添翼,其觉悟提高之快,更是令人难以想象。这些都激励着我们必须把夜校办好。同时,在实践中也深深体会到要当好一名教师,光凭一股热情是不够的,还要研究怎样更有效地提高工人文化水平。教材是教学中很重要的工具。女青年会劳工部和女工夜校的前辈们在这方面做过很多努力和探讨。1946年成立劳工福利实验站。专门聘请黄静汶负责编写教材工作,并由叶圣陶、俞庆棠、方与严、胡绣枫、傅彬然、胡耐秋、王辛南等组成编委会,教科书定名为《女工读本》,1948年由女青年全国协会正式出版,深受女工同学欢迎。

劳工部还经常请一些进步知名人士到夜校来讲国际国内形势、物价与生活指数问题以及介绍各国妇女生活情况等等,如陶行知、许广平、胡子婴、罗叔章、雷洁琼、俞庆棠、孙起孟等都来讲过,他们的演讲都是针对现实,富有启迪性,不仅可以补充课堂教学的不足,尤其对于扩大工人眼界,提高思想认识,作用很大,同学们非常爱听。

有一次,我们请了加拿大籍民主人士,圣约翰大学教授文幼章到三和里夜校来作报告,三和里夜校楼下和天井挤得水泄不通。文幼章手提小型电影放映机放映他旅行到各地的影片,同学们个个伸长了脖子很有兴趣地看着。后来他又以亲身经历讲了他长期生活在四川与国民党政要接触所看到的种种腐败事实,大家更愤怒地听着。文幼章用他那道地响亮的四川话大胆地说出了当时一般中国人不敢公开说的话,引起了墙外警察特务注意,但伸头进去一看,原来说话的是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也就无可奈何地走了。

陶行知先生一向很关心和支持女青年会女工夜校工作,1946年7月7日,上海女青年会女工夜校假愚园路市立幼稚师范学校大礼堂举行抗战胜利一周年和毕业典礼大会,陶行知先生亲临讲话,并特地写了一首诗歌表达对时局的看法和对毕业同学的勉励,当众朗诵。不幸的是7月25日,陶行知先生因操劳过度突患脑溢血猝然逝世,他在毕业典礼上的讲话竟成了永诀。陶先生的教导更深刻地铭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

五

女青年会女工夜校的课外活动组织友光团,在“孤岛”时期一度被迫停顿活动,抗战胜利后也恢复起来了。各校同学选举出自己的友光团主席和职员。女青年会

劳工部干事和夜校教师都是友光团的辅导,帮助她们制订每月每周的活动计划等等。友光团根据每个时期的形势和女工们的兴趣和爱好开展活动,内容相当丰富。女工同学喜欢唱歌,我们聘请音乐界进步人士陈良、茹伟、杨今豪等担任歌咏老师。也有不少人喜欢跳舞、演戏,我们聘请育才学校钱凤、章恒、强明作指导。许多爱好文艺的文化课老师也跟着学唱、学跳、学排戏,回去再教其他同学。因此当时流行的歌曲如《工人自叹》歌、《团结就是力量》、《茶馆小调》、《薪水是个大活宝》、《你这个坏东西》、《山那边呀好地方》、《跌倒算什么》等和《朱大嫂送鸡蛋》、《王大娘补缸》、《农作舞》、《青春舞》、《垦春泥》,以及新疆、西藏民族舞蹈等,同学们很快就学会并且传播到工厂里去。戏剧多数是师生自编自导的活报剧,如《更生嫂》、《花棉袄》、《失业》、《不识字的苦》、《冬老人》等。各校友光团一般每隔两周或一个月有一次文艺演出,逢到纪念三八妇女节、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圣诞和毕业典礼等大会,则举行规模较大的演出。由于文艺节目内容都是反映当时工农大众的现实生活和悲惨遭遇,揭露了旧社会的黑暗和反动派的丑恶嘴脸,表现了工人阶级的坚强意志和斗争决心,因此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鼓舞作用。有不少女工就是通过厂里小姐妹到女工夜校去看演出以后,开始对女工夜校发生兴趣,才进夜校读书的。

友光团还根据同学的兴趣特长分了很多小组,如做小先生、开展演讲比赛、故事比赛;出《友光通讯》、办小小图书馆、举办时事讲座、读书会;组织集体看进步电影和话剧、到余山、昆山、无锡等地郊游、参观报馆和盲童学校等等。1947年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友光团活动就以“妇女与社会”为主题,发动各校友光团小组热烈展开妇女问题的讨论,从美国新闻处、英国新闻处和苏联领事馆等,弄到各国妇女生活的电影和图片轮流到各校放映、展览。劳工部在女青年会江宁路会所办过一个“女工生活和成绩展览会”,用图表、照片和实物展示出女工为社会所作的贡献很大,而她们的工资待遇、劳动条件和衣、食、住情况却很差。这个展览会使女青年会学生部、少女部等从未接触过工人的会员看了也深受教益。

通过友光团活动,同学们不仅扩大眼界,提高认识,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同时增长才干,培养锻炼了工作能力。因此人们讲:“工厂里的女工领袖,大多数是女青年会女工夜校读过书的。”国棉一厂女工丁巧林,进女工夜校时才13岁,她天生一副好歌喉,最喜欢唱歌。在车间里小姐妹们做夜班打瞌睡时,常常围

着巧林要她教唱歌,特别那个《活不起来》歌,完全唱出了工人的心声,当时大家称之为“活不起唱不厌的歌”。丁巧林后来成为很出色的工厂宣传干部。许多原来在陌生人面前害羞,说话要脸红的小姑娘,也活跃起来了。她们逐渐学会当主持,掌握小组会议,以致在千百人大会上讲话不慌不忙,有条有理。

六

在旧社会,工人生活在最底层,受苦最深,而女工所受的苦又多了一层。不少女工因封建买卖包办婚姻的纠缠而苦恼,为此劳工部特约热心的女律师,研究和尽力帮助解决这方面的“疑难杂症”。在一般情况下这类问题如果家长还可以商量的,我们鼓励同学耐心说服家长取消包办婚姻。有的婚约虽已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了下来,但还是可以争取用合法的手段解除婚约。夜校同学、工足袜厂李爱珠就是在史良律师帮助下依法解除了她养母强行为她许配的不合理婚约。有些女工家长不顾女儿反对坚持包办成亲,在无法抗拒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也支持过她们逃婚。

女工中体弱多病的特别多,女青年会劳工部早在30年代在三和里夜校就设有一个诊疗室,至40年代日本占领最艰苦的时期,诊疗室的设备已经破旧不堪,药物也断了来源。但是劳工委员、沪西平民产科医院沈骥英医生始终坚持每周用一个晚上为女工看病、体格检查,有时还为女工同学上课,讲授卫生常识和女工常见病——肺病、妇科病的预防及治疗等。还有海防路光华眼科医院院长张锡祺(1949年后任安徽医学院副院长)长期来免费给女工夜校同学到光华医院治疗眼病。他们这种默默无闻地为工人办实事的服务精神,老工人是不会忘记的。此外,劳工部曾特约槟榔路(今安远路)工厂联合医院余新恩医生、慕尔鸣路(今茂名路)孙桐年医生长期免费为女工看病,在那劳动人民被人瞧不起的年代,这种帮助特别可贵。

抗战胜利后,人民仍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劳工部主要提倡女工同学发扬团结、互助、友爱的精神,做些福利工作。如1946年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女青年会各部会员包括女工夜校同学在内,义卖纸花,收入全部作为劳工妇女贫病贷金。1947年,联合国救济总署捐赠给女青年会劳工部700多磅绒线和一批旧衣

帽。我们将其中一部分救济特困女工同学,还组织失业女工打毛衣出售。另外,通过友光团发动夜校同学动脑筋,利用这些旧呢帽剪制成各种别在大衣上的装饰花拿出去义卖。两项所得全部作为失业救济和贫病贷金之用,对于当时大批因罢工而被开除或其他原因生活严重困难的工人,起了临时救急的作用。

七

抗战胜利后的3年,正是我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斗争的决战时期。回顾上海女青年会劳工部、女工夜校与女工同学前进的过程与当时整个革命形势是分不开的。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官员在美军空运支持下纷纷前来上海“劫收”,疯狂地搜刮人民。被接收的日本纱厂迟迟不开工,不少私营工厂也因美货充斥市场停工减产,全市仅纺织业失业工人就达20万。女工夜校同学绝大多数在纺织、轻工等厂工作,她们积极投入到要求复工,要求失业救济的斗争中去。组织起来的沪西失业工人,经常在平民村集会,其中不少骨干如汤桂芬、杨美龄、杨善、何彩东、张菊宝、郭培燕、陈素英、张金娣、蔡金媛等都是女工夜校的同学。

1946年1月13日,上海学生和各界人民代表在玉佛寺公祭昆明学生反内战运动中被国民党反动派残杀的死难烈士,女工夜校一些同学跟着老师第一次参加如此规模的控诉国民党反动派暴行的大会。晚上回到夜校,讲给其他同学听,激起全校师生的公愤,大家要求以后有机会也参加这样的集会。这时期学生、教师和各界人士组织的活动特别多,内容是请进步民主人士如陶行知、郭沫若、许广平、林汉达、马叙伦等作时事形势报告。夜校同学都争着要票子去参加。通过这些活动,使她们大开眼界,认清了破坏和平、践踏民主的是国民党反动派,支持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的是美国。懂得工人不仅要为争取生存和生活权利而斗争,同时还要关心国家大事,投身到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群众运动中去。

1946年“六·二三”以后,国民党反动派撕破民主外衣,发动全面内战,在上海镇压爱国民主运动,解散进步工会,逮捕工人学生,暗杀进步人士。上海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的运动发展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反美反蒋爱国民主运动。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此起彼伏,互相配合,形成人民革命运

动的新高潮。一连串震动全市的重大事件,如三轮车工人臧大咬子被美军打死事件,国民党当局禁止黄浦、老闸两区的摊贩营业而引起的全市摊贩暴动,北平发生美军强奸北大学生沈崇事件,百货业等爱用国货抵制美货在劝工大楼开会永安公司职工梁仁达被打致死事件等。夜校教师都结合课堂教育向同学讲述事实真相,大家听了莫不义愤填膺。纷纷回到厂里揭露反动派的暴行,并写慰问信、募捐等支持死难烈士家属。1947年5月,上海学生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时间持续达一个半月之久。交大学生直接到女工夜校,向女工同学控诉他们在反动派统治下的困难生活,大专公费生每天的菜金只能买两根半油条,当他们要求政府增加津贴时被国民党特务盯梢、毒打和逮捕的经过,台上讲的人声泪俱下,台下听的人群情激愤。现实是最深刻的教育,她们联系到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搜刮内战经费,宣布冻结生活指数,而物价却不断暴涨。工人强烈反对冻结生活指数,实际上也是反饥饿、反内战的斗争。工人和大学生的感情完全融合在一起。夜校师生到交大去慰问被打伤的同学,以后常常参加交大举行的营火晚会等。交大学生以及其他大学的学生也常到夜校来开座谈会、联欢会,了解工人生活和斗争情况。

女工夜校学生来自各工厂,很多是工人运动中的骨干,夜校无形中成了工人的宣传、联络点。不论沪西还是沪东,工厂里发生罢工斗争或其他情况,甚至是学生界的斗争,只要到夜校里一讲,立刻就传开了。他们利用课前课后交谈厂里斗争情况和经验,相互支援。在罢工时,把夜校学到的歌曲如《团结就是力量》、《跌倒算什么》、《光明之路》等教给大家,指挥唱歌,鼓舞斗志。

八

国民党反动派很注意女青年会女工夜校的活动。市长吴国桢、教育局局长李熙谋经常向上海女青年会董事俞庆棠和总干事陈善祥等提出警告:“当心你们女青年会女工夜校里有共产党。”警察局、社会局、教育局不断找夜校负责人查询师生情况,还派人到夜校“视察”。他们用各种卑劣手段,阻挠和破坏夜校工作,散布到女青年会女工夜校读书的都是“共产党”;公然查抄女工学生的书包,串通资本家晚上提前关厂门,使工人们放学后无法回工房睡觉;他们还常常派流氓在女工夜校门口捣乱,监视教师,盯梢、侮辱女工学生,企图使她们不敢

去夜校,但女工夜校的教师和学生并没有被吓倒。

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在政治上加紧迫害进步力量,敌人的魔爪也直接伸向女工夜校。3月5日,国民党特务突然闯进麦根路第六女工夜校,抓走了新来的教师张莲华。女工夜校全体师生又着急又气愤,一致要求女青年会上层负责人出面交涉立即释放张莲华老师。为了营救张莲华,女青年会上层负责人确实也是全力以赴。董事们通过各种关系打听张莲华被关在什么地方。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劳工部干事邓裕志、美籍干事耿丽淑、上海女青年会总干事陈善祥等通过宋庆龄主持的“国际人权保障协会”在中外报纸上呼吁保障人权,要求国民党市政府和警备司令部调查包括张莲华在内的一系列失踪事件。同时,女工夜校学生纷纷向报馆写信,要求“还我张先生”。最后,终于迫使当局释放张莲华。张出狱后,经常有特务在她后面盯梢,使她无法继续在上海待下去。在沈体兰等进步人士帮助下离开上海,去了香港。临走时她写了一篇《我控诉》交给“国际人权保障协会”,后来在《密勒氏评论报》、《文汇报》和《联合晚报》上同时发表,揭露了被捕经过。把在狱中遇到的其他被捕的人的姓名以及特务对待她们的卑鄙的手段和法西斯暴行公诸于众。用铁的事实戳穿国民党当局矢口否认捕人的无耻谎言。

1948年,国民党统治面临崩溃,更加疯狂镇压迫害群众。不久,我们又听到三和里女工夜校学生陆宗桓在厂里被捕的消息。陆宗桓是寅丰毛纺织厂工人。1947年,刚进夜校时是个读书非常用功,不声不响的小姑娘。通过夜校读书和参加友光团活动,进步很快,后来被同学推选为友光团主席。陆宗桓经常将夜校里听到学到的回厂讲给周围小姐妹听,并且动员她们也到女青年会夜校去读书。人们都说陆宗桓进夜校前后判若两人,陆宗桓变了,变得更聪明能干。谁知这也成了反动派注意的对象!警察局逮捕她的理由就因为她在女青年会女工夜校很活跃,有“共产党分子”的嫌疑。真是天晓得!陆宗桓关在监狱里毫不胆怯,她理直气壮地说:“我不是共产党,但是我认为对的就要听,就要讲。”她看到很多和她一样无辜被关在监狱里的工人、学生,他们都是正义感很强,在坏蛋面前敢于坚持真理,敢于斗争的好人。为什么好人就是共产党嫌疑犯?坐牢使她受到很大的启迪。后来反动派在陆宗桓头上抓不到什么辫子,同意交保释

放。上海解放后我才知道,陆宗桓出狱以后倒真的参加了共产党。

在那黎明前的黑暗时刻,女工夜校师生团结得特别紧。自从张莲华事件后,大家的警惕性也有所提高。1947年7月,一个炎热的星期天晚上,沪东区第五女工夜校四十多个女工学生正在楼上教室聚精会神地听着从青年会工商经济研究会请来的邝日安先生讲关于冻结生活指数的问题,突然楼下闯进3个便衣特务,声称找张琪华老师。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同学们立刻将张琪华老师掩护起来。我和周琦老师作为夜校负责人,将一个特务引到办公室谈话。徐淑贞和王志芳两位老师在楼下故意和其他两个特务大声争吵,使楼上教室听讲的人引起警觉,有所准备。师生们又趁敌人不注意的时候,迅速把张琪华从教室转移到后面亭子间卧室,校工小张又帮助她由隔壁劳工托儿所后门出去,摆脱了敌人。这场紧张的战斗,没有谁当指挥,也没有条件共同商量,完全靠全体师生配合默契,团结对敌,取得胜利。

九

1949年初,国民党反动统治处于土崩瓦解中。他们以假和平为烟幕,在上海开始作逃亡的准备,下令将重要工厂迁至台湾和华南等地。人民解放军渡江后,他们已来不及迁厂,便派遣军队到各厂驻扎设防,企图镇压工人,破坏工厂。女工夜校同学再也不能像平日那样来夜校读书了。她们在工厂里同工人们一起参加到全市人民反迁移、反破坏、护厂、护校、保业的斗争中去。各厂纷纷建立起应变组织,进行储粮应变。并组织护厂队、纠察队、消防队以适应形势需要,机智灵活地同反动派进行新的战斗。上海临近解放时,各工厂、企业的护厂队、纠察队统一改称由各人民团体联合组成的人民保安队。夜校不少教师也参加了人民保安队的活动。以工人为主体的全市6万多名人民保安队,配合人民解放军保护好上海的工厂、学校财产,维持好社会秩序,大家以无比喜悦的心情迎接上海的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高兴地看到女青年会女工夜校很多同学担任了政府机关、工会、共青团、妇联的工作,有的担任了工厂的领导工作,现在她们绝大多数已经离休或退休,当聚在一起回忆自己过去成长的过程,永远忘不了女青年会女工夜校和教师对她们的启蒙教育。

难忘的师生情

黄幼秋

到女工夜校任教

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日本法西斯侵略军进犯上海地界,大批遭战火洗劫的难民,扶老携幼,只能涌向尚未被日军占领的租界,形成了有几十万难民组成的特殊群体。在上海许多社会团体的组织下,办了许多难民收容所。在这时候,我从浙江海盐老家到上海,在难民所工作,结识了一位在医院工作的护士。她姓陈,为人正直,乐意为难民服务,与我结成好友。1943年由她介绍我进女青会三和里女工夜校任教,受到校方和学生们的欢迎。女工夜校是个大熔炉,我受到钱琴老师的帮助,使我学到了许多革命道理,懂得了劳动人民只有起来革命,打倒反动派,才能得解放。1944年,党组织经过对我的考察,吸收我入党,并由陈护士做入党介绍人,这时候,我才知道她原来是中共地下党员。陈护士是我的革命领路人,因此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自己的个人命运与党的前途、人民的前途,紧紧连在一起。自己有了理想信念和革命的奋斗目标,我在女工夜校的工作更加自觉,更有信心了。

我感到女工夜校是个革命的摇篮,特别是日本法西斯侵占租界后,一片白色恐怖。但在我们女工夜校里,却是劳动人民的乐园,见到女工学生爽朗乐观,我也融会在她们之中。师生之间亲密无比,学生什么话都对老师说,我也把她们视比亲姐妹还亲。这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时期。至今我已85岁,夜校学生还在挂念着我,王菊秀、杨善、瞿云秀等同学,每月总要给我打一次长途电话问寒问暖,她们还专程从上海到南京来看望我,对我是很大的安慰,这种革命的战友之情,使我感到温暖,深深感动。

目睹女工的苦难生活

女工同学在日本人的纱厂里受尽日本资本家的残酷压迫和剥削,有的还要遭东洋婆的殴打,一天工作15个小时,男女同工不同酬,下班后还要受流氓的欺凌,在家里受封建包办婚姻的痛苦。日本侵占上海后,民营纺织厂都被迫停关,夜校许多学生也失业。钱琴和我千方百计为同学们介绍工作。汤桂芬是钱琴的学生,钱琴很关心她,常去桂芬家访问。当时汤桂芬在日商同兴被服厂做工,她技术水平高,当了班长。工厂招工要领小木牌,汤桂芬设法为失业的同学拿到牌子,让她们既有工可做,又能坚持上学读书。有几十名夜校学生先后进了同兴被服厂,她们团结在汤桂芬周围,在同兴厂与日本资本家开展了许多斗争。抗战胜利后,被服厂停关,这批同学又进入到沪西各棉纺厂去工作,成了各厂工人运动的骨干。

抗日战争时期,不少同学生活极端困难。为了帮助她们解决些问题,钱琴老师教学生学做小生意、学算账,办起了合作社,通过买卖日用品,赚点小钱补助生活困难的同学。钱琴老师生活也非常艰难,自己患牙病,也无钱去治疗。为了缓解经济困难,她在教学之余以编织毛线衣挣点钱,并把节省下来的钱,去帮助生活更为困难的学生。我们老师的生活也十分清苦,经常是等米下锅,以大饼充饥。我们的苦难生活,学生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学生曹云卿家里好不容易买到一袋米,就立即想到老师,叫我们去吃饭,好让我们晚上教课有精神。我和钱琴老师每天去曹云卿家吃一顿晚饭,约有一个月,他们还坚决不收我们的饭钱。其实曹云卿家也很穷,家有几口人,凳子也没有,我和钱琴只能站在破旧的小桌旁吃饭。她的父母待我们很好,还搞点蔬菜、咸菜、萝卜干下饭。在当时这已经很不错了,是雪中送炭,这种情谊是终生难忘的。曹云卿的父亲靠卖布为生,我们就动员一些学生通过关系,找些客户买布,好让曹的父亲小本经营能维持下去。

日军占领整个上海后,反动统治更是暗无天日。当时全市夜校都被迫停办,唯独三和里一所女工夜校在最艰难困苦时期尚能坚持不停课,这与钱琴老师克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是分不开的。晚上灯火管制,夜校要拉上窗帘点了

煤油灯坚持上课。学生风雨无阻坚持到校,从不缺课,有些学生放学回去已是深夜,路上行人很少,我们很不放心,有时就陪送她们回家。我和钱琴经常住在学生家中,同她们亲切交谈,讲许多革命故事和抗日战争的形势,借进步书籍给她们阅读。杨善单身一人在上海,我经常去看望她,同她住在一起,与她谈心,启发觉悟。她失业了,我用节省的一点钱帮助她,后通过汤桂芬介绍她进了同兴厂做工。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我介绍了杨善、王菊秀参加中国共产党,我也是她们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人。夜校处在最困难时期,由于师生共同努力,克服种种困难,夜校里充满了生气,唱歌跳舞,好似春天的阳光。但也常引起巡捕房特务的注意。学生们为了掩人耳目,淡化夜校强烈的政治气氛,亲切地叫钱琴为外婆,叫我舅妈,叫另一位老师为娘舅,让外人感到这里不过是一所平俗的夜校。其实我们老师都是还未结婚的青年女教师呢!

团结友爱胜过手足情

杨善同学因失业,生活困难只得去贩米为生。日伪时期贩米是很危险的,但杨善机智聪明,当她赚了点米钱就去帮助生病的曹兰娣同学,多次给曹兰娣家送米,她也经常去帮助其他同学。杨善发现第一印染厂里有些流氓在下班后骚扰女工夜校的同学。有一次杨善骑着自行车,陪同一位女工回去,又遭流氓拦路调戏,杨善就上前对流氓打了两个耳光,流氓被打得晕头转向,目瞪口呆,吃不准杨善是何人?第二人打听到她是一般女工,便要对她报复,要她拉台子(即请客)赔礼道歉。她为打击流氓的嚣张气焰,设法以毒攻毒,利用关系关照(警告)第一印染厂的流氓不准欺侮“侄女”杨善。自此该厂流氓吓得下班后不敢骚扰夜校学生。杨善怒打流氓之事在夜校学生和第一印染厂工人中传开,流氓们更对杨善刮目相看。不久杨善也进厂工作,她在工人中很有威信。

不少学生敢于向恶势力斗争,而且机智灵活。有一位在毛纺厂做工姓胡的同学,一天在马路上遇到流氓吃豆腐(即调戏),反被同学狠狠抽打了一顿耳光,因嘴边出血较多,便硬拖她到巡捕房去,快到巡捕房门口,同学急中生智在自己大腿上狠狠扭出了紫青块。到了巡捕房流氓隐瞒自己的丑行,只告发她打人,该同学揭发,小流氓调戏她,还先动手打人,然后自己也还击他耳光,巡捕问她,

“你有伤吗？”同学边说边把腿上自扭的紫青块给巡捕看，小流氓看得傻了眼，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最后是小流氓咎由自取，被巡捕房扣下。

工足袜厂李爱珠同学，因家里包办订婚，她非常不满。在旧社会，男方有势力，这个婚约不容易解除，解除婚约请律师没钱，李爱珠很苦闷。同学们很关心她，在钱琴和奚宗伟老师指导下，她们知道著名的女律师史良，是全国有名的“七君子”之一。于是杨杏轩、孙立、李亚芳等同学陪同李爱珠去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律师事务所找到史良，史良听了她们的诉说，很同情女工的遭遇，不收她们一分钱，出面帮助解除了这个不合理的包办婚姻。

坚忍不拔精神永志不忘

抗战胜利之初几天，杨善、曹云卿等夜校学生在第一印染厂，为了反对日本资本家搬运厂内物资出厂和为解决工人生活困难进行要求发米的斗争。她们把第一印染厂日本大班（厂长）抓了关起来，与资方展开了短兵相接的谈判。我生怕她们鲁莽，经常到厂门口与她们见面，指示党员紧紧依靠群众，注意斗争策略。要她们与中纺一厂（后名国棉一厂）保持密切联系，斗争要相呼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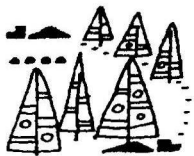
176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根据中共中央和上海党组织的部署：上海要组织工人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迎接新四军解放上海。按原定方案，沪西棉纺、机器业工人集中在信义铁工厂，准备起义。女工夜校学生汤桂芬、张菊宝、杨善、曹云卿、瞿云秀、马林轩、陈素英、张金娣等纺织厂骨干于8月23日清晨按党组织指示带领群众去信义铁工厂集中。沪东许多工人也来到信义铁工厂。这天，她们待命时，饿了一整天。女工夜校老师王知津、钱琴和我，去信义铁工厂慰问。我叫曹云卿等同学去劳勃生路（今长寿路）买了许多大饼、羌饼，送到信义铁工厂支持他们的斗争。后因故上级党组织紧急命令暂时停止武装起义。围在信义铁工厂的同志就立即改变了口号，提出“要做工、要吃饭”。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了许多夜校的同学，关进了警察局，后通过斗争全部释放。

王菊秀入党后，在长丰布厂发展了十多名党员。1946年。为了改善工人的生活福利，贯彻纺织工人的十八条要求与资本家开展了三天三夜的罢工斗争。她们不怕镇压，斗争很英勇。王菊秀每天来夜校汇报情况。我支持她们的斗

争,并再三嘱咐: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通过斗争,争取最后的胜利。在这些群众性斗争中,党员受到了很好的锻炼,也使我受到教育,学到工人阶级的勇敢斗争,不怕牺牲的精神。

1946年夏天,钱琴老师在夜校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党组织决定她离开女工夜校到新的岗位去工作。因党组织的纪律,我没有问她的去向。她离开夜校与我告别时,我哭了一场。真想与她一起去新的战斗岗位。钱琴是我的良师益友,想不到这次一别,竟成了永诀。直到上海解放后,才知道她在台湾牺牲的消息。我十分悲痛,好长时间的夜晚不能入眠。几十年过去了,现在想起她时,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怀念和崇敬。



“你们是最有希望的”

陈祥珍

1947年，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上海的物价飞涨，生活指数冻结，国民党反动统治对工人、学生进行疯狂镇压。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当年5月，女青年会劳工部干事王知津请来一位外国友人到三和里第一女工夜校做报告，全校学生都集中在楼下教室内开会。教室挤得水泄不通。王知津向同学们介绍的这位外国友人叫文幼章先生。开始我们瞧着这个高鼻梁、蓝眼珠的外国人，怀疑他是不会讲出什么好听的内容。文幼章当时见到我们这些惊愕的女工学生，仍然露出亲切和蔼的神情，面带笑容用流利的中国话深入浅出地分析了当时国内外形势，以他亲身经历滔滔不绝地讲了他生活在四川的情况，亲眼目睹国民党当局高官的种种腐败事实。特别讲到“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停战协议，发动全面内战，破坏和平的罪魁祸首是蒋介石”。当他讲到“我对蒋介石很了解，曾同他一起工作二十余年。蒋介石不是好人，后面还有美国政府支持他”时，说出我们平日想说而不能公开讲的话，同学们感到特别的痛快。当又讲到“你们别以为我是高鼻子，就是美国人，不，我是美国的邻居加拿大人。”会场内立刻哄堂大笑起来。大家对这个外国人的挥洒自如的风度报以赞许。最后，文幼章鼓励我们：“胜利一定属于人民的，希望寄托于你们，今天你们是女工，深受剥削压迫，明天你们是国家的主人，你们是最有希望的，最有前途的新女性。”文幼章先生对我们这些女工寄以如此大的期望和给予这样热情的鼓励，同学们都深受感动。当时我是女工夜校“友光团”主席，主持当天的会议，文幼章先生报告结束后，同学们就上演《要求解冻生活指数》等小节目，并请文幼章先生观看指教。他欣然地同我们一起观看同学们的演出。文幼章先生平易近人，和蔼可亲，那天他的夫人也陪同一起来校，对同学们也非常亲切。会后

与我们交谈，问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及工厂的情况，并且还放映幻灯，介绍他一家成员和加拿大的优美风景，同学们都伸长了脖子，非常有趣地看文幼章放映幻灯片。

这一次报告，同学们议论了好几天，使我们开了眼界，增加了信心，认识到高层次的外国人中，也有进步的民主人士，世界广大人民也同我们站在一起。有些进校不久的同学在校接受教育，特别听了文幼章先生启发性很强的报告后，也较快地提高了政治觉悟，认识蒋介石是打内战破坏和平的罪魁祸首。她们像种子一样，回到工厂里，成了向黑暗努力作斗争的积极分子。文幼章这天在女工夜校的报告，也轰动了学校周围的居民，那天晚上校门外挤满了大人小孩，好奇地要看看外国人。可是这引起特务的注意，在暗中加强监视。劳工部干事王知津和同学们都为文幼章先生的安危捏一把汗，担心他的安全。幸而他是外国人，特务也有些顾忌，无可奈何。

斗转星移，没几年，国民党反动统治被中国共产党推翻。50年代时，当我看到文幼章先生以加拿大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的身份访问中国，报上登载毛主席接见他的照片时，仿佛感到他又来到我们的同学中间，当年三和里女工夜校的演讲似乎余音绕梁。我们心里无比激动，多么想再见到文幼章先生！

1993年秋，上海女青年会副总干事洪倡明女士随同她的先生沈以藩主教（中国基督教协会副会长兼总干事）应邀访问北美，在加拿大多伦多访问时，于同年10月31日上午专程去医院看望了94岁高龄的文幼章先生。文老见中国友人来访，显得特别的高兴，特地将不久前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赠送他的奖章给沈以藩夫妇观看，并同他们合影留念。我们女工夜校的校友也为之特别的高兴。沈、洪二位先生访问后一个多月，文幼章先生不幸病故。与世长辞。当我们听到这个噩耗，都沉浸在特别的哀痛和思念之中。

文幼章先生在白色恐怖统治下，不辞辛劳冒着生命危险来女工夜校做报告，抨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腐败，提高女工的觉悟，对深受三座大山压迫的中国女工寄予深切的同情和厚望，他博学多识的才华、爱憎分明的立场给我们留下了永世难忘的印象。

女工夜校与国际友人

杨杏轩

我是工足袜厂女工，在三和里女工夜校读书时认识上海女青年会劳工部干事王知津和邢泽老师。她们十分关心对女工夜校学生的教育培养，除了课堂学习文化，还注意社会实践的锻炼。1947年，王知津老师聘请我和王菊秀担任劳工部委员，要求我们多参加社会活动，增强社会工作能力。对此，邢泽老师付出了她的辛勤劳动。邢泽老师是1946年底调任女青年会职业妇女部工作，兼任女青年会国际部干事。她经常组织联合国国际友人参观上海的丝绸厂、纺织厂，使他们从缫丝厂童工的劳动状况，看到中国劳工的苦难。她还多次组织他们访问上海女青年会女工夜校，以了解中国工人受压迫、受剥削的惨状和女工们要求解放的心情。到女工夜校参观的美国人较多，他们看到女工夜校的学生学习认真，会看报、识字，关心国家大事，并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成为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大受启发。有位美国朋友在参观了女青年会三和里女工夜校后，对比美国女青年会没有做这项工作而深为惋惜，表示回国后要向家乡女青年会建议，效仿三和里女青年会女工夜校的做法。她们看到女青年会女工夜校教学认真、师生融洽、亲如一家，更是赞叹不已。邢泽老师经常组织国际联谊会友人来校参观，也增强了女工夜校的地位和影响，不仅使女工同学增加了知识面，扩大了眼界，而且使一些反动政客和特务不敢对女工夜校轻举妄动。

邢泽老师还经常组织学生向国际妇女代表团介绍女工夜校情况。1947年，有一次邢泽要我代表女工夜校同学向国际妇女代表作介绍，事先对我说：这些代表来自世界各地，有思想进步的，也有保守的，她们不了解中国情况，只认为中国是不开化的落后国家。工人是没有文化知识的愚民，中国妇女是

任人宰割无能为力的群体。我们要如实介绍，使她们有新的认识。当我走进会议室，有30多位黄头发、蓝眼睛的陌生人，都用好奇的眼光注视着我，从头看到脚，不时发出怀疑的眼神。开始我心里有些紧张，但邢泽老师用英语向代表团介绍我从小做工，自从进了女青年会女工夜校读书，有了文化知识，被工人选举为代表，并为工人的利益而斗争的事迹，使她们对我另眼相看了。然后邢泽老师要我镇静如实地介绍。我立即鼓起勇气，滔滔不绝地把工厂里工人受到的种种剥削压迫，作了全面的介绍。我说：八九岁的乡下小姑娘招进厂做包身工，受尽资本家和工头的欺凌，3年不发工资，每天工作时间12至15小时。吃不饱，穿不暖。有的女工为生活所迫，在车间或厕所里生孩子。男女同工不同酬。妇女生活更为痛苦，广大女工不甘心永远过这种牛马似的生活。先到女工夜校学文化，懂得受压迫受剥削的根源，关心国家大事，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结合起来，做一个自尊、自强、自爱、自立的新女性。我还介绍在工厂里向资本家争取福利，改善工人生活，要求国民党当局停止内战，争取和平民主，反对物价飞涨，要求过安定的生活，为此许多工人纷纷进行示威游行，甚至罢工斗争。不少工人代表为此被捕坐牢，并坚持斗争到最后的胜利。

我每讲一段，邢泽老师就用英语翻译一段，使我的介绍更为生动，博得了全场外国人的赞扬。她们说：原来以为中国女工是没有文化，愚昧落后，生活在黑暗中，无能为力，想不到你们能通过女工夜校学习文化知识，争取妇女自身解放，真是了不起。会议开得很热烈，达到了如实介绍中国妇女状况的目的。在回家的路上，邢泽老师与我都一直沉浸在成功的欢乐中。

有次邢泽老师带我到四川路的新亚饭店，见来自西欧等一些国家的妇女代表团，这次我的介绍已不紧张。情况与前一次相似，介绍后代表们很满意。会后还请邢泽和我在新亚饭店餐厅共进晚餐。通过这两次会议使我懂得我们工人阶级奋斗的解放事业，不但要团结国内各界人士的支持，同时也要争取世界各国朋友的同情和支持，我们要通过一切机会对外宣传，要让更多的国际友人支持我们的斗争。

事隔六十年，至今仍记忆犹新，我很感谢邢泽老师对我的培养。我也很

钦佩邢泽老师的才能，她的英语水平非同一般，她的翻译是很出色的，两次会议中可看出外国朋友很欣赏她的才华。新中国成立后她一直从事外交工作。1980年邢泽作为最佳人选进入联合国担任新闻处长。我从报刊上看到报道她是“联合国的中国女外交官”的文章。邢泽在联合国工作5年多，结交了许多新朋友，每当有人初次相识问起她是哪里人的时候，她都会马上告诉他：“我是中国人。”然后再缀上一句：“我来自中国”。因为中国人还可以来自别的什么地方。邢泽老师在联合国工作时，面临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但她的工作非常出色，得到联合国官员们的称赞，为中国人争光，使中国妇女扬眉吐气。我们也为女工夜校有这样的好老师而自豪。



一堂难忘的启蒙课

包月芬

我因家境贫寒,14岁就从无锡乡下到上海元丰毛纺厂做养成工。一天干12小时的活,还经常要加几小时的小夜班,下工后常常累得不能动。养成工是吃、住在厂里的,人身不得自由,20多个人挤在一间10多平方的房间里,并排三行床,上下铺,还每铺睡两个人。隔20天才让出厂门一次,去买些生活用品。每月的工资只有五六元钱,在当时的物价下,仅够买肥皂草纸。阴沉沉的工厂对我来说就像是一座牢房。工人的生活为什么这样苦?我实在想不通。我多么想去读书,想明白更多的道理。后来我从养成工转了正,比较自由点了,终于在1945年经小姐妹介绍进了女青年会女工夜校。

每天放工后,我就直奔女工夜校上课,老师们辛勤的教育,循循善诱,深入浅出的讲课,使我们的文化程度提高得很快。我敬爱的周琦老师是中级班的级任老师,她总是在课堂上结合我们同学受苦受难的实际生活,讲劳动创造世界的真理。她告诉我们,工人地位低下,生活没有保障,没有读书受教育的权利,妇女更是生活在最底层,这都是因为我们头上压着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听着这些崭新的从未听到过的道理,我就像在黑暗中找到了一盏明灯,老师的讲课就像磁铁一样把我深深地吸引住了。放工后,我常常来不及洗脸就赶去上课,在那里,汲取着精神的力量,使我忘记了一天做工的劳累。

有一次上语文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天,周老师对我们说:“今天是作文课。”同学们都静静地等待着她出作文题,可是她却没有马上出题目,而是问我们:“你们厂的资本家待工人好不好?”这一问,如同一石激水,同学们都争先恐后地抢着发言,诉说着各个厂里资本家压榨工人的桩桩事实。有的说,

老板经常借故扣罚工钱去搞囤积,物价飞涨,我们工人做死做活,也养不了家糊不了口;有的说,资本家不把我们当人,天天进厂要抄身,进行人格侮辱;我也诉说:“在我们元丰厂,工人一天到晚当牛做马,厂里劳动条件差,工人很易得肺病,可是一生病资本家就把你踢出厂外。与我同车间就有两个小姐妹生了肺病,被赶出厂去,名为回家休息,实则是踢出了事。她们回去后,贫病交加,不久就死去。”这样的苦,就是再加上三天三夜大家也说不完哪。我们原只以为是自己厂里的资本家坏,通过这堂生动的诉苦会,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了各个厂的资本家都差不多。这时候,周老师发言了:“大家诉说了资本家压榨工人的罪恶,但如果你是资本家,你会怎样对待工人呢?我今天的作文题就叫——假如我是老板。你们认真想想,怎样想就怎么写,作文下次交。”同学们听了这个题目都很激动,分头回去准备了。

带了这个作文题,我想了很多很多……

我想,我们厂的老板没几年工夫,就从1个厂变成3个厂,老板的钱越赚越多,越来越阔,可他对我们工人仍旧是一毛不拔,死人不管。工人的生活还是那么苦。他开厂的钱哪里来?还不是从我们工人身上压榨来的,是我们的劳动填满了他的腰包。这不就是老师在课堂上讲的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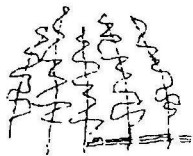
我想,为什么各个厂的工人都是这样的苦,为什么各个厂的老板都是这样压榨工人,这样贪心不足?从中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当老板的就是想多赚钱,要赚钱就要靠剥削工人,谁当了老板都会这样做,假如我做了老板,也会去做一本万利的生意,也会贪得无厌,这是资本家的本质,否则就不叫资本家了。

我又想,这种不合理的事为什么没有人来管,为什么政府不来管一管?我们沪西区毛纺行业工人组织起来游行请愿,要求实行10小时工作制;男女同工同酬;工作时间外,工人可自由出入;厂方应设卫生设备;应办夜校;提高工人待遇等最起码的18条。资本家同业工会在工人游行示威的压力下勉强在谈判桌上同意。但事后许多厂仍不执行,政府并不出来管一管,还站到资本家的一边讲话。我记起了周老师在课外同我们谈话时讲到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是中国最大的资本家,他们掌握了国家的政权,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三座大山中的一座大山,他们怎么会为工人讲话呢。”对!这个政府就是支持老板压迫我们

工人的。因此我在作文中写了：在这种社会制度下，不能期望资本家不剥削工人，只有改变这个社会制度才是我们工人解脱苦难的出路。

作文交上去了，在又一次语文课上，周老师对我们的作文作了一次讲评。她说：不少同学都说，当了老板，就要给工人福利、办夜校、托儿所、食堂等等，这反映了工人对生活的美好向往，但这是不容易实现的。即使有几个资本家开明一点，改善了部分工人的待遇，但不会根本改变整个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老师肯定我的作文找到了问题的关键，把我的作文在班上公开宣读。之后又引导大家进一步讨论了资本家的阶级本质。大家说：“我们不可能当资本家，不剥削工人的资本家也不可能有，资本家只想剥削，工人生活有所改善都是经过工人斗争得来的。”这堂生动、深刻的作文课使我们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更明确了我们的奋斗目标。

40 多年前的这段夜校生活，使我终身难忘，每次回忆，总是在心里升起对这些老师们的深深的敬意。



精神财富伴我前进

张梅芳

我是鸿章纱厂童工出身的女工,1941年进上海女青年会三和里女工夜校读书。在夜校的几年中,从识字开始受到的教育,给我思想上留下深刻的印象,成了我的精神财富。如今记忆犹新的片断:

“劳工神圣”

记得老师在黑板上写下“劳工神圣”四个大字。它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经过老师的教导,我懂得:劳动创造世界。粒粒米饭、件件衣衫、幢幢楼房,都是劳动者创造出来的。劳动是伟大的,神圣的。没有劳动者就没有世界,没有人类社会。可是我们工人、农民辛勤劳动,却没有衣穿,没有饭吃,其原因是创造出来的财富被剥削去了。我还懂得了:劳动人民要靠自己的力量求解放,不是靠神仙皇帝。

还我完整的“桑叶”

老师在教我们识“救国”二字时说:“救”,是由两个字组成的。“求”,加上“文”,组成“救”字。求,首先是求生存、求生活;为求生存、求生活,必须懂道理、求学问,也就是求文化、学文化。所以“求”加“文”便是“救”。救什么?要救国。这给我的印象极深。另一次,钱老师上地理课,她在黑板上画了祖国的地图,像一片“桑叶”。每讲到哪个地方被侵占,她就划掉一块。眼见一块块地被划掉,桑叶越来越小,我的心急得像要跳出来了。内心迫切要求把坏人赶走,还我完整的“桑叶”。还有位老师上课时,又向我们讲了热爱祖国的道理。举了好些事例,使我们知道,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等许多爱国志士,为了祖国强大,自

已宁愿流血牺牲。我的心灵受到爱国精神的熏陶。救国、爱国,在我心中扎下了根,永远永远拔不掉。

歌词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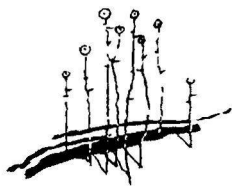
孟波老师谱曲《工人自叹》歌,使我深受教育。这是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阶级教育课;也像是一堂深入浅出的《共产党宣言》般的政治课。它特别形象地描绘了什么是剥削,什么是压迫。以后,在漫长的岁月中,在任何情况下,哪怕是非常时期,走投无路时,我一想起这首歌词的尾段:“拳头捏得紧,大家一条心,造个新世界”,就会想到党的教育和培养,我就有了力量,增添了胆量和信心。还有一首老师教的歌。歌词是:“我和你是少年,精神好,身体健,热热烈烈如朝阳,活活泼泼比春天,踏着光明大道,乘着黄金时代,向着世界大同,勇往直前。”当时也给了我生活、斗争的勇气。唱着这首歌,就会感到生活更有意义。夜校里教的歌,有的紧密配合形势。如老师组织学生参加1946年的“六·二三”反内战游行。我被任命为小组长。一路上我和大家一起高唱:“要求民主,要求和平。大家一条心,大家向前进。我们是青年工人,我们要做国家主人。谁挑起内战,我们就反对谁!”歌词鼓舞、激励我们奋勇斗争。

新的女性

老师一再教导我们:男女要平等,婚姻要自由。女人要自尊,不做寄生虫,秋瑾是榜样。老师组织高级班同学讨论,有时开辩论会,气氛热烈。当时我人虽小,也懂得了其中的道理。我很快联想到我的一些亲戚,她们都是以男人为中心,“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给一根木头就扛着走。”没有自己的尊严,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与人格。这都是封建包办婚姻,使妇女落火坑。我暗下决心要走新的道路;长大后,一定做个有志气的人,做一个新的女性。老师上课时还讲了抗日根据地的一个妇女叫孔瞿英,因为家里穷,以两斗米的身价被卖掉当童养媳。后来参加抗日部队,努力学习,有了文化,成了大家羡慕的一个女兵。以后为革命立了功劳,人人夸她是好样的。我听后深受教育,她的事迹促使我走上革命道路。我还曾写了篇作文《春》,歌颂中国女工积极向上的精神,经奚老师

修改后,作为宣传材料,油印发到各班级。

女青年会女工夜校老师对我的教育培养,实际上也是党对我的教育培养。像我这样的小女工,不识字,天真单纯,本性又心直口快,没有手段和“面具”,更容易受欺负。现在想想自己真是幸运,从小就碰到女青年会里的好老师,从小就受到了党的教育。党培养我在思想上树立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和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这成为我日常生活中的精神支柱。1946年2月19日我由夜校奚宗伟老师介绍入党,从无知的穷孩子成长为中国共产党员。



从觉醒到成长

杜惠娟

1945年的上海,我们工人生活在都市的最底层,过着苦日子。母亲曾意味深长地对我说:“女儿啊!认认真真干活,清清白白做人,找到一个好的男人,跳出工厂,跳出火坑,才是理想的出路。”这些话,是世俗的偏见,还是人间的真情,我没有能力判断。

我一天接一天地做工,发现厂里有些小姐妹一面工作一面读书,对生活、生命、生存的认识别有一功,另成一路。我想跟着她们看个究竟,便也随着她们到女青年会办的第五女工夜校读书学习。

进了夜校,我才知道,那里虽然设备简陋,其貌不扬,学习内容却十分充实。我不但学了语文、数学,还学到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的很多知识,比如:人从哪里来?人类社会如何发展?记得一位姓刘的老师在讲社会发展史时说:“四五千年以前,女人曾经主宰着世界,统治着社会。男人要服从女人的指挥。人们只知道自己母亲是谁,而不知道父亲是谁。”这使从小就被灌输着“男尊女卑”思想的我,更提高了进夜校学习的兴趣。

经过老师的教导,我逐步懂得:劳动创造人、创造世界,劳动者最光荣;男尊女卑并非天经地义,女人并非生来是“下贱胚”,男女应该平等;女人不要依赖男人,女人要参加劳动,要自尊、自强、自爱、自立。这时,我已经明白,母亲说的跳出工厂,嫁个好男人才是理想的出路等并不对。

聂梅励老师告诉我:“为什么创造世界的劳动者这样痛苦,吃不饱,穿不暖?这都是地主、资本家、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剥削与压迫造成的。我们的劳动果实被他们剥夺了。我们应是世界的主人,现在却成为社会的奴隶。”通过一两年的读书学习,我进一步认识到:即使打败日本侵略者,取消帝国主义在上海的租界

统治,仍然是官僚、地主、资本家的天下,我们劳动者尤其是劳动妇女仍然没有好日子过。工人要翻身,妇女要解放,必须首先推倒压在我们头上的三座大山。如今的社会,我们穷苦的妇女受到更多的压迫,更多的束缚。我立志要充实自己,解放自己,为革命、为妇女解放而斗争。于是,在夜校,我逐步确立了革命的人生观。夜校又组织我们看《祥林嫂》、《大雷雨》、《乌鸦与麻雀》等进步电影,参加反饥饿、反内战等社会活动,我的认识和觉悟也不断提高。

思想上觉醒,行动上便有所表现。在厂里,我敢于为工人讲话,敢于同资本家作斗争。有一次,厂里要开除一名女工,我出头为她说话,并和全厂工人一起,为改善生活罢工四天四夜,最后取得了胜利。还有一次,有些工人到厂长室要求准时发放工资,被资本家及其走狗赶了出来。工人们叫我去评理。我到厂长室对厂长说:“现在物价飞涨,一天变几变,工人生活全靠这一点工资。你们知不知道工人不按时拿到工资要饿肚皮?!你们为什么要扣下我们工人的血汗钱?”

资本家发现我这个小姑娘敢于斗争,就想办法加害于我。

这时是1948年夏季,一天下午,放工后我走在离厂不远的河间路桥畔,资本家暗中指使一批小流氓,把预先准备的一盒大粪,没头没脑地抛在我身上,然后逃之夭夭。当时,经过夜校的教育培养,我已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党领导当夜派人找我研究对策。提出我是否要离开上海,以免受到进一步迫害。我认为此事的发生是因为资本家恨我触犯了他们,对我进行报复,我的党员身份并未暴露。如果我就此离厂,正合了资本家的心意,会造成他们的胜利感而更嚣张地加害其他同志。我要坚持斗争,照常上班。党领导同意我的意见。第二天我仍旧上班。资本家在群众中造谣,说:“这个小姑娘的男朋友之间争风吃醋,才抛粪给她尝尝。”以后又威胁说:“如果她再来上班,要把她推到苏州河里淹死!”妄图赶我出厂。我不怕,也不予理睬,继续上班,资本家的诡计失败了,他们对我也无可奈何。我在该厂工作直到上海解放。

感谢夜校，感谢老师

王亚姑

我是女青年会第二女工夜校毕业的学生，时间虽相隔 50 多年，许多往事仍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记得我初进夜校，开学第一天，在戈登路（今江宁路）女青年会的大礼堂里，挤满了来自各厂的学生。热心于教育事业的王知津校长对大家说：“日本人侵占上海以后，30 年代蓬勃兴办的浦东、沪东、沪西、沪南、闸北的各所夜校，都被迫停办，只剩下了三和里一所。现在抗战胜利，为了满足青年女工们求知的愿望，经全国协会劳工部主任干事邓裕志先生的支持和社会各方面的资助，我们的各所夜校又相继复校了。各个夜校与一校一样，分高、中、初三个班级，望全体师生通力合作，办好我们的夜校。”接着她分别介绍了各个班级的级任老师。

我们的级任老师是黄纫秋。她短短的头发，穿一件深蓝色旗袍，穿着一双布鞋，红润健壮的脸庞，说着带浙江海宁口音的普通话。她告诉大家：曹家渡一带报名的同学多，好不容易才找到了校舍。由于大部分同学来自各个纺织厂，要上日、夜班，因此，如果同学们晚上来上课有困难，欢迎大家白天来补课，不要怕缺课多跟不上。老师这番话送到了我们的心坎上，感到老师们为了我们读好书，想得真周到。当时我们这批文盲和半文盲的青年女工，多么需要文化、需要有人引导和鼓励。进了这所充满民主气氛的夜校，又见到和蔼可亲的老师，大家心里感到无比的欣慰。

黄老师讲的语文课《秀英的信》，给大家的印象很深。黄老师说这封信是秀英向父母倾诉苦难生活的家信。秀英在农村受地主的折磨和压迫，逃生来上海做工，哪知做工还是受东洋老板的剥削和欺侮。为什么东山的老虎要吃人，西山的老虎也要吃人呢？因为我们工人和农民都是被剥削者，是一根藤上的两个苦瓜。秀英苦，不是她的命苦，而是由剥削阶级的压迫所造成的。听了这一课，我思想上豁然开朗。对！我们工人受苦受累，吃不饱，穿不暖是因为受帝国主

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的压迫、剥削，不是我们天生就命苦。

黄老师结合上课，给我们讲苏联的故事。由列宁、斯大林领导工人阶级起来革命，推翻了沙皇的反动统治，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翻了身，成了国家的主人。老师还组织我们到杜美电影院（今东湖电影院）看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等。这种形象又生动的教育，不仅提高了我的文化知识，还指引着我前进的道路，使我懂得了革命的道理。因此我不论刮风下雨，严冬酷暑，虽然白天做了12小时很累，还是天天坚持到夜校上课，即使是夜班做出，觉也不睡，第一件事就是去夜校补课。有时下课晚了，黄老师为了我的安全，就叫我住在她们的宿舍里，两个人挤在一张小床上，她像爱护自己女儿一样，关心体贴我，我心里觉得无比温暖。我把黄老师看作自己的亲人，不论有什么想法，或者遇到什么问题，总是求助于黄老师，把自己的命运紧紧地与夜校连在一起。

夜校还教我们许多振奋精神的文娱活动。如教我们唱歌的茹伟老师，他的歌声豪放，富有艺术感染力。他教会了我们很多进步歌曲，例如《团结就是力量》、《山上的荒地是什么人来开》等等。这些歌曲唱出了我们的心声，激发热情、鼓舞斗志。有的歌曲我们还带到工厂里，教工人们唱，在罢工斗争中唱，唱起了“我们是兄弟姐妹。大家团结在一起，不分你，不分我，手拉着手把路来引”，促进团结，鼓舞斗志，显示力量。几十年过去了，这些歌曲仍然在我耳边回响，有的歌我还能一字不差地唱出来。

教我们演戏的是强明老师。他第一次到夜校来时，身穿草绿色青年装，头戴大沿帽，脚上的皮鞋声咯笃咯笃响，神气十足。开始我们还以为他是来监视我们活动的，可他在排练节目时，却是那么平易近人、认真细致。在教陈美玉演“王大娘补缸”时，他自己先扮演一次，又唱又扭地示范，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有的话剧和独幕剧，还是他亲自编导的，如李志英、徐素珍、徐惠珠演出的《受压迫的女工》，在演出中引起台下观众流泪，使大家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强明老师排完节目，常与我们闲聊。他叙述从小在重庆儿童团生活、在文艺界工作等情况，侃侃而谈，使我们受益匪浅。

我们这批青年女工，白天分散在各个工厂里，受气受累，一到夜校就完全不同，一天的劳累，随之消散了，扭秧歌，演活报剧，歌声此起彼落，异常活跃，真正感受到民主、自由、团结、博爱的幸福。

每当想起夜校的读书生活情景，我总是从内心感谢我们的夜校，感谢老师的栽培。

一次生动的辩论会

唐永珍

在一次女工夜校的周会活动上,奚宗伟老师组织我们同学开辩论会。要求把同学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人代表工人讲话,一部分人代表资本家讲话。辩论的题目是:“穷人是不是生来命穷、命苦?工人罢工是不是捣蛋、破坏生产?”

当时是1948年,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民不聊生,工人罢工此起彼伏。辩论的题目与我们工人的命运密切相关,也是有些工人仍然认识模糊的问题。大家都很有兴趣。虽然谁也不愿代表资本家讲话,但为使辩论会开起来,通过辩论提高认识和发言能力,在骨干的带头下,有些同学还是参加了辩论中资本家一方的一边。

辩论开始,代表资本家的一名学生首先发言。这是比较容易的。她把大家经常听到的,厂里资本家说的一些话搬出来,振振有词地说:

“工人应该好好工作,好好生产。如果罢工,工厂生产不好,工厂关门,你们工人到哪里去工作?哪能生活?哪里来饭吃?”“工厂生产好了,你们工人有工做,有饭吃,能活命。工人罢工捣蛋,工厂关门,你们工人只好饿死!”

虽然明明知道这是假扮“资本家”讲话,同学们听了也不由气愤。工人一方马上有人严加驳斥:

“我们罢工不是捣蛋,是因为物价涨,生活指数不提高,我们工人还是拿这点工资,我们全家人不能生活下去。你们资本家吃鱼吃肉,花天酒地。我们工人苦粥苦饭也吃不饱……”

“是啊!现在物价一天变几变,我们的工资照旧,哪能活得下去!你们资本家不顾我们穷苦工人的死活!”……

工人一方接连几个人发言。

“苦,是因为你们生来就苦,你们的命苦,怨不得别人!”一名“资本家”代表分辨。

“我们工人不是天生命苦!”一位同学大声道:“我们穷是因为辛辛苦苦赚的

钱,被你们资本家拿去了……”

许多同学听了点头。她们在夜校学过这个道理。

可“资本家”代表又即刻辩解:我哪里拿过你们的钱?你们做多少就按规定付给你们多少工资嘛!

.....

就这样你来我去的,同学们都认真、积极地发言。一次周会结束不个星期的周会继续辩论。这时,虽然好些同学更加清楚,我们工人穷苦是受了资本家剥削;但也有同学迷迷糊糊,觉得双方似乎都有道理;个别是感到,我们工人的确是生来命苦,也不要再去怨天怨地了。

第三个星期的周会,奚宗伟老师作了辩论会的总结。

“我们工人穷苦是不是命里注定的?不是!”奚老师亲切地望着大家说人穷苦,不是由于我们人人生来命苦,而是因为我们国家的社会制度,是为劳的。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使得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大家看过十月革命,改变了这种社会制度,穷苦工人的生活不就起了根本的变化!成为国家的主人,过上了好日子。难道可以说,他们是生来命苦的吗?资本人生来命苦,是妄想要我们工人心甘情愿地一直受压迫、受剥削。”

同学们静静地听着。奚老师又说:“我们工人罢工,不是捣蛋,而是求生存、求生活的改善,是为了要回一些本来应该属于我们工人的钱。”

而后,她用数学计算的方法,说明一个厂的工人一天生产的产品值多去一部分生产成本费用,此外都是工人新创造的财富;资本家给工人的工工人创造财富中的极少一点点,其余都被资本家拿去了,剥削去了。正因为原因,资本家的钱才会越来越多,才会从原来的小厂变成大厂,从一个厂变厂。所以,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生活,完全是合理的,天经地义的。

最后,奚老师语重心长地告诉大家,工人一定要团结起来斗争,才能有活的改善,才能改变现在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由于经过辩论,经过各人自己思考,对奚老师这些既深刻又通俗的

从胆小女工变为革命战士

陆宗桓

进了所特殊的学校

1946年6月,我经人介绍,从家乡无锡到上海寅丰毛纺厂做工。当时我才17岁,人地生疏,一下子从家庭踏上社会,很幼稚,还特别怕难为情。我做工、吃、住都在厂里,连厂门口都不敢出。

可我很想读点书。1947年初,由同厂小姐妹陈祥珍介绍,我进了女青年会第一女工夜校。因我在抗战前读过两年书,就插入高级班。

一开始,我对女工夜校的教学方法不习惯。总以为应该像我小时候进的学校那样,老师完全按照教科书宣读和讲解,学生一句句地跟读和听讲。而这所学校很特殊。老师讲课是从书本上的内容延伸开去,联系当前时事形势来讲,同时还组织了许多课外活动。开始我担心会影响学习的进程。但过了些时日,我发现这样不但有助于我们学生加深对课程内容的理解,而且可以举一反三,通过联系社会实际和参加活动,使我们增长知识和才干。

当“友光团”主席

于是,我读书格外用功,上课更加专心,学习成绩越来越好。同宿舍的小姐妹也夸我说:“陆宗桓进了女工夜校,进步像飞一样快哩!”通过一段时间课外活动的锻炼,我居然也不怎么怕难为情了,而且逐渐地活跃起来,成为夜校学习和参加活动的积极分子。不久,我竟被同学们推选为第一女工夜校的“友光团”主席。

自此,我更注意在学习和参加活动方面起带头作用。我协助老师做课外活

动的组织工作,主持好“友光团”的联席会议,组织好女青年会各所女工夜校同学的学习经验交流会等。我每天一放工就往夜校跑。

夜校的课外活动一般通过“友光团”进行。内容丰富多彩。在老师指导下,我们组织同学阅读、讨论进步书籍;学唱民歌、跳民族舞和集体舞。还组织同学接触社会,如参观《申报》馆,了解一份报纸的出版要经过许多人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参观盲童学校,了解盲童的学习与生活,使我们亮眼人感到自己更应努力学习,做一个有知识、有觉悟的人。

政治思想上的启蒙

老师上课讲授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等作品时,介绍鲁迅的为人,突出他“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高贵品格;启发我们去探究工人、农民做死做活还不得温饱的原因,开导我们懂得团结起来就是力量,用这个力量去摧毁人吃人的制度,推翻不合理的社会。我们还在老师带动下,参加社会上的进步活动,如参加以“反饥饿、反内战”为主题的交通大学学生晚会,慰问被打伤的同学等。

1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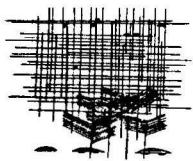
我的觉悟日益提高,夜校老师对我也更加关心。特别是黄少平老师对我的教育尤为认真、细致,处处关心我的进步。我也每个星期天到她的宿舍去,听她讲时事。有时她还对着地图说当时的解放战争形势,揭穿国民党的骗局。

有一次,我向黄老师暴露了一个思想。我认为人生在世,光是吃得好、穿得好没啥意思;做人要做一个有学问的人,不被社会遗忘的人,这样才有意思。黄老师听了,当即提出两个问题:什么是最有意思的?什么是没啥意思的?要我回去想好了告诉她。为此我苦思了好几天。后来听一个同学讲:“将来,我们工人翻了身,当了家,什么地方都可以去,那才真有意思呢!”我觉得有道理,便去告诉黄老师。黄老师进而开导我说:我们不能只顾自己有学问,自己安身立命,而是要想到大家,想到我们的阶级兄弟姐妹,要团结许许多多的工人一起来推翻这个不合理的社会,建设工人当家做主的新社会,让工人都过上好日子。我听了很受启发。

监狱中的锻炼

之后我更自觉地参加各类活动。除“友光团”活动外,我还参加学校招生工作,现身说法,把在夜校学到的知识讲给厂里的小姐妹听,动员她们到女工夜校读书。并经常把老师对时事形势的分析转告给她们,给她们讲进步杂志《展望》中登载的解放区故事等。1948年春,在本厂工人争取年终奖金的饿工斗争中,我挺身而出,向厂内厂外宣传,团结厂内小姐妹,向资本家作斗争。

1948年11月,国民党特务把我作为共产党嫌疑分子逮捕,在黄浦警察局关了近两个月。我当时并不害怕,也一点不后悔。我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应该做的。那时我还不是中共党员,警察局查不出我有什么问题,加上群众的压力,只得把我放了。经过监狱生活的锻炼,我变得更坚强,终于在1949年3月,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我从一个不懂事的,胆小怕羞的小姑娘,自觉成长为一名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战士。



人生道路上的转折点

薛文君

我出生在一个小手工业者的家庭。自幼跟随祖母、叔父生活。由于家境贫困,念完小学5年级,因拖欠学费不得不中途停学,进了上海金蕾烟厂当了扯烟叶的女工。

1947年初,一个偶然的的机会,经同厂姐妹的介绍去女青年会第四女工夜校报名求学。想不到一年半的读书生涯,竟成了我人生道路上的转折点,使我从一个普通的女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记得报名的那天晚上,接待我的是后来教我的张华老师。她问了我一般情况后,突然问我:“你认为做工坍台不坍台(坍台即丢面子的意思)?”我说:“又不是去偷去抢,做工有什么坍台的。”她微笑地点点头。这短短的几分钟接触,使我感到夜校老师与我在小学时遇到的老师不一样,很和气,有一种亲切感。

不久,便开学上课。每当放学回家,我总是与张老师同走一段路,边走边谈心。她经常关心我家中生活,也常常问我厂里做工的情况。我告诉她,我们叶子间的工作是将烟叶上的筋往下扯,以烟筋的重量(以磅为单位)多少来计算工资。烟叶有好有坏,好的筋粗量重,次的筋细量轻,垃圾多。为了这个缘故,平日相处很好的姐妹们,甚至刚才还互相说笑着,但只要男工们把烟叶,特别是好的烟叶往桌上一倒,两边的姐妹便蜂拥而上,拼命把烟叶抢往自己身边。这时为了多挣几个钱,什么面子、友谊都不顾了,相互争吵着、骂着。我有时也抢,可我抢不过她们,我不与她们争吵,尤其不会骂人。姐妹们说我老实,个别的嘲笑我是清高没饭吃。每次遇到这种情形我心中非常苦恼。另外,男工们的调笑辱骂,也是我们最反感的。每天放工,资本家叫亲信在门口搜身,把我们工人当

贼,又使我非常气愤。张老师听完我的诉说后,总是耐心开导我,要我多同周围姐妹交往,把自己的想法和知道的东西对她们讲讲,并启发我要多用心想想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

平时老师除上课之外,还经常把夜校有些姐妹们与资本家斗争的故事讲给我听,还给我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母亲》、《我的儿子》、《升官图》、《祝福》等书籍,带我去看《列宁在一九一八》等电影,参加各校“友光团”的文艺活动,使我扩大视野,受益不浅。我懂得了受欺压的不仅是我,所有的工人都同我一样受压迫;懂得了我们工人只有团结斗争,才能求生存的道理;懂得了世界上有为劳苦人民做事的勇敢的好人,他们有不怕死的牺牲精神,这些都是我在夜校中获得的。因此我对夜校、对夜校老师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亲切、温暖,给人以向上的力量,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我,一天不去夜校,我像丢了什么似的。故一年半来风雨无阻,天天到校。

有一次,我们叶子间为了要求厂方增加夜班点心钱,一位姓叶的阿姨挺身与资方进行斗争,结果我们得胜了,那位叶阿姨却被厂方开除了。当我领到夜点心钱时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我恨资本家不讲理,随便开除工人;恨同车间的女工为啥不出来讲活;也恨自己没办法,不知怎样帮助叶阿姨不被开除。当晚我把此事告诉了张老师。她说叶阿姨是勇敢的,做得对的,但是同资本家斗争要注意方法,要团结大家一起斗,不能单枪匹马。又一次,我们叶子间一连有好几个姐妹被工头罚磅。事情是这样的:我们每天完工过磅时,要过一难关,就是工头要检查你是否扯得干净,稍有一点叶子留在筋上,必须重扯。而且在检查时,她怕烟筋上的刺刺痛手,要我们自己把箩内烟筋翻松。如有人平时得罪了她,她就借此告诉过磅先生罚我们的磅,一罚就是3—5磅,我们一天工作手脚最快的可扯27—28磅,普通都在15—20磅左右,最少的仅10磅左右。经过她这一罚收入就减少很多,因此我们早就想整一下这个可恶的工头。于是我与几个年纪较轻比较要好的小姐妹商量怎样同她斗争,再分头与大部分小姐妹联系好。我们决定检查时大家都不翻松,让她自己翻。大家商量出了3条:第一,要有一个不被她和厂方抓住话柄的正当理由,那就是:我们一天工作做下来,手指已经痛得很了,检查烟筋是

工头的事，应由她自己动手翻，而且这样也可防止我们工人舞弊了。（因她有时说我们故意把清洁的一面翻给她检查）。第二，必须团结一致，不可中途变卦，否则我们就不能成功，以后仍旧受她的气，受她的罚。第三，谁排在第一位？对此大家都犹豫不决。这时我就说我来排第一位，我堂妹排在第二位。虽然冒着被开除的危险，但我想只要我们一条心，厂方和工头也就没有办法了。大家还有意把箩内的烟筋踩得结实一点，让这个工头吃点苦头。放工了，我们按照商量好的去做，工头叫我翻，我不翻，她又叫第二、第三个翻，大家异口同声要她自己翻。这样僵持了半小时，双方都不动手。后来她把副厂长叫了出来，我们一齐把我们的理由反复地讲。她看到我们是有准备的，副厂长无奈也不好支持她，就只好自己动手翻，我们得胜了。这胜利今天看来是小事一桩，可当时这个小小的胜利使我们这些年轻姑娘心中充满了喜悦。大家高兴得接连好几天都在讲这件事，互相间更亲热了，我自己也从中更加体会到老师教导我们团结才有力量这一真理。

某天晚上，上课铃响了好几分钟，还不见张老师来上课，大家十分焦急，因为张老师是从来不迟到的，莫非路上出了什么事？不一会，只见张老师气喘吁吁地上楼来了。一进教室就说：“今天我先讲一件事给大家听”。于是她给大家讲述了当天梁仁达同志在劝工大楼的一个集会上，针对市场上充满美国货，而国货滞销，呼吁大家抵制美国货提倡用国货，竟遭到国民党特务殴打致死的事件。同学们都屏声息气地听着。说毕，老师出了两道作文题，第一道内容是给梁仁达夫人写封慰问信。第二道是“提倡国货，抵制美国货难道有罪吗？”我选择了后者做了一篇作文。这件事使我进一步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派是勾结美帝国主义、卖国求荣的政府。我们工人要过上好日子，必须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

毕业了，老师在我签名纪念簿上写了这么两句话：“路是人走出来的，我们女人的路要靠我们女人自己去走”。我当时立志。以保尔·柯察金和《我的儿子》一书中的女游击队员为榜样，要做像汤桂芬大姐姐那样的人，走为劳苦大众服务的路。幸运的是我终于找到并走上了这条光明的路，我感谢为我指路的张华老师，我也深深怀念哺育我成长的女青年会女工夜校。

情同手足的引路人

丁巧玲 李爱珠

奚宗伟老师是我们班的级任老师，1945年9月，她到三和里女工夜校当老师，聪明活泼，教书认真，一直深受同学们的欢迎。当时钱琴老师戏称她为“小弟弟”。钱老师也是我们敬仰的好老师，大家亲切地称她为“外婆”。她对奚老师影响很大。自钱老师在1946年离开三和里女工夜校后，奚老师继承钱老师的好传统，对我们这批女工同学特别的关怀。由于奚老师待人热情奔放、思想活跃、又能歌善舞，深深吸引了女工学生，至今我们仍有许多难以忘怀的故事。

爱憎分明支持女工斗争

201

奚老师在女工夜校工作的几年内，几乎跑遍了沪西所有女工同学劳动的纺织行业工厂，例如棉纺业申新二厂、织布业的长丰布厂、毛纺业的寅丰厂、工足袜厂、丝绸业的大成绸厂、印染厂等都留下她考察的足迹。当她在长丰厂闷热、潮湿的车间里看到女工同学进行繁重的劳动，在空气混浊的宿舍里看到大家艰难生活时，已不难想象会发生女工闷死在车间的惨境，她发自内心对工人阶级的苦难抱以同情，憎恨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压迫剥削。当从女工同学处了解到寅丰毛纺厂进行饿工斗争时，毫不犹豫地支持工人的斗争，她与同学们一起买了许多食品慰问、支援工人斗争。她在课堂里，亲口对我们说：“我在工厂的所见所闻，使我深深认识到这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我们一定要推翻它。”同时她也看到女工同学团结战斗的精神，她说：“我到工厂去，也是向工人学习，也是一次锻炼，这比我在女工夜校之处所受教育要深得多。”

为李爱珠解除婚约

1946年，奚老师发现班里的学生李爱珠闷闷不乐、愁眉苦脸。课后她主动找李谈心，才知她为家长的封建包办婚姻所苦恼。原来，她在夜校受教育后，有了强烈独立自主的意识，反对父母将她许配给一家茶馆店的小开。父母虽知女儿的心意，但因已收受了茶馆老板的聘礼，碍于男家的权势，已无法解除婚约。奚老师了解实情后，立刻与钱琴老师商量对策，决定与著名的女律师史良联系，并写了介绍信，在同学李亚芳、孙立陪同下，与李爱珠一起到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的史良寓所。史良听了李爱珠的诉说后，胸有成竹地对李说：“请放心，这是小事，我一定会帮你解决的。”

事后，史良律师立刻亲笔写信给茶馆老板，为李爱珠提出解除婚约的法律依据。老板接到大律师信后很害怕，怎么也想象不出一个无权无势的贫穷女工竟会请到大名鼎鼎的大律师，不敢再强行逼婚，答应解除婚约，但又提出要追回全部聘礼。

老板这一招，果然又把李爱珠全家难住了。聘礼是几年前收受的，因为家穷，早已贴补家用告罄了，现在哪里能凑钱还债呢？奚老师知悉后，又发动女工夜校师生进行募捐，奚老师自己也典卖了大衣，终于还清了这笔债。师生们为李爱珠同学获得自由而欢庆。

社会活动积极组织者

奚老师十分关怀女工同学的社会实践活动。1946年12月24日晚上，圣诞节的前夕，北京大学女学生沈崇被美国兵强奸，在全国掀起抗议浪潮，上海交通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等17所学校成立上海市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举行全市性的抗暴示威游行。奚老师带领同学投入这场轰轰烈烈的抗暴斗争，上街游行，组织同学写抗议书，投稿给《文汇报》，使同学们受到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1947年5月，国民党反动派面对重重的经济、政治危机，坚持打内战，民怨沸腾，夜校师生又投入全国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

奚老师组织同学到交大等院校参加声讨会，到红十字会医院（今华山医院）、中山医院慰问被打伤的大学生。当工厂进行罢工斗争时，大中院校学生也纷纷到工厂慰问，支援工人斗争，在这相互声援和支持的氛围下，女工夜校成了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阵地，这些活动都凝聚着奚老师辛勤组织工作的心血和汗水。

我们的革命引路人

女工同学参加工厂罢工而被开除，失业给生活带来极度困难。奚老师十分关注女工同学的实际困难。在长丰布厂做工的同学李亚芬被开除后，奚老师及时通过同学陈祥珍的介绍，让她进寅丰毛纺厂做工，解了燃眉之急。因罢工被开除的女工同学还很多，奚老师便通过女青年会劳工部干事王知津的关系，搞来一批毛线，发给每个失业的同学暂渡难关；有些被工厂开除的同学，无家可归。住宿有困难，在奚老师的安排下，到三和里女工夜校借宿；刘学群老师、陈祥珍同学患了伤寒症，奚老师家访慰问。奚老师更是从政治思想上关心同学的进步和成长，经常带同学观看苏联电影。她多才多艺，还通过自编自演的歌曲来教育我们。当我们工人生活越来越困难时，她就教唱《活不起》。当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出现通货膨胀，民不聊生时，又教我们唱《五元钱的钞票没人要》。在上海解放前夕，奚老师又教我们学唱《亲爱的朋友》歌。

奚老师就是通过这些生动活泼的歌曲和社会活动，对我们进行潜移默化的政治思想教育，使我们跟上社会进步的步伐，投身到人民的解放革命事业中去。我们不少同学在奚老师的帮助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舞台就是战场

强 明

1946 年秋,正是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双十协定》处心积虑向解放区进攻之时,黄静汶大姐介绍我去三和里女工夜校教戏剧。当时我在电影制片厂当演员,厂里环境十分复杂,不少演职员都与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大队那帮凶神恶煞的人物有来往。我和这些“同事”有一年多的“厮混”,总算被他们认作“自家兄弟”。而夜校地处沪西重要枢纽小沙渡、曹家渡的热闹中心,那一带工厂多,工人运动常在那一带爆发,故也引起国民党军、警、匪、特的特别“关照”。为掩人耳目,我决定打扮成国民党少校军官的模样去上课,并为此特请黄静汶大姐向已见过一面的夜校校长邵漪容大姐打个招呼。

204

第一次与同学们见面

我清晰地记得第一次与同学们见面的情况。邵大姐向大家介绍我姓名的时候,同学们只是礼貌性地鼓掌,大家脸上都带有疑惑和微微惊讶的神情。直到她说:“强老师是电影演员,上个月还在兰心大剧院演话剧。”气氛才活跃起来。窃窃私语有了,笑容也有了。邵大姐的介绍,一下子把同学们与我之间的隔阂消除不少。

我就势“闲谈”了这第一课。我谈了前两个月演出的《升官图》、《新官上任》、《春寒》等话剧。从大家的表情看,没有同学看过这几出话剧,但从她们急切追问剧情中,又感到她们对戏剧艺术的热切爱好。这第一课的“闲谈”,既是我向她们的“交底”,又是我向她们“探底”。我心中暗喜。为我所担心的这身“老虎皮”(军装)可能引来的芥蒂竟能这么快地消除而受到鼓舞。

虽然在此之前,我曾为专业团体辅导过戏剧,也专门上过表演课,但这次面

对的是同以往决不相同的群体。尽管邵漪容大姐明确交待我是教戏剧,但我不能把表演那些基本原色,什么“听”、“反应”、“接得紧”等等按部就班地来设计课程,我必须找到收效快的捷径。首要任务是深入了解同学们的思想实际和她们的喜怒哀乐。这方面我得到了邵大姐和王知津、黄纫秋、徐林、樊雯、茹伟等老师的许多帮助。

为同学们编写剧本

我每次去夜校都提前 20 分钟或半小时,在二楼那间教师备课改作业的房间和老师闲谈。通过老师们的介绍,我逐渐对同学们有所了解。特别是女工同学们的精神使我深受教育和感动。如,同学们普遍都要在工厂里劳动 10 到 12 个小时,有的还有家务拖累,但都坚持到夜校,即使上夜班,也仍然带着困倦的身体来上早课。又如,只要听到有一个“小姐妹”有困难,即使大家也很困难,都自动地前去帮助等等。这些都成为我以后两年多来在夜校授课和创作的源泉和动力。从此开始,我心里有了一点“谱”。我以他们的实际生活为基础,设计了一些小品,如,一个女工从床上起来,带着惺忪的睡眼看了一下闹钟,见时间还早,笃悠悠,漫不经心地把课本文具塞进布袋里,然后往冷饭里倒开水,就一碗剩菜开始吃起来……她又看了一下钟,呆住了,原来闹钟停了。她看看窗外,天已黑了,她急得什么似的,放下没吃完的碗筷,拎起书包就疾奔出门。又如,一个女工天不亮就起床,忙了一阵,刚想出门去上工,忽然想起今天是“厂礼拜”。拧了自己一下,自我解嘲地笑了等等。这一类小品容易设计,因为我在抗战前一年,也在纱厂当过童工,有这方面的生活体验。但对邵大姐、王知津等和我谈起的女工同学遇到的婚姻苦恼,却使我难以设计,而且总不能以小品这种初级形式来排练,现成的适合女工演的反封建婚姻的剧本又没有。

这时,我突然想起曾为一个大学学生会导演过俄国的名剧《求婚》。我想以这个戏为框架进行改编是有可能的。于是,我改编了这一名著。我设计一个女工,在母亲逼迫和媒婆纵容“要嫁一个有钱人”的情况下,十分不愿地接待三个求婚者——一个戴着礼帽的秃头;一个总不愿意让人看到背面的驼背;一个是瘸子。由于这位女工的机智,三个人原形毕露:如有意从桌上挪掉一支笔,秃头

低头去拣,礼帽落地露了馅等,使求婚者,也使母亲和媒婆尴尬并引发了彼此的埋怨。这个戏在女青年会内部演出后取得一定的效果。在反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强调婚姻自主方面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求婚者》是我给同学们排练的第一个短剧。以后,还依据和同学们交谈中得到的真实事例,加以构思和发挥,编导了五六个短剧。我仅记得其中几个戏的梗概:一个是以悲剧样式写的《苦中苦》,一家三口人,婆婆瘫痪在床(不出场,仅以唤声效果出现),丈夫患肺病,一副重担落在妻子身上。妻子告贷无门,实在无法,受到在舞厅做杂务工的邻居大嫂之劝,借来印子钱(高利贷)买了件旗袍,去舞厅当舞女,对丈夫谎称是帮人家晚间带孩子。因为对人格的自重,不愿赔笑,收入甚微,却要受舞场老板和“大班”层层盘剥;还要忍饥挨饿带点鸡头鸭脚供婆婆和丈夫“营养”。不料当舞女的事被丈夫发觉,丈夫咒骂甚至动手殴打。吵声惊动邻居大嫂,劝说不止。大嫂也动了火,不仅诉说了妻子为全家的生计,忍辱负重的经过,还痛斥丈夫的“无情”。最后夫妻俩抱头痛哭。

另一个戏叫《花棉袄》,是以悲喜剧的样式写的:一家人家,夫妻两人。妻子是纱厂女工,已经快临产了,还要拖着肚大如鼓的身子操持家务;最难办的是孩子快出世,连一件为孩子御寒的棉袄都没有。丈夫有文化,因失业而不得已去拉黄包车。寒冬腊月,风雪交加,妻子指望丈夫能赚点钱回来,却见丈夫穿着祖上传下来的破棉袄,浑身积雪空着手回来。正在这“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的极度困难时刻,一群小姐妹风风火火地拿着一件用五颜六色布缝成的“花棉袄”送来了。尽管岁月艰难,但人间自有真情在……

其他,如编写了《更生嫂》、《不识字的苦》、《失业》、《女工的控诉》等几个短剧。这些戏虽也反映了当时的现实生活,带给人们希望,但总感到游离于生活真实之外。

在夜校演出《屏风后》

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完全撕下了“民主”、“和谈”的遮羞布,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我个人生活也起了重大变化。

演员。同时,在与女工同学的接触中,我隐约地感到,她们似乎已经参加到社会上重大的群众运动中去。我十分敏感地觉得自己落在群众的后面。我必须找到一条“切中时弊”的创作道路。于是,我又创作了《屏风后》。故事梗概是一对夫妻分别藏匿2个因参加罢工运动而被警察追捕的人。开场,远处警笛呼叫,妻子慌张地领来一个女人,想了想说:“跟我到灶披间去”(下场)。稍顷,丈夫也领一个男工上场,本想也把他藏在灶披间,向里一望,妻子在里面,慌张之间,把男工藏在屏风后面。这以后是夫妻两人向对方作试探性的对话。妻子机灵,常用反义词作答。丈夫耿直,听妻子说“闲事少管,免得惹火烧身”大为生气,以正面的道理教育妻子,诉说物价天天涨价,工人生活苦,工厂不加工资,工人实在逼上梁山才罢工,批评妻子“没良心”……接下来就是一段碰着“黑狗”(警察)要抓他们怎么办的对话。最后两人思想得到统一,彼此亮出了底牌。夫妻俩充满自信地在商量着。(灯暗,闭幕)

说实话,我当时写这个戏的时候颇为“自鸣得意”,彩排时,同学们也都满意,不时发出会意的笑声。可我已经记不清楚是邵大姐还是王知津找我以闲聊方式谈了一次。她们先是鼓励,接着提示说,现在警察局最怕最关心的就是工人罢工……我当即意识到这样写将会引起后患,于是这出《屏风后》仅在夜校内演出了一场就此“封箱”。

与同学一起磋商剧本

正是由于这次教训,我探索着另一条路,一条在“狼窝”里既不被狼吃掉,而又能战胜狼的斗争道路。我记起曾在重庆育才(学校)实验剧团演出过的《王大娘补缸》。那是在抗战胜利前演出的。内容和唱词是根据当时的形势和要求编的。现在可以根据现今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和腐败的需要重写内容,所谓的“旧瓶装新酒”。

我想当时物价飞涨,冻结生活指数涉及千家万户,人人深恶痛绝。这原本是国民党反动派为搜刮民财而造的孽,但却贼喊捉贼地在它主管的报纸电台上大喊大叫“囤积居奇可恶”、“操纵物价可耻”……。它反民主,却高叫“民选”,要筹备什么“国民代表大会”。而我们也正可以利用这一点点“合法”,来进行

创作。我一如既往,由我先设计好情节、内容及主要的对话。然后与大家集体讨论、修改和补充。比如我欲突出补缸匠古老二的忠厚朴实的性格(这是王大娘爱他的基础),古老二起先说出一天工夫钱数万可以买半升米,但王大娘告诉他,“这一会儿粮店挂牌,米价已经涨了一倍”,欲加他的工钱。古老二坚持不肯,憨态可掬地说:“男子汉大丈夫,说一不二!”然后是两人痛骂奸商。这样说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又写出了两人在情感上的进步。

又如,由于物价飞涨,两人在痛斥奸商之后引申到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当权者,在于宦商勾结,加上美军的帮助。但当王大娘刚提起话头就被古老二以“莫谈国事”打住。可是谈不两句,古老二自己也犯了这个“莫谈”的禁忌,王大娘又去提醒……这样反复“犯错”、“纠错”,不仅产生了喜剧效果,而且透露出在国统区生活的民众,连自由讲话的民主权利都没有的现状。

在改编创作时,我随时提醒自己,戏一旦演出,就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它将影响大家,更要影响到学校。所以我不仅把稿子让同学们补充、修改。也征询邵大姐和王知津等老师的意见,生怕出纰漏。

从演出效果看,这些要求都达到了。特别是1947年圣诞节。在戈登路女青年会本部庆祝晚会上的演出,效果出奇地好。从笑声不断中,我们感到所有“隐秘”处观众都能“意会”,并报以热烈的掌声。

与特务周旋的风波

在经历了一段时日以后,我不仅与老师也与同学之间建立了默契和友谊,原来教唱歌的茹伟老师调走了,邵大姐要我接替他,好在我在抗战前就以戏剧和歌咏为武器投入救亡运动,教歌在我并不犯难。

1948年初春,在解放战争的战场上,反攻胜利的讯息像春潮般不断涌来。但在国统区这边却加强了对人民的镇压。“失踪”之事时有发生。一天,我和同学们正在对《王大娘补缸》进行精加工。忽然,黄纫秋老师匆忙走到我身边,对我耳语了一句:“有人来了。”从她的神态看,我判断,准是来了个不善的人。说实在的,我当时心里也很紧张,好在我已演了十多年的戏,不妨就当一场戏来演。我迅即向同学们布置:“摆好道具,排《求婚者》。”大家心领神会,迅速摆好

了桌椅，饰演媒婆和母亲的演员开始演第一段。正在这时，邵大姐陪一个约30多岁的男子来到排练现场。邵大姐只介绍了一句“先生来参观”。我就抢上前，手虽伸向他却并不握，嘴上说“欢迎，欢迎”，却表现了一副倨傲的神态：“先生哪里发财？”冷冷地寒暄了两句就让他坐在我身边看我排戏。平时，同学们有些动作达不到要求，我总会站起来做一些示范动作。这天我一反常态，俨然是副导演的架势，身子端坐在凳上“指手画脚”，不时还表现出一些火爆脾气……这场“戏”，同学们和我配合得非常默契。戏演到秃头、驼背上场那两节，大家笑，那家伙竟然也跟着大笑。这场是政治而又毫无政治色彩的戏中戏，竟使那家伙连连点头。临走，这家伙卑躬地向我说着：“打搅，打搅，好戏，好戏！”事后，邵大姐才偷偷地告诉我，那家伙是李志英（夜校学员）厂里的，是专门破坏工人运动的……。

局势一天天紧张。先是黄静汶大姐打电话叫我到她虹口的新的住处去，告诉我她要暂时离开上海。不久，邵大姐一天紧急到我家来通知我，叫我不要到夜校去了。说是当局已经动手抓人，正在抓陈美玉（陈如文）。陈美玉是极富表演才能的同学之一，特别是演《王大娘补缸》中的古老二，更是风采毕现。邵大姐见我担心的样子，赶紧安慰了我几句，同时向我提出要我介绍可以接替我的老师。我想了一想，就介绍了与我在重庆育才学校共过事的章恒。邵大姐当即表示，由夜校出面去请。至于陈美玉，全国解放后，她从广州给我来信，告诉我是邵大姐先把她藏在自己家里，而后再给她介绍了关系，安全地潜到广州去了。

在解放前那狂风骤雨的几百天日子里，夜校同学不仅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镇压的手段所吓倒，相反把阵线扩大了，他们在各自的工厂里演革命戏，唱革命歌，鼓舞起更多的姐妹，参加到迎接解放的斗争中去。我也在这一年的冬天接受中共地下党文委的安排组织两个电影厂的职工，与同学们遥相呼应，参加到“阻迁护厂”的斗争中，直至上海解放。

为工人姐妹引吭高歌

茹 伟

1946年春,我经陈良同志介绍到上海女青年会女工夜校任教歌老师。那时我虽已加入共产党,但没有基层工作经验,对于身为劳苦大众的女工,我只有在书本上、理论上的认识。

我初到女工夜校,对女工学生的工作、生活学习很生疏。我不知如何教歌?教什么歌?开始是在钱琴、黄纫秋老师指导下工作的。教什么歌都事先与黄老师商量好。有的歌曲是黄老师提供的,如《啥人养活啥人》就是提高女工姐妹们的阶级觉悟的好歌。有的是我征得黄纫秋老师同意,如《傻大姐》是为动员女工学文化而教唱。再如,为开庆祝会演唱的《朱大嫂送鸡蛋》,生动地反映了解放区的军民一家亲密关系。工人姐妹学唱了这支歌,进一步认识到解放区是个好地方,军民鱼水情深,十分向往解放区。

教一支歌,上堂课。有的歌看来一般,但在特殊情况下成为鼓劲的好歌。如《团结就是力量》。我教女工同学唱歌时,大家都非常认真,有的姐妹连续上了好几天大夜班,脸色苍白,神情疲惫,但仍振作精神,神情专注地跟我一起学唱。我怎能不为她们引吭高歌呢?

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支持下,我到公大三厂(今上海绢纺厂)去教过几次唱歌,并深入到车间了解工人的工作、生产情况。工人在闷热的车间里忙个不停,正如《新女性》歌词写的女工“天天眼不见阳光赶做工,无分雨雪风,天天耳只听机器闹轰轰,声声震耳聋”,“天天手跟着机器忙转动,一点不能松,一天十二点钟,加上女人的苦痛,更比男人甚一重”。我亲眼目睹女工是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这对我教育是深刻的。她们下班后,在厂里我就教她们唱歌,她们不懂简谱,我就耐心地一遍又一遍地教,直到她们会唱为止。当时我只有一个心愿,

不开的。在有敌情的时候,他们提醒我注意,关键的时刻通知我转移,免的毒手。1946年2月,我先到三和里第一女工夜校,因为我教的是进步引起特务的注意。钱琴老师及时保护我,安排我去曹家渡第二女工夜校我在那里的时间较长,至1947年又被敌人怀疑上了。我不能在二校待是又转移到杨树浦第三、第五女工夜校。1947年夏天,五校发生了敌人张琪华老师的事,五校形势较紧张,我又不能再教工人姐妹唱歌了,地下安排我撤退去大别山,因情况有变化未去成,就转移到苏州暂避。上海1949年7月1日,我参加市委在文化广场召开的党员会师大会,我在台大家唱《国际歌》。女工夜校的许多同学也参加了这次大会,我和夜校的姐妹们也会师了。

女工夜校这个革命大熔炉中,我们大家是多么的团结友爱、亲密无间、心,想起这些来,我还是心驰神往。



参加“三八”大游行

张菊宝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尤其是饱受侵略者蹂躏之苦的沦陷区人民普遍渴望过和平民主的生活。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努力争取和平民主的前途,而国民党却变本加厉地推行反动独裁统治,肆意镇压人民群众运动。

1946年3月1日,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作出了推翻政治协商会议成果的决议,决心进行全面内战,妄图消灭共产党。这引起了人民的严重关注和反对,人们通过各种方式呼吁,要求实现真正的和平。

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到了,这是战后第一个三八节,是动员妇女姐妹的大好时机,中共上海地下党以上海妇女联谊会名义发起在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举行各界妇女集会纪念三八大会。上海女青年会也发动了许多工人、学生、职业界妇女参加庆祝活动。当时女青年会女工夜校教师发动组织夜校女工学生,并通过她们广泛发动各工厂女工参加这次三八节活动。我当时在鸿章纱厂做工,与在女工夜校读书的同厂工人周巧英、许玉琳和女工积极分子一起组织本厂女工参加庆祝游行。

3月7日早晨,汤桂芬大姐通知我,国民党捣鬼也要庆祝三八节,要我们带工人队伍上街时注意,我们的集合点在兆丰公园。我将此情况告知厂工会内的中共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使大家思想上都有准备。果然,社会局派来的工会指导员王振绪(特务)也装作来与我们一起写标语,组织工人队伍。3月8日这天,王振绪派了几个男工特务参加游行队伍,说女工扛不动横幅和大旗,由他们来扛。我厂千余人的队伍浩浩荡荡,高喊着口号出发,沿着康定路走到戈登路(今江宁路)口时,那几个男工扛着大旗朝南京路大光明电影院方向走,当时,我是游行队伍的大队长,就拉住大旗说:方向错了,应向西去,目的地是兆丰公园,

他们没法只得向西走,到了兆丰公园就溜掉了。

兆丰公园内的大草坪上集合着 20000 多的各界妇女,其中许多是女工夜校同学带领的各厂女工。庆祝大会主席团由许广平、罗叔章、王国秀、俞庆棠、沈粹缜、陈玉俊、包仁宝等组成。周建人、罗叔章、林汉达等到会向大会致词,鼓励妇女投入民主运动,号召妇女们团结起来,与男职工一起,争取国内和平、政治民主、改善生活,妇女们特别是首次参加三八节纪念会的姐妹们莫不受到极大鼓舞。接着有各界妇女代表先后发言。这次三八节纪念大会会有中纺二厂女工代表张金娣(女工夜校学生)的发言,提出劳动妇女要团结起来,集中力量,努力争取政治民主。会后,各界妇女队伍浩浩荡荡向南京路方向游行,直到外滩。每个人手举旗帜、标语,齐声高呼口号:“妇女要解放”“男女平等、同工同酬”“争取八小时工作制”“全上海妇女团结起来”“反对独裁,要求和平、民主自由”。许多人喉咙喊哑了,就在地上、墙上写口号。这样雄壮的妇女队伍在南京路上游行,恐怕还是第一次吧!马路上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其中许多妇女还主动加入到游行队伍中来。到一个三岔路口,有敌人要冲散队伍,学生们就用自行车组成一道道防线,保证队伍继续前进。游行队伍通过大光明电影院,正巧国民党当局举办的妇女集会刚散会,那些妇女大都是国民党和有钱人家的太太、小姐,见到我们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听到我们高呼妇女解放、争取政治民主、自由的口号,有的羞得低下头,退到街沿下,偷偷地看着我们;有的仿佛从沉睡中醒来一般,瞪着眼,呆看着我们。游行到大新公司(今中百一店)时,听说有坏蛋在上面投啤酒瓶破坏,但也没能阻挡队伍的前进,而我们的口号更响亮了。通过这次庆祝活动和大游行,夜校同学和厂内工人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并看到我们妇女团结的巨大力量,更坚定了我们争取解放斗争的信心和决心。

参加李公朴、闻一多追悼大会

李亚芳

女工夜校为提高我们学员的觉悟和活动能力，常组织学员走向社会，参加重要的政治活动。

1946年10月4日上午，我和王菊秀等不少女工夜校同学，去天蟾舞台参加李公朴、闻一多先生的追悼大会。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一面加紧对解放区进攻，一面更猖狂地推行法西斯统治。在昆明为和平、民主努力奋斗的李公朴、闻一多先生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各界人民十分愤慨，强烈要求为他们公开举行追悼会。当时国共和谈尚未最后破裂，中共代表团在南京、上海还合法存在。国民党南京政府为缓和民愤，并企图为其最高当局推卸责任，同意在上海由国民党、中共、民盟、无党派人士联合召开追悼会，沈钧儒主祭，国民党南京政府人员主持会议，并规定“互不攻击”。

追悼会经过国民党当局的精心策划：楼下座位全部安排给工人。内有受国民党控制的“护工队”，他们必须听从命令——凡是国民党方面人员发言要热烈鼓掌，共产党和民主人士发言则不许拍手，还可以起哄。带队的特务，分坐每排左右边座。护工队员一律听他们指挥：他们拍手，大家跟着拍；他们不拍手，谁也不许鼓掌。

楼上是文艺界人士、学生和其他方面代表。周围也布满了特务。

为此，中共上海地下党发动了各条战线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参加追悼会，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我那时已是经夜校老师蒋华发展的共产党员，怀着悲愤和沉重的心情参加了大会。

追悼大会开始。先是上海市长吴国桢、市参议院议长潘公展等人发言。坐在会场四周的特务死命地拍手，可会场中间楼上楼下只有零零星星的掌声，气

氛冷落。而共产党和民主人士代表发言时,虽因“互不攻击”的约定使发言内容受到限制,会场上下仍充满了热烈的掌声。真是大长了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反动派的威风。尤其是郭沫若同志讲到:

“这是光明与黑暗的斗争”、“公正与自私的斗争”,“这是人民要做主人还是奴隶的斗争”,“光明与正义最后必将胜利!”全场掌声雷动。

当邓颖超同志登上讲台时,掌声像暴风雨般响起,会上气氛进入高潮。邓大姐庄严沉痛地朗读了周恩来同志的悼词:

“今天在此追悼李公朴、闻一多两位先生。时局极端险恶,人心异常悲愤。但此时此地,有何话可说?我谨以最虔诚的信念,向殉道者默誓:心不死,志不绝,和平可期,民主有望,杀人者终必覆灭!”

邓大姐每读完一句,都被震耳的掌声打断。读到“此时此地,有何话可说?”时,全场爆发出震天撼地的掌声,人们怀着无比悲痛、愤怒和激昂的情绪,拼命地鼓掌,经久不息。台上台下国民党头目与特务分子惊慌失色,狼狈不堪。

参加了这次大会,我们更加痛恨国民党反动派,而且大开了眼界,增强了斗志,更有信心地投入革命斗争,去争取革命的胜利。



在寅丰厂高唱《团结就是力量》

陈祥珍 李亚芳 陆宗桓 居琴娥

寅丰毛纺厂坐落于上海莫干山路，是一家全能的精纺厂，名牌产品经销国内外，是上海毛纺业较大的私营厂之一，全厂有职工 500 多人。该厂在抗日初期就有中共党员开展活动，但在抗日胜利后也只有个别党员，有一段时间是空白。

1946 年该厂有些女工到女青年会第一女工夜校读书，至 1947 年约有 20 名女工在夜校学习。夜校教师发展的两名党员，也于 1947 年先后转到寅丰厂工作。全厂当时有党员 6 名，大多集中在修呢间，较少机会与各车间群众接触。

1947 年下半年修呢间党员发起反对资本家亲信无故开除工人，全厂工人要求改善工人伙食的斗争，各车间工人都团结一致，两次斗争均获得了胜利。斗争使工人懂得团结起来就有力量，也提高了地下党员在群众中的威信。1947 年年底，为进一步提高工人的政治觉悟，充分发动群众，准备进行年终奖金的斗争，党员决定借厂工会筹备会成立的机会，在 1948 年元旦举行一次革命的联欢活动，组织全厂职工都参加“同乐会”。首先是利用合法名义，由工会筹备会主任、党员金志康同志向职工发出号召；同时向资方代理人唐孟雄厂长提出要求元旦开一个全厂的“同乐会”，让职工过一个快乐的新年。唐厂长表示同意。他是留学英国的技术人员。比较开明，还出钱支持联欢活动。党员团结各车间的青年职工一起排练节目。凡是对文艺感兴趣的，有一技之长的都吸收他们参加演出。不少工人都想在同乐会上显示自己的艺术才华，个个都兴高采烈。在女工夜校读书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她们也是夜校的文艺骨干，都把夜校学到的歌咏、舞蹈、戏剧等全部搬过来作为元旦同乐会的节目，大家称之为“现贩现卖”，通过这些节目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节目的内

容揭露旧社会的黑暗，控诉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屠杀解放区人民和迫害国统区工人、学生的罪行；反映解放区人民民主自由的幸福生活，唤起职工进行斗争。如《工人自叹歌》、《新女性》、《抗暴歌》、《五月的鲜花》、《黄水谣》、《山那边呀好地方》、《青春舞》、《垦春泥》、《朱大嫂送鸡蛋》、《王大娘补缸》、《光明之路》、《团结就是力量》等，以上歌曲还穿插舞蹈，使歌唱更形象化。还有话剧《屏风后》、《苦命的画家》、《为谁牺牲》等等。夜校同学在很多节目里当起了导演，约有两、三个星期每天晚上都在饭间、宿舍里排练，吸引了许多工人在旁观看，大家觉得新奇、感人、有趣。

元旦那天，全厂像办喜事一样，热闹非凡。节目丰富多彩：有大合唱、小组唱、独唱，还有朗诵、舞蹈、话剧、活报、京剧、越剧、沪剧等。纺部技术人员华增甲编导了有趣味的滑稽开场白。演出开始，他与纺部职员吴敬业在台上幕前从相反方向对面走来，急匆匆不小心碰到，两人都摔了一跤，吴敬业（扮外国人似的小丑）问：“急急忙忙干什么呀？”华说：“去寅丰毛纺厂参加元旦同乐会！”全场职工大笑，幕就渐渐拉开了。接下来的节目个个都激动人心，如陆剑义编导的《打回老家去》，反映东北被日寇侵占后老百姓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惨状；纺部工人二人对唱《松花江上》，感情真挚，演唱时真的哭了；修呢间女工黄凤珍表演《新女性》，真实地反映女工的痛苦生活；有的职工编导的话剧《苦命的画家》，诉说旧社会知识分子没有出路，生活贫困的痛苦；《卖菜歌》由夜校同学居琴娥演唱……节目都有很强的感染力，深深吸引、感动了全场观众。

元旦下午资本家王云程兴冲冲地也到会场来观看了工人的演出。当看到台上演唱《跌倒算什么》、《山那边呀好地方》、《团结就是力量》等节目时，他的脸色立即“晴转多云”，但我们的节目单早已公布于众，他无可奈何尴尬地离开了会场。

节目从元旦下午1点开始一直演到深夜1点钟，共12小时，中间还插入唐孟雄厂长为大家摇奖，有不少职工摸彩得奖。这次同乐会，工会还邀请沪西各毛纺厂的代表前来参加，并请他们留厂共进晚餐。

会场始终保持着热烈的情绪，大家一直兴致勃勃地观看节目，至深夜职

工仍不肯离去，这次庆祝元旦大规模演出，实际上是一次革命思想的宣传会、动员会，轰动了整个沪西的毛纺厂。

同乐会大大激发了广大职工的爱国主义热情和阶级感情，加强了全厂职工的大团结，并争取一部分职员站在工人一边，逐渐地接受革命思想，为争取年终奖金的饿工斗争打下了较好的思想基础。在饿工斗争中，全厂职工团结一致，表现勇敢，饿工坚持了5天5夜，是沪西毛纺业饿工斗争坚持到最后的工厂之一。

饿工斗争后，国民党社会局和资本家将15名工人（其中有不少党员）开除出厂，并派警察、特务进驻工厂，把持厂门、车间门，监视工人的一切行动，全厂一片白色恐怖。但党的活动没有停止，党员们又介绍了几十名工人到女青年会女工夜校和实验民校去读书，并发展了16名中共地下党员，建立了党支部，发展了党的外围组织“工人协会”会员40多名，为迎接上海解放、保护工厂作出重要贡献。

直到现在，许多职工经常回忆同乐会所演出的节目和它产生的进步思想、政治影响，以及寅丰厂饿工、申九工人英勇斗争的情景。饮水思源，不少夜校同学经常回顾女青年会女工夜校对我们的培养。夜校不仅对女工学生传授文化，还通过丰富多彩的教育实践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增强活动能力。歌咏、戏剧教师都是音乐界进步人士，如陈良、茹伟、强明等。我们在夜校如饥似渴地吸收这些丰富的“营养”，然后到工厂去播种、生根、开花。

在募捐中得到锻炼

姚莲英 曹云卿

女青年会为了聚集资金,每年秋季要向社会各界进行募捐,从青年会总干事到女工夜校学生,都要参加这一活动,有些上层领导可以向国民党政府官员及社会名流募捐到很多钱。而女工夜校的学生,她们接触的是工人。当时有些人认为女工夜校的学生,只能面向工厂,向工人募捐,捐不了多少钱,对夜校的募捐不抱希望。但我们夜校的老师处处关心对学生的培养和锻炼,考虑到女工在旧社会不善于讲话,初次在人多的场合讲话会脸红。所以每年都要动员学生积极参加募捐活动。为提高学生的自信心和活动能力,积极启发同学动脑筋,想办法。何况向工厂募捐还可以借此宣传学习文化的重要性,扩大女工夜校的影响,动员更多的女工上学,老师也动员学生向社会各界募捐,可显示女工夜校学生的力量。

我们记得1947年这次募捐,夜校新鲜事特别多。同学们非常活跃,积极热情,几乎每天都在夜校交流募捐的收获和各种生动灵活的方法,争取捐到更多的钱,反映了女工学生的智慧和活动能力。

向特务流氓募捐

国民党的各种反动组织地痞流氓在第一印染厂无处不有,政治情况很复杂。当他们知道我们夜校同学要开展募捐活动,就在工厂中蛊惑说什么:“女青年会有共产党”,说我们是“为女青年会共产党捐钱”。当时厂里有一个叫王老四的蓝衣社特务说:“我如果有枪,真想把曹云卿打死!”还有一个绰号叫小眼睛的流氓与王老四是一伙的,也造谣破坏、恐吓工人,使大家不敢捐钱,我们的同学不但不怕,而且针锋相对,为取得合法名义,首先向特务流氓募捐。曹云卿利用午饭时间,缠住

他们不放,对他们说:“我们不懂什么叫共产党,为了读书学文化,为了老师要吃饭捐钱,难道是犯法吗?”要他们讲讲清楚。王老四跑到哪里曹云卿跟到哪里。特务王老四被缠着没法,也只好捐了几角钱了事。曹云卿给了他女青年会的收据。这样就扫除我们女工夜校同学募捐的障碍,可以顺利地向工人宣传,扩大我们的影响,工人兄弟姐妹们捐了很多钱,两本募捐簿的任务很快就完成了。

向袁雪芬募捐

三和里夜校同学姚莲英考虑到工厂工人生活困难,捐钱不会多,就想办法约了大诚绸厂金焕琴、金有琴几位同学走出工厂,向社会去募捐款。她们看过越剧《祥林嫂》,想到袁雪芬,就利用星期日放弃休息向袁雪芬募捐。当时袁雪芬在明星大戏院演戏。在下午演出前,大家早早等在戏院后门。当见到袁雪芬等演员,就走上前去问好,并说:“女青年会女工夜校向各界募捐。”同时拿出女青年会募捐本。袁雪芬对女工夜校也很熟悉,曾与女工夜校师生共庆三八妇女节。她对募捐表示很支持,很快就捐出钱。范瑞娟跟着捐了不少钱。其他的演职人员也纷纷捐款,捐的钱很多。通过这次走向社会募捐活动,我们学到很多,初步懂得如何扩大影响,向外界宣传,如何争取社会各界的同情。以后姚莲英在工厂斗争遇到困难时,经常一次又一次上街宣传。

到舞厅里募捐

女工夜校的学生,白天做工,只能利用晚上和假日去向社会各界募捐。晚上较兴旺的是舞厅。特别是9时到10时,有一对对的男女情人手挽手走进舞厅跳舞。这些人大都是社会各界的职员和知识青年。我们就利用这一时机,在舞厅入口处向他们募捐,宣传学文化、求知识是社会进步的好事。我们还察觉男士捐钱往往要看女朋友的脸色行事,因此我们就积极争取做女士的工作,说明我们都是妇女,女青年会是为妇女谋福利的。果然不出所料,女朋友一表态,男士们立即掏包拿钱,要在女朋友面前显得很慷慨。这办法真灵,我们去了大都会和新仙林舞厅募捐,有的同学去了丽都花园等舞厅。募捐效果很好,捐的钱也很多。

走向街头,向商店店员募捐

我们利用星期日,组成一个个募捐小组,三至五人一组,从南京西路走到南京东路。有的同学到淮海路。早晨我们等商店开门,向一家家商店店员宣传女工白天做工十几个小时,晚上要读书学文化,没钱只能请社会各界支援帮助。我们拿出女青年会募捐本,请他们捐钱。出于我们意外的是,店员们不仅慷慨解囊捐献,而且大大称赞我们好学上进,白天做工,晚上读书,精神可佳。他们不仅自己捐钱,还帮助我们向顾客宣传,动员顾客捐钱,确实也有顾客捐了钱。他们还不要我们的收据,但同学们还是坚持给他们,以表示我们的谢意。因为募捐后,我们都按收据地址,以女青年会名义,给每个人寄感谢信。同学们从上午一直跑到傍晚。大家不怕疲劳、口渴、饥饿,基本上每家商店都去进行宣传募捐。虽然也有少数商店的店员只表示同情,却摇头说没有钱。我们也丝毫不泄气,一直坚持走到外滩。这一天,我们一组的同学,用完了3大本募捐本,这更使大家受到鼓舞,感到我们女工夜校得到社会重视,也深深感到做一个新女性的自豪。同学们还说:“我们上街募捐受到锻炼,说话脸也不红了。”

这次,第一女工夜校师生遥遥领先完成了募捐任务,受到老师们和女青年会总干事陈善祥、劳动部干事王知津同志的表扬。

声援抗暴的交大学生

姚莲英 陈 奕

1947年5月下旬,三和里第一女工夜校的师生,每天都在议论国民党当局迫害大学生的罪行:派军警、特务到复旦、交大、大同、大夏等大学制造事端,分化学生,要解散学生自治会。一些特务甚至开枪射击交大学生,有的夜里到学生宿舍袭击。有的带上口罩到宿舍抓人,有的拿了狼牙棍(木棍上钉上钉子)和皮鞭去殴打学生,不少大学生被打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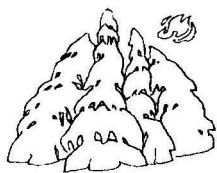
222

这些暴行激起了广大师生的愤怒,有一天大家集中在交通大学开会,我们女工夜校的师生也参加了。会上有进步人士揭露国民党种种腐败,交大学生站出来控诉国民党当局派军警特务迫害学生的罪行,并提出“要求民主、反对迫害”。司徒汉指挥齐唱《你是灯塔》、《黄河大合唱》等革命歌曲。女工夜校师生们和大学生一起唱着,情绪都非常激动,当时国民党特务埋伏在黑暗处,等待时机打人、抓人。夜校的教师要女工学生镇静,一切听从指挥。5月30日,交通大学和其他大学均有不少人被捕,许多学生被打伤,送进了医院。我们夜校学生听说后很愤恨,许多同学为此流下了热泪。同学们到工厂向工人兄弟姐妹们宣传,痛斥国民党反动派不让大学生好好念书,还要残酷镇压师生。让工人们进一步认清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狰狞面目。夜校教师奚宗伟,利用星期日,带领我们女工学生去中山医院、红十字会医院(今华山医院)慰问被打伤的大学生。我们带了鲜花、水果、食品到一个个病房慰问,他们有的头部、手脚受伤,用纱布包扎,有的伤得很重。

国民党反动统治对大学生的残忍,使我们气愤。对大学生不畏强暴、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精神,我们表示敬佩。我们向大学生们说:“你们的斗争不是孤立的,我们工人坚决支持你们!”同时我们也控诉了国民党反动派、资本家对

工人进行镇压迫害的罪行。那天受伤大学生对女工夜校学生的慰问很感激,同时还愤怒地揭露反动派种种阴谋。病房成了工人、大学生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控诉会;相互感染,教育深刻,夜校老师用铁的事实来教育女工学生,医院成了课堂。女工们和大学生们都受到深刻的教育。

以后我们不少工厂进行罢工斗争,许多大、中院校的学生也到工厂进行慰问宣传,激励我们的斗志,使工人运动与学生运动汇合成一支重要的力量。



在课外活动中锻炼成长

沈 群

我8岁读书,12岁失学当童工。1946年时我17岁,开始到小沙渡路三和里女青年会第一女工夜校读书,参加高级班,直到上海解放。我在校时间不长,但女工夜校对我的一生影响深远。特别是夜校组织的各种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使我从一个只会低头干活,只想多出力、多赚钱养家糊口的女工,变成了活跃的文艺积极分子和革命者。

我出生于封建大家庭,但夜校师生间、同学间的团结友爱和各种活动吸引了我,我不顾家庭封建思想阻挠,积极参加夜校的各种文体活动,如演活报剧,集体扭秧歌,学跳农作舞、青春舞、新疆舞、西藏舞等。

记得在“六·二三”事件发生后,夜校组织我们演活报剧,配合声讨国民党反动统治、支援学生运动的活动。当时,大学生到南京请愿,遭到国民党当局惨无人道的迫害。在活报剧中,我演一位请愿时被迫害致死的大学生的妹妹。用上海方言演出。我是全心地投入。剧中要求我带孝,我就准备了白衣、白鞋,白鞋没有便向旁人借了双白跑鞋。演出时,想到老师给我们说的剧情,就像自己真是那个妹妹一样,我声泪俱下,痛哭失去哥哥,悲愤地控诉、声讨国民党反动派。既教育了观众,也教育了自己。

一次,我们在江宁路分会演出,戈登路巡捕房派出便衣警察,混到会场来。这时老师立即把准备上场的该剧拉下,换上欢快的新疆舞、西藏舞等。待警察看看没什么可挑剔,没趣地走后,仍照常演出活报剧。这样,既避免了不必要的麻烦,又达到演出成功的目的。老师在白色恐怖下,对付反动派的机警、不慌不忙的态度和有效的方法,对我的启发教育很大。

1948年2月2日,国民党反动派残暴镇压正在罢工的申新九厂工人。惨案

发生后,老师让我们臂带黑纱,悼念被迫害的阶级兄弟姐妹,并组织募捐等活动。老师告诉我们:募捐的意义,不仅在于经济上的支援;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道义上声援阶级兄弟姐妹,反抗统治者的压迫。又说:在“申九”惨案中,当局出动全副武装的军警,运用军事武器,这不单是为对付一个工厂的工人,而是为了杀一儆百,对付我们整个工人阶级。使大家认识到,我们工人的斗争不是孤立的,工人阶级必须团结一致,一方有难,各方支援,团结才有力量。

于是,我在厂里积极发动募捐。当局知道后要抓我,厂里没抓到,直扑我家。我大妹妹沈林妹也是夜校学员,她掩护我跳窗离家到夜校。奚宗伟等老师叫我不要怕,暂避到隔壁亭子间老师办公室去。不一会便衣警察即到校查问。老师们出面,理直气壮地说理。说募捐是女青年会总会指示的。工人们是一家。现在申新九厂不少工人死伤,许多工人被厂方开除,生活困难,大家应该在经济上给以帮助。便衣警察理屈词穷,只得悻悻地走了,我也得以安全地回厂上班。我就是这样在夜校老师的指导和保护下不断成长。

我还参加了夜校组织的与交大学生联欢的活动。大家有说有笑,亲密无间。我们工人讲苦难史、斗争史,学生谈当前时局和学生运动,从而使我们进一步懂得天下乌鸦一般黑,只有推翻反动统治,人民才能出头;工人、学生应该团结起来,为同一个目标而斗争。我们与学生边唱边跳集体舞,在《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中结束了联欢。

经过夜校组织的一系列活动,我对国民党当局的反动本质有了认识,觉悟有了显著提高。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发展了几位小姐妹入党和参加党的外围组织。我积极参加厂内罢工,参加人民保安队护厂。我还将自己在夜校学到的各种舞蹈,教给厂里的小姐妹,培养了一批文艺积极分子,为组织宣传队迎接上海解放准备了骨干力量。

在工人运动中冲锋陷阵

杨 善

1943年，我经邻居金秀英介绍，开始到女青年会工夜校读书。在夜校老师，尤其是在黄纫秋老师的教育、帮助下，我学了文化，确立了革命的人生观。1945年3月，黄纫秋老师发展我入党。于是，我从一个10岁起做童工、失业后以偷越封锁线贩米为生的苦孩子，变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主义战士。

团结和发动工人群众

入党后没几天，黄纫秋老师就介绍我去第一印染厂工作。一印厂前身是日本内外棉第二加工场。日本投降后，经国民党接收，成了官僚资本企业。这个厂尽管生产停滞不前，但在当时还是中纺公司获利最多的一个重点企业，受到国民党的重视。各派反动势力都想插手，企图从中捞到油水，先后建立了三十多个反动组织，有公开的也有暗藏的。他们明争暗斗，各不相让，但对付共产党则是一致的。那时厂里共有职工600多人，大多数是男工（约500多名），女工只有几十人。党的力量很小。我进厂前只有一个刚入党的党员，名叫汪月秀。党积极分子有近10个，如瞿云秀、曹云卿、王雪文等。多数是女青年会夜校读书培养出的青年女工。后来其中部分同学也在夜校党组织的培养下入了党。

我与汪朋秀同志都是入党不久的新党员，不懂得如何开展工作，于是，我就请教黄纫秋老师。黄纫秋老师要我依靠厂里的积极分子，从工人中存在的切身问题着手，团结群众，启发教育群众，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对思想成熟有入党要求的，就发展入党。当时我在布房间做工，那里大部分是青年女工，她们一般比男工受苦深，而且常被流氓、工头欺凌、污辱。因此我们

首先关心女工生活，帮助她们抵制流氓工头的欺压。例如厂里没有食堂，也没有蒸饭的地方，布房间不少女工只得把家中带来的剩粥冷饭放到整理间拉幅机回笼上烘热。那些流氓往往借此寻衅，欺负女工，不是弄脏她们的饭菜，便是拿走饭盒，“吃豆腐”，逼女工为他们编结绒线衣等。弄得一些青年女工吃不成饭，饿着肚子做工。我们就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等到烘饭时，特意约大家一起把饭盒集中起来烘热。这样一来，那些流氓就不敢轻易恶作剧了。既解决了她们的吃饭问题，同时也使她们初步领会团结起来才有力量的道理。由此她们也觉得我们人好，懂得的道理多，把我们比作自己的新姐妹，对我们十分信任。以后曹云卿、郑阿彩等都入了党。

在团结教育女工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把党的力量影响扩大到男工中去。当鲍国梁、孙炳祥、高起华、潘学锦等人都成长起来，又通过他们在后车间开展“交朋友”活动，团结和培养了一批男工积极分子。到上海解放前夕，一印厂已有36名中共党员。

冲信义铁厂的战斗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中共中央、华中局曾发出指令，要求上海工人、市民与近郊游击队实行武装起义，占领上海。为此中共上海工人运动委员会（简称“工委”）决定工人地下军以沪西信义铁厂为据点组织武装起义。沪西工人清晨到信义铁厂聚集待命，傍晚却又接到中共中央因形势变化要求紧急中止武装起义的通知。于是工委因势利导将起义改为声势浩大的复工斗争。在整个过程中，夜校同学汤桂芬是领导这声斗争的指挥部成员之一。其他夜校同学如杨美林、孙雪珍、李惠芳、张菊宝、瞿云秀、曹云卿、朱月华、蔡金因、陈素英、张金娣、张金凤、郑阿彩、马林轩、吴惠贤等和我都是沪西各厂工运的组织者，都在斗争中冲锋陷阵，经受了锻炼和考验。

记得1945年8月下旬的一天，天刚亮，顾亮急冲冲地跑来找我说：“要抓紧时间，快动员工人群众，去莫干山路信义铁厂。这个厂是个汉奸厂，我们要占领这个厂，建立据点，为迎接新四军解放上海作准备。”当时我不知道

顾亮的身份，对顾亮的话有疑虑，就连忙去夜校找黄纫秋老师。她说：“顾亮是我们的人，他的话是对的，我本来也想找你谈，你快去做好这个工作。”我既兴奋又紧张，急忙找到汪月秀、瞿云秀、曹云卿等，把顾亮讲的话作了传达，并研究了一个动员的方案，就是对群众说信义铁厂的汉奸厂，厂里存放着大批大米，要每人带米袋到信义厂去。我们的口号是“没收汉奸财产”、“我们要吃饭”，要老板把仓库里的米拿出来。我们还作了分工：我负责总联络，瞿云秀、曹云卿、王玲娟等夜校同学负责宣传鼓动工作，孙炳祥、鲍国梁负责纠察。大家分头去发动群众。群众听到要分敌产，高兴极了，纷纷报名参加。在约定的8月23日早上，约200名左右工人，在我们的带领下去了信义铁厂。一到那里就看到四面八方各路人马不断进厂，汇成人山人海，都不断地高呼口号：“我们要做工”、“我们要饭吃”、“救救失业工人”。我们冲进去后，以厂为单位席地而坐，等待着我们的代表汤桂芬、顾亮、张培兴、唐兴与国民党派来的章祝山谈判。我们积极分子不断地在人群中做宣传鼓动工作。我说：“我们工人阶级是最有觉悟最有纪律的队伍，我们要团结一致，不达目的誓不收兵。要给反动家伙看看我们的力量”。中午时，三和里女工夜校的老师们踏了两辆三轮车，装满了羌饼让夜校同学分发给工人群众。其他各方也都来支援，大家的斗志更高。

那天，国民党上海总工会整理委员会沪西办事处主任章祝山身穿西装，带上一批特务赶到信义厂，走上天桥，声嘶力竭地高喊：“工人立即出去，派代表来谈判。”他还指责说：“工人占领信义厂是非法的，接收工厂是政府的事”。工人们当即予以反驳：“这是汉奸厂，厂里有大批大米，我们苦了8年了，没吃没穿，现在要工做，要饭吃有什么不对！”说得章祝山哑口无言。

下午警察局突然开来一辆红车子，车上跳下几个警察，与原在厂里的警察一起要把谈判的代表强行拉走。我们见状立即把红车子围住。我和几名工人跳上车抢方向盘。有的还躺在红车子的前头，不让红车子开走。反动军警察狠命殴打工人，还逮捕了21人。我们气得眼睛也冒火了，纷纷上去与军警搏斗。警察强行拉开工人，让红车子开走。我和许多工人一起紧追红车子，涌到普陀区警局，抗议警局颠倒是非，包庇汉奸，欺压工人，无理扣压工人

代表。工人群众为了营救被捕代表，坚持斗争到深夜。

第二天，工人群众又赶到玉佛寺，但玉佛寺周围早已布满了铁丝网和军警，工人们无法入内。当时领导嘱咐把工人带领去浜北平民村，平民村有几间房子，有较大的空地，平民村就成为工人集中活动的据点。为了加强领导，就在那里成立了沪西失业工人联合会。在联合会统一领导下，工人团结一致继续战斗。

为了营救在信义厂被捕工人，一方面发动工人群众，继续进行斗争，要国民党交还代表，一方面又派工人代表到总工会办事处，与宪兵队及警局进行交涉。进步的报纸作了报导，揭露敌人的毒辣手段。经过四天的斗争，普陀分局无可奈何，不得不将 21 名被捕的工人释放。

“欢迎”金开德的智斗

1945 年 9 月 19 日，美国第七舰队五星上将金开德率领 4 艘军舰来上海访问。国民党为了讨好主子组织了一次欢迎活动。上海总工会要沪西区失业工人联合会派 200 人去外滩欢迎。我请示了黄绉秋老师。黄绉秋老师说：“组织上有了布置：可以将计就计，以欢迎为名，而实际是举行一次要求复工、要求有饭吃的大示威，可以搞臭国民党，同时显示工人的力量。”我回来后召开了一次党员和积极分子会议，布置和讨论了这个工作。大家的积极性很高，瞿云秀、曹云卿、王玲娟、孙炳祥、唐森林、高其华等都自己买了红绿纸，写成“我们要饭吃”、“我们要复工”的标语，并买了布做成横幅。第二天早晨，沪西区数千人的工人队伍，从平民村出发，浩浩荡荡地向外滩挺进。在路上，我们先把准备好的标语卷起来，不让发现。当队伍走到南京路外滩时，正巧沪东区的工人队伍也到了，两支队伍约万人，合并一起加上沿途观望的群众汇成了人山人海。下午 1 时半，金开德率领的第七舰队开进外滩黄浦江。霎时间，许多横幅高高举起，横幅上写着“要复工、要饭吃、要救济”、“你们发了国难财，我们工人饿肚皮”等。近万名工人的手中都拿着三角小旗，上面都写着要饭吃要复工等口号。国民党要员周学湘、范才驊、章祝三等本

目瞪口呆，既恼又急。社会局、总工会急忙派人出来与工会代表商谈，对工人们提出的复工要求虽未当场答复，但讲定了21日上午，到总工会找周学湘，由周陪同找国民党市党部主任吴绍澍解决。我们想这次示威游行主要是让国民党出丑，同时检验我们的力量，现在既已达到目的，就趁势同意周学湘的意见，工人们逐步离开了。

包围国民党市党部

9月21日清晨，沪西区失业工人联合会组织工人群众，推派15名代表去总工会找整理委员会主任周学湘。本厂推选我去，成为15名代表之一并担任总联络。这15名代表中的7名女代表，全都是女工夜校学生。大家讨论决定了谈判的内容和策略，先提出两点要求：（1）立即给工人发放救济费；（2）被接管的工厂，应在近日里开工。并讲定如果会议有变，由我想办法电话联系，以便立刻组织队伍前往声援。

当天上午9时，我们15人就到了蓬莱路总工会，找到周学湘，由周学湘陪同乘车到徐家汇国民党市党部。市党部王先青出来对代表们敷衍几句，接着说吴主任在开会。就让代表们空等在大厅里。一直到下午2点钟还没有答复，我看形势不妙，经商量就悄悄走了出来，打电话到平民村联系。下午4时左右，平民村几万工人冒雨涌到市党部。在雷雨交加的倾盆大雨中，高呼“要饭吃、要复工”等口号，并立即又推荐几十个代表一起到市党部大会议室。此时王先青慌慌张张跑出来，对代表们威胁说：“这是要挟市党部！”我们顶着反问：“工人要吃饭要工做有什么错？”王先青无言以对。然后代表们向他提出2点要求：（1）对面女子模范中学腾出来，让工人避雨；（2）发点心给工人充饥。王先青置之不理，且暗地里叫一支宪兵队来镇压。宪兵荷枪实弹，气势汹汹面对代表。代表们毫不畏惧，手挽手挺起胸膛到屋外与群众一起站在大雨里高呼口号。雨水中的群众见状更加愤怒，蜂拥冲进大楼。此时王先青连喊带跑地奔出来说“主任同意谈判，请上午的代表参加”，可是当代表刚走上大楼，就被宪兵一个一个分开押起来。

这样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夜色深沉，已是午夜时分，虽然雷雨已停，

但马路的积水到达人们的膝盖以上。几万工人仍然坚持着等待着。沪西失联会经过研究，认为这样坚持下去不利，决定暂且撤退，准备新的战斗。

工人队伍撤退后，在市党部里，宪兵把15位代表一个个押到卡车上，开到开纳路宪兵队队部对面的一座小洋房里关押起来。

我和其他代表已经两天两夜没有吃过一点东西，也没有喝过一口水，可是斗志仍然不减。

到第三天夜里，宪兵把15位代表押到一个空房间里集体审讯，要大家当场在字条上写“诽谤政府”四字。我当时很气愤，写了“冤枉”两字，以示抗议。在牢房里，宪兵把代表们的钢笔裤带都拿走了，我们就用指甲在墙壁上刻写：“我们要做工、要吃饭”，进行着顽强的斗争。宪兵对代表集体审问，没有捞到什么，又变换花样，一个一个地分开审问。第五天下午，我从窗口看到男代表依次押出去，估计敌人还有花招，就告诉了大家。代表们说：“我们不怕，外边还有几万人支持我们！”不一会，代表们被敌人一个一个地叫出去。我是第三个被叫去审问的。在审问中，宪兵队长问：“啥人叫你做代表的”，我说：“工人选的”，“顾刚、张培兴认识吗？”“不认识。”我很冷静地回答着。宪兵见问不出什么，就命令士兵将我揪到地上，穷凶极恶地用粗木棒打我，我痛苦难熬，但咬紧牙关坚强地站起来，怒目而视。还有两名女代表——夜校同学杨美林和孙雪珍也挨了打，都坚贞不屈。

我们15名代表被扣留以后，沪西失业工人联合会进一步掀起一个要求释放被扣押代表，要求迅速复工的斗争高潮。一面发动失业工人在平民村继续坚持复工斗争。一面组织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以工人的身份，在群众中揭露国民党对要复工、要饭吃的失业工人采取蛮横镇压和无理关押并折磨工人代表的反动暴行。造声势、造舆论，我们的斗争得到社会的同情和支持。《文汇报》、《大公报》、《世界知识》、《联合晚报》记者及苏联塔斯社记者等赶来采访。工人们斗争精神使记者大为感动，有的记者还当场捐款，连续发表文章揭露国民党的暴行，以示声援。

在工人的坚持斗争和强大的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市党部不得不释放代表。

复工斗争的胜利

我被释放的第二天，就去黄纫秋老师处，汇报了被关押的情况。纫秋老师的肯定和鼓励。她也把我关押以后社会上的斗争情况作了诉我胜利来之不易。她说：“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工人群众。万众，一切依靠群众，这是我们的目的和方法，也是我们战无不胜的。听了以后，觉得意义深远，增强了必胜的信心。接着黄纫秋老师又工作。她说当前要抓复工斗争。首先调查好失业工人情况，然后登记。要让真正老工人先登记，防止国民党将坏蛋趁机塞进厂来。做好了，我们的群众基础就更扎实。我觉得黄纫秋老师讲得句句明确了努力的方向。

回厂后我找了厂里的党员和积极分子，把党组织的精神作了传达何落实。在认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分工，然后分头去各个工人家中作登记的动员。有的失业工人已回乡的也分头写信去，催促他们返回。

在与工人接触过程中，我们发现有的工人犹豫不决，甚至不敢查原因，才知道原来是敌人在破坏，在江宁路戚家村也冒出一个复工。他们不仅大肆宣传，还搞物质刺激，说到他们那里去登记，每人可“大头”（银元）外加一碗阳春面。经调查，这个戚家村“复工登记”负责人乃是市总工会的一个头头，名叫周英才，他是国民党特务，善人。这个复工登记处是以“工人运动指导委员会”的名义办起来的。

复工招工组，从而又掌握了招工大权。他们变换花样，以招工优先招收技术工人由，把原在平民村参加复工斗争的大批工人排斥在外，而把原来欺压工人的流氓、拿摩温以及他们的亲信先招进厂，国民党也乘机把他们的爪牙安插进来。我觉得这样下去，势必壮大敌人的力量，削弱我们的力量，因此又把这个情况，向黄纫秋老师汇报。

在黄纫秋老师的指导下，我回厂立即找党员和积极分子商量，由我和几个党员、积极分子正面提出交涉。批评他们：复工是有关工人切身利益的问题，又是以后要搞好生产的问题，这样大的问题，不和工人代表商量是不对的。接着提出了我们事先商量好的三点招工规则：（1）老工人特别是生产能手，应该优先复工；（2）老工人全部复工后，如果生产确实需要，可以推荐一些有生产能力的人进厂；（3）同日本鬼子有瓜葛的人不许进厂。我们这个意见是完全合理的。他们也不得不同意这样做。在实行过程中，我们又监视着，所以还比较顺利，第一、第二条，基本上都做到了，第三条只是部分做到。因为当时厂里人员复杂，界线很难划分。只能做到对少数名声很坏的人坚决不让复工。

工人们陆续复工，但在复工斗争中，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发给工人救济费的要求，还没有着落。我们就和其他厂代表一起，跑社会局总工会经济部交涉，通过多次往返斗争，最后经济部终于同意发给每个工人3个月的失业救济费。

复工斗争胜利后，广大工人群众斗志高昂，他们看到：只有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才有力量，才能不被欺侮，生活才有保障。我在党的领导下，与工人们一起为建立工人自己的组织——工会，为迎接上海的解放而继续奋斗。

开辟地下交通线

林福英

抗战胜利后，我从浙东三五支队回到上海，进入元丰毛纺厂做工。在中共毛纺地下党领导下，积极参加各项斗争，1948年1月因参加沪西毛纺业的饿工斗争被工厂开除，后与毛纺业的同志参加申九“二·二”斗争后援会的许多活动，不少党员同志暴露，无法留在上海工作，当时敌人已开始大逮捕。党组织要我安排已暴露的党员撤离上海到革命根据地大别山去，当时元丰厂党员、女工夜校同学王惠英、姬彩云离上海经汉口去大别山。到了汉口，因联络站出事，王惠英、姬彩云在离汉口前遭敌人逮捕。元丰厂的党员、夜校同学孙立为掩护二区机器业地下党员，经常与他们结成对子，以扮假夫妻为掩护，陪同他们一起东躲西藏。为防不测，孙立与毕金康假戏真做，在赵惠芳同志家里点了红烛拜天地，然后以夫妻名义离开上海去大别山游击区。大别山游击区环境恶劣，生活艰苦，国民党经常下乡扫荡，一次敌人挨户搜查，孙立被围，危险之际，在老百姓的帮助下，她扮作老大娘的闺女病卧床上，机智地逃脱了敌人的搜捕。

对此，组织上考虑建立多渠道交通线。组织上知道我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浙东三五支队，熟悉那里的地形和情况，要求我安排送一些地下党员去浙东游击区，也是要我去开辟浙东的地下交通线，以便上海地下党员紧急撤退时备用。

按组织安排，第一次我送毛纺厂党员金志康、程兴炎同志去浙东，并要我在离上海前，身穿黑旗袍、白皮鞋，手拿《大公报》，在胶州路、余姚路等联络员接关系。那天与联络员见面后，约定日期，乘火车到杭州，为了安全，大家在火车上装作互不相识，到杭州下车后一个跟着一个，4人始终相隔10米左右行走。然

后再改乘车辆,又经过半天的步行,才到达浙江东阳、义乌一带游击山区,我们见到浙东金支队长和鹰大队长,受到他们热情欢迎。游击山区的环境比较恶劣,比抗日战争时期的四明山更为复杂艰难。四明山是抗日根据地,有我们的抗日部队,而解放战争期间的浙东游击队是在国民党鼻子底下生存斗争的,所以游击队每天要与国民党部队周旋,一个夜里要翻山越岭转移两三次。我到那里不公开自己的姓名和身份,因为我只能在那里待两天就返回上海。我向游击队领导介绍了送去的两位同志,就准备回沪。在这两天内我喜出望外地见到上海女青年会女工夜校的老师。在游击区亲人相见,互相拥抱,当时我们都禁不住热泪滚滚。当我知道游击区战士需要经常改装活动,特别黑夜行军穿黑色衣服,可防止被敌人发现,当我知道老师没有黑衣服做掩护时,便把自己的黑色绸缎旗袍赠送给她,老师非常高兴,我们都感到这是在特殊条件下的师生相见,是难以忘怀的革命师生情。

我完成了任务回上海时,游击队的领导决定晚上由武装同志护送我出境到白区,经过半夜的步行快到义乌车站附近,我就请武装同志回去。为了避免敌人发现,就躲藏在会馆里,里面都是一口口棺材,阴森恐怖,同时蚊虫肆虐咬人厉害,一直熬到天蒙蒙亮,立即赶到汽车站候车。到了杭州又改乘火车回沪。我回到上海睡了3天才得以恢复体力。

回到上海,我见到党组织领导沈正光同志,感慨万千地说:“上海地下党同志在白色恐怖下工作,游击区的同志也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战斗,我们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以后这条交通线由上海去浙东的同志担任,我按党组织要求,仍回毛纺业工作,后又安排了一些同志撤离上海去浙东。

饮水思源,回顾自己成长的历史,抗日战争时期我在三和里女工夜校读书,受到启蒙教育,又受钱琴老师抗日救国思想教育,毅然去参加浙江四明山抗日部队,经过锻炼,抗战胜利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女工夜校的经历是终身难忘的。

接管上海印钞厂的前前后后

张 瀛

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机构

上海是我国最大的经济中心，也是最大的金融中心。解放前，国民党政府所属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的总行都设在上海，货币发行和印钞的领导机关也在上海，并设有专门印钞的上海印钞厂（原中央印制厂上海厂）。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除了仰仗美援和对人民大肆搜刮外，就依靠上海印钞厂大量印制金圆券等货币，来维持它那反人民的内战。尤其是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巨大胜利后，国民党面临彻底失败的境地，进一步滥发货币来为维持战争输血，企图作垂死挣扎。直到上海解放前夕，该厂仍被催逼着拼命加快金圆券的印制。中央印制厂主管人接到国民党政府财政部的密令，要他们随时作好准备，秘密制订分步分批将上海印钞厂的机器拆迁至台湾的计划。各种反动组织，诸如国民党直属区分部、工人福利会、三青团等，都在厂内积极进行活动，企图瓦解工人团结，胁迫工人拼命生产，并在必要时胁持工人随厂迁往台湾。

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很早就重视上海印钞厂这个经济命脉机构，通过几个渠道向该厂散播党的种子，并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就在厂内建立中共地下支部，领导群众进行多次经济的政治的斗争。党的力量也在不断壮大。解放前夕，该厂已有中共地下党员 34 名和“工协”会员 30 多人，积极分子力量遍布厂内各个部门。同时通过厂内外各种力量，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工厂上层领导人员，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如中央印制厂总管理处副主任糜文熔曾是我党早期党员，党支部通过当年与他一起工作的老同志孙冶方向他做工作。进

入厂内生产人事领导部门工作的地下党员陈炼军、叶扬等也积极和他接触,促使他接受党的领导,并暗中支持革命工作。随即通过糜文熔与厂长高杰等的老同事和师生关系,又争取到一部分高级职员。这一切,为开展反搬迁和护厂斗争,以及胜利接管、恢复生产,建设人民自己的印钞厂,打下了有利的基础。

“一定要完整地使它回归人民”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对国民党地区的一切经济文化设施一定要力求完整地保护好、接管好的指示精神,我有关部门于1948年底开始,着手进行对国民党政府印钞机构的接管和恢复生产的准备工作。中共中央华东局财委负责人曾山指出:“国民党政府的印钞厂,我们一定要完整地使它回归人民,为人民所用,成为我们国民经济的重要机构。”1949年2月,山东北海银行发行局和各印钞厂组成接管队伍,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以发行局干部为主,配备必要的警卫武装,由几十辆大卡车组成运输队伍,车上满载新印的各种面额的人民币和印钞纸张以及人民币原分版,以配合解放军解放新城市后,由军官会迅速发行人民币,并在接管工厂后,迅速投入人民币的印刷;这部分队伍由发行局长杨秉超直接率领。另一部分是由发行局和各印钞厂抽调的干部和技术工人共140余人组成的工厂接管队伍,这批人员大多数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由党组织从上海输送进入解放区的。他们对上海情况比较熟悉,对工厂管理和领导生产也具有一定的业务知识和技术能力。这两支队伍在华东局青三纵队的统一领导下,2月中旬从山东南下,先在安徽怀远地区集中整训,学习解放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以及党对新解放区的各项政策和入城纪律。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后,他们又随军集中到江苏丹阳地区进一步整训,一面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一面根据上海地下党供给的印钞厂、造币厂的具体资料,重新调整了接管计划和具体实施办法,并决定在上海市军管会金融处领导下,组成由杨秉超、张瀛担任正副组长的工厂接管领导小组,确定派驻各接管单位的正副军代表和军事联络员人选。曾山在南京接见并听取了陈穆、杨秉超、张瀛对货币发行、印钞厂的接管和复工工作准备情况的汇报,对接管和复工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包括原材料供应、职工生活等,作了详尽的指示。

艰苦复杂的护厂斗争

与此同时,上海地下党为配合接管上海印钞厂,作了艰苦复杂的护厂斗争。1948年初,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电令中央印制厂理监事会主任凌宪扬和总管理处主任陈公亮实施该厂分批迁台计划,并要陈公亮去台湾筹建,由总管理处副主任糜文熔主持总管理处和上海印钞的工作。上海印钞厂党支部获此消息后,积极开展反搬迁斗争,在工协会会员和积极分子配合下,在群众中广泛宣传“搬机器就是搬掉工人的饭碗”、“机器是工人的命根子,宁死不准搬机器”等口号,把反搬迁和广大工人切身利益结合起来,发动群众用各种方式抵制和阻挠搬迁计划的实施,严密监视偷拆偷运。1948年12月的一天,当多辆卡车进厂,企图突击搬运机器时,许多工人包围卡车,阻止搬机出厂。地下党员陈炼军、叶扬等也积极利用各种机会,对糜文熔、高杰等阐述形势,晓以利害,动员他们千方百计拖延搬迁,使国民党当局的拆迁计划无法得逞。

接着,上海印钞厂党支部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进一步开展护厂工作。除了继续抓紧对糜文熔、高杰等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外,对中层职员也积极进行宣传教育,提高他们认识,共同参加护厂。对反动组织成员,则利用亲戚、朋友、同乡等各种关系,劝导他们不要死心塌地跟着国民党做危害人民的事。在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有利形势下,这些工作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党支部通过糜文熔出面,成立了应变委员会,并向中央银行申请到相当数量的黄金和银元,供上海印钞厂应变护厂之用,还搞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机要工厂,不准驻军,不准散兵入厂”的布告,张贴在厂门口,使护厂工作合法化、公开化。同时,以党员和工协会会员为骨干,组织了有200多人的护厂队,不但工人和大部分职员积极参加,连黄色工会的一部分理事也参加了。护厂队日夜巡逻工厂区,控制了驻厂国民党武装警察的武器弹药库,以及变电所、金库、版库、材料仓库和电话总机,还准备了充分的粮食、副食品、帆布床、毛毯等。大家悄悄地议论着:“天快亮了”、“国民党快完蛋了”,等等,群众护厂热情更加高涨,护厂力量不断加强。

5月25日,上海市区大部解放的喜讯传遍全厂,人们奔走相告,兴高采烈。

这一天的中午,忽有自称“中共华中局静安寺总部”的一批人,乘着一辆吉普车前来,声言要进厂接管。经护厂队员盘问,并责令出示军管会的证件,这些人便露出原形,护厂队当即把他们扭送到附近解放军部队依法处理。

经过全厂职工的共同努力,护厂斗争取得了胜利。一个完整的上海印钞厂及其全体职工,翘首盼望人民解放军的接管人员来临。

胜利接管,迅速复工,加紧生产

5月25日,上海印钞厂接管组大部分成员,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随军进入上海南京路,当晚睡在金门饭店(现华侨饭店)的9楼地板上,个个兴奋得难以入眠。次日,中共上海沪中区委邝若安带领上海印钞厂地下党支部书记钱正心和支部其他领导成员,与接管组领导在外滩6号原中央印制厂总管理处会面。两支队伍胜利会师,共同商定了接管和迅速恢复生产的具体步骤,以及组织分工。27日接管组杨秉超、张瀛,以军管会军代表身份,会见了原中央银行发行局长高风和中央印制厂总管理处主任凌宪扬、副主任糜文熔,以及印钞厂、造币厂厂长,阐明了人民解放军的政策和接管办法,希望他们真诚配合。

28日上午,接管组派出军代表冯锦章、张腊良,持上海市军管会主任陈毅、副主任粟裕签署的委派通令和接管命令,进上海印钞厂。全长顿时一片沸腾,锣鼓喧天,职工们载歌载舞,热烈欢迎接管,共庆企业获得新生。

在地下党和职工的密切配合、积极合作下,清点移交工作进展顺利。除了对票版、武器、金银贵重物资和机密文书档案由军代表专人直接管理或封存外,一般均原交原接,责成移交人员负责保管。在接管的同时,立即准备恢复生产和印制人民币工作。由于党支部在军代表进厂前已经动员各生产部门职工清理并整修机器设备,军代表进厂后,人民币原版到来,立即按照主要生产工序,派熟悉生产技术和管理军事联络员会同原生产部门负责人负责恢复生产的工作,不到两星期,第一批人民币成品就开始进入国家金库。广大职工在革命胜利形势的鼓舞下,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战斗意志,生产新纪录不断出现,为提前完成每一项生产任务而战斗,为国家发行人民币的迫切需要,作出了重要贡献!

大夏大学的革命斗争

郑广裳 蔡明 陈祁 徐英伟 整理

从抗战胜利到“六·一三”反内战运动

1945年抗日胜利前夕,上海大夏全校学生约500人,中共党支部在蒋丽似(书记)、殷去芳(副书记)、林肖容、曹碧琴四位同志组成的支委会领导下,连同高平、蔡明美、陈赞培等共有16位党员秘密发动群众,为配合人民抗日军队,准备参加解除上海日伪武装的行动,迎接我党领导的新四军进入上海,保卫人民抗战胜利的果实。后来党领导的上海地下力量按照党中央的指示,改变原先的计划。大夏大学党支部按照中央和市委的指示在日军投降后的十几天里就投入了“庆祝胜利,惩办汉奸”的“打汉奸”斗争,揭露蒋介石政府垄断接受日本投降权利和宽容汉奸罪犯的反革命面目,教育群众警惕蒋帮助政府的内战阴谋,揭开了党领导大夏大学群众进行战斗的序幕。

抗战胜利后大夏大学的第一个学期,于九月间开学,内地部分尚未返沪。上海重华新村部分,在上级党委费瑛的继续联系下,党支部加紧对周围群众开展宣传与组织活动。这时候的上海大夏学生共600多人,这些学生都生长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大部分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具有爱国思想,抗日胜利后大都力图奋发,切望全国各方团结一致开创出一个民主联合和平建设的新局面;但是,也有不少学生对美、蒋反动派的本质和内战阴谋缺乏认识,寄希望于美、蒋的幻想一时不易觉醒过来。

九十月间,国民党、三青团以及三青团控制的学生总会在大夏大学进行了半公开的活动,以关怀青年学生为幌子,吸引学生到他们的周围。10月中旬,“双十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就下达了内战密令,用80万兵力大举进攻我根据

地。解放区军民以自卫战争迎击敌人的进攻。国民党统治区各界人民奋起指责蒋帮的内战阴谋,竟然遭到反动军警特务的镇压。大夏大学校内反动分子歪曲真相欺骗同学,造谣攻击我们党和爱国民主的力量。中共大夏支部党员针对觉悟不同的群众开展不同的宣传教育。对觉悟较早的同学,正面揭露美、蒋的反动面目,并宣传我们党的正确主张;对觉悟较迟的同学,则通过组织同乡同学会、文艺读书会等活动,深结友谊,适当宣传国内形势的真相和爱国民主斗争的意义,帮助他们逐步认识到个人前途、切身利益同革命斗争的联系。党支部周围的进步力量不断扩大。大夏大学“广东同学会”,就在这个时候由党支部分工给党员陈赞培积极活动,团结同学组织起来的。这个“广东同学会”以其团结友爱、活跃求进、维护正义、不畏强暴的特点闻名于众,很快就成为大夏学生运动一支坚强力量。反动势力后来屡次企图瓦解这个团体而终未得逞。

12月20日,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来华“调解国共军事冲突”途径上海。大夏党支部发动同学写信给马歇尔表示“反对内战”、“反对美军驻华”,并通过合法斗争的形式,组织了有代表性的三十几位同学到中央路广场(今中央商场)参加本市40多所大中学校学生的集会,准备去华懋饭店面见马歇尔,表达中国人民反对内战的力量和意愿。国民党的特务、暴徒冲击了学生队伍,毒打学生群众,同学们被激怒了,美、蒋的凶恶面目掩盖不住了,广大群众经受了风暴的洗礼,以游行宣传回击了这一场法西斯暴行,政治觉悟大大提高。

就在“欢迎马歇尔”的同时,上海学生界纷纷议论12月1日震惊中外的昆明惨案。大夏学生代表参加了上海数十所大中学校商讨“公祭昆明烈士”活动的会议。在公祭活动中声援昆明学生的斗争,进一步掀起了上海人民争取民主,反对内战的高潮。大夏党支部发动了60多名同学参加了1月13日在上海玉佛寺举行的万人公祭于再烈士大会上,随同大家一起激愤地唱着“西风凄凄,大地在叹息。……这是什么世界?自由、公理在哪儿?在哪儿?”……与会者回到校内,将公祭情况很快传开,悲痛和愤怒,使不少大夏同学受到了又一次深刻的教育。

1946年初春,大夏党支部蒋丽似、殷去芳已经离校,调来季梅先担任党支部书记,林肖容任副支书,另有两名支委是曹碧琴与高平,这时候党员已经发展到

20多人。党支部发动了同学参加了学生自助自救,用集体力量解决学费问题的义务助学运动,参加“三八节”妇女要求民主和解放的斗争,同之江大学、沪江大学等校共发起了“上海市学生团体联合会”。四月,党支部书记季梅先调离大厦,由副书记林肖容负责领导党支部工作,上级党委由黄素痕来联系大厦。党支部几次考虑发动同学组织全校学生统一的组织“大夏大学学生自治会”,都因进步力量不足、校内反动分子不少、条件未具备而没有决定进行;改由进步力量较多的“广东同学会”等团体发起组成了临时的“大夏大学学生团体联合会”,以协调进步同学和一部分中间同学在爱国民主斗争中的步伐。

1946年5月,蒋帮在公开撕毁“停战协议”之后,扩大了向我解放区进攻的规模。大夏校内的反动分子不时散布“不要弄政治”、“不要被党派利用”等流言蜚语,并以盯梢、跟踪等卑鄙手法企图孤立和威吓革命群众。党支部布置了大夏校内各学院的学员并通过陈赞培、陈志光等党员所领导的广东同学以及另一些学生团体以标语和墙报反击了敌人的阴谋,发动更多的同学投入“反对内战,争取和平与民主”的斗争。在此和战的紧急关头,传来了周恩来同志的指示,要上海党组织积极组成广泛的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统一战线。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和上海学生争取和平联合会为了抢救和平,在6月20日左右共同决定发起组织“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到南京去请愿。6月23日,上海各界人民5万人齐集北站,欢送圣约翰大学学生陈震中、民主建国会负责人胡厥文等10名上海代表去南京请愿。中共上海市学委的主要领导人张本、吴学谦、李琦涛等,乃至中共中央上海局的领导人刘晓、张承宗等同志都亲临指挥,正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青委书记冯文彬也到了现场。大夏大学这一次比前几次更多地发动了200多位同学参加了北站的集会以及会后的示威游行,深刻地教育了群众。在此前后,发展了一批新党员。至7月间,大夏校内的革命力量有了明显扩大。学期结束,国民党为了强化对各校控制,派出大批特务打手监视进步师生,对无辜生以恫吓、开除、逮捕等手法进行迫害。参加“六·二三”反内战运动的大夏学生中,约20人被诬为“不遵守校规”或其他罪名被开除出校,这更激怒了进步同学、家长和社会舆论。党组织将党员和一部分党外进步学生安排转到别的学校,有的被输送到解放区,还有的在社会上就业继续战斗或转到外地去了。

抗议美帝横行,开展“红五月”斗争

1946年下半年,伟大的解放战争开始了。周恩来同志在离开驻沪办事处返回延安前,指示上海党组织必须坚持艰苦的斗争。按照“荫蔽精干,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以利再战”的要求,大夏大学党支部发动党员深入群众,广交朋友,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同反动分子争夺一些学生团体的领导权。这一年,大夏大学原先曾在贵阳、赤水的师生员工陆续回沪上课,全校学生已达1700多人。大夏党支部利用这些机会对内地迁沪的同学开展了交友活动,同时开展了对学校上层教职工的统战工作。大夏校内五个学院中,文学院与工学院的教授不乏进步、开明者,有吴泽、程俊英、陈旭麓、夏炎等多人;每个学院都有进步人士,也都有反动人物,只是比例大小不同而已。分布在各学院里的中共党员,根据不同的条件,针对不同的对象开展了团结、争取或予以孤立等不同的做法。在同学中加快建立各种学术团体、文艺团体、同乡组织以及体育组织等。这一年的下半年,校内几十个学生团体中,进步力量较多的学生团体的为4/10左右,反动势力较大的学生团体占3/10,其余的处在中间状态。学生中来了一大批三青团员和国民党的复员青年军,其中很多人头脑极为反动,也有一些是上当受骗而后来逐渐醒悟过来的。学生工作增加了不少的复杂程度。冬天,党支部陈赞培、陈志光等在巩固发展“广东同学会”的基础上,又同“广西同学会”联合起来成立了“两广学会”。“福建同学会”也有不少进步同学。同时,倾向进步的歌咏队、诗社等,也陆续活跃了起来。

在国民党反动政府血腥镇压下,1946年下半年全国各地工人、学生被捕13000多人,闻一多惨遭杀害,李公朴教授被无声手枪暗杀身亡,上海三轮车工人臧大咬子无辜被逛舞厅的美国水兵活活打死,北平女大学生沈崇在广场上被美国军人强行奸污。种种消息,激起了人们极大愤怒。尤其是沈崇事件,更加燃起各地学生——包括上海各校学生的怒火。消息传来,大夏大学一片沸腾,同学群起抗议暴行。大夏校方当局和校内反动势力竟然讽刺学生们“小题大做”。有正义感的同学们顶住了各种恶毒的攻击,在校内各处贴满了标语口号,上面写着:“强奸了北平同学,就是强奸了我们姐妹!”“谁替兽行辩护,谁就是没

有人性!”代表30万上海学生的“上海学生团体联合会”发表了宣言,一万多学生在1947年的元旦集合外滩举行抗议示威。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形成了,我们党领导的革命人民在蒋管区的第二战场开辟起来了。大夏大学爱国学生在这个斗争中感受到无比振奋。

1947年4月,大夏党支部的上级领导人黄素痕分析了“人民革命的群众运动必然要到来”的形势,同大夏支委会一起研究了大夏的具体情况,成立了以党支部书记曹碧琴为首的部分党员和党外进步同学10人小组。这个10人小组自称为“核心”,经常讨论校内的复杂形势和开展活动的方案,并派党员施智君与非党员沈家麟为校代表同“市学团联”联系,进一步开展同交大、圣约翰等各校进步学生团体的交往。4月上旬发动了大夏160多名同学去无锡搞“春游”,以沈裕华为主要指挥的“丽虹歌咏队”和群众自发组织的“绿野诗社”等团体都纷纷活跃起来,为迎接“红五月”运动创造了思想上和组织上更为有利的条件。

5月初,大夏部分同学参加了由中间状态正在变为坚强起来的交通大学的“五·四”晚会,听了交大同学介绍“反饥饿、反内战”斗争的情况,受到了很大启发。回校后,也举办了一个有1000同学参加的文艺晚会,请民主战士洪琛作关于“五四”运动的讲话,知名人士胡子婴作了关于抗日胜利后“经济形势”的报告,提出了要救国必须开展“反饥饿、反内战”斗争。晚会还演出了揭露国民党法西斯面目和鼓舞人民革命斗争志的《茶馆小调》、《兄妹开荒》、《黄大娘补缸》等节目。

5月19日,国民党政府颁发了《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的第二天,上海几所国立大学30多位学生代表去南京,要求国民党当局停止内战,增加教育经费,提高师生员工的生活待遇。上海各大、中学动员了7000多人到北火车站为代表送行。大夏50多位同学参加了北站的欢送会,会后还同大队一起举行了“向炮口要饭吃”的游行示威。

5月20日,南京和各地去宁的学生代表在游行时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残酷镇压。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五·二〇”惨案。消息很快传到上海,各校学生群情激愤。这时候,黄素痕向大夏大学党支部传达了上级指示,要大夏同各校一起都在23、24两日举行全市总罢课,扩大宣传,向全上海人民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的

云作」研究，迅速向兄弟和兄弟外传，做好响应于状与台及切云迷的准备。为使抗议活动得到广泛支持，先在 22 日组织部分同学在思群堂大会场前面摆起了摊头，发动师生签名抗议当局暴行。22 日晚上，在校园边的一条大河——丽娃栗姐河畔的一间小屋内，召开了“临战”前的两部分党员和党外积极分子会议，研究了当时大夏校内进步力量还不够强的情况，决定 23 日早晨先由部分党员和党外积极分子占领学校钟楼，在上第一堂课前打钟为号，各院系随即发动同学们到大礼堂集合，听取“五·二〇”惨案真相的传达和行动号召。次日，大会按照部署进行。声音宏亮、话语铿锵的党外积极分子陈修仁与南京来沪同学的讲话，激起了广大同学的义愤。特务和三青团分子在会间几次起哄，都被进步同学的纠察队制住了。训导长苏希轼力图阻止大会召开未成，竟然当众哭了起来。大会速战速决，结束时号召全校罢课两天，并组织了 100 多位同学分乘校车由蔡明美、党外积极分子沈家麟等带领去市里游行，留下陈赞培、汤明达等党员与众多同学一起在校内开展各种宣传活动。这次罢课，是抗日胜利后大夏大学第一次全校性大规模的政治斗争，狠狠地给了反动派一次沉重的打击。

正当大夏党支部兴奋地回顾这次斗争的全过程以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反动当局却在策划阴谋。5 月 30 日晚上，在全市范围内进行了一次大逮捕，在各处抓走了 60 多名大学生。大夏非党员学生徐鑫、金时豪、凌学渊、宋丕文与党员桃易军同时被捕。事后，学校当局公布开除了这 5 名同学，连同汤明达、张昌道等 3 人，一共 8 位同学被开除出校。党组织一面根据情报和分析将可能已被敌人注意的党员和党外积极分子作了转移，一面决定发动各方营救同学。由施智君与沈家麟等代表同学去拜访、慰问被捕者的家长，动员社会舆论展开营救。大夏的营救组织是全市营救被捕同学后援会的主席团成员之一。大夏大学以蔡明美（党支部委员）、朱成钊（党员）、沈家麟（党外积极分子）等 10 人组成代表团，去市政府面见国民党市长吴国祯，要求立即释放被捕的同学，正气凛然，吴国祯理屈词穷而找机会逃脱。学期结束时，群贤堂教学楼贴出了校方布告，开除了朱成钊等 20 位同学。党支部书记曹碧琴安排了沈家麟、陈修仁等研究，

决定由沈、陈两人代表大夏,同交通、复旦、暨南大学学校的代表一起赴宁请愿。到了南京,先后走遍了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教育部和司法部。陈修仁引用了国民党当局颁布不久的“宪法草案”驳斥了当局的无耻谰言,还在记者招待会上揭露了反动派镇压学生正义运动的罪行。

沈家麟与陈修仁回沪后,在校内召开各社团联席会议,介绍了去南京请愿的情况,印发了“请愿纪要”给本校各社团和广大同学。暑假中,陈修仁也被学校无理开除了。大夏进步力量受到了一定的挫折。党组织将陈修仁等几个人转送去解放区,安排了另一些党员转到别校或转向社会就业继续战斗。同时,在大夏校内进一步开展了发展新党员和扩大积极分子队伍的工作。这一学年结束的时候,大夏中共地下党员发展到30多人,紧密团结在党支部周围的党外积极分子有一百七八十人,这些党员和积极分子广泛地联系着校内各学院、各学系、各位同学以及部分教职员工,利用各种合法条件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生活性和政治性多形式的斗争。在社会舆论压力和各方面努力下,反动当局不得不将大夏前些时候被捕的学生先后在同年夏秋之间释放了出来。

反迫害,反卖国,大夏争“国立”

1947年“红五月”之后,大夏大学由于入学条件较松和学生成分复杂,反动势力较大(有军统特务、中统特务,有国民党骨干、三青团骨干,也有各种杂牌的反动组织分子),反动当局不断加强对大夏大学的控制,以致大夏进步力量两年来几度处于“发展——挫折——又发展——又挫折——再发展”的曲折而艰巨的局面。1947年夏天,有同学听到校内的一伙反动分子背地里在议论,说大夏共产党和周围的人共约300人,说他们自己也有300人左右。在蒋管区,总的条件是敌强我弱;在大夏大学,这个时候总的条件也是敌强我弱,革命斗争是复杂而艰巨的。

秋季学期在9月上旬开学,大夏党支部决定由校内各社团共同组织起来欢迎新同学,搞好与新同学的联系,团结更多的同学。大夏党支部原来担心走了不少党员,现在一下子又调来了许多。原来南通学院的党支部委员马之骏来了,中学里的党员骨干叶公琦来了,“六·二三”赴京代表圣约翰大学陈震中的

弟弟陈震海也来了，杭州之江大学的党组织负责人郑广裳、张景辉、薛家德和善于做群众工作的王迅攸、周启元等 11 名党员还有一些党外爱国同学也来了。上级党委负责联系大夏的黄素痕考虑到党组织的安全以及有利于直接熟悉新到大夏的党员，把原来大夏留下的曹碧琴担任书记的党支部，之江大学来的 11 名党员另外编一个由郑广裳担任书记的党支部；这两个党支部都由黄素痕自己分别联系，不让两个支部发生“横关系”。同时，还把其他学校转来的马之骏等十几名党员分别编组，也由黄另外联系。

9 月、10 月，大夏校内这 50 名左右的党员和爱国同学们分别活跃在各学院、各学系和自己的班级，有的还活跃于同乡会、歌咏队等社团，有沈裕华、董景星指挥的“丽虹歌咏队”，朱萍影、庄家春、姚芳藩为骨干的“丽娃宋旦剧艺社”，等等。还有之江大学来的薛家德推动理工学院部分同学发起组织了“Happy voice club(快乐歌声社)”。党组织研究了反动派部署要在大夏大学对学生政治活动加强控制的情况，考虑到要特别注意精干力量的隐蔽，不让曹碧琴、郑广裳、张景辉、马之骏等公开担任群众团体的负责职务，也不允许这些党员在群众场合过于活跃。这些党员的主要任务是做好党支部和各个党小组的领导工作。经过两个月深入群众的宣传组织活动，广交朋友，党员们普遍都团结了好些群众在自己的周围，使党的政策和各项主张的影响在同学中日渐扩大。10 月底，党组织得到了反动派要逮捕之江大学担任过学生自治会总干事的党员薛家德的消息，及时地将刚进大夏只有一个多月的薛家德作了转移并送去浙东我们党的根据地。薛后来在浙东战斗中被捕，惨遭活埋，壮烈牺牲。

虽然在教育学院、文学院、理工学院的一些学系里扩大了进步力量，掌握了更多学生社团的领导权；但是，不开政治气氛浓厚的大会，不组织示威游行，没有发动罢课。有些党员不习惯连续几个月这样对中间群众深入细致地耐心进行工作，感到不上劲，感到憋不住气。10 月下半月，传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关于“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号召，党员们和党外积极分子的精神为之大振。11 月初，传来了一个消息——杭州曾任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的于子三被反动当局秘密逮捕并在狱中杀害了。这个消息引起了上海各校富有正义感的学生们的愤怒。为了抗议反动政府杀害于子三，上海学联号召各校在 11

月11日用罢课、素食等方式表示哀悼和抗议。上级党委指示大夏党组织要在校内尽力发动一次罢课,就是罢课半天也好。黄素痕一面部署各个党组织,一面让马之骏、陈赞培、周启元等党员同沈家麟、张华宜、吴中一等党外积极分子共七八个人以“好同学”的关系共同商议如何通过各个学生团体发动校内同学来一次罢课。这七八个人秘密聚在一起,自称为大夏的“总核心”。“总核心”商定找几个适当的同学在11日中午以后第一课快上课时抢占学校钟楼,鸣钟集合同学,同时在校内张贴大量抗议杀害于子三的法西斯暴行的宣传品。这个方案在各学院产生了不小的反应,有的党员(如王迅攸等)和党外积极分子认为这样搞罢课可能使很多中间同学接受不了,弄得不好会使进步力量暴露。但是,较多的党员和党外积极分子兴奋地接受了这个方案。最后,各个党小组坚决服从并贯彻了这个决定。11日这天,大夏部分社团联合请来了圣约翰大学学生自治会阮仁泽,在鸣钟后,同学们集合来到思群堂,阮仁泽在大会上介绍了于子三受害的情况并宣布圣约翰大学同学们已决定罢课抗议的消息。大夏一个党支部委员、法学院学生金明远在台上激情地号召大夏同学也以罢课半天的行动来抗议暴行,会场上四五百个同学群情激奋。这时候,大夏大学商学院的挂名学生、军统特务骨干分子龚云亭等带领了大批专事镇压群众运动的反动武装人员,冲进了学校,挥舞棍棒绳索,强行临时“戒严”。校内各派反动分子紧密配合,大会会场受到了冲击。进步同学组织起来的纠察队抵挡不住,连“两广学会”也难以施展威力,于是带领部分同学高喊“军警退出学校”,“特务退出学校”。学生团体代表要求学校当局出来交涉以保证代表的安全,也得不到结果。反动分子们挤入人群叫嚣着要抓走阮仁泽和金明远等。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在场的党员张景辉急中生智,在人群中挤了一下就在离开军统特务龚云亭等人不远的地方倒在地上,大声呼叫“救命呀,不要再打人呀!”装成被打伤了的样子,叫个不停。反动分子们一呆,注意力集中到他身上,停住了手脚。一些党员和进步同学乘机掩护了阮仁泽和金明远等离开会场从小道安全撤离学校。张景辉也被一些同学抱起送出会场转移了。事后,反动分子们想起当时的情景,感到这个剃着光头宁波口音的学生——张景辉有问题,要追查已经来不及了。张景辉离校后,按照党组织指示隐蔽了一段时间,在1948年春转到解

放区去了。

为抗议杀害于子三而罢课的几天之后,大夏十几个社团酝酿着要成立大夏学生自治会,党组织决定领导起这件事。一天,校内政见不同的几十个社团在一个在教室开会讨论关于组织学生自治会问题,正在争论不休时,会场外的反动分子同保护会场的纠察冲突了起来。纠察中的“两广学会”骨干、中共地下党员黄国珍和一些进步同学呼喊着重要“抓特务”,这些反动分子们慌了手脚转身逃窜。反动学生王国珍逃到一个房间里从窗口跳出不见。坏蛋们乘机倒打一耙,造谣说“王国珍失踪了”,叫嚣要两广学会交出王国珍来,还到训导处去哄闹着重要逼迫“赤色学生”离校。其实,反动分子王国珍是躲了起来的,没几天就露了馅。反动当局不顾舆论,开除了大批学生。两广学会会长、共产党员陈赞培被迫离校,“两广”勇将温世华也被迫离校,胡开铭、金明远、仇世荣、施智君等党员连同一些非党员,共有30多名学生被迫退学了。大夏的进步力量又一次受到了较大的挫折。这时候,不少中间群众增添了对政治斗争的恐惧情绪。大夏党组织随即同各学校一起开展了反对无理开除学生的反迫害斗争。这个反迫害斗争,向社会控诉反动当局的罪恶,争取社会对学生运动的更多支持。这一年的冬天,大夏党员约有50人,后来转去解放区的有6人,毕业离校或未毕业转去另外单位的有9人。

1948年元旦前后,学校面临期末考试。寒流接连南下,同济大学的党组织首先发动了众多同学上街劝募寒衣救济受寒饥民。各大、中学校纷纷响应。大夏党组织也发动了各学院同学组织劝募队伍深入到各商店里弄去活动,通过这一运动启发同学组织认识造成饥寒交迫的原因,认识反动政府统治下这个社会的致命伤。这是学生运动低潮时开展的一次大规模争取生存权利斗争,争取了社会同情,团结教育了中间群众。大夏这次活动的参加者有400多人。期考结束后,又开展了每学期一次的助学运动。

1月中旬,发生“九龙事件”。上海市学委决定抓住美、英之间的矛盾,利用“反英”的合法性开展一次斗争。大夏大学党组织发动校内部分社团号召组成了“爱国护权会”,由沈家麟、张益群等迅速同交大、约大、同济等校联络,16日在交大举行了70多所大、中学校4000多学生参加的“抗议九龙暴行大会”。17

日午后,大夏发动300多同学前往外滩,参加了各大、中学校联合举行的示威集会。会后,将近2万人的队伍游行到外滩公园斜对面的英国领事馆门前,推派了几名代表进去递送了抗议书,然后展开了游行宣传。队伍高喊“绝对不能容忍英帝制造九龙暴行!”等口号。

1月下旬,学校已经普遍放假。上级党委黄素痕召集了曹碧琴、郑广裳、马之骏、叶公琦4人,宣布组织决定:曹碧琴已在大夏毕业,离校另行安排工作;大夏共50多名党员,合起来建立一个统一的党的基层组织,由郑广裳任书记,马之骏任宣传委员,叶公琦任组织委员。郑联系商学院与教育学院的党组织,马联系法学院与理工学院的党组织,叶联系文学院的党组织。

1月26日,黄素痕传达了党组织的决定,要发动大夏同学前去同济大学支持同济学生自治会的斗争。这时正值寒假,中间群众对这种面对面的政治斗争抱回避态度,各校发动同学甚为困难。大夏党组织执行上级指示,尽力发动了党员、党外积极分子和一些中间群众共120多人,在1月29日黎明赶去其美路(今四平路)同济大学的工学院,参加了声援同济同学自治会的队伍。大夏队伍的公开指挥兼联络是法学院的沈家麟和理工学院的周同揆。郑广裳、叶公琦也随队伍到了现场,时刻向队伍中的大夏党员骨干作具体部署。黄素痕与上级党委一些领导同志也在现场秘密指挥。前哨同学报告说发现反动军警两三千人分几层包围圈逼近同济。近午,国民党市长吴国桢和警备司令、警察局长等都出现了。同学们围着他们,要求撤退军警,反对迫害学生。反动当局早有预谋。谈判未成。下午3点钟,现场秘密指挥的上级党委领导人决定大家不要离散队伍。大夏执行了这个决定,同各样同学一起调整队伍,坚守岗位在同济门外的田野上。4点左右,反动当局以骑警队与刺刀冲击学生群。学生以石块、泥巴还击。但是,力不抵敌,一部分学生自行散去,多数学生转退同济校内。当场受伤、失踪百余人。入夜,大夏队伍遵照各校代表商议的决定,同各校同学2000余人齐集礼堂,以歌唱、舞蹈等活动相互鼓气。夜深,反动军警破门冲入礼堂,以绳索将场内学生拦切成若干小块,以木棍、钉棒、枪柄等凶器袭击学生,学生坚持搏斗直至深夜,被一个一个拉出礼堂,抓走了一批。下半夜,各校当局纷纷来人点领本校学生离开同济,并趁此机会查抄参加这次活动的学生姓名。大夏

学生亦被学校来人领出同济。在陈震海等一些党员和群众的掩护下,郑广裳、叶公琦等避开了反动分子的眼目,安然离去。数日后,组织查明,大夏一名未注册入学的党员唐进和在同济被捕了。唐被关押一个多月后释放,经党组织送了解放区。

同济“一·二九”事件之后,反动派疯狂逮捕、开除学生,上海学生运动一时转入低潮。2月,学校开始新的学期,大夏新从别校转来了一些党员,有马玛丽、朱焕文、华联奎、曹锦苏等;又新发展了张善潮、俞其中等入党。上级党组织决定利用各校一年一度的春假,通过市学联发动一次4月上旬的“春游”,以利各校进一步团结群众,鼓舞斗志。大夏20多个学生团体联合向校方交涉,学校终以4月8-10日放春假3天。“春游”,这是一种广受群众欢迎的兴趣活动。大夏张善潮等先去杭州联系,落实在浙江大学住宿,安排同浙大进行一次不公开的进步同学关于民主运动经验教训的交流。这一次由进步力量领导起来的春游团,共组织了500多人,多数是中间同学。另外留下马承源等一批党员和积极分子在本校,观察反动分子的动向,酌作对策。大夏反动分子见势另组旅游队伍近百人,也到了杭州,造谣污蔑并企图瓦解我春游团,但终未得逞。“大夏春游团”经过同浙大学生联欢、交流,感受了浙江大学当时的民主空气,深感利用合法条件和对上层教授有选择地进行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士气为之大振。

4月间,叶公琦的工作有调动,关系转出大夏。新调来中学区委委员屠国维任大夏党总支委员。党总支委员会由郑、马、屠3人组成。

春游归来不久,经过整理、巩固,发展了革命力量。党总支研究决定着手组织5月初的纪念“五·四”的活动。以校内各社团联席讨论的方式,选定了5月2日在校内举行一次“文艺晚会”,请校方教务长鲁继曾等参加,请许杰等知名教授演讲,并由理工学院同学吴中一通过关系借来当时的进步电影《追》,以两广学会为主组织了100多名纠察在礼堂内外加强保卫。是日,近2000名同学参加在“思群堂”举行的晚会。会间,师生共同回顾“五·四”光荣革命的传统,追溯“五·四”以来的国情,深感“民主”尚未得到保障,“科学仰仗洋人鼻息,今日又是美帝扶植日本军国主义”。群情激愤。同学们演出的文艺节目,革命气息浓厚。反动分子几次在场内起哄都被压了下去。最后,放映电影《追》,中途,

电源突被切断,全场一片黑暗。混进会场的反动分子抽起场内的板凳猛地向师生们劈来,反动当局的政治警察也大批涌入校内临时戒严。挂名学生、苏北流亡协会分会理事长、军统特务骨干龚云亭,带了大批反动分子大肆活动,校内一片混乱,学生多人被打伤。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同学们被迫不得不散回宿舍或者离校返家。3日晚,邻近的圣约翰大学举行纪念“五·四”晚会,经过联系商议,大夏发动将近200名同学前去约大,晚会下半段由大夏理工学院同学周同揆上台控诉反动派昨夜在大夏的法西斯暴行。约大同学热情慰问,并表示声援大夏反迫害的斗争。深夜,大夏同学乘兴整队返校,在校园内游行示威,高呼口号“反对迫害学生”,“特务、打手退出学校”,“不准军警进入学校”。轻敌情绪一时控制不住,游行时间过长,郑广裳等紧急通知骨干及早解散队伍。但有五六十位同学未听劝告,继续游行,被预先埋伏的特务打手窜出以钉棒、木棍打伤。夜半,得悉住宿校内的华筠(中共党员)、张瑛然、钟国英等3位女同学被抓去了。进步、中间社团急议,一面派出代表要求校方交涉释放同学,一面准备天亮后即向全校及社会揭露,控诉当局的法西斯暴行。次日,3位女同学都被放回校。5月4日,上海大、中学校几十所联合起来在交通大学“民主广场”举行纪念“五·四”的“营火晚会”。大夏组织了一批同学前去参加,以鼓士气。当大夏300多名同学进入交通大学时,深深地呼吸到了民主的空气。交大新任校长程孝刚与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相似,都是国内科技工程界地位很高的知名人士,而且都是主张“民主治校”的,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学生在校内开展民主活动的自由。营火晚会上,15000多名各校同学,此起彼伏地高唱讽刺反动统治的《古怪歌》:“往年古怪少哇,今年古怪多呀!……只许黄狗汪汪叫呀,不许人们用嘴来讲话!”唱着要求民主自由的《茶馆小调》:“……倒不如干脆,大家痛痛快快地讲清楚。把那些压迫我们,剥削我们,不让我们自由讲话的混蛋,从根铲掉!”在大会上,大夏同学代表控诉了反动当局5月2日、3日在大夏血腥镇压学生民主活动的罪行,激起会场上的义愤。这时候,大夏更多的进步学生在革命斗争中成熟起来了,秘密寻找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途径。党经过审慎的考察,吸收了沈家麟等一批新党员。解放大军在4月下旬收复延安的消息传来,大夏全体党员和积极分子精神大为振奋。

5月下旬,社会上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的呼声日益高涨。6月1日,上海各大学校长、教授300多人联名发出电报,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大夏校内各社团纷纷贴出墙报和举行座谈,共议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形势。大夏党总支决定发动大夏同学参加计划于6月5日举行的全市学生“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大示威。是日中午,大夏同学200多人分路前去外滩集合。3时许,各校学生齐集外滩已有5000人。在现场秘密指挥的有中共市学委领导人张本、钱李仁等。大夏得到黄素痕的指示,鉴于形势对我不利,要相机行事,不宜硬拼。反动军警特务终以刺刀、枪柄、木棍冲击学生队伍,滥打滥抓。黄昏,增加大批马队骑警驱散学生队伍。大夏学生化整为零,向各街人群展开宣传,并将剩余传单散发完毕,完成了示威宣传之目的。事后得悉大夏这次未曾有人受伤。党员周启元一人午后在中山公园前门车站候车时被抓,问不出什么,关押3个多小时就放了出来。另外,积极分子周同揆一人在外滩被抓,经过营救,关了一些日子也被保释了出来。

抗日期间,大夏内迁时,当时校长屡谋申请改为国立而未果。1948年6月,大夏一部分学生再次酝酿切望学校由私立改为国立。大夏党总支研究,认为这是师生员工大家欢迎而政府当局甚感为难之事,决定发动群众争取将学校改为国立。6月18日,几十个学生团体联席会议决定推派代表说请校方向政府提出要求。方案既定,次日即由学生代表面见教务长鲁继曾,要求将本届学期考试推迟数天。20日,毕业班学生举行毕业典礼之后,即以学生团体联席会议之名召集全校学生大会,动员全校同学团结一致争取学校改为国立,同时力请学校当局派出代表与同学一起去南京向教育部提出将学校改为国立的要求。大会意见得到广泛的支持。当场选出了“国立运动主席团”,这个主席团里面有中共党员,有三青团员,也有几个在群众中有声望的中间人物。黄素痕鉴于“国立运动”的声势较大,决定在党总支之下成立一个临时“党团”,由黄素痕亲自联系部署工作。这个党团成员有党总支委员马之骏、教育学院党支部书记王迅攸、文学院党支部书记马玛丽和另一党员朱焕文,由马之骏兼党团书记。“党团”决定通过“国立运动主席团”号召全校同学罢课3天,催请校方派出代表与学生代表同去南京。校方不允派出代表,学生代表自行去宁请愿。请愿未获结果,

继续罢课。党总支考虑到斗争应该有理、有利、有节,决定做通大家思想工作,立即复课继续斗争。然而,当局竟然宣布学校提早放暑假。此令一下,师生陆续星散。党组织再做群众工作,终难留住多数。

7月,大夏学生陆续有七八十人接到校方开除学籍或着令退学的通知,其中有中共党员二十几人,非党员积极分子三十几人,其余为一般群众和个别不显眼的反动分子(敌人故意安排搞“红旗政策”的)。黄素痕对党总支同志说,反动当局可能已在策划大肆袭击进步力量,要将一些可能已被敌人注意的党员和积极分子隐蔽起来。经研究,决定要马之骏、马玛丽、王迅攸、周启元、沈家麟、张华宜等多人离开自己家庭设法暂住亲友比较隐蔽的地方。

8月18日,党总支委员会3人按照黄素痕的指示,到党员顾以恭在昆山的老家住几天,秘密总结大夏一年来的斗争。黄素痕也到了昆山。总结时,一致认为合法条件利用不够。对上层(教师和社会知名人士)争取支持的工作也着力不多,未很好地在“有理、有利、有节”的“节”字上多下功夫。当时,研究决定二十几名党员和一批非党员积极分子分一批转到解放区去,其中包括马之骏、王迅攸、马承源、周启元、沈家麟、张华宜等,另外,又安排了一些党员和积极分子转移单位隐蔽活动。

8月,王迅攸、周启元的家中已发现敌人追捕。严重的是,马玛丽在党组织决定转送去解放区并已接上了“交通”关系之后,在暂时隐蔽的住处被敌人逮捕了。事后了解,是“交通员”出了事故被敌人逮捕,接着就逮捕了马玛丽。马玛丽在押几个月后,经营救和家属出钱设法保释了出来。反动派还把姚芳藩、朱杏桃等群众也抓去,关了一段时间。

这期间,苏南系统的中共党员秦和鸣等在大夏大学校内将运动中锻炼出来的几名学生吸收入党,在大夏另建几个人的党支部,专事调查研究、学习文件、发展新党员,有时也配合学生运动做一些工作,与大夏党总支不发生“横的关系”。

加紧组织,冲破黑暗,迎接解放

9月,学校开学了。黄素痕要郑广裳另搞“交通”,不再负责校内工作,帮助一些人员准备好一切,在适当的时候先后分批转送去解放区。留在大夏的原有

党员屠国维、徐惟诚、韩光远3人组成。由屠任书记。

1948年的秋季学期,人民解放战争已经进入决战的前夜了。国民党政府拼力垂死挣扎,学生运动很难开展。屠国维等将各个党小组细致分工,深入开展组织工作,公开主要搞社团的生活、文娱、学术等活动以广泛团结中间同学,半秘密地在中间偏进步的群众中宣传“国民党反动派必然倒台,人民革命必然胜利”的形势和道理,有党员和非党员积极分子中开展关于“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及“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等内容的教育。除了在校内开展工作外,还安排劳敏霭、郭蓉、薛浩庆等几名党员组织一些同学在邻近开办民众夜校,把大学生中的工作同劳动群众中的工作结合起来,发展革命力量,积蓄革命力量。12月间,鉴于郑德宏不宜留在上海,决定送去华中解放区。

年底前后,大夏党支部按照上级部署,组织力量编写发给学校反动分子的警告信,针对反动程度不同的对象写上不同的语句,要这些人准备好向人民投降。这些警告信发过3批,发给对象共200多人,是按照上级组织交来和各个党小组提供的名单发的。信发出后,有些人就在校内销声匿迹,有的还故意作态,实则已是色厉内荏了。当然,花岗岩的反动脑袋还是有的。

1949年的元旦刚过,大夏理工学院的一名新党员薛浩庆突然被敌人逮捕,据了解是革命书籍保管不慎被人发现了。薛被捕后,牵连另一党员劳敏霭也被捕了。劳在狱中受刑致残,坚贞不屈,没有暴露自己党员的身份,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气概,关了两三个月才被设法保释了出来。上级考虑到党组织的安全,决定将屠国维、韩光远等几名党员和非党积极分子在一月间交由郑广裳转送去解放区。

在黄素痕的安排下,自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先后将党员和非党积极分子马之骏、王迅攸、马承源、周启元、黄连海、李英萍等50多人转送去苏北、华中解放区,转送去大别山中原解放区的有曹碧琴、徐文逵、屠国维、韩光远等20多人,总共约80人。他们中大多数是大夏大学的,少数是大夏以外的人员。

1949年1月底,北平解放了。2月,党组织认为反动当局对郑广裳不很注意,结束转送人员去解放区的工作,立即设法返回大夏大学。学校在2月中旬

开学,党组织安排了一大批党员转到大夏大学来。黄素痕召集了郑广裳、徐惟诚、徐英伟3人,宣布成立大夏大学新的党总支委员会,由郑任书记,徐惟诚任宣传委员,徐英伟任组织委员,3人分工联系大夏几个学院的党组织。华联奎、毛乾华调出大夏搞党的调查研究工作。这时候,大夏党员共有50多人。黄素痕传达上级指示说,要揭露国民党玩弄假和谈求取喘息时间的阴谋;由于解放军强大,解放上海不需采取武装起义的方式,而要我们更广泛地组织群众,在大军解放上海时作好配合,接管好城市,建设新上海。于是,党总支随即一面部署成立各个分党支部,加速整顿和发展学术性、生活性、联谊性的各类学生团体,特别是发展各学院的学会、系会和各班级的组织,极力争取更多的领导权;一面深入宣传“揭露假和平,争取真和平”,“新民主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共产党和老百姓是一家人”。为了在党组织与群众之间有更好的联系条件,也为了把全校进步力量更加严密地组织起来以适应迎接解放的需要,3月初建立了党外围的秘密组织——“大夏大学新民主主义青年联合会”简称“大夏新青联”。成员近200人,把这几年经过斗争锻炼,要求参加革命的进步同学大部分组织进了“新青联”,大大有利于各项工作的开展。经研究,“新青联”的总部由党员张善潮和党内外共4人组成,而实际上是由各学院的分党支部在领导,新青联总部并不清楚下面组织的全部情况。

3月间,冷落了几个月的“两广学会”振奋起来了,全校女同学的统一组织“女同学会”组织成功了,原先为反动势力控制的“江西同学会”、“安徽同学会”的领导权也转到进步同学手中来了……剩下少数为反动分子把持的社团如“苏北同学会”、“清流社”等,已是日薄西山的局面。军统骨干龚云亭也不见踪影了。党总支分析这时候的形势,认为敌人正在制造种种和平假象,一面大批撤退力量向南,一面可能在其统治区准备疯狂屠杀我革命力量,我们决定提高政治警惕,争取校方中间力量支持,联合吴泽、陈旭麓、夏炎、程俊英等教职员中可以联合的更多力量,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工作。

当局宣布停学,疏散学生,不准学生留校。党的工作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党总支发动同学千方百计在市内找到可以集中落脚的地方安置同学,在愚园路的“好莱坞花园”安置了200多人临时住宿,几所中学安置了几百人,几所同乡

会馆又安置了几百人。两三天内,党组织迅速恢复了联系,大夏“新青联”也继续展开了活动。按照上级党委指示,一面组织起来慰问同学家属,积极营救被捕同学;一面很快就建立起秘密的“大夏大学人民保安队”和“人民宣传队”,这支专门迎接上海解放并配合解放军进城工作的队伍发展到约400人,开展了调查敌军驻地情况、了解敌人军力和动态、绘制详细街坊地图、宣传党的城市政策等工作。

自2月底到5月下旬,大夏党组织陆续发展了共计30多名经过锻炼和考察的新党员,党总支所属党员到5月下旬共有89名。

5月25日,人民解放军从沪西、浦东两面攻入市区,苏州河以南地区先获解放。5月27日,上海全部解放。大夏大学党组织带领400多名人民保安队、人民宣传队(其中不少是“新青联”成员),在上海即将全部解放的时刻,先后汇集到设在圣约翰大学校园内的上海市人民保安队沪西指挥站,接受上级领导人季梅先、黄素痕布置的战斗任务,适时散发城市政策宣传资料,配合解放军抓捕敌人,维护社会治安。军统特务骨干龚云亭很快就在浦东被抓住了,一些罪恶累累的反动分子也陆续受到了人民的制裁。大夏在押的同学,除早些时候已经陆续保释出来的以外,剩下包括查汝勤、吴菊贞等在上海解放的当天破狱而出,获得自由。

6月,大夏党总支组织力量兵分两路:一部分由郑广裳、徐惟诚、杨鸿训等带领的同学队伍配合解放军和军管会投入了社会上的治安和政治工作;一部分由徐英伟、查汝勤、张凤宝、程传泰、程能荣、张善潮等带领的同学队伍返回校园会同吴泽、陈旭麓等教授和学校教职员一起,修复被破坏了的中山桥,重整校舍,整理学校,迎接解放后新的生活。黑暗已冲破,光明已到来,人民自己的新中国在招手,夏去秋至,大夏1000多位学生,除一部分在校外,在党员带领下参加了人民公安、人民经济、人民革命大学、青年干部训练班、西南服务团、南下服务团等革命工作,踏上了新的战斗岗位。

青春热血 爱国篇章

程卫军

华童公学创办于1904年。早在“五四”运动期间,全校师生就积极投入到反帝爱国运动中;到中国大革命时期,又参加了伟大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成为上海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

1945年9月,在抗日战争取得最终胜利,民族精神极为振奋的日子里,上海人民为纪念“八·一三”淞沪抗战中驰名中外的抗日将领谢晋元,把具有光荣反帝爱国传统的“华童公学”命名为晋元中学,这是沪西地区唯一的一所市立中学。

1945年抗战胜利后,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晋元中学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建立了地下党支部,学生黄克欧、郭丰敬、倪执中、钱亦琳等都是该校早期的地下党员。

为了建立组织,壮大队伍,开展斗争,晋元中学地下党先从关心帮助同学做起。1945年暑假,他们联系了一部分家境贫寒的同学,到社会上勤工俭学,搬运大米、大豆等。后来还在现南京西路茂名路口摆了一个修理自行车的摊子。地下党员一面以自己的劳动收入来帮助濒于失学危机的清寒同学,一面以此为据点联络同学、团结同学。不久,地下党在校内发起组织了以地下党和进步学生为核心的学生组织“力行同学互助团”,广泛地开展生活性活动,如搞乐队、教唱歌、演话剧、办讲座、踢球、远足、野餐等。地下党员在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和广大同学联络了感情,交流了思想,很快吸引和团结了各年级的一大批同学,并且培养了不少积极分子。随着工作的深入,地下党还领导开展各种形式的宣传工作,如组织读书活动,引导学生阅读进步书刊;绘制壁报,宣传解放区进步情况,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发表对社会问题的看法等,促进了许多同学的思想

进步,为地下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和组织学生投入反饥饿、反内战、争和平、争民主的革命斗争创造了条件。从1945年下半年到1949年上海解放,地下党在晋元中学先后发展了将近40名党员,使晋元中学成为当时地下党力量较强、工作开展得较活跃的一所市立中学。

晋元中学学生在地下党领导下的第一次政治性斗争,是1946年1月13日参加在玉佛寺进行的公祭昆明“一二·一”惨案死难烈士,声援昆明学生的反内战斗争。

1945年12月1日,昆明国民党当局出动大批军警特务,武装镇压反对内战的大中学校师生,于再、潘琰等四人被杀害,数十人受伤,这就是震惊全国的昆明“一二·一”惨案。

消息传来,激起晋元中学同学的强烈反响。“力行团”举行集会,请领导晋元中学地下党的市委王光华同志作演讲,报告了“一二·一”惨案的真相,揭露了国民党政府的法西斯暴行。在地下党组织下,学生们勇敢地走出校门和上海各界一起声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暴行。

1月13日凌晨,学生就冒着寒风成群来到槟榔路(安远路),涌进玉佛寺。晋元中学与玉佛寺毗邻,学生们来得特别早,有的学生还参加会场布置。主祭团由宋庆龄、柳亚子、马叙伦等七人组成,参加公祭的有上万人,气氛肃穆悲壮。会后举行了浩大的示威游行。晋元中学学生结队前行,沿途高呼口号:“人民不死!”“要求真正民主!”“严办昆明惨案凶手!”游行示威持续到傍晚。从此,晋元中学学生积极投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伟大斗争,在上海学生运动中写下了光荣的一页。

1946年4、5月间,晋元中学学生参加上海市学生团体联合会,并投入全市性敬师运动,为支持教师的反饥饿斗争而筹募款项。

1946年6月23日,上海各界人民发起组织“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赴南京请愿。晋元中学同学到北火车站为代表团送行,并参加送行以后的呼吁和平、反对内战的游行示威。

1946年冬,在地下党学委领导下晋元中学与育才、格致、市西、敬业、女师等13所市立中等学校,组成“市校福利会”,晋元中学学生黄克家、倪执中先后与

女师沈如恂、育才吴宗麟组成党组，领导市校福利会，团结广大师生开展维护学生读书权利，保障教师生活的斗争。

1947年元旦，晋元中学学生参加抗议美军暴行大示威，并投入“抗议美军暴行，要求撤退美军周”的斗争。同学们秘密印刷、张贴传单，有时通宵达旦。

1947年5月20日国民党反动派在南京、北平、天津等地残酷镇压学生，制造“五·二〇”流血惨案。晋元中学地下党发动和领导学生罢课，在校内演讲，并组织惨案后援会，抗议迫害学生。

1947年5月底6月初，晋元中学学生会，加入地下党领导的上海市学生联合会，即上海学联。

1947年冬，晋元中学学生积极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全市性救饥救寒运动。同学们走上街头为受到内战、天灾祸害的失业工人、难民劝募寒衣。该校蔡尔轨同学向亲友募得几十件寒衣交给学生会救济灾民。

1948年1月，晋元中学学生到外滩游行，向帝国主义示威，抗议英美在华暴行。

晋元中学学生在斗争中英勇而机智。1948年1月17日，地下党决定组织学生参加上海学联发起的游行，向英国领事馆示威，抗议香港英国当局在九龙枪杀中国居民的暴行。那天上午，该校地下党员舒家骧通知积极分子，下午在外滩有反帝示威，迅速发动同学参加。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为了阻挠学生的爱国行动，下令各汽车出租公司：“一律不准出租汽车给学生。”中午，舒家骧就打电话给祥生出租汽车公司，说马白路号要搬家，请马上来一辆卡车。一会儿，卡车来了，正在找哪一家要搬家，舒家骧一声招呼，早就等候着的同学冲上去，挤满一卡车。学生们要求司机支持反帝斗争，请他把车开到外滩，司机同意了。学生们顺利地到达外滩，冲破了反动派的阻挠，参加了大示威。

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晋元中学的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英勇地站在反帝爱国和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斗争的前列。他们中有的遭到反动派逮捕或追捕（如黄家克、张福海等）；有的被学校当局开除（如吴庆培、许铁如等）；有的毅然奔赴苏北、浙东等解放区和游击区参加革命斗争（如倪执中、贾福根、徐思祖、钱亦琳、陈隆培等）；还有的地下党党员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如郑炯芝）。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保卫千百万先烈用鲜血换来的革命果实,为了中华民族不再遭受帝国主义的蹂躏,晋元中学师生满腔热血投入到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中去。学生纷纷报名要求参军,1950 和 1951 年晋元中学先后有 100 多位同学参军参干,有的赴西南服务团肃清残敌,有的到军事干校,不少同学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一批又一批的晋元中学学生同唱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当祖国需要的时候……”告别母校奔赴炮火纷飞的前线,留校的师生们含着热泪欢送,该校老师和老校友至今回忆起感人情景仍激动不已。晋元中学的反帝爱国传统在共和国的初创年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



附录 1:

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

(1949 年 1 月 8 日)

毛泽东

(甲)目前的形势

(一)军事方面,一年计划,半年超过。一九四八年七月至十二月歼敌正规军一百四十八个师,内有一百一十一个整师。平津、淮海、太原、大同诸役结束时,又将歼敌六十几个整师。上述已歼及将歼两项共计二百一十个师以上,内有一百七十三个师以上是属于整师。一九四九年春季以后,国民党就只剩下一百六十几个师了。其中大部分是新编成的,或者是被歼后补充起来的,或者是战斗力不强的,只有一小部分具有较强的战斗力,例如桂系和马家^[1]。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可能动员五十万人左右,除补充已有各师外,将编成若干新师,但是毫无战斗力。在平津、淮海、太原、大同诸役以后,可不可以说国民党政权已经在基本上被我们打倒了呢?就其军事主力已经被歼灭这一点来说,是可以这样说的。但是在南京、武汉、西安等处还有几个大仗要打。在打了这几个大仗以后,那么,不但就军事上来说,而且就政治上和经济上来说,国民党政权是被我们基本地打倒了。基本地打倒了国民党,不等于全部地打倒了国民党,中国尚有许多敌军待我们去歼灭,尚有许多地区待我们去占领和去工作。轻敌的观念

262

* 这是毛泽东 1949 年 1 月 6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会议讨论后,经毛泽东修改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文件,于 1 月 8 日在会上通过。

[1] 马家,指青海回族军阀马步芳和宁夏回族军阀马鸿逵,他们的军队以封建的家族和宗教统治为特点。

无论何时是不应该有的,我们决不要使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

(二)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广大人民群众是大群大群地脱离国民党的影响和控制而站到我们方面来。自由资产阶级向我们找出路^{2]},跟国民党走的很少了。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代表们已经或正在成批地来到解放区。整个国民党在长江以北的战略上的战线已经崩溃,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域内是处在极大的混乱和崩溃的状态中。我们已经完全有把握地在全国范围内战胜国民党。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〇年将是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两年。我们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容许半途而废。我们必须在党内,在人民解放军内,在人民群众中,有说服力地进行教育工作,在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人物中进行解释工作,使大家懂得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容许半途而废的理由。国民党的所谓和平谈判的阴谋必须继续地给以揭露和打击^{3]}。

(三)到南方去作战的有利条件是:国民党军队已经没有主力了,我们则有强大的军队;国民党的威信已经丧失,特别是在南京和武汉被我们夺取以后,它将更加威信扫地,我党则有极大的威信;南方是曾经经过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和一九二七年以后数年的土地革命的区域,现在已经有了许多游击部队和游击区。这些都是有利条件。到南方去作战的不利条件是:最广大区域是在国民党统治之下的,我党在那里的组织还不强大,那里的群众还没有发动。在这种条件下,军队的给养在头一个时期内将遇到许多困难;大城市夺取容易,但掌握它则将较掌握北方诸城要困难得多。这些都是不利条件。以上的有利和不利的条件我们均必须看到,并且必须明白地讲给准备到南方去的全体干部和战士们听,使他们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好好地利用有利条件去克服不利条件,争取全国的胜利。

(四)我们从来就是将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并和我们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计算在我们的作战计划之内的。这一种计算现在仍然不要放弃,以免在事变万一到来时,我们处于手足无措的境地。但是中国人民革命力

〔2〕 这里所说的自由资产阶级,是指民族资产阶级。

〔3〕 指蒋介石1949年1月1日提出的愿意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建议。其目的是为了保持国民党政府的残余力量,取得喘息时间,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力量。

量愈强大,愈坚决,美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也就将愈减少,并且连同用财政及武器援助国民党这件事也就可能要减少。一年以来,特别是最近三个月以来,美国政府的态度的摇摆不定和某些变化,证明了这一点。在中国人民中和我们党内存在着对于美国帝国主义力量的过分估计的错误观点。必须继续地加以指明和克服。

(五)美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已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武装反共,转变为两面性的政策。这即是:一方面,支持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及地方军阀,继续地抵抗人民解放军;另一方面,则派遣其走狗混入革命阵营,组织所谓反对派从内部来破坏革命。在人民解放军接近于全国胜利时,甚至不惜用承认人民共和国的方法,以求取得合法地位,实施这一“内部破坏”的政策。对于这一帝国主义的阴谋计划,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性,并坚决地将其击破。

(六)全党大多数干部,在过去几年,特别是在一九四八年,有系统地学会了在农村工作中、在城市工作中和在军事工作中的各项具体的政策和策略,有系统地纠正了右的和“左”的偏向。许多同志在过去长时期内没有学会的东西,一个年头内都学会了。这样,就使党的总路线在全党内能够贯彻地执行^[4],这是一个最伟大和最根本的胜利。这是我党政治成熟程度的极大的增长。这样一件事就指明:我党在不要很久的时期内是能够有把握地取得全国政权的。为了保证胜利,一九四九年还要进行普遍的和深入的政策教育工作。说是“学会了”,并不等于不要再学了,我们还要学习很多的东西。说是“偏向已经纠正了”,并不等于说党内已经没有任何偏向,或者将来也不会再发生偏向。现在党内还是存在着某些偏向,将来也还是会发生偏向的,我们还是必须随时地注意纠正党内的偏向。

(乙)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

(一)一九四九年夏秋冬三季,我们应当争取占领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甘等九省的大部,其中有些省则是全部。

[4] 毛泽东1948年4月1日《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二)一九四九年夏秋冬三季需要随军使用的五万三千个干部,必须及时地征调和训练好。

(三)一九四九年必须使各野战军进一步地正规化,这主要地是加强炮兵和工兵,使用铁路、公路和水路的近代运输工具,加强军队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坚决地克服现在还是相当严重地存在于军队中的某些无纪律的状态,并加强司令部的工作。

(四)一九四九年及一九五〇年我们应当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及一支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五)一九四九年必须使全区的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比较一九四八年确实地提高一步。我们区域的主要的铁路和公路均应修复和使用。我们区域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应在可能和必需的基础之上更具计划性和统一性,以免浪费人力物力,障碍生产的提高和对前线的支援工作。

(六)一九四九年必须使人民解放军的后方勤务工作的组织性和效率在可能和必需的基础上加强起来,以便有效地支援人民解放军向南方各省的大进军。这些工作,包括军火工业的适当的生产计划,军火以外各项军需工业的调整或建立,军械制度的确立,各种供给标准的统一规定,卫生和通讯器材的统一分配,运输和仓库的前后分工以及后方勤务组织与系统的确定等项。

(七)一九四九年必须使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在军委政治部领导下,做出关于“新式整军运动”、“党委制”、“革命军人委员会”、“连队支部工作”等项的总结,并制成条例或章程,以便普及全军,成为定制。

(八)一九四九在各主要解放区内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必须是围绕着生产运动,利用群众的闲暇时间,一部分一部分地去解决那些为数不多的尚未完成的分配土地或调剂土地的工作和整党的工作。在各主要解放区内建立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并选举各级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各主要解放区内健全党委制,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在中原解放区是实行减租减息、发动群众的工作。在长江以南诸省,在三年至五年内,不是分配土地的问题,而是减租减息、发动群众的问题,必须在减租减息、发动群众以后方能谈得上分配土地。

(九)一九四九年的干部教育计划,即在干部训练学校中及在在职干部中进行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及中国革命各项具体政策的计划,必须适合目前革命形势和革命任务的需要。

(十)一九四九年的国民教育计划(大学教育,各种专科教育,中学教育,小学教育和成人补习教育)必须适合当前革命形势和革命任务的需要。通讯社和报纸的工作亦是如此。文学和艺术工作亦是如此。

(十一)一九四九年的职工会工作,青年团工作和妇女工作均应比一九四八年有更好的成绩。一九四九年的上半年应当完成全国青年代表大会和妇女代表大会的工作。

(十二)一九四九年必须召集没有反动派代表参加的、以完成中国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并通过共同纲领。

(十三)平津、淮海、太原、大同诸役以后,几个大的野战军必须休整至少两个月,完成渡江南进的诸项准备工作。然后,有步骤地稳健地向南方进军。

(十四)关于在全党全军各级领导机关内,开展反对某些严重地存在着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斗争,必须按照中央规定,于一九四九年三月底以前办理完毕。军队团委以上地方县委以上关于此事的决议,必须于四月份交来中央。有特殊原因要求推迟者,亦须于四月办理完毕,五月交来中央。

(十五)在一切新占领区域必须谨慎地发展党的组织。对于上层知识分子入党尤须采取严格地审查的方针,在大城市内尤其要注意这一点,宁少勿滥。

(十六)在一切解放区必须加强保卫工作,坚决地和一切暗藏的或公开的反革命分子作斗争。

(十七)北平解放后,必须召集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这个会议的任务是:(1)分析目前形势和规定党的任务;(2)通过准备提交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的草案;(3)通过组成中央政府的主要成分的草案;(4)批准军事计划;(5)决定经济建设方针;(6)决定外交政策;(7)其他事项。

(本件选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1949】中央档案馆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2 年 10 月第一版)

附录 2: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后,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它的作战部队仅仅剩下 100 余万人,而且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内和漫长的战线上,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的局面已经确定下来。面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于 1949 年 3 月 5 日至 13 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是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陈云、彭德怀、董必武、林伯渠、贺龙、陈毅、邓小平等中央委员 34 人,邓颖超、王震、习仲勋等候补中央委员 19 人。全会批准了 1945 年 6 月七届一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认为中央的领导是正确的。毛泽东在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即《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议》。这个决议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在全中国胜利的局面下,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我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的任务和主要途径;同时强调提出了在全国胜利的形势下,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意义。全会决议提出,为了彻底打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国家机器,取得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以后解决残余的国民党军队的方式可以分为三种,即“天津、北平、绥远三种。”天津方式,即用战斗去解决敌人,这种方式“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全会号召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绝不可以稍微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北平方式,即迫

使敌军用和平方法,迅速地彻底地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绥远方式,即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大体不动,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全会号召全党必须根据新的情况,采取有利于我军有利于人民的方式来解决战斗,取得胜利,并强调提出:“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同时又是一个工作队。”全会着重讨论了在当时形势下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指出,从1927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来,由于敌我力量的悬殊,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重心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历史证明这个方针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并且是成功的。但是“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全会同时指出,在这一新的时期,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和乡村、工人和农民、工业和农业密切地联结起来。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如果这样做,那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全会指出,管理和建设城市的中心关键是恢复和发展生产,而城市中的其他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建设工作,工会工作和各种民众团体的工作等,都应当为恢复和发展生产这一个中心工作而服务。为了实现这个中心任务,全会号召全党同志用全力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学习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决议强调指出:“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全会提出了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并且规定了实现这个总任务的各项基本政策。决议指出,中国的经济是落后的,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工业占10%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90%左右。这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

发,产生了我党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中国的现代性工业的产值虽然还只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0%左右,但是它却极为集中,最大的和最主要的资本是集中在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份。”这一部分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它是迅速恢复和发展我国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物质基础,因而在恢复和发展生产中必须优先发展国营经济。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右倾错误。其次,我国国民经济还有90%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类经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就其基本形态说来,还将是分散的和个体的,谁要是忽视或轻视这一点,谁就要犯“左”倾错误。但是“农业经济和手工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全会认为,应当逐步组织生产的、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这种在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是推动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其三,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了现代性工业中的第二位,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或限制,在民主革命中常常采取参加或者保持中立的立场,而且中国经济现在还处于落后的状态,因此决议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和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但同时,“我们要从各方面,按照各地各业和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对于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政策。”“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全会详尽分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的各种经济成份的状况,指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我们国家的主要经济成份,这些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全会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改造个体农业、手工业和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本思想。全会估计到,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帝国主义不会甘心于在中国的失

败,它们还要千方百计地继续侵略活动,从事捣乱破坏,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仍将是十分尖锐的,这个斗争又必然深刻地影响到国内。面对这种国内外的阶级斗争的形势,毛泽东指出:“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全党必须学会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作外交斗争。既要学会同他们作合法的公开的斗争,又要学会同他们作隐蔽的斗争。既要和拿枪的敌人作斗争,又要和不拿枪的敌人进行斗争。全会要求全党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与我党合作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以便共同打倒帝国主义势力和国内的反革命势力,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从而创造条件使中国有可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全会号召全党在思想上和工作上确立与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鉴于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即将到来,全会强调必须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并特别告诫全党不要骄傲自满,不要被资产阶级的捧场所征服。为了保持谦虚谨慎,防止对个人歌功颂德,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会还作出了一不祝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我们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并列等重要规定。为了加强和改善共产党的领导,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中,就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总结了“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等十二条经验,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工作方法。中国共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促进了全国胜利的迅速到来,并为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作了重要准备。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以后,为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中共中央于1949年3月25日,由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迁往北平。

(本文选自《20世纪中国实录》【第四卷】20世纪中国实录编委会 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

附录 3:

在丹阳集训会议谈解放上海问题(节录)

(1949年5月10日)

陈 毅

谈谈进入上海的问题。这一次渡江准备了两个半月,四月二十一日进军江南,四月二十三日占领南京,五月三日占领杭州,五月四日占领上饶……整个渡江作战任务已很快完成了,不到两周便占领了苏南、皖南、浙江……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的战争。老百姓走路也没有这样快,十天光景进军一千多里,横渡一条大江,而且敌人部队大部被歼灭。敌二十一个军,有十个全歼,七个残破不堪,上海现有几个军,比较好。打起来能够跑出一个团的是好的敌军了,很多只跑出一个连、一个营,这是历史上少有的,几乎令人不相信,也大大出乎我们总部的预料,与我们原先估计大有出入。我们原先估计,江要渡几天,可能不打退下来,就是渡过去了,也可能占领滩头阵地。我们原先准备六月初打下南京及苏州等地。如此迅速出乎意料,这证明我军之强大无敌,敌人之腐败不堪,敌人不敢抵抗,我军威力达最高峰,表示了大革命的胜利。占领南京,就是全国革命胜利的标志。这胜利是如何得来的?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检讨,当然是由于党与毛主席的领导,老百姓的支援(解决一切渡江困难),凡我军指战员,都出了一份力,不是那一个人的天才。现在我来讲讲一个我们胜利的关键,这同样也是我们到上海的关键。我们同志大多数是北方人,很多人掉在水中就完了。敌人把长江北岸桥头堡都封锁了,用几万人守住,有强固工事配以军舰。很多不重要地方的港口又沉几只船塞住。敌人这个计划是有知识的,一般的说,也很周密的。而我们同志过淮河后,就遇到了四十天的大雨,很麻烦,很辛苦。很多人吃

不来大米,吃了拉肚子。很多人对渡江无信心,抱怀疑态度……等。渡江有困难,然而这些困难我们用两个方法来解决:

(一)我们各个单位都进行了渡江演习,整整进行了差不多两个月,按级指挥,学上船下船……。老百姓看了很奇怪,说我们八路军发了疯。原来不会乘船,有些人上了船只往左边坐,结果船歪了,后来我们就要两边坐,平衡了。如船上能不能发挥火力,我们原来不知道,演习以后,知道不可能。很多人不会在船上打枪,不经演习谁也不能预料到。如救生圈问题,经过试验演习,并不如意,结果发明用稻草做的救生圈,问题真的得到了解决,大家信心高了,连船也不想依靠了。如我们不能撑船,要请船夫,而船夫又怕打仗,结果大家来请船夫教。很多部队在大风大雨中学会了撑船。有一个旅的部队横渡巢湖六十里,顺风,只花半小时全部渡过了。有一部队,遇逆风,几十只船吹散了……。这些,从兵团司令到战士一齐搞。这样,南下情绪不高的,经演习以后,都有信心了。又如敌人用兵舰封锁(敌人有一百五十只兵舰在江面),我们无经验,炮兵不会打。后来经过演习研究,又解决了。

战士对每一问题只要求一个实际的答案,他就相信。领导上就是掌握了演习,回答了这个问题。敌人江北据点我们不打,只从两个据点中把千百只船弄过去。老百姓佩服我们。这的确是个伟大的革命创造。有的部队硬开六七十里长的一条运河,开水闸,把船一只一只弄入长江;有的挖水隧道入江,在长江内又弄好隐蔽船坞……。这些我们原来都没有知识,可是经过了两个月的演习,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我们的首长、干部,向一切有知识的人——老水手、工程师、海军……请教,拜他们为师。假如说渡江谁都有一份功劳的话,那就是都经过了演习的辛劳,使我们胜利地渡过了长江。同志们不要轻视这个东西,这就是工作方法,虚心请教,艰苦演习,这样横渡长江成功了。我们进上海如用横渡长江那样演习研究的精神,那么我们就可以成功。这次渡江我们用了一千五百万到二千万个劳动力。渡江后我们又要重新把运河堵起来。同志们!我们必须用这样的精神来演习入城纪律,以渡江精神来做,进上海一定会做好。

(二)渡江胜利与实际渡江演习是经过军事民主方式。如何克服船不能入江,克服敌人海军,如何解决救生圈问题,每一件都经过反复讨论。这样军事民

主弄好了，渡江胜利了。我们进上海如不通过军事民主，怕还要打败仗。一切打仗我们都胜了，可是上海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与外国人打交道等，我们不一定样样都行。然而，一切只要经过有领导的民主讨论，反复演习，都可解决。这是毛主席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不是天才，不是马克思保佑，不是归功那一个将军。天才是表示熟练。拉胡琴拉了几十年的，就拉得好，就有天才。我们这次天才渡江，天才打下若干地方，是用了脑，流了汗的。虽然前方野战军也是有若干毛病的，拦汽车、拿电灯泡、冲戏院，但一有任务大家都齐心弄好。今天还不进上海，就是因为没有准备好。现在上海只有敌人残兵五六个军，没有什么打头了。敌人现准备放弃九江、南昌、武汉，退到福建、广西去抵抗，这是不可能的。敌人已走了绝路。现在我们是一个走路的问题，走到那里，解放到那里。以前那些恶仗不会有了。现在全党的中心，就要转到巩固胜利，转到建设新中国。不要破坏自己取得的胜利，因而提到入城接管城市的问题。我们同志思想上过去一直想的是消灭、破坏敌人，可是现在已进入建设时代，如不加改变，就对革命要起破坏作用。现在全党中心要转到接收城市、保护公私财产。这是一个思想转变问题，是方针原则、政策思想的转变，要有新的斗争方式，如二十几年游击战争的经验所带来的东西，都要改变。有人说，老子革命几十年，入城还没有资格？他看到对民主人士的优待，就悔恨自己为什么不做民主人士……这些就是旧思想一下转不过来。我们要有合乎新政策的表现，要保护建设。将来建设三五年，大家都可以享受。我们进城暂时不自由，先紧一下，把一切秩序弄好了，大家再去乐了，大家再享受。否则秩序被破坏了，大家革命一生也见不到好世界。有计划、有秩序、有纪律，则加速我们好日子的到来；无纪律、无计划、无政府，则永远不能得到。我们要使军事上的胜利发展为经济上的胜利。以上是以渡江的经验教训，来启发我们注意入城纪律。

三、对进占上海我们要有革命的信心，另一方面要有谨慎虚心的态度。我们同志们有一个偏向，谈到进北平、天津、上海就怕麻烦，不愿意去，说进城麻烦。民主人士也说我们进城搞工业不行，他们估量我们搞不好。帝国主义也如此估量我们，两眼望着。蒋介石及帝国主义在军事上打败了，他们想要我们进南京、上海搞不好，来捞政治资本。我们承认我们管理城市的经验确实也少，我

们不知就不知。但我们同志没有考虑这个问题,有盲目乐观心理,没有想到实际工作的困难。上海城市工作中的困难,第一是管理指挥六百万老百姓,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过去指挥几十万军队,但没有集中的指挥过几百万老百姓,因此很简单地对待这件事是不对的。现在进入上海城市,已经有各种各样的思想情况,一种是想出风头,想争个位子,想报上登照片,可以光宗耀祖,仿佛他革命几十年,就是要进上海,进了死也甘心。归结来说,我们对上海要有两个正确态度:一方面接管上海大城市要有革命胜利信心,一方面要有虚心谨慎的态度,这才是正确的。

上海的工人有革命传统,上海有地下党,有各阶层民主人士。大批民主人士到北平,就是要欢迎我们去上海。我们欢迎他们就是要他们帮助我们搞好上海的接管工作。我们请他们吃饭、坐车,将来他们仍要纳粮上税,要请我们大吃,我们一本万利。有他们配合我们,帮助我们,加上我们自己努力,上海没有搞不好的。没有这点信心,要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革命几十年,小小上海还搞不好吗?中国革命发展到现阶段,根据主客观力量,全中国问题能解决,上海问题难道不能解决?但仅有这种态度、信心还不够,还要有另一种态度,那就是要谨慎虚心,抱学习态度。因为我们对这些是不熟悉的。上海是个帝国主义的吞吐港,有青红帮、反动势力等,很复杂,诸如此类,我们都不大懂。我们不能自大,吹牛。上海一天要烧二十万吨煤,六百万人这一张大口又要饭吃,要解决几百万人的粮、煤及生活问题。单是每天的大小便问题不解决就不得了。每天的垃圾不解决,几天就堆成一座山……这些,国民党能搞好,我们搞不好,老百姓会比较的。我们会演戏、唱歌,人家佩服。我们管理不好上海,就无法向老百姓说话,无法向上报告。我们要抱临事不惧的态度,估计各种可能,免得翻跟头。我们进入上海,可能仍如在前线打胜仗,也可能在上海打大败仗。我们共产党员要意识到这一点才是聪明的,领导上不意识这点是要犯错误的。进南京、上海是我们胜利的标志。在南京、上海搞一件坏事,全世界都知道。毛主席说,我们进上海是中国革命过一难关,它带全党全世界性质。我们要把自己的行动与帝国主义、国民党、汪伪比较一下,谁是为人民的?同志们,要懂得我们进入京、沪后,全世界工人阶级、兄弟党都在注意。我们在上海、南京搞得好的,发出每一

条消息他们都要欢呼,向我们祝贺。因为,这证明中国共产党有能力,世界革命有希望。世界革命三大胜利:(1)十月革命;(2)打败希特勒;(3)中国革命。全世界人民都在无线电中听我们的消息。假如我们犯错误、犯纪律,那革什么命呢?反动派听到我们在上海搞得好,会更垂头丧气;看我们搞不好,他又会动起来了,也会以为他们自己还有希望。我们到上海,跑跑公园,坐坐汽车,看看戏,一举一动对敌友我都有关系。比如我们的饲养员为了系马,连树也不管了,这就不好了。我们要表示解放军是一支好的军队,前线打仗是勇敢的,但进城要表现虚心谨慎,要小心,要表现这方面的勇敢。我们野战军的“野”,在城市不能“野”的。在城市不能采取在火线上对敌人的态度,老一套是危险的。这两种态度都要注意。今天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我们接管上海。我们共产党也曾进过京、沪的,但搞不好是被人赶走的。共产党如果搞得好,中国一定是共产党的。

四、必须强调入城纪律。

(一)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前奏,是见面礼。入城纪律搞不好,入城政策要走弯路。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开始。入城纪律搞不好,会造成损失,今后要费大功夫,甚至还很难挽回。上海人一定把解放军看作“天神”,看作毛泽东、朱德,把我们当圣人、救星。但假若把我们看为“剩人”、“庸人”,就糟糕了。人民对我们抱着很大的希望和要求,入城纪律就是要给人不失望,满足人家的要求。

(二)对敌人、特务、帝国主义的阴谋破坏和暗杀分子,我们要作斗争,消灭他们,随时准备开火。另一方面,对开明士绅、资本家、外国人要很客气,要团结,要争取。我们解放军除西藏而外,全国都到过,可是说不定到上海被人打倒在地。上海这个地方随便打死几个人是平常的事,无人过问。我们农村同志到上海,无异进入八阵图。在农村里,随便进入人家去,老百姓欢迎,谁也不会不欢迎。在上海你随便进入人家,就可能会被人弄死。所以,我们进城后越小心越好。我们在三五月后搞好了,群众组织起来了,我们再观光,看看大上海。上海大的工厂、学校等都是值得一看的。我决定到上海后,起初不出去,就说是怕死也好。所以,入城的两方面:一方面一定要严格对付敌人,另一方面要好好对待我们的朋友。城市要军管,就是要组织对付敌人,要管老百姓,要管我们的

丘八。老百姓好管,对敌人要讲斗争,要斗智,最难管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混乱,敌人就有机可乘。因此,要有一个严格的原则,秩序未定,我们的部队都集中驻地,不准进城。假若我们女同志一进城,就去看妈妈,男同志去看朋友、看戏,这样一动,几万人都不见了。我们在农村的条件好,我们胜利了,在城市我们可能上当,要谨慎才好。

(三)尽量做到我们部队不入市中心,驻郊外,否则要引起混乱。我们要派专门训练的队伍配合干部进城接收,分配好驻地,看好房屋。重行李都不入城,城内没有房屋可住,可让。自由进驻是危险的。南京一营长带二十几人雇车去游中山陵,车翻了,伤八人,死三人,这是自己倒霉,一时也弄不清楚,我们能判车夫什么罪呢?参观可以,也应该,但要有秩序。

(四)外交问题。上海有七万多外国人,满街都可碰见。我们同志对外国人一般有一个反抗情绪,不象国民党那种奴隶样子,这是好的。但我们同志有些是盲目的,不懂得外国人的多少种,有敌、友,有帝国主义、非帝国主义,假如笼统反对就糟了,我们同志有经验的看得出来。我们战士同志有的认为外国人都都是帝国主义,凡帝国主义都要打倒,不加区别,是错的。如苏联人、捷克人,他们就帮助我们;美国政府官员就会反对我们;美国人民就无所谓。今天,我们避免发生与美帝国主义武装冲突,我们要打倒美帝,要用新的策略,不采取武装方式,我们不要给帝国主义挑拨起战争来。南京有一个营长闯入司徒雷登房屋,这并不表示我们同志勇敢,反而是愚蠢。对外国人打枪等,这些都不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方法。我们若用合法手续,他没有话讲,否则我们就给人混淆了对帝国主义及对外国人的不同原则,使我处于不利的地位。南京部队政治部有人去大使馆打房子,这些本来是个人的糊涂行为,别人则认为是我党毛主席的意思,以为是我们的政策。帝国主义不向我开交,我决不开交,一般外国人都要保护。今后除了指定的外交人员外,一切同志不准与外国人发生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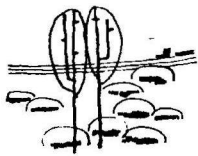
总之,入城纪律之最好保障,是事先请示,事后报告,不要乱决定,乱动手,一切有我们的专门机关分别处理。我们控制了城市,敌人总跑不了的。处理慢一点,没有关系。我们这次进上海,由华东局来领导就办得好。近年来,我们每一次胜利对帝国主义都是一次测验,由于国际国内的形势不同,帝国主义也软

了,他是因为看到我们步骤严密,革命进入了高潮,他就退让,站在一边,假若看到我骄傲、混乱,他就来还击了。我们对付帝国主义是有严格的态度和政策的,我们的脚步站稳,枪法不乱,帝国主义就无法了。所以,外交政策不能随便乱搞,我们要把它当一个大问题来对待,像渡江演习那样,当一桩大事来做,就可以做好。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军事上失败了,斗争采用新的形式,比如他要挑拨我们同外国人打起来……,不要上他的当。

最后讲讲军风纪。简单、朴素,我们仍应是老样子,宁可土一点。但要加一条:讲卫生。在街上不吃东西,头发、胡子、衣服等都要弄清爽。时代化的大城市都是要讲卫生的。

全体干部对入城纪律,在丹阳就要演习讨论起来。占上海不出五月,或者就是近几天后的事,我们分头准备,全党、全军准备来过好这一关。上海革命胜利解决了,中国革命也就解决了。

(本文选自《接管上海》【上卷·文献资料】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档案馆编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3 年 2 月第一版)



附录4: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 颁发“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的命令 1949年4月1日于本部

命 令

兹颁发“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作为全军指战员、工作人员进入城市生活行动的准绳。各级军政机关须据此深入教育所属部队，务使人人了解、个个熟记。各级军政干部须以身作则，督率全体切实遵行。并须奖励自觉遵守的模范行为，批评与制止违反的现象；对有意违反或屡教不改者，应予以必要的纪律制裁，以期贯彻执行，而达到正确执行党的城市政策的目的。

此 令

司 令 员

兼政治委员 陈 毅

副司令员

兼第二副政委 粟 裕

副政治委员 谭震林

政治部主任 唐 亮

政治部副主任 钟其光

附：“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

入城三大公约

- 一、遵守军管会及人民政府的一切法令和各种规定。
- 二、遵守城市政策,爱护市政建设。
- 三、保持革命军人艰苦朴素的传统作风。

入城十项守则

- 一、无故不得打枪。
- 二、不住民房店铺,不准打扰戏院及一切娱乐场所。
- 三、无事不上街,外出要请假。
- 四、车马不得在街上乱跑。
- 五、不准在街上吃东西,不得扶肩搭背,不准拥挤街头。
- 六、买卖要公平。
- 七、驻地打扫清洁,大小便上厕所。
- 八、不准卜卦算命,赌博宿娼。
- 九、不准封建结合,徇私舞弊。
- 十、不准在墙壁上乱写乱画。

(原件存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本文选自《上海战役》学林出版社 1989

年4月第一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附录 5:

解放战争时期普陀区党史大事记

(1945.8 - 1949.5)

1945 年

8 月

17 日 在中共沪西纱厂委员会和杂厂委员会的组织领导下,以纺织、机器等业为中心,在中山北路朱家湾平民村召开庆祝抗战胜利大会。参加大会的有 5 万多人。会上,建立了工会的筹备机构——庆祝抗日胜利筹备委员会。

18 日 中共上海市委为配合新四军解放上海,决定首先在沪西地区组织工人武装起义,并制定了以信义机器厂为据点,夺取沪西、普陀、静安日伪警察局的方案。方案确定后,随即分头发动和组织群众,加强武装起义的准备。

19 日 中共中央华中局上报中央《关于发动上海武装起义报告》称:根据目前主客观力量,可以发动群众武装起义。

20 日 中共中央发出批准上海起义的指示。

21 日 中共中央华中局电令张执一、陈伟达坚决执行起义命令,立即以现有力量占领一二个工业区,并迅速推广至全市,不必等待主力到达。上海党决定在沪西地区组织武装起义,以信义机器厂为据点,首先夺取普陀警察局的方案。

是日 中共中央发出两份急电,停止上海武装起义。第一个午电称:日本投降条约即将签字,蒋介石已委任上海官吏,在此形势下,上海起义宜改为群众组织各种团体,发动清查汉奸斗争。第二个午夜电指出:“关于上海起义问题,我们过细考虑结果,认为目前起义对我们和人民是不利的,应即照本日午电停止起

义，保存我们在工人及其他人民群众中的组织基础，以使将来进行民主运动。”

中共中央华中局于21日21时急电上海行动委员会，取消上海武装起义，改为广泛建立各种群众团体。

23日 中共上海地下党“工委”按原计划组织上海地下军和工人占领信义机器厂，准备夺取日伪普陀警察分局的武装。当日清晨，地下军全体人员和信义厂的地下党员集中在工厂附近，3个战斗突击队布置在工厂大门前，沪西机器业、棉纺业等7000余工人群众集中在工厂附近。6时正，地下军队员和2000多有组织工人以“闹事”的方式，高呼着“我们要上工”、“我们要饭吃”、“没收汉奸财产”等口号，冲进工厂大门，按原计划迅速控制了厂内的电话、制高点和交通要道，占领信义机器厂。地下军领导人和中共沪西地下党领导人高骏、汪毅、汤桂芬、朱品芳、范小凤等到现场指挥行动。前线指挥部在占领信义机器厂后，立即指挥战斗突击队准备夺取日伪普陀警察局。

下午4时，“工委”书记张祺赶到信义机器厂，传达中央关于改变计划，暂不占领上海的指示，并部署撤出战斗突击队。群众排成队伍，以上街示威游行的形式分散。游行群众遭到宪兵的镇压，被捕21人。

24日 沪西地下党组织在玉佛寺和工人群众商量营救被捕工人事宜。宪兵队荷枪实弹，布防在玉佛寺周围。为避免损失，转移到朱家湾平民村活动。此后，沪西地下党组织在平民村进行失业工人登记，建立沪西失业工人联合委员会（简称“联合会”），领导沪西棉纺业、机器业等40多家工厂，5万余工人开展活动。联合会规定每厂派4个联络员，2个常驻平民村，2个在厂里组织工人。“联合会”首先开展营救被捕工人的斗争。

29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方针的指示》。中共上海市委根据中共的指示精神，决定坚持“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积极地组织群众，保护工人的生活权利，开展争取和平、民主的运动。中共沪西纱委、杂委依据市工委的指示，为进一步发动群众，保护工厂和工人权利，作出了具体斗争的部署。一是向日伪开展清算斗争，迫使日伪厂方发给工人生活维持费；二是向国民党当局展开复工斗争。

下旬 在地下党领导下，大陆铁工厂的800余工人在平民村召开大会。会上，宣布大陆铁工厂民主工会成立。工人们以举手表决的方式，正式选出了顾亮、刘永明、唐阿兴、谈根富4名代表。

9 月

月初 日商工厂停工,工人们要求清算日伪罪行,停工期间维持最低生活,救济失业。国民党当局置若罔闻。在地下党领导下,工人们开展争取生活维持费的斗争。大陆铁工厂工人在民主工会领导下,经过艰苦斗争,迫使日本大班松雪同意给每个工人先发 60 万元中储券(抵当时工人半个月工资)。其他各厂也相继取得了争取维持生活费的胜利。

月初 国民党当局被迫释放 21 名被捕工人。“联合会”在平民村召开万人大会,欢迎被捕的 21 名工人。被捕工人代表唐守谦(唐星)在会上控拆了警察局严刑拷打工人和污辱女工的暴行。大会号召广大失业工人进一步联合起来,为要求救济,争取复工进行斗争。

19 日 美国第七舰队海军上将金开德抵沪。国民党控制的总工会要工人到外滩“欢迎”。上海地下党“工委”借机组织沪西平民村的棉纺业和机器业 2000 余工人举行要求复工的示威游行。当金开德上岸时,国民党要求工人喊欢迎口号。工人则呼喊“肚皮吃不饱”、“要求发给生活维持费”。国民党政府被迫答应次日工人派代表谈判。

20 日 在地下党领导下,沪西失业工人联合会派出失业工人代表郑海松、杨善、杨美玲等 9 名代表于上午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进行复工谈判。直到中午,谈判无结果。“联合会”得知消息,即组织 4000 余工人冒雨前往国民党市党部,下午 5 时许到达,派出孙雪珍、杭惠兰等第二批代表进入市党部与第一批代表汇合。国民党当局拒绝工人要求,逮捕 14 名工人代表押于宪兵队,并派出大批宪警用武力驱散工人。

22 日 沪西失业工人联合会组织 15000 余工人,集队前往国民党控制的总工会抗议,提出立即释放被捕工人代表、发放救济费及复工等要求。国民党当局被迫同意分批复工。

沪西工人的英勇斗争,引起各界的关注。《世界知识》、《联合日报》、《文汇报》、《大公报》等报刊都派记者前往采访,发表专题消息和评论。苏联塔斯社记者访问沪西失业工人联合会负责人顾亮、张培新等,并捐款支援失业工人。

28 日 国民党当局被迫释放失业工人代表。

10 月

8 日 女教育家俞庆棠先生创建的上海市立实验民众学校正式开办。校址在胶州路 601 号。老师中有不少是共产党员,学生绝大多数是沪西地区工厂的工人。地下党组织以该校为隐蔽,为党培养和积蓄力量。至解放前夕,先后在没有党员的

42 个单位发展了党员;帮助有党组织的 13 个单位发展了 70 多名党员和外围组织工人协会会员。被誉为“沪西的红色堡垒”。

下旬 被接收的沪西内外棉纱厂一、二工场工人为反对复工“甄别”使用,要求全面复工而开展斗争,迫使厂方答应无条件复工。

11 月

本月 上海美商电力公司、电话公司、法商电车电灯自来水公司、英商电车公司、煤气公司、自来水公司等 6 家外商公用企业职工,在各厂建立工会筹备会的基础上,成立上海 6 大公用事业工会联谊会。“工委”派法电朱俊欣出面组建。

12 月

3 日 新裕二厂厂方毁约,不让工人进厂复工。工人冲进工厂,在厂内坚持 9 天 9 夜斗争。迫使厂方同意复工。

中旬 国民党三区(沪西)棉纺织业整理委员会(亦称“新三区工会”)成立。17 名委员中,中共党员朱汇寅、张金娣、杨美玲 3 人为常务理事。这是上海“工委”和沪西棉纺织业地下党积极贯彻“合法与非法,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斗争方针,利用敌人矛盾,名义上由国民党当局指派人员组建,经国民党社会局批准同意,而实际上由我党控制优势的棉纺织业工会组织。

24 日 代表官僚资本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正式成立。该公司成立后,于 1946 年 1 月 1 日开始接管原日商在沪纱厂,并改名为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第 X 纺织厂(简称“中纺 X 厂”)。其中沪西地区原日商纱厂:内外棉一、二厂改名为中纺一厂;内外棉五、六、七厂改名为中纺二厂、中纺三厂;内外棉九厂改名为中纺四厂;丰田纱厂改名为中纺五厂;日华三、四厂改名为中纺六厂;喜和纱厂(日华六、七厂)改名为中纺七厂;同兴纱厂(被服厂)改名为中纺十厂;内外棉三厂改名为中纺十一厂;内外棉四厂改名为中纺二十厂;公大三厂改名为中纺第一绢纺厂;内外棉第二加工场改名为中纺第一印染厂;内外棉八厂(东亚铁工厂)改名为中纺第二纺织机械厂。

本月 工委决定从杂厂委员会中分出毛纺、染织、丝绸等行业党组织、另建立中共沪西杂纺工作委员会,领导中纺一毛、二毛、协新毛纺厂等 9 个毛纺织厂和立丰漂染厂、天一印染厂、丰泰漂染厂党的组织,负责人朱品芳,成员安中坚。

1946 年

1 月

8 日 崇信纱厂工人为争取年终奖举行罢工斗争。厂方召警察镇压工人,工人坚持斗争,34 人被捕。

12 日 申新九厂工人为要求改善生活,增加工资举行罢工,资方被迫答应工人提出的条件。

新生纱厂、新裕二厂、崇信纱厂、鸿章纱厂、永安三厂、申新二、五厂等厂工人为争取发放年终奖先后举行罢工,劳资双方斗争激烈。中纺各厂也提出了年终奖问题。中共上海“工委”根据工人的要求和当时的情况,研究决定掀起一场全市性以年终奖为中心内容的斗争。24 日,全市棉纺业工人举行罢工。25 日,在资方答应年终奖按本年薪金总额的 30%、25%、20% 三级发放,另发布 1.3 丈和红利 1 万元后复工。

13 日 中共上海地下党发动各界群众 1 万人,在沪西玉佛寺公祭 1945 年 12 月 1 日因反对内战而被昆明国民党当局杀害的爱国师生于再、潘琰、李鲁连、张华昌 4 位烈士。主祭团由宋庆龄、柳亚子、马叙伦、沙千里、郑振铎、许广平、金仲华 7 人组成。宋庆龄赠“为民前驱”的挽联。公祭会致电政治协商会议要求成立联合政府,实行保障人民自由等 8 项要求。会后,大家唱着挽歌,举行示威游行。

2 月

16 日 三区丝织业产业工会,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乐群中学召开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有沪西 84 家绸厂代表。中共地下党员沈默、许荣甫、俞兰英、周学明、王奇明等均当选为理监事,保证了党在工会中的领导作用。会址在西康路太平坊 22 号。

21 日 在上海“工委”的统一部署下,以沪西棉纺业整理委员会和沪东棉纺业工会筹备会的合法地位,领导全市 47 家纺织厂 13 万职工,开展为争取依照生活费指数追加工资、调整底薪为主要内容的斗争。提出“调整底薪、工时,发送生活福利,女工享受产假和承认工会的合法地位”等 18 条要求,并采取全体一致罢工,被称为“十八条斗争”。

3 月

1 日 抗战期间成立的上海工人救亡协会,改名为上海工人协会。上海工人协会在“工委”领导下通过新的工作纲领。提出加强工人间的团结,积极参加民主运

动。“工协”下设:上海工协沪西国营棉纺业分会、沪西民营纺织业分会、沪西丝织业分会、沪西毛纺业分会等9个分会。

是日 新裕二厂工人因厂方不履行“十八条”而起来斗争,厂方勾结警察局,捕去2名工人。沪西区工会立即与沪东区工会联络,要求声援,全市纺织厂在14日上午怠工2小时,迫使资方放出被捕工人,并履行“十八条”。

6日 上海妇女联谊会成立。

8日 上海党组织动员妇女参加争取和平、实现民主的斗争。上海妇女联谊会发动女工、女学生、女职员在沪西和沪东分别举行“三八”国际妇女节的庆祝活动。沪西女工和女学生等共3万人,在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举行庆祝大会。大会主席由许广平、罗叔章、王国秀、俞庆棠、沈粹缜、陈玉俊、包仁宝、郑少如、张金娣等组成。周建人、林汉达等作为来宾参加大会。许广平、周建人、罗叔章、张金娣(沪西纺织工人代表,中共党员、中纺二厂工人)等人在会上讲话。大会一致通过了宣言和致全国妇女的通电。会后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高呼“反对独裁,要求民主、自由!”“妇女们团结起来!”“要有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的自由!”“妇女要有参政权”等口号。许广平、罗叔章一直走在游行队伍最前列。

9日 三区机器制造业工会,在中正路(延安东路)浦东同乡会召开成立大会,参加会议的有43家工厂,1000余职工。大会选出倪选青、顾刚等15人为理监事,其中有中共党员4人。中共党员参与工会的领导,为以后开展公开与合法的斗争打下了基础。

18日 全市丝织业工人为要求调整底薪,按生活指数计薪,遭到资方联合反对,沪西美亚四厂、大诚绸厂等率先罢工。19日,全市丝织业陆续进入怠工状态,并派3000余工人向国民党社会局请愿。在社会局被迫同意部分条件后,“工委”决定先行复工。由于资方拒绝执行同意了的条件,并于4月15日勾结警察逮捕工人,又有资方汽车撞伤工人等事件发生,工人再度罢工。后由朱学范出面调解,劳资双方达成协议,5月16日罢工结束。

19日 三区染织业职工2000多人要求增加底薪并进行怠工。

25日 中央印制厂沪西第一、三、四印制所工人为要求改善待遇,按照生活指数计算工资等五项条件,遭资方拒绝举行罢工。4月8日,厂方勾结国民党社会局举行记者招待会,大肆诬蔑工人,并宣布开除125名工人。工人忍痛复工。

27日 三区机器业工会根据中共沪西杂厂委员会的指示,领导工人为改善生活待遇和劳动条件进行斗争。6月7日,国民党市政府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技工工资底薪每天为1.5、1.6、1.9、2.1元等7项仲裁。长达3个月的斗争获得胜利。

本月 “工委”决定建立沪西与沪南两个绸厂工作委员会。中共沪西绸厂工作委员会领导美亚四厂、大诚绸厂、中蚕一、二厂和针织业袜厂4个支部,美亚二厂、璞成、天成绸厂3个党组织,并与有关厂的个别党员点线联系,共有党员73名。沈默、许荣甫先后任书记,委员有卢瑞花、潘月英、万文华、万兰妹,王文娟。

4月

8日 中共代表团王若飞、秦邦宪因国民党推翻政协决议,由重庆乘飞机回延安。叶挺、邓发同行。飞机至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17人遇难。30日,由各界知名人士宋庆龄、柳亚子、王绍鏊、马叙伦、陶行知、黄炎培、章乃器等发起的“四八”烈士追悼会在上海玉佛寺举行。会场挂满挽联、花圈。正中挂着17位遇难者像和灵位。王绍鏊读祭文,黄炎培、陶行知、章乃器、马叙伦分别讲话。中共代表潘梓年致谢词:“这样的天气,各位还跑来,这不是为了共产党和私人感情,而是为了追悼民主战士,因为大家都要民主。”

14日 上海党组织根据政治协商会议关于国大代表可以增加党派及社会贤达的决议,组织发动妇女进行一次选举“国大”女代表的活动。上海各界妇女团体成员等3万多人,正式投票民主选举,许广平、潘月英(中蚕厂地下党员)、汤桂芬(统益纱厂地下党员)等37人当选为“国大”女代表。虽未被国民党承认,但揭露了国民党的假民主,教育了广大妇女。

5月

1日 沪西15万工人在党的发动和组织下,于胶州公园召开庆祝抗战胜利后第一个“五一”劳动节大会。会上工会领导人汤桂芬、朱俊欣等发表演讲,会后游行,高呼“成立联合政府”、“打倒官僚资本”、“改善工人生活”、“实行三八制”等口号。会上工人还表演了自己创作的文艺节目。大诚绸厂的《暴风雨》,申新二厂的《一个美丽的梦》、中国绸厂的《谈判之前》等节目反映了工人的疾苦和争取和平、民主的愿望。

5日 在党的领导下,“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成立。参加该会的有52个单位,不久扩大为91人为常务理事。联合会发表《反对内战宣言》,号召“人民团结起来,以具体行动阻止战乱”。

6 月

23 日 上海人民呼吁和平入京请愿代表团代表 9 人和学生代表等赴南京请愿。各界群众 5 万余人在北火车站广场开欢送大会。代表离站后,到会群众进行游行示威。沪西产业工人参加大会和示威游行。

当晚,上海代表团到达南京下关,国民党派遣特务暴徒殴打请愿代表和记者。“下关惨案”发生后,周恩来发表了致“三人会议”国民党和双方备忘录,对此暴行表示严重抗议,并提出六项善后意见。周恩来、邓颖超等到医院慰问受伤代表。25 日,毛泽东、朱德由延安发来慰问电。各民主党派,上海市人民团体联合会等组织发表宣言,表示抗议。

26 日 国民党调集 30 万军队向鄂东、豫南中原解放军军区司令部宣化店围攻,全面内战开始。

7 月

9 日 中纺第二机器厂等 13 个单位的工会,以全体工会会员的名义上书国民党政府,递交《关于要求勿背弃停战命令致蒋介石书》。表达了工人要求和平、停止内战的强烈愿望。

17 日 上海民主党派、团体为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被特务刺死事,举行非常会议。通过决议,要求政府严惩凶手,保障人民生命安全。

20 日 中共中央作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指示。

本月 上海党组织将 1000 多名已暴露的同志转移荫蔽或送解放区。

8 月

18 日 中华书局产业工会成立。

25 日 中纺十一厂厂方拒绝老工人复工,双方发生冲突,普陀警察分局派警镇压,6 名工人被捕。

28 日 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借故取缔黄浦、老闸两区摊贩后,党组织指示抓住时机,保卫群众生活,争生存,反对独裁内战政策。摊贩中的党员在部分摊贩骨干中开展工作。上海万余摊贩到市府请愿,反对国民党当局关于 9 月 1 日起取缔摊贩的决定。

9 月

18 日 国民党政府在上海苛征各业工人工资所得税,平均每一工人须缴纳

10万元左右。上海总工会赴京请愿团朱学范等，要求国民党政府免征各种工人税收。

22日 美国水兵饶德立克在上海打死三轮车夫臧大咬子。惨案激起上海人民公愤，社会舆论一致要求惩办凶手，为臧大咬子报仇。

23日 上海各人民团体代表集会，响应美国35个城市进步团体发起的“美军退出中国周”运动。决定即日起举行“美军退出中国宣传周”运动月。这一运动迅速遍及全国各大城市。

10月

6日 上海各界代表于静安寺公祭李公朴、闻一多。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新华通讯社、《群众》杂志社代表参加。

11月

10日 统益纱厂女工参议员汤桂芬在市参议大会上，发表书面提案。要求社会关注女工疾苦，提出以厂为单位设托儿所；工作时间减至10小时，如可能应减至8小时，多余时间，用于学习。

12月

1日 为抗议取缔摊贩，抗议国民党屠杀摊贩，5000多摊贩自发包围黄浦区和老闸区警察局。军警镇压，群众被杀10人，伤百余人，被捕4人。由于摊贩坚持斗争，广大市民支持，国民党政府被迫收回取缔摊贩命令。毛泽东趁这次斗争是蒋管区人民斗争新高涨的一个标志。

23日 全市丝织业工人进行要求年奖斗争。12月下旬，一、二、三、四区丝织业工会，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向资方提出要求发给年奖2个月，派代表与资方谈判遭到拒绝。23日，各区工会派代表15人向社会局请愿，未获结果。各区一半以上丝厂采取怠工形式对资方施加压力，党领导美亚、大诚厂工人斗争首先成功，资方答应条件，各区工会再向同业公会提出要求，资方以6天、9天、12天三等发给年奖。

24日 北平发生美军强奸北京大学女学生事件。北平学生抗议美军暴行。

31日 在党的领导下，上海17所学校的学生代表举行联席会议，公开成立上海市学生抗议驻华美军暴行联合会。

1947 年

1 月

1 日 上海交通大学等 27 所大中学校学生 1 万余人,举行抗议北平美军强奸北京大学女生暴行的示威。沿途高呼:“美国兵滚回去!”等口号。

7 日 上海工人协会发表《告工友职员书》,号召工人支持学生运动,抗议美军暴行。

10 日 中国学生和人民声势浩大的斗争迫使美军法庭不得不将强奸犯和帮凶分别判处 15 年和 10 个月徒刑。

2 月

1 日 中共中央发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指示。上海党组织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决定在上海发动一个能够把各阶层群众进一步团结起来,反对美蒋反动派的群众运动。

9 日 爱用国货抵制美货筹备委员会(简称“爱抵会”)成立大会在劝工大楼百货工会会址召开。郭沫若、邓初民到会演讲。会议正要开始时,混入会场的特务动手殴打与会群众,重伤 13 人,轻伤数十人,永安公司职工梁仁达因受伤过重,不治身亡。事发后,在党的领导下,三区百货业工会成立了二九惨案后援会,印发《暴行经过记详》,在《文汇报》、《大公报》、《联合晚报》同时发表。各界纷纷写信,捐款、慰问烈士家属,发表宣言,抗议国民党特务的暴行。

14 日 上海工人协会发表《宣言》,揭露国民党特务制造“二九”惨案的计划、组织、动员和行动的全部真相。

27 日至 28 日 国民党政府通知中国共产党驻南京、上海、重庆等地担任谈判联络工作的代表全部撤退,宣布国共谈判完全破裂。

3 月

8 日 上海 50 余妇女团体,分别举行“三八”纪念活动。

9 日 三区绵纺工会,在澳门路 535 号办事处召开各厂工会代表会议。决定组成汤桂芬、朱汇寅、郑海松等 13 人的请愿团,代表沪西 5 万名棉纺工人,赴上海市参议会、社会局、中纺公司,提出解冻生活指数、平抑物价等四项请愿要求。

本月“工委”决定建立中共沪西中纺纱厂委员会,领导中纺一、三、四、五、六、七、十一厂,以及中纺第一绢纺厂、第一印染厂、第一毛纺厂的1个总支、6个支部、2个直属党小组,183名党员。书记夏明芳,委员杭惠兰、孙雪珍、郑阿彩。

4月

29日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城市工作部。周恩来任部长,李维汉任副部长。在中央领导下,经管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切工作。

5月

1日 “工委”通过群众团体,发动3万工人在跑马厅(现人民广场)参加国民党政府召开的“五·一”节纪念会。当国民党官员谷正纲、吴国桢等在台上宣传反共时,台下工人高呼“肃清贪官污吏”、“反对苛捐杂税”、“要求解冻生活费指数”等口号。会后,工人们高举“要求解冻生活费指数”等横幅、标语,分路游行。

3日 沪西棉纺业28个工厂的45000余工人举行罢工,要求解冻生活费指数。8日,全市丝织业工人1万余人冲破国民党的禁令,上街游行示威。在群众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被迫宣布有条件解冻生活费指数。

19日 上海10所国立大学和4所私立大学学生共7000余人到北站,送代表赴南京请愿,在北站广场召开欢送大会。会后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

20日 上海、南京等城市专科以上学校学生6000余人,为抢救教育危机联合向行政院请愿游行示威,高喊:“反对内战!”“取消《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等口号。游行队伍遭到国民党警宪的殴打镇压。当场500余人被打,其中:重伤20余人、轻伤90余人,被捕20余人,造成震惊全国的“五·二〇”惨案。

21日 上海市“抗暴联”召集102所学校学生代表开会,成立“上海市学生抗议五·二〇惨案后援会”。决议在23、24两日举行全市总罢课。

24日 上海73所学校学生举行罢课。街上到处贴满了“罢课”、“抗议”的大幅标语。

6月

7日 一、二、三区针织业工人因资方不按上月份生活指数发给工资,与资方展开斗争,相持数日,由社会局仲裁解决。

9日 上海市机器、染织、丝织、铅印、皮革、笔墨等业工人为资方不按生活指数照发工资,相继罢工。

7 月

4 日 国民党政府颁布《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

本月 “工委” 决定建立中共沪西机器业支部。领导大隆机器厂和三区机器业工会党团的组织与中纺第二机械厂和震旦机器厂 2 个支部及华通电器厂、安泰机器厂等 9 个党组织，共有党员 83 名。书记史桂昌、委员吴开寿、杨公保、黄金柱。

8 月

2 日 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布《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开了 2000 多人的黑名单，准备大逮捕。

9 月

1 日 在“工委”和中共沪西机器业支部领导下，大隆机器厂成立以党员为骨干，青年工人为主体的斗争服务组。广泛发动群众，揭露资本家卖厂停工，解雇工人的阴谋，提出以原职、原薪、原制度为中心的六点要求。国民党社会局慑于工人斗争的威力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于 10 月 16 日发出仲裁规定，斗争取得胜利。

10 月

10 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发出“打倒蒋介石”的号召，宣布八项基本政策。

11 月

11 日 信和纱厂工人集会，重选工会理事长。该厂原工会理事长、特务分子袁志良纠合 50 余人，携带手枪、刀棍等凶器冲击会场，发生殴斗，12 人受伤。

20 日 福新烟厂 1300 余工人，要求厂方按照当月生活指数计算工资，遭资方拒绝举行罢工。国民党宪警及社会局压制工人，工人被迫复工。14 名工人被开除。

12 月

14 日 上海机器重工业工会筹备会召开成立大会。大隆机器厂产业工会参加筹备工作。

25 日 毛泽东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中央用密电把报告发给上海党组织。年底，中共上海局为市委负责干部举办学习班，联系上海斗争实际，学习报告。

1948 年

1 月

22 日 大有余榨油厂工人与厂方发生年赏纠纷,普陀警察分局逮捕 4 名工人,愤怒的工人冲击警察局,遭到镇压。

23 日 在中共沪西杂纺委员会的领导下,振丰、寅丰、元丰、华纶、章华三厂、大光明等 8 家毛纺厂工人为争取年奖,开展 5 昼夜的饿工斗争。资方勾结警方对工人实行镇压,逮捕部分工会代表(其中党员 6 人),开除积极分子 78 人,查封了三区毛纺织业工会。

29 日 同济大学学生为反对国民党破坏学生自治会和无故开除学生举行罢课示威,并决定赴南京请愿。国民党军警宪特几千人,出动铁甲车,飞行堡垒,包围同济,镇压学生。受伤学生 69 人,重伤 3 人,失踪 33 人,近百人被捕,造成“一·二九同济血案”。

30 日 棉纺同业公会向全市各厂发出“本年度工人年赏按照上年旧例以八折计算,分两期发给奖金”的通知,引起工人群众的强烈不满。“工委”提出“年奖不打折扣,按当月生活指数发放”的口号,发动全市棉纺工人进行反击。申新九厂党组织根据“工委”、中共沪西民营纱厂委员会和三区棉纺工会党团组织的指示,率先组织 7500 余工人罢工,并提出 7 项条件。

31 日 全市 6000 余舞女与舞厅职工,因国民党上海市政府抽签禁舞,濒临失业、饥饿危机,在新仙林舞厅开大会。会后赴社会局请愿,以示抗议,遭反动警察镇压,当场数十人被打倒在地,400 余人被扣押。

2 月

2 日 “同济学潮”、“申九工潮”、“舞潮”三潮并发,国民党政府惊慌万分。出动千余名军警、特务,国民党上海警察局长俞叔平,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亲自指挥,包围申新九厂。军警用装甲车冲击工厂大门,开枪屠杀工人,蒋贞新、朱云仙、王慕媚 3 人被打死,40 余人重伤,236 人被捕。制造了申九“二·二”惨案。

申九“二·二”惨案发生后,上海工人协会根据“工委”指示发表宣言,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罪行。各产业工会成立声援委员会。在全市工人声援下,大部分被捕工人获释。厂方发放了配给米、煤等。

中共上海局书记刘晓总结指出：申九斗争和同时发生的学潮、舞潮，证明上海反美蒋斗争进一步深入发展，粉碎了国民党全面打击群众运动的计划。

22日 全市各业工人佩黑纱，悼念申九血案中死难工友。

3月

15日 上海申新纱厂第二厂2000余工人，为要求职业保证，抗议解雇工人，举行罢工。

20日 中共上海“工委”委员王中一因策反国民党军队丁锡山余部发生横关系，遭国民党逮捕。国民党特务在王家中抄去规定必须销毁而没有销毁的有关党员和积极分子名单。国民党根据名单进行大逮捕，全市共有125人被捕，其中党员118人。沪西丝织、针织业有35名党员被捕，党组织被破坏。

23日 泰利铁厂工人800余人罢工，抗议厂方解雇工人。

本月 中共上海局在香港举办学习班，轮训干部。学习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总结地下工作的经验。

4月

1日 国民党特务到大隆机器厂逮捕地下党员厂工会理事长顾亮和工会秘书张俊才。顾亮在厂门外与特务遭遇并与之搏斗，被工人发觉营救脱险。工人们抓住两名特务，缴获手枪两支，带回厂里“公审”。

30日 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全国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侵略中国主权，反对美帝国主义扶植日本侵略势力的复活！”上海党领导各界人民进行反美扶日斗争。

5月

4日 上海学联组织全市120所大中学校学生1万多人，在交通大学举行营火晚会。晚会展出了从“五四”以来学生运动的光荣斗争史，成立了上海市学生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挽救民族危机联合会。

23日 上海学联为纪念“五·二〇事件”一周年，进一步动员反美扶日的斗争，组织学生15000余人在交大集会，发起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全市10万人的签名运动，得到全市各界群众的热烈支持和全国各地积极响应。

6月

5日 上海学生举行大规模的反美扶日游行。上海市长吴国桢、警备司令宣铁

吾指使 1500 余名军警特务冲击游行队伍,殴打、逮捕学生,大批爱国学生被打和逮捕。各界人士纷纷抗议国民党暴行。

28 日 上海私立小学教师,在党的教委发动下开始 27 小时的反饥饿斗争,请愿教师达 1500 余人。21 个团体和单位,346 家厂商职工,2000 多学生,32 位教育家和社会名流前往慰问。围观市民一两万人。这次反饥饿斗争,远远超过小学教师范围,成为一次社会性的反饥饿斗争。

7 月

7 日 上海公交公司工人,在党支部的领导下举行反解雇的罢工斗争。

17 日 染织行业工人举行罢工,要求按当月生活指数发薪。印刷、橡胶、手帕、织带、翻砂、热水瓶等行业工人相继举行同样要求的罢工怠工斗争。

28 日 中纺三厂的中统特务高玉林等,污蔑厂工会理事长朱汇寅(地下党员)有贪污行为,胁迫全厂工人罢工,企图打击我党控制的工会,遭到工人和厂长的抵制而失败。高玉林等 5 人被厂方开除。

7 月-10 月 上海撤到华中解放区有 1262 人(党员 891 人),撤至大洪山、大别山、浙东四明山等解放区的约 300 人(党员 200 人)。地下交通冒着生命危险护送大批干部和民主人士撤退、转移。

8 月

1 日 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哈尔滨举行。上海出席会议的代表 17 人,其中有三区棉纺业工业理事长汤桂芬(上海工人代表团团长)、三区机器业工会顾亮、三区毛纺业工会惠根宝、申新九厂工会徐明哲等人。汤桂芬、顾亮当选为执行委员。

9 月

1 日 新裕二厂工人为反对工会改选举行罢工,遭普陀警察分局的镇压。后来改选后的领导班子仍为我党组织控制。

12 日 人民解放军发起辽沈战役。

30 日 4 月 21 日因叛徒叛变,上海电力公司工会常务理事王孝和等 10 名地下党员被捕。面对敌人种种酷刑,意志坚强。在法庭和刑场上,王孝和坚贞不屈,顽强斗争,揭露国民党政府严刑逼供,制造冤狱,陷害无辜,遂英勇就义。

31 日 中共中央给刘晓、刘长胜电《中央关于派人到苏南等地隐蔽工作的指示》。

10 月

4 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总常委人选及建立全国性工作给东北局的指示》，同意汤桂芬等为全总常委。

11 月

4 日 上海连续发生抢米事件，至 10 日有近百起，抢米人数在 2 万人以上。8 日，反动当局出动 7 万军、警、特在全市“大清查”，镇压群众。

6 日 人民解放军发动淮海战役。

17 日 沪西百余家丝织厂工人为要求提高待遇举行怠工斗争。

28 日 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以“违反戒严令”罪，逮捕大隆机器厂地下党员陈正泉、黄金柱等 9 人和“工协”会员 2 人，党组织积极营救。敌人以拆运厂里机器运往台湾建厂为释放条件，遭到被捕者的坚决反对。

本月 中共沪西机器业分区委在市委委员、工委书记马纯古主持下成立。下属大隆、中纺二机、泰利机器厂等 13 个支部，同昌车行、六三钉厂等 4 个党组织，共有党员 154 人。书记史桂昌，委员杨公保、黄金柱。

12 月

5 日 人民解放军发动平津战役。

9 日 中央印制厂工人在地下党支部的领导下，进行反对敌人拆运机器的斗争，粉碎了国民党财政部将厂里全部机器设备迁往台湾的阴谋。

中旬 全市各棉纺厂工人，派代表同社会局、中纺公司等处谈判，要求增发“年终奖”。上海党组织为积蓄力量迎接解放，及时结束这次斗争。

本月 中共上海市沪西区委在市委马纯古主持下建立，书记夏明芳，副书记周小鼎，委员王关昶、施惠珍。后周小鼎调离，递增安中坚、李德鸿为委员。原沪西各系统的党组织统一归区委领导。

本月 中共沪西区委设机关于小沙渡路药水弄（今西康路 1281 弄 138 号），由王关昶、施惠珍 2 人住机关。

本月 中共沪西民营纱厂委员会，分别成立民棉一、二分区委，由中共沪西区委领导。

民棉一分区委下属鸿章纱厂、永安三厂、新裕二厂、新生纱厂、大同纱厂、华阳纱厂的 6 个支部，另有 1 个党组织，共有党员 110 名。书记李名琦，委员张翼钧、顾新宝。

民棉二分区委下属申新九厂、信和纱厂、统益纱厂、德丰纱厂、申新二厂、民营中纺一厂的2个支部,5个党组织,共有党员95名。书记徐佩玲,委员张淑曾、刘敬章。

本月 中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为加强沪西劳工教育领导,以实验民众学校、女青年会夜校、基督教青年会沪西公社为基础,建立中共沪西劳工教育委员会,中共沪西区委成立后,归沪西区委领导,改名为中共沪西劳工教育分区委。下属6个支部、11个党组织,共有党员82人。书记李德鸿,委员梅继范、毛经赐、胡铁民。

1949年

1月

1日 新华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写的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提出了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

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提出:在中华民国的宪法不能违反,宪政不被破坏,国体能够确保,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保障等五项条件下,与中共“议和”。

5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的《评战犯求和》,揭露了蒋介石企图利用和平谈判来保持其统治的阴谋。

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的决议。指出:“1949年和1950年将是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两年”,“几个大的野战军必须至少休整两个月,完成渡江南进的诸项准备工作。然后,有步骤地稳健地向南方进军”。

10日 淮海战役胜利结束。

淮海战役后,国民党南京政府下令各地采取“应变措施”,拆迁工厂,搬运物资,转移资金,破坏主要设施。蒋介石派蒋经国到上海,转移中央银行现金到台湾。

12日 物价猛涨,威胁工人生活。沪西新生、信和、新裕、申新纱厂及中纺二、三、四、六、七厂,制麻、二纺机、一毛等厂工人罢工、怠工,要求借薪借米和按生活指数计算发放年奖,遭到社会局的制止。

18日 蒋介石任命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司令部”总司令。

上半月 中共中央指示上海党组织,动员群众,迎接解放军渡江,里应外合,配

合解放上海的斗争。

21日 蒋介石以“因故不能视事”的名义宣告“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蒋介石“引退”后蛰居浙江奉化，表面虽处于“在野”地位，但实际仍控制着国民党的军政大权。

31日 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结束。

是日 根据中央的指示，中共上海市委决定开展反对屠杀、反对迁移、保护工厂、保护学校、保护机关的斗争。

是日 大隆机器厂资本家利用工人春节休假机会，派8辆大卡车到厂拆运机器。次日清晨，工人闻讯从各方汇集到工厂，阻止拆运，在地下党支部领导下，挫败了资本家拆运逃跑计划。

本月 中共沪西中纺委员会改称中共沪西中纺分区委，由中共沪西区委领导。下属中纺一、二、三、四、五、六、七、十一厂，第一绢纺、第一印染、第一毛纺厂的7个支部、5个党组织，共有党员234名。书记王定中（周成哲），副书记杭惠兰，委员孙贤德、徐仙玲。

本月 上海市委根据中共中央上海局指示，对上海党组织提出：由于人民解放军强大，占有绝对优势，因此，上海的解放指日可待，不需要采取工人武装起义的方式。上海地下党的主要工作是发动群众，反对国民党破坏，保护工厂、机关、学校，配合人民解放军接管城市，维持社会秩序，迅速恢复生产。

本月 在中共中央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的策动下，上海国民党海军部办公厅主任金声、秘书游侠、淞沪警备司令部作战科长刘泉琪等，多次向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提供了国民党军长江沿岸的兵力部署、炮台设施、布防情况及上海作战计划等情报。在此前后，国民党上海市工务局长赵祖康、国民党军联勤总部中将视察员张权、国防部少将专员许彦飞和在国民党军工兵司令部的中共地下工作者等也都先后提供了国民党长江布防图、淞沪地区工事构筑图等情报资料。中共中央上海局和上海市委分别将这些情报送交第三野战军指挥机关。

2月

8日 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复第二、第三野战军《把军队变为工作队》的电文指出：“今后将一反过去二十年先乡村后城市的方式，而改变为先城市后乡村的方式。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

收城市和管理城市。”

10日 中共上海市委发出《宣传工作指示》，要求地下党各级组织在迎接上海解放的过程中，采取各种秘密的、合法的形式宣传解放战争胜利的形势，宣传解放军和解放区的真实情况及党的方针政策，利用各种社会关系进行策反瓦解工作。

上旬 根据中共中央上海局的指示，上海市委为了适应里应外合斗争的需要，除公用事业、警察系统等以外，全市党组织由按产业划分，改为按地区划分。设立了中共沪中、沪东、沪西、沪南、沪北、徐龙、新静长、北郊、浦东等区委。

16日 上海工人因物价飞涨，难以维持生活，在党领导下，纷纷向当局要求发放“应变旨”、“应变米”。

本月 中共沪西杂厂委员会改称中共沪西卷烟面粉分区委，由中共沪西区委领导。后，轻工业搪瓷、橡胶和印刷等行业并入，亦称中共沪西轻工业分区委。下属9个支部和4个党组织，共有党员123名。书记顾松盛，委员何其友、潘云虎、屠传泗。

本月 中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领导的沪西地区的党组织，改称中共沪西贫民区分区委，归属中共沪西区委领导。下属7个支部，5个党组织，共有党员90名。书记陈鲁生，委员许之敏、陈祁、单意基。

本月 中共沪西杂纺工作委员会改称中共沪西杂纺分区委，由中共沪西区委领导。下属党组织分布在毛纺、染织、内衣、丝绸等行业，先后建立13个支部和6个党组织，共有党员214名。书记安中坚，委员万忆琴、潘裕德、胡肇昌（胡方）。

月底 中共沪西区委下设中纺、民棉一、民棉二、机器业、杂纺、卷烟面粉业、劳工教育、地区8个分区委及学生、教师两个系统。在区委领导下，沪西地区全面开展以护厂、护校为中心的斗争。发展一批党员，加强了核心领导，吸引了一批有觉悟的工人参加工协和人民保安队，作为护厂的骨干力量。大量散发反映解放战争形势、当前任务和党的政策的宣传品。《新华通讯》、《上海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关于工商业政策》等。各种形式的纠察队纷纷成立，积极开展活动。还通过在民校工作的同志在工人、贫民居住集中地区，组织支持工人护厂和保护地区为主要任务的贫农团，参加者达1200余人。各工厂企业党组织还努力争取团结资方参加护厂活动，中纺公司总经理顾毓泉等毅然向我党靠拢，申新九厂、新生纱厂等厂资本家支持工人的护厂活动。

3 月

1 日 上海工人协会发出《工协纠察队总部通知》，要求在各工厂企业建立工人纠察队。纠察队的任务是：保护工厂，反对搬迁；保护工人领袖，保护工会，反对压迫、逮捕、屠杀工人；监视战犯、特务、工贼走狗；瓦解反动武装；配合解放军解放上海；维持地方秩序。工厂企业工协根据上海工协通知，建立各种形式的纠察队。

5 日 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13 日结束。毛泽东向全会作了工作报告。全会讨论了彻底摧毁国民党的统治，夺取全国胜利，把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城市，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等问题。

31 日 总前委制订《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并报中央军委。纲要提出：以第二、第三野战军歼灭上海至安庆之国民党军，占领苏南、皖南及浙江全省，夺取京沪杭，并拟于 4 月 15 日全线渡江。本战役计划：第一步达成渡江；第二步达到割裂、包围敌人之任务，确实控制浙赣线，断其退路；第三步分别歼灭被围之敌，完成全役。

本月 沪西地区学生党组织，建立学生分区委，由中共沪西区委统一领导。下属男女中学 3 个支部、5 个党组织，共有党员 46 名。书记胡铁民，委员倪善锦、陈俊忻、傅教文、吴妙龄。

春 中纺公司策划第一印染厂机器设备迁往台湾建厂。厂地下党组织得悉后，提出“反对搬迁，保护机器就是防止失业，保护饭碗”等口号，发动党员团结积极分子，对重点车间和重要设备专人保护，防止破坏。

本月 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由南京迁至上海。

4 月

1 日 国民党和谈代表团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李蒸、刘斐等飞抵北平开始进行谈判。中共中央决定增派聂荣臻为和谈代表，齐燕铭为代表团秘书长。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颁发《入城三大公约 十项守则》的命令。

国民党行政院长何应钦，自南京电复上海市市长吴国桢，不准其辞职。但准给假一个月休养，在休假期间，由该市政府秘书长陈良代行其职权。

3 日 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批复同意总前委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7 日 中共中央电告邓小平、饶漱石、陈毅：《关于争取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协助接管上海工作的指示》。

8 日 中共中央上海局给上海市委发出关于《解放军渡江和我们的工作》的指

示,指出,当前的中心任务是,抓紧人民空前高涨的革命情绪,把已经发展的群众运动,从思想上、政治上及组织形式上,予以提高、集中和统一起来,以便顺利地完应外合、解放上海和接管上海。

中旬 中共上海市委决定恢复“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的活动,建立“人民保安队”、“人民宣传队”,开展反搬迁、反破坏的护厂护校斗争。人民保安队沪西指挥部成立,下有队员2万余人。

21日 国民党南京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23日 人民解放军解放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南京。

24日 本年初,中共中央华东局决定组织的南下干部纵队,在南下途中人员增至8000左右,参加接管上海工作。24日,纵队到达丹阳,在华东局和陈毅、曾山同志直接领导下,为解放上海接管工作作准备。

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宣布《约法八章》。中共上海市委通过区委、人民团体联合会及所属各团体,由党员、积极分子利用各种关系,大力进行策反攻心工作,寄发《约法八章》和信件。

30日 上海市军事接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江苏常州召开。出席会议的有:粟裕、唐亮、刘瑞龙、张震、钟期光。唐亮主持了会议。会议提出军事接管委员会由唐亮、刘瑞龙、张震、钟期光、余立金、张崇文、谢胜坤、陈锐霆、张凯、张爱萍、蒋天然11人组成,唐亮、刘瑞龙分别任正副主任。会议还讨论了军事接管的组织分工、力量配备和接收项目等事宜。

下旬 中共中央电示上海局及香港工委,调潘汉年、夏衍、许涤新参加接管上海的工作,潘等于5月初抵北平,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向他们面授了接管上海的方针。5月中旬,潘等到江苏丹阳向陈毅作了汇报,并参加接管准备工作。

5月

3日 中共中央华东局发出《对沪局工作指示》,指出:人民解放军不日就将进入上海,要求中共上海地下组织集中力量保护工厂企业,维持社会秩序,阻止破坏。

月初 中共沪西区委下属有机器业、中纺、民棉一、民棉二、杂纺、卷烟面粉业、

劳工教育、地区、学生9个分区委,126个支部,1194名党员。因沪西地区由吴淞江分割为浜南、浜北,党组织都设在浜南。为迎接上海解放,决定成立浜北分区委,顾松盛任书记,陈宝明、杨汉品、何其友为委员。以备浜南、浜北解放有先后,而领导浜北的斗争。浜南解放后浜北也随之解放,组织也无形取消。

4日 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成立了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上海出席大会的代表有三区棉纺工会党团书记范小凤、申新九厂地下党员何宇珍、毛和林及江怡、钱李仁、江春泽、丁盛雅、郭予均、马林仙、陈龙祥、吴开寿、葛志成、蔡怡曾等。

7日 国民党于浦东戚家庙杀害革命志士12人。其中有3月19日被捕的中共中央上海局秘密电台报务员秦鸿钧和联系电台的张困斋、1948年12月29日早先被捕的另一个秘密电台负责人李白等。他们在狱中受尽毒刑,坚贞不屈。就义时,烈士高唱国际歌,高呼口号。

8日 中共中央上海局刘晓、刘少文从丹阳给在沪的刘长胜、吴克坚、张登、张承宇等同志发出关于上海解放后会师工作的指示电。指出:1.上海即将解放,地下党即将与解放军会师,将与解放区来的大批干部共同工作,必须加强相互团结。真正从思想上认识以解放军和解放区干部为主体的重要性。2.地下党的主要任务是配合与协助解放军,上海解放后,它的任务即告结束,应立即在思想上、组织上与解放军结成一体,形成新的组织系统来统一领导,负担新的任务。3.在全党,首先在主要干部中进行关于城市政策及接管经验的教育,待解放军进入上海后,应即按接管部门、系统分门别类,发动党员及群众积极分子、组织工作组来发动群众,协助接管,支持军事代表,执行军管会一切决定。在各技术部门,特别是铁路、航运、国际电台、工务局、电力公司、公用局、渔管处、财政、税务、海关,要准备一批熟悉情况与技术的干部参加接管工作。

10日 第三野战军于苏州下达《淞沪战役作战命令》。

是日 陈毅在丹阳向南下人员讲话,对进占上海要有两个正确态度:“一方面接管上海大城市要有革命胜利信心;一方面要有虚心谨慎的态度。”讲话还强调入城纪律。

饶漱石向中共中央报告关于接管上海准备工作的情况及机构建立和干部配备的建议。

11日 王尧山在丹阳向南下干部纵队传达华东局《关于接收上海的政策及几个问题》。

12日 解放上海的战役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对上海作战的指示部署作战：以建设为前提，破坏必须服从建设，即既要歼灭上海的敌人，又要保存这座城市，将一个完整的上海交到人民手中。解放上海的各线人民解放军部队分东西两个兵团，从两路向上海行进。

13日 粟裕、张震向华东局、总前委并报军委，请示进入上海市警备需派的兵力。

总前委复电第三野战军并告宋时轮、郭化若，拟派3个军进入市区，2个军驻吴淞、江湾一带担任海防及港口防务。每个部队均应进行驻城专门训练。

第28军占领嘉定县城和罗店镇。第20军占领金山县城朱泾镇和金山卫。第27军占领松江县城。

13日 国民党普陀警察分局的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钱凤岐，党员刘家栋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杨浦警察分局地下党员钱文湘及进步青年蒋志毅。20日，在宋公园被杀害。就义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14日 第29军攻占月浦镇。第26军占领了黄渡镇、南翔镇、马陆镇。第27军占领青浦县城、泗泾镇。第20军占领奉贤县城南桥镇。第30军占领奉贤县旧城和南汇县城。

19日 人民解放军第31军攻克金家桥镇和庆宁寺。第27军占领了七宝镇。第28军攻占刘行国际电台。

20日 中央军委电示粟裕、张震并总前委：据邓小平、饶漱石、陈毅电告，接收上海的准备工作已大体就绪，只要军事条件许可，即可总攻上海。攻击步骤以先解决上海，后解决吴淞为宜。如吴淞不利攻击，亦可攻其可歼之一部，放弃一部不攻，让其从海上逃去。

21日 国民党军警包围中纺三厂印染工场，逮捕工人19人。次日，地下党支部委员、厂工协负责人孙方璟，工协会员张如松、李阶平被杀害。

24日 中共上海市委通知各级党组织，人民保安队紧急动员，全体出动坚守岗位。

是日 解放军进入沪西地区，在各大厂派军护厂。

25日 凌晨1时,苏州河南的上海市区全部解放。晚,人民解放军第26军占领真如车站、真如国际电台、大场飞机场。人民解放军入城后,纪律严明,不入民宅,露宿于马路人行道上。

是日 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人民保安队总部迁至海关大楼办公。沪西、沪中、沪南的人民保安队协助人民解放军搜索散兵游勇,押送看管俘虏,维持社会秩序。沪东、沪北区的人民保安队,对盘踞在工厂中的国民党军进行劝降。人民保安队总部派员接管上海广播电台。百货业人民保安队进驻设在新新公司(今上海市第一食品商店)内的私营凯旋电台,播放“约法八章”和向苏州河北之国民党军劝降。

是日 解放军81师师政委罗维道与沪西区委领导接上关系,欢迎解放军进城。沪西地区解放。

是日 上海人民保安队西区某大队长陈仲信在执行任务时遭国民党残军暗害牺牲。

是日 位于真如的上海国际电台报务员用简便公电“xa”向全世界各地发出了“上海解放”的消息,同时收到不少电路发来的“xa”向中国人民表示祝贺的回电。国民党电信总局曾经命令上海国际电台拆迁设备,运往台湾建台。上海解放前夕,敌人企图破坏电台。在电台地下党支部的领导下,先后发起无首尾圆圈式“反迁台签名书”向群众宣传,组织50多名积极分子参加党的外围组织“邮电联谊会”,成立名为“公益会”的应变委员会,争取爱国主管人员与工程技术人员,勇敢机智完整地保护了电台设施。后来在护台庆功会上,900多名职工中有342人立功,管理工程师卢宗澄获护台特等功。

是日 国民党淞沪警备区副司令、敌守军51军军长刘昌义于下午过吴淞江到西康路劳工医院解放军27军81师师部,与师政委罗维道一起到27军前线指挥部谈判,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改编。

26日 刘部后撤,集结于江湾、大场地区向人民解放军缴械投诚。解放军接管所撤防区。

是日 陈毅、张鼎丞、曾山、魏文伯、刘晓、王尧山等同志和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接管干部队经南翔进入市区。陈毅等同志听取了解放上海部队首长和刘长胜代表上海党作的汇报。

是日 已解放的市区各商店当日即开市营业,各工厂也迅速恢复生产,水电正常供应,社会秩序良好。

是日 中共中央华东局召开扩大会议,上海党与人民解放军胜利会师。同时参加接管工作的人员集中在金门饭店(今金门大酒店)开会,传达毛泽东关于接管工作的指示,布置了上海的接管工作。

是日 陈毅、饶漱石、刘晓在圣约翰大学与上海局刘长胜及中共上海市委部分负责同志会见,并研究部署上海解放后的接管工作。至此,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27日 上海全部解放。

晨,粟裕、张震率三野指挥所由苏州进驻上海市区。

拂晓,人民解放军第23军占领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第27军占领电话总局,下午3时肃清杨树浦地区国民党残余部队,至此,上海完全解放。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告正式成立。陈毅为主任,粟裕为副主任。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开始播音。

28日 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陈毅任市长,曾山、潘汉年、韦悫为副市长。

是日 市军管会委任董镇为接收国民党普陀路警察分局接收专员,开始对该机关实施接管。6月10日,接管工作顺利结束。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成立。董镇任局长。

是日 市军管会派军代表冯镇璋、张腊良接管位于本区的中央印制厂上海厂,改名为上海人民印制一厂。翌日,第一套人民币单凹凸贰佰圆券开印。

附录 6:

解放战争时期沪西革命烈士

(据不完全统计)

姓名	籍贯	生年	职 务	牺牲时间、地点
江其生	江苏常熟	1913	申新九厂工人, 抗战后回乡参军	1946 年遭还乡团袭击, 搏斗牺牲
陈文宽	江苏盐城	1928	沪西出生, 1946 年回乡参军	1946 年在涟水战斗中牺牲
徐寿俊	江苏滨海	1928	幼年居住在沪西, 1946 年回乡参军	1946 年在涟水战斗中牺牲
沈长生	江苏建湖	1912	沪西小贩, 1943 年回乡参军	1947 年在解放战争中牺牲
朱云仙 (女)	南汇	1924	申新九厂工人	1948 年 2 月 2 日申新九厂惨案中牺牲
王慕楣 (女)	浙江杭州	1930	申新九厂工人	1948 年 2 月 2 日申新九厂惨案中牺牲
蒋贞新 (女)	上海	1931	申新九厂工人	1948 年 2 月 2 日申新九厂惨案中牺牲

姓名	籍贯	生年	职 务	牺牲时间、地点
赵 春	安徽怀宁	1923	沪西小贩,1939 年参加新四军,任解放军营教导员	1948 年在淮海战役中牺牲
骆何民	江苏扬州	1914	共青团沪西区委组织部长	1948 年 12 月被杀害于南京雨花台
周宝训	上海北新泾	1923	中华书局职员,1941 年参加中共,坚持地下工作	1948 年被捕,1949 年 5 月 7 日被杀害
钱凤岐	河北河间	1909	普陀路警察分局警察,中共地下党员	解放前夕被逮捕,1949 年 5 月 20 日被害于宋公园
刘家栋	江苏泗阳	1910	普陀路警察分局警察,中共地下党员	解放前夕被逮捕,1949 年 5 月 20 日被害于宋公园
徐海峰	江苏宿迁	1922	1946 年在沪西国民党政部被服厂做工,从事中共地下工作	1949 年 5 月 13 日被捕,20 日被杀害
孙方璟	安徽寿县	1920	中纺三厂一印工场工人,从事中共地下工作	1949 年 5 月 13 日被捕,24 日晨被杀害
张如松	江苏宝应	1928	中纺三厂一印工场工人,从事中共地下工作	1949 年 5 月 13 日被捕,24 日晨被杀害
李阶平	江苏南通	1928	中纺三厂一印工场工人,从事中共地下工作	1949 年 5 月 13 日被捕,24 日晨被杀害

姓名	籍贯	生年	职 务	牺牲时间、地点
郑文信			中共地下工作者, 四行两局总管理处职员, 家住朱家湾	上海解放前夕在住处被捕, 关押在南市看守所, 被秘密杀害
陈仲信			上海人民保安队西区第二大队长	1949 年 5 月在沪西执行任务时牺牲
杨天衡	江苏盐城		华中公安战士, 在沪从事地下工作	1949 年 5 月被杀害
李怀纲	山东东阿	1921	解放军二十六军七十七师二三一团一营副营长	1949 年 5 月, 上海战役, 解放真如镇战斗中牺牲
张相水	山东泰安	1923	解放军二十六军七十七师二三一团一营一连代连长	1949 年 5 月, 上海战役, 解放真如镇战斗中牺牲
吕云吉	山东	1929	解放军二十六军七十七师二三一团一营一连副指导员	1949 年 5 月, 上海战役, 解放真如镇战斗中牺牲
周有才	安徽怀宁	1927	解放军二十六军七十七师二三一团一营一连副班长	1949 年 5 月, 上海战役, 解放真如镇战斗中牺牲
恒风保	湖北麻城	1922	解放军二十六军七十七师二三一团一营一连战士	1949 年 5 月, 上海战役, 解放真如镇战斗中牺牲
张敬光	山东胶县	1932	解放军二十六军七十七师二三一团一营一连战士	1949 年 5 月, 上海战役, 解放真如镇战斗中牺牲

姓名	籍贯	生年	职 务	牺牲时间、地点
侯文堂	山东文登	1924	解放军二十六军七十七师 二三一团一营三连班长	1949年5月,上海战役, 解放真如镇战斗中牺牲
李玉福	山东新泰	1930	解放军二十六军七十七师 二三一团一营三连副 班长	1949年5月,上海战役, 解放真如镇战斗中牺牲
史敬和	山东	1924	解放军二十六军七十七师 二三一团一营三连战士	1949年5月,上海战役, 解放真如镇战斗中牺牲
郭观君	湖南	1928	解放军二十六军七十七师 二三一团一营三连战士	1949年5月,上海战役, 解放真如镇战斗中牺牲
彭玉儒	河南商城	1930	解放军二十六军七十七师 二三一团一营三连战士	1949年5月,上海战役, 解放真如镇战斗中牺牲
陈 原	广东	1930	解放军二十六军七十七师 二三一团一营三连战士	1949年5月,上海战役, 解放真如镇战斗中牺牲
张德卫	山东泰安		解放军二十六军七十七师 二三一团一营三连战士	1949年5月,上海战役, 解放真如镇战斗中牺牲
侯振远	山东		解放军二十六军七十七师 二三一团一营三连战士	1949年5月,上海战役, 解放真如镇战斗中牺牲
王大新	湖南		解放军二十六军七十七师 二三一团一营三连战士	1949年5月,上海战役, 解放真如镇战斗中牺牲
王开培	福建南平		解放军二十六军七十七师 二三一团一营三连战士	1949年5月,上海战役, 解放真如镇战斗中牺牲

姓名	籍贯	生年	职 务	牺牲时间、地点
李连治	福建南平	1913	解放军二十六军七十七师二三〇团六连班长	1949年5月,上海战役,解放真如车站战斗中牺牲
谭忠华	安徽五和	1925	解放军二十六军七十七师二三〇团六连班长	1949年5月,上海战役,解放真如车站战斗中牺牲
方安东	湖北苏城	1917	解放军二十六军七十七师二三〇团六连副班长	1949年5月,上海战役,解放真如车站战斗中牺牲
李如山	河南民权	1932	解放军二十六军七十七师二三〇团六连副班长	1949年5月,上海战役,解放真如车站战斗中牺牲
张治华	四川		解放军二十六军七十七师二三〇团六连副班长	1949年5月,上海战役,解放真如车站战斗中牺牲
杨顺堂	河南宝丰	1913	解放军二十六军七十七师二三〇团六连战士	1949年5月,上海战役,解放真如车站战斗中牺牲
徐志超	山东	1915	解放军二十六军七十七师二三〇团六连战士	1949年5月,上海战役,解放真如车站战斗中牺牲
孙庭玉	山东	1920	解放军二十六军七十七师二三〇团六连战士	1949年5月,上海战役,解放真如车站战斗中牺牲
许德伦	河南高尚	1921	解放军二十六军七十七师二三〇团六连战士	1949年5月,上海战役,解放真如车站战斗中牺牲
林树贵	山东商河		解放军二十六军七十七师二三〇团二连连长	1949年5月,上海战役,解放绿杨桥战斗中牺牲
陈传义	山东宁阳	1928	解放军二十六军七十七师二三〇团二连排长	1949年5月,上海战役,解放绿杨桥战斗中牺牲

姓名	籍贯	生年	职 务	牺牲时间、地点
彭章国	湖南		解放军二十六军七十七师二三〇团二连副排长	1949年5月,上海战役,解放绿杨桥战斗中牺牲
梁 光	广东怀集	1920	解放军二十六军七十七师二三〇团二连班长	1949年5月,上海战役,解放绿杨桥战斗中牺牲
雷秀福	四川梁山	1914	解放军二十六军七十七师二三〇团二连副班长	1949年5月,上海战役,解放绿杨桥战斗中牺牲
孙步云	山东临沂	1928	解放军二十六军七十七师二三〇团三营通讯员	1949年5月,上海战役,解放绿杨桥战斗中牺牲
卢梅义	安徽	1928	解放军二十六军七十七师二三〇团七连战士	1949年5月,上海战役,解放绿杨桥战斗中牺牲
刘效路	山东沂南	1927	解放军二十六军七十七师二二九团三营三连指导员	1949年5月,上海战役,解放真如地区战斗中牺牲
李会福	山东鄆平	1922	解放军二十六军七十七师二二九团二营四连排长	1949年5月,上海战役,解放真如地区战斗中牺牲
伊松山	山东蒙阴	1926	解放军二十六军七十七师二二九团三营七连排长	1949年5月,上海战役,解放真如地区战斗中牺牲
范金楼	山东	1923	解放军二十六军七十七师二二九团二营七连副排长	1949年5月,上海战役,解放真如地区战斗中牺牲
魏守禄	山东临朐	1928	解放军二十六军七十七师二二九团一营三连副排长	1949年5月,上海战役,解放真如地区战斗中牺牲
卞根元	山东新南	1928	解放军二十六军七十七师二二九团二营九连班长	1949年5月,上海战役,解放真如地区战斗中牺牲

姓名	籍贯	生年	职 务	牺牲时间、地点
荣光传			解放军二十六军七十七师 二二九团一营三连副班长	1949年5月,上海战役,解 放真如地区战斗中牺牲
傅永君	四川慈县	1918	解放军二十六军七十七师 二二九团一营三连战士	1949年5月,上海战役,解 放真如地区战斗中牺牲
石炳文	河南汾阳	1924	解放军二十六军七十七师 二二九团一营机枪连战士	1949年5月,上海战役,解 放真如地区战斗中牺牲
聂金星	山东邹县	1926	解放军二十六军七十七师 二二九团一营二连战士	1949年5月,上海战役,解 放真如地区战斗中牺牲
傅厉扬	湖南醴陵	1927	解放军二十六军七十七师 二二九团一营二连战士	1949年5月,上海战役,解 放真如地区战斗中牺牲
张永时	河南宁陵	1930	解放军二十六军七十七师 二二九团一营二连战士	1949年5月,上海战役,解 放真如地区战斗中牺牲
王金亭			解放军二十六军七十七师 二二九团一营二连战士	1949年5月,上海战役,解 放真如地区战斗中牺牲
黄洪坚	湖北	1928	解放军二十六军七十七师 二二九团一营三连战士	1949年5月,上海战役,解 放真如地区战斗中牺牲
高重修	河南商丘	1929	解放军二十六军七十七师 二二九团一营三连战士	1949年5月,上海战役,解 放真如地区战斗中牺牲
张体仁	河南	1930	解放军二十六军七十七师 二二九团一营三连战士	1949年5月,上海战役,解 放真如地区战斗中牺牲
陈教功	江苏淮阴	1930	解放军二十六军七十七师 二二九团一营三连战士	1949年5月,上海战役,解 放真如地区战斗中牺牲

姓名	籍贯	生年	职 务	牺牲时间、地点
时颂直	山东		解放军二十六军七十七师 二二九团一营三连战士	1949年5月,上海战役,解 放真如地区战斗中牺牲
沈光华	四川金堂		解放军二十六军七十七师 二二九团三营八连战士	1949年5月,上海战役,解 放真如地区战斗中牺牲
高成泉	河北成县		解放军二十六军七十七师 二二九团三营八连战士	1949年5月,上海战役,解 放真如地区战斗中牺牲
黄世良	广西连山		解放军二十六军七十七师 二二九团三营八连战士	1949年5月,上海战役,解 放真如地区战斗中牺牲
李致强	河南陕县		解放军二十六军七十七师 二二九团三营八连战士	1949年5月,上海战役,解 放真如地区战斗中牺牲
蒋永迁	山东沂水		解放军二十六军七十七师 二二九团三营八连战士	1949年5月,上海战役,解 放真如地区战斗中牺牲
张观福	山东沂水		解放军二十六军七十七师 二二九团三营八连战士	1949年5月,上海战役,解 放真如地区战斗中牺牲
杜长恒	湖北阳新		解放军二十六军七十七师 二二九团三营八连战士	1949年5月,上海战役,解 放真如地区战斗中牺牲
李胜三	山东商河		解放军二十六军七十七师 二二九团三营八连战士	1949年5月,上海战役,解 放真如地区战斗中牺牲
郝兴修			解放军二十六军七十七师 二二九团三营八连战士	1949年5月,上海战役,解 放真如地区战斗中牺牲

后 记

《拂晓》——解放战争时期沪西地下斗争回忆,历时一年余,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在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前夕,与大家见面了。

该书以解放战争时期沪西地下斗争回忆为主题,采用口述和撰写形式,记录了60年前沪西地下斗争峥嵘岁月的片段。在征集和采编中,许多当事人怀着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或口述或动笔从不同侧面追忆、再现沪西地下党在中共上海市委领导下,积极开展波澜壮阔的地下斗争,参与迎接新中国的解放,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为我们留下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丰富教材,也为人民共和国60华诞献上了一份厚礼。

在本书编纂过程中,得到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领导和相关处室同志的大力支持,悉心指导,亲自审稿,提出许多针对性意见和建议。解放前中共上海市委唯一健在的委员马飞海同志在住院期间欣然为本书作序。中共普陀区委办相关同志抽出时间协助审稿;许多老同志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对为本书的出版付出努力的领导与同志们一并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本书由于篇幅和其他条件所限,一些稿件未能入选;另有健在的老同志没来得及采访,深表歉意。同时因我们水平有限,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批评指正。

编 者

2009年9月

